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

第一章 山雨欲来

我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于60年代首次相识，其时他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已有几年之久。他已离职，确切地说是“让”他离职的。他同妻子加琳娜和小女儿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

因为我当时年纪很轻，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因而他的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他那种感情迸发和为正义事业一往无前地投入战斗的能力就愈发使我感到惊讶。

他的住处摆满了书籍、手稿、杂志、文件。这些东西放在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或者堆放在地板上。

斯涅戈夫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是我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尖锐问题，他干着今天称之为消灭“空白点”的工作。二十二大已经开过，斯大林的尸体已经移出陵墓，但没敢挪得太远，就在近旁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这种两重性随处可见。全国刚刚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有所认识，“个人崇拜”这个词组念起来还有些拗口。

几年前，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词组呢。为了对30年代的事件进行初步分析而成立波斯佩洛克那个专案组时，父亲第一次说出

“个人崇拜”这几个字。自然就开始查找经典作家原著中有没有什么切中时弊的论述，而且当然是找到了相应的语录。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地点在别墅。给父亲送来一个装文件的公文包，他从中取出一个薄薄的银灰色文件夹，里面是经典作家的语录。父亲让我给他朗读马克思关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及不能容许个人崇拜的思想。

我从标题开始读：

“卡尔·马克思论个人文化。”

当时对这个错误嘲笑了一番，可要是仔细想想，这个印刷错误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因为要想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的。

当时斯涅戈夫的话就使我惊讶不已，他论证说，并不存在斯大林的个别错误和谬见，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那罪恶政策的结果。这些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在30年代并非偶然。斯涅戈夫说，其根源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革命事件中。斯涅戈夫不但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而且抨击了整个被奉为经典的历史。

斯涅戈夫撰写了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其中论及斯大林对列宁1917年夏天出庭问题的立场，也论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悲剧性的擅自行动——那是1920年战争中红军在波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要是在今天，这些材料就会归类存放起来。可在当时它们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斯大林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不让这些研究材料问世。站在斯涅戈夫对立面紧紧抱成一团的，是以我们的主要思想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费多

罗维奇·伊利切夫为首的一些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是他们写了被斯涅戈夫批得体无完肤的“历史”，斯涅戈夫指责他们在伪造历史。

斯涅戈夫在同保守分子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支持，他

俄文中“崇拜”（ ）与“文化”（ ）词形相近。（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对这两人的正直毫不怀疑。通过正式途径见到高层领导人很困难，他又信不过赫鲁晓夫的那些助手，至于在赫鲁晓夫班子中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他干脆认为那是苏斯洛夫的人，隐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斯涅戈夫通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找到了我。谢尔戈论职业是历史学者，同斯涅戈夫见过几次面，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米高扬，但事情毫无进展。

有一天，谢尔戈建议我去斯涅戈夫家，并答应让我见识一下此人所拥有的关于斯大林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材料。我当然是欣然从命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十分敏捷的人，目光犀利而严峻。他看上去年岁不小了，但浓密的黑发只是微微有些斑白。主人请我们进他的书房，茶端上来了。斯涅戈夫一下子给我们讲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方法、关于当代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息。他反复强调一点：斯大林主义并未摧垮，二十大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是胜利。

斯涅戈夫也谈了自己的身世。他（当时叫阿廖沙）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命运使他东奔西走。他就是在那几年起先见到米高扬，后来又在乌克兰见到默默无闻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当时在斯涅戈夫手下工作。后来的生活使他们各分东西。父亲青云直上。斯涅戈夫的升迁则慢多了。

1937 年来临了。当时任州委书记的斯涅戈夫受到迫害，他受尽了地狱般审讯的种种磨难，却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最后被判

了 25 年徒刑，他便从赫鲁晓夫的生活中、也从米高扬的生活中消失了。

沦陷期间，法西斯分子把他的母亲当成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母亲活活烧死。而斯涅戈夫却作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关在劳改营里受苦受难。战争结束了，然而这对他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

1953 年到了……

斯大林 3 月去世，贝利亚一心夺权。斯涅戈夫跟贝利亚十分熟悉。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俩曾在外高加索共过事。后来也曾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但他俩从未亲近过：两人彼此都没有好感。斯涅戈夫了解贝利亚的许多情况，其中包括贝利亚认为最好不去回忆的事情。他也知道贝利亚内战时期替木沙瓦特分子干事的经历，并记得此人在格鲁吉亚飞黄腾达的血腥历史，没有忘记“历史学家”贝利亚那本完全颠倒外高加索革命历史的书。

斯涅戈夫尽管掌握这类情况，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53 年贝利亚被捕。准备进行审讯，侦查机关四处寻找证人。证人已几乎绝迹。能够讲出犯人过去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才想起了斯涅戈夫。在劳改营里找到了他，火速送到莫斯科。受害者与刽子手在法庭上又见面了……

审判结束。贝利亚被处决了。

然而原告方面的证人后来的遭遇却很不寻常。新任苏联总检察长是斯涅戈夫过去的好友罗曼·安德列耶维奇·鲁坚科。囚犯斯涅戈夫被押送到检察院，两人相见了。

鲁坚科在谈话中老是避重就轻，不过末了他目光闪烁地问斯涅戈夫，他可以替斯涅戈夫做些什么。

据斯涅戈夫说，他听了此话只是惊讶地抬起了头。

于是鲁坚科便向他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斯涅戈夫已被判刑，谁也没有取消这一判决。他还得回劳改营服刑。最后鲁坚科向斯涅戈夫提出在释放前替他保存笔记。

斯涅戈夫一时竟目瞪口呆……

他交出了自己的笔记，鲁坚科把笔记藏进自己私人的保险柜。

囚犯斯涅戈夫的日记就这样在总检察长的保险柜里放了两年多。

他本人呢……去继续服刑。他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差点被刑事犯杀死。时间仿佛停顿了。监狱外传来的消息很少，真想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啊。为什么不释放他们呢？难道仍然是一切照旧吗？

终于盼来了 1956 年。2 月，举行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父亲决定请在斯大林大清洗后幸存下来的老共产党员作为来宾参加大会。助手向他呈阅名单时，父亲突然想起了斯涅戈夫。谁也不敢告诉他斯涅戈夫还在继续服 1937 年所判的刑。

下面赶快四处寻找。于是从监狱里把缺衣少食、胡子拉茬的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直接送到莫斯科。当下把囚衣换成质地上乘的西服，发给一张进克里姆林宫的邀请券。至于尚未服满的刑期，当然再没有人想起了……

大会闭幕后，父亲一直注视着斯涅戈夫。在打破旧体制的过程中，他对象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或者奥丽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图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人寄予厚望。他需要志同道合者。

沙图诺夫斯卡娅出狱后被派往党的监察委员会搞平反工作，

斯涅戈夫则被派往内务部当“政委”，然而保守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终于以体面的借口精简掉了斯涅戈夫所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光荣退休”。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喝着茶。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讲得愈来愈起劲，愈来愈激动。不断地回忆、论证和解释着。

他要我们相信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只有根小一批年轻的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对手可比这多得多，这些人在经历了二十大引起的休克后已经清醒过来，只待伺机反扑。

斯涅戈夫说苏斯洛夫和他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的敌人。用他的话说，正是这些人在阻挠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他们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批判斯大林方法的尝试，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犯下的罪行。任何新事物、进步事物的一点点萌芽，都让这些阅历“丰富”的“园丁”们那颇有经验的双手拔得一干二净。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尝试被无情地中断。斯涅戈夫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表示不满，责怪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自由主义，行动迟缓。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父亲是“不务正业”。

斯涅戈夫说：“他干吗要去管工业和农业上的各种问题？一个人又不可能包办一切。应该干的不是种玉米，而是同主要的敌人，即斯大林主义及其在我们心脏中——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深深扎根的追随者进行斗争，不然的话，旧体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里必须有一个正直的原则性强

实际上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在父亲亲自过问下，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的时间要早得多。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相见，斯涅戈夫还积极参加了为无辜判罪者恢复名誉的艰巨工作。他未必会忘记自己被释放的日期。很可能是他觉得这样来叙述往事更富有戏剧性。我没有纠正他叙述中的不确切之处。——作者

的人，一个能够进行整顿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要赋予他特殊的权力。

“如果能在中央委员会获胜，那么往后的前进步伐就会加快，并可保证不定回头路。赫鲁晓夫身边能够让机关来个大换班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为任何创举设置障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只相信米高扬一个人。他认为赫鲁晓夫就应该让米高扬来对中央机关进行清洗。”

斯涅戈夫请我向父亲转交一封要求接见并有重要问题相告的信。我有些犹豫。从前也有人拿着类似的申诉信来找我。我转交给父亲时，他必定要剋我一顿，并且说这类申诉信应当交到中央

办公厅，那儿知道该怎么处理。

无论怎么犹豫，我毕竟还是同意了：斯涅戈夫又不是一般的告状者，他是在为共同的事业感到焦虑。

我从那天起就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交上了朋友，每次见面，斯涅戈夫都介绍一则又一则详情，并且援引事实，说明赫鲁晓夫本人、更重要的是他奉行的政策正在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对。

过了一段时间。信写好了。我找了个机会把信交给父亲，并且简要他讲了讲我所知道的情况。他不知为什么对来自老同志的消息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句斯涅戈夫的极端主义，信也不拆就往口袋里一塞。父亲不久接见了斯涅戈夫，但当我问起谈话后有何感想时他却不大耐烦，他说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许多事情夸大了，许多问题他根本不明白。也许斯涅戈夫的话里有正确的成分吧，但照父亲看来，他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对，言过其实，至于那些担心嘛，更是毫无根据。

父亲不愿把谈话继续下去，此后我们再未涉及这个问题。

我去找斯涅戈夫。他感到绝望，火冒三丈。据他说，父亲什么也不明白，根本没有把他的话说进去。斯涅戈夫给他介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以及背着他进行的阴谋活动。希望他理智和警惕，提醒他注意所面临的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父亲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还说斯涅戈夫想象力太丰富，所以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

赫鲁晓夫对他说，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彻底忠于思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怀疑他们热衷于代表大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不要算旧帐，那样会引起新的暴力仇恨浪潮——这就是父亲对斯涅戈夫呼吁进行侦查和惩办刽子手的反应。

至于斯涅戈夫要说服他把日常的经济工作交给专家去做、自己专管党的政策的根本问题，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还说没有比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更重要的问题了，而且他认为解决这些日常问题就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同意把米高扬调到中央来，借口是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

“他简直是个睁眼瞎。”斯涅戈夫未了说。

谈话不欢而散。在见父亲之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见过米高扬，可在那里也是一无所获。总之，她感到绝望。

我不知不觉也受了斯涅戈夫情绪感染的感染：我感到必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我开始为我们的国家（不必隐瞒，也为我自己）提心吊胆起来，觉得周围全是一帮阴谋家。

走出斯涅戈夫的家就一切都变了。生活照常进行，而且很美好，这是年

轻人所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周围都是一些可爱而友好的面孔，善良而诚实的笑容，同那满是书籍文件的住宅里作出的预言丝毫吻合不上。我去斯涅戈夫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再说在见过父亲后他也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了。现在我对他的斗争已经帮不了什么忙。我很快就将所担心的事情置诸脑后……与此同时，生活仍在继续。1964年新年即将来临。这一年对父亲说来具有纪念意义：他即将满70周岁，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也将近10周年。

为庆贺新年，在刚刚竣工的克里姆林会议宫顶层的大厅里举行了招待会。凡是曾经去过会议宫的人都很了解这个大厅：每到休息时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设在那里的小吃部。

最近几年，在这个大厅里而不在家中与家人一起迎新年，已成为父亲的惯例。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主席团委员和党中央负责干部、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工作人员、军事将领、先进生产者、作家、导演、演员、诗人、剧作家、画家、飞机和火箭设计师、外交官。

大厅角落的高处竖着一棵五彩缤纷的大枞树。招待会搞得豪华气派，人们频频举杯，舞兴甚浓。客人们到了后半夜才纷纷回家与亲人一起“继续欢度”除夕之夜。

有些人喜欢这个新办法：可以在这里结识新朋友，进行有趣的谈话，建立必要的联系。有些人却不以为然：新年是家庭的喜庆活动。话虽这么说，倒是人人都去，一个不落。

父亲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个殷勤的主人。这一年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后他又当了几天部长会议主席，然而当“反党集团”成员分别派往遥远的城市时，他的退职就已经定好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等人陆续退休并返回莫斯科来。布尔加宁也回来了。他孑然一身。老朋友中很少有人敢跟他来往。

父亲想见他，于是就给这位下台总理发出了参加新年招待会的请柬。

我相信父亲的动机决不是想见一见吃了败仗的对手，七十将至，他愈来愈多地想起年轻时代，怀念故旧。他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系密切：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布尔加宁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他俩同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一幢楼房的五层，门对门。甚至在那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沉闷时期，他俩也常常避过旁人的耳目到对方家中小坐，呷两口茶或是来上一杯白兰地……

在那次难忘的新年晚会上，父亲热情地迎接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人拥抱，同从前一样，并且……分手了，这次是永远地分别。

晚会结束了，枞树上的彩灯熄灭，音乐止息，父亲又投入日常的紧张工作。情况远非尽如人意。必须找到出路，找到那条唯一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启动经济机制的“线索”。然而事情千头万绪，纷乱如麻，问题一大堆……

父亲明白（当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单纯指望工人阶级的热情、“赶超美国”的口号都已经毫无效果，也不可能有效果。他拼命探索一种能够保证经济机制在无需上面反复敲打的情况下顺利运行的经济模式。却仍然没有实际结果。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离开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就一事无成。

每个新的步骤不仅碰到各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暗地里的反对，而且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反抗。市场、竞争、利润可都是早在20年代就批得体无完肤的，

当时宣称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够跨越这道障碍呢？……

但是又不能原地踏步，需要找出“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的办法。

较为生疏的新思想传播起来十分困难。父亲支持哈尔科夫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赞成胡坚科任场长的哈萨克国营农场所进行的试验。当时他脑子里形成了经济改革的轮廓，甚至作出了主要的原则性决定。这次他一反常态，并不急于求成，他想反复验证那些给未来经济奠定基础的原则。因为一旦犯错误，没有时间去纠正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也注意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同铁托的多次谈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仔细地了解南斯拉夫朋友的经验，却下不了决心在我们国家推广。思想家们异口同声地一再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纯，资本主义味道甚浓。人们对他说，南斯拉夫道路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

父亲试图在我们今天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结构范围内探寻把国民经济从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拯救出来的办法。这个体制的逻辑就是要求在各个级别、各个环节对生产进行干预，要求不仅对每个工厂或农庄，而且对每个车间、生产队、车床进行严密的监视。

为了使这个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把州党委和区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

用行政命令办法抓经济，其实质就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直到区一级机关中，都应当是一些事无巨细亲自处理的人。这样一来，机关里的专家愈来愈多，而工作却干得愈来愈糟。结果是机关变得十分臃肿。

父亲所陈述的意图很简单：国民经济变得异常复杂，州委或区委书记、他的班子已经不可能既是工业专家，又是农业专家。就是说应当成立起两个平行的机关。总之，同克雷洛夫那篇著名寓言里说的一样：只消把坐位换一换，就一切都上轨道了。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根本不应干预经济事务的思想，当时尚未成熟。说实话，压根儿没往这儿想过。

我听父亲讲过这些想法。看来它们早已在酝酿之中了。那年夏天，他在离利瓦季亚不远的克里木新别墅里休养。用白砂石砌成的房屋里凉爽宜人，可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海滨浴场的帆布凉篷下度过的，很少呆在室内。他在海边看邮件，同来访者交谈，其中有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有住在附近疗养院的客人——设计师、学者、作家。凉篷下就装有政府专线电话。父亲往往就在这里、在比海滩稍高处搭建的一间木结构小棚屋中过夜。

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在父亲这儿作客，好象还有波利扬斯基。他们在邻近的别墅里休养，照父亲的说法是来“串门儿”的。大家分别坐在海边的藤椅上。从容地谈论国是。然后下海游泳。顺便说说，父亲游泳不行，要借助一个很象自行车胎的红色橡胶救生圈。关于把州委一分为二的谈话早在水中就开始了，上岸后，父亲继续讲自己的想法。最后他不作声了。大家马上异口同声地对他表示热烈支持。“主意很不错。得马上贯彻，”——这是我当时的印象。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显得特别兴奋。

我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这个计划，不过按照老规矩，我不敢参与长辈的谈话。他们更了解实际情况。我要是不同意，那就说明我的想法不对。

不久，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对党的机关进行改组，而且这个想法开始付诸实施了。然而希望注定无法兑现：经济并未好转，新出现的双重领导反而加重了混乱。此外，改组的结果使机关又膨胀了。这个决定引起各级党和经济

领导人极大的不满。这是父亲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改组。但正确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找到……

是啊，事情不顺利，于是父亲亲自去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他下工厂，去田间，哪儿也不想落下，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却总是顾此失彼。

尽管如此，这几年还是许多方面都有起色：住宅建设铺开了，开垦了荒地，垦荒明显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开始发展重化工。

外交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十大提出的关于防止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论点宣布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也使无限膨胀的军队得以缩减，并进而发展到裁军。

苏美军事力量保持均势问题的解决，也对缓和起了促进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国领导人始终生活在恶梦中：美国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复。如今导弹一出现，两个大国都处在平等的地位。结果是开辟了裁减兵力的可能性。苏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几乎裁减了一半。父亲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再多裁一些，以便腾出人力和资金来发展国民经济。服现役的年限缩短了。年轻人返回家园，经济得到了一批生力军。

这些步骤引起了将军们的不满，他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和特权。他们不愿意就此罢休。但是父亲坚定不移。他摸透了军界人士的脾气，却不打算跟着这些不大高明的军国主义者的指挥

棒转。他认为将来只应保持相互遏制的最低限度兵力，而且父亲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导弹热正是方兴未艾，而他已经十分认真地提出了让许多导弹工厂转产民用用品的问题。

新的作法使同美国开始裁减核武器谈判成为可能。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在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是一大成绩。对父亲的最后一个推动力是在新地岛进行的超级氢弹爆炸。它的极其有害的后果被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记录下来。很清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到了应当考虑如何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时候。

国内生活也有重大起色。二十大所开始的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过程必然转变为我国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民主化。起草新宪法的问题提出来了。事情进展缓慢，很不顺利，但毕竟在进展中。

父亲异常操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的继承，如何建立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更不许滥用权力的社会保证与国家保证。关键问题之一是劳动人民代表的选举。父亲建议取消只提一个候选人的现行制度，同时提几个候选人，以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出一名最好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代表对选民的实实在在的依从关系。

为了证明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他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女作家万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娅为例，父亲高度评价她的创作和社会活动。她经常来我们家作客。亲密的关系从战争时期保持至今。1939年，万达·利沃芙娜这位资产阶级波兰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女儿投奔已经收复的利沃夫，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国永远地联结在一起。战争期间，她同丈夫、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一起经常下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万·利·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波兰、苏联作家。作品有《水上歌声》（1940—1951）、《虹》（1942）等。

亚·叶·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国务活动家。作品有《前线》（1942）、《在第

见过父亲。然而作为代表她……什么也没做过。而且最令人注意的是，乌克兰当局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每次选举都把她放到一个离上次选区远一些的新选区去。那里的选民对于她这个代表还不了解……

“哪有这么办事的！”父亲表示愤慨。“这叫什么代表！随便塞个人来就让你选！”

然而他未能改变漏洞百出的选举制度。没有时间了。

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确定这样一种苏维埃工作程序，使之能够切切实实地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生活进行监督的问题。提出了使之具有更大权威和充分权力的任务。新宪法的一种文本中曾经考虑到使苏维埃向按照西方国家议会惯例不间断地工作过渡的可能性问题。

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把担任领导工作的任期缩短到两至三届的思想已经成熟。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适用于党务工作人员的这样的决定。现在只需把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家机关并在新宪法中作出明文规定。可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任满两届后的工作人员上哪儿去？他能够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直接以美国为榜样。他在两次访问这个国家之后，尽管没有完全抛开“敌人的形象”，毕竟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大洋彼岸的经验和试用这些经验了。诚然，他在公开场合从未讲过可以借鉴国家结构体系中的优点。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偶尔

很谨慎地提及。

但是，如果说父亲的其他许多新措施，不管是否赞成，机关毕竟都贯彻了，虽然有时也不满地嘟囔两句，那么这一次他可捅了马蜂窝。区级以上的领导层一片恐慌。岂止是出现了一批不满者，简直是形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渴望采取积极行动的反对派。

取消机关工作人员的斯大林赋予的许多特权，这一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在这方面，二十大以后马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取消所谓的“红包”，即定期给一定级别的官员发放的免税的补助金。不过秘密报告引起的恐惧使官僚们一时麻木了，看来，因此“减薪”才没有引起多大的痛苦。大家实在是吓坏了，对夜间抓人记忆犹新，所以才没有勇气来进行抵制。

不过休克很快过去了，机关明白如今谁也不会有被处决、被捕或者被流放的危险了。官僚们愈来愈有把握地感到自己是决定性力量、局势的主宰者。接二连三的提议都是光打雷不下雨。关于取消内部供应商店和削减专用小车的建议本应由中央专门任命的小组来起草和执行。该小组组长最初是当时任中央第二书记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钦科。小组开过会，讨论过，建议过，推翻过和明确过，却……什么也没有决定。

父亲着急，一再催促。人们要他相信，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拿出一些文件给他看。他暂时放心了，于是一切又依然如故。

基里钦科下台后，又换了几位组长，最后，1964年10月以后，小组即不复存在。父亲得以办成的唯一一件事，是稍稍缩小了专用小车的停车场。

当然，通过取消特权来确立社会公正更多地具有道义性质，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它。满足对商品的需求只有通过生产数量充足和质地优

良的商品才能做到，而不能靠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些决定使那些有可能失去特权的人怀恨在心。而且相当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妻子。这一切在赫鲁晓夫倒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精简国家机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部里精简下来的官员调到国营农场、委员会和其他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新单位。可想而知，这些措施也丝毫不会增加官僚们对父亲的好感。今天，对于父亲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平常关系议论甚多。显然，对这个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只是斗胆提出几点看法。

二十大的结果使社会生活、文学和艺术急剧地活跃起来。新的名字、新的作品纷纷涌现。人们开始大声谈论昨天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权威”摇摇欲坠。这时才发现政权本身并未作好接受变化的准备。事态的发展令它感到突然：如此“老实”听话的创作知识分子居然失去控制，拒绝听从习以为常的上头的吆喝。这一新现象使许多人感到惊恐，而惊恐则产生了对策。

父亲从未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专家，象在农业、工业或者建筑业方面一样。官方的思想界由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把持着。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对立的双方都来找父亲告状：作家寄来被书刊检查机关否定的作品，而“思想家们”只要“缰绳”稍一放松，就异口同声地危言耸听，说什么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从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以绞刑架和动枪杆结束的。只要“缰绳”一放松，我国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种警告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没有经济作后盾的扩大政治自由，很容易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父亲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没有下决心迈出打算实行的那一步。下野之前的最后那几年因为他同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发生过激烈冲突而蒙上一层阴影。他同那些实质上同他站在一个营垒的人展开了斗争，这特别令人遗憾。

其实，应当说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有人对父亲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让他相信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我国创作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我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众所周知，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

有人精心选择好时机，挑动赫鲁晓夫去发表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使他同那些昨天还是他的最热烈的支持者的人闹翻。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除了这一切不幸之外，又加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麻烦。欧洲的风暴刚刚止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这次是同中国发生分歧。对于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的对抗的起因和后果进行分析，那是专家们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独自承担了冲突的全部责任。有人以为这并非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而是两国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一意孤行的表现，有人则是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为了彻底明白这种看法怎样站不住脚，是需要许多年时间的。

问题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年近七十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父亲回家时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走上两圈，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五颜六色的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那份工作。他就在这里、在饭厅的桌前阅读，或者到二楼的卧室里去。尽管家里有书房，他却从来没有利用

过。通常都要工作到深夜。早上九点钟，他总是已经端坐在办公室里。

由于无休止地阅读，眼睛疼痛，他愈来愈多地请助手或者我们这些做孩子的给他大声朗读。那些年，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给父亲规定了缩短的工作日，额外增加了两星期的休假。决定成了一纸空文，工作不仅占去整个工作日，而且占去了全部业余时间。额外的假期他倒是利用了：若是到皮聪达、克里米亚或是比亚沃维扎密林区去该有多好，哪怕稍微脱离一下老一套生活方式。父

亲在那儿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带根本性的问题。他当下就把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以致中央的报告的形式写出来。父亲经常利用休养中的空闲时间开会，或者同学者和设计师谈话。我还记得许多人在皮聪达开会讨论航空业、导弹制造业、化工的发展道路的情形。

父亲十分清楚他的精力已经耗尽，而且即将来临的70寿辰也标志着一定的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和执拗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愈来愈多地想到退休。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说着玩儿，有时则挺认真。他在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据我的记忆，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典型说法。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而周围的人都打着哈哈，把他的当玩笑。

但是他在这一年，同青年会见时第一次公开说起退休的事儿。他的讲话刊登在各家报纸上。这番话里隐含着重要的意图吗？我想，父亲确实打算退下来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即将临近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把那当成自己最后的界线。

他的话在家里不会引起异议，工作上的同事却激烈地表示反对了。

“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气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年轻人充沛！”人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我认为很难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老是有新的想法，新的计划。他想把这些东西一一付诸实施之后再退。

然而无论关于退休的想法有多么认真，父亲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时时刻刻牵挂着。权力继承问题在最近这几年一直困扰着他。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找到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他终于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此人愈来愈

受到父亲的信任，尽管免不了发生冲突和尖锐的争吵。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科兹洛夫患了重病——中风。在他稍稍恢复知觉，从医院里回到别墅时，父亲曾去看望他。那是个星期天，父亲象往常一样把我带上。从前科兹洛夫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两家彼此都很熟悉。

科兹洛夫的别墅离得不远，刚过乌斯宾斯基就到了。汽车经过千篇一律的绿色院门，停在正门门口。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的妻子，还有其他人。我们进了屋。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睡的床放在房间中央，这是为了便于护士走到病人跟前。靠墙的小桌上放着药品、消毒器和针管。

科兹洛夫半躺着，身下掖着枕头，脸色苍白，略带黄色。我们进去时他认出了父亲，试图挪动身子、张口讲话，但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叫人看了心里难受。父亲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设法让他振作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打趣说，科兹洛夫在休息，装病。该康复起来去上班了。

我们道别之后来到隔壁的房间。医生们都在这里。他们向我们说明，弗罗拉·罗曼诺维奇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

“能工作吗？”父亲问道。

医生的判决是一致的：绝对不行，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科兹洛夫是指靠不上了……

父亲记住了医生关于神经紧张可能置病人于死地的警告。因此在下一次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谈到科兹洛夫的命运时，父亲建议尽管弗罗拉·罗曼诺维奇有病，还是让他留任主席团委员。没有人表示反对。但是1964年10月以后又修改了这一决定，让科兹洛夫退休。医生的话真灵验。他经不起这个折腾，不久就去世了。

科兹洛夫这一病不起，使父亲面临着更加尖锐的问题，现在不光牵涉到今后谁来接班，而且还有眼下中央第二书记的人选问题。

答案一直没有找到。无人可以商量。于是这些令人苦恼的疑虑、一吐为快的内心需要，大概就成了我有幸深入到极其神圣的政治家“厨房”、成为父亲深思熟虑的见证人的来由吧。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容易着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都喜欢十分高兴地同任何人详细讨论自己所热衷的某种想法。家里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有关用于住宅的预制板制造的术语，我们很了解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和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的优缺点，我们知道转炉炼钢比马丁炉炼钢强多少倍，不仅懂得玉米的栽培特点，还懂得谷子、小麦、蔬菜，葡萄，水果等的栽培特点，我们为可以用塑料代替金属而欣喜若狂，我们注视着水翼船的进展，还了解其他许多情况。

因为我参与了国防工作，父亲还同我讨论有关飞机、导弹、坦克的问题。但他同我们说话时从不涉及人事问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禁谈的话题。甚至在1957年6月，当时矛盾已经以剑拔弩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和以后的中央全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只能从间接的征兆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消息是从别处得来的。至于说向父亲提问题，那根本不可能，答案早就知道，说法也是老一套：

“别多管闲事，别添乱了。”

所以，当我问起科兹洛夫的事，父亲突然说起他闷在心里的疑虑时，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那是1963年深秋在别墅里的事情。晚上我们出去走走。我们在路灯的灯光下沿着从院门到住处的柏油路散步，父亲冷不丁他说起了主席团内部的情况。据我记忆所及，他对科兹洛夫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甚感惋惜。用他的话来说，他对弗罗拉·罗曼诺维奇期望甚殷：此人在地方上干过，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若指掌。父亲认为没有谁可以代替，而他自己又已到了考虑退休的时候了。精力不如先前，也应该给年轻人让路了。“我拉套拉到二十三大就告老退休，”这是他当时的话。接下来他说自己老了，其余的主席团委员都是到了退休年龄的老爷爷。年轻人几乎没有。父亲是45岁那年当上政治局委员的。这是干大事的最佳年龄：精力充沛，来日方长。人到了60岁就不想将来的事情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

弗·罗·科兹洛夫（1908—196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7—1964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因为又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人。很想找个年轻一点的人。起初父亲对谢列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看来是最佳人选：年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诚然，对经济工作知之甚少。为此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丰富的革命传统。经过这样的锻炼后即可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他认为把中央书记的官僚交椅换成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的职位是降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父亲叹息道。“也许这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本想让他去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熟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就当官僚当下去了。不了解生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位。”

记得父亲当时不作声了，沉思起来，后来才又继续谈论可能接替科兹洛夫的人。其中谈到波德戈尔内。尼古拉·维克托罗维

奇·波德戈尔内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他经验丰富，但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总之，照父亲的意见，他也不适合担任此职。

说到这里，他谈到勃列日涅夫，说此人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但父亲认为，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的鼻子走。战前他被任命为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时，当地俏皮话专家送了他一个绰号，叫“芭蕾舞女演员”。意思是谁想怎么摆弄他都可以。而这个岗位上却需要有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休想把他引上邪路的人。科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见勃列日涅夫也不行。

父亲不作声了。这次谈话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我们又在通往住处的那条柏油路上徘徊良久，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看来，父亲在脑子里反复掂量着可出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几个人选。

我却因这一意外的开诚布公感到抑郁。我当时想，既然父亲不得不就这些问题跟我讲心里话，那就可见他有多么苦恼和孤独了。从前不曾有过这种情况。从前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谈到人事这个禁谈的题目。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类话题上来。他的这些心里话我自然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尽管父亲没有提醒过我，我并不需要类似的提醒。

这样，当我得知仍然打算让勃列日涅夫当中央第二书记时，我的惊讶就不难想象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不过我也没有向父亲提出什么问题……

我本人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倒满有好感。他脸上老是挂着友善的笑容。一张口就是一段趣闻。我对他酷爱多米诺骨牌倒是

觉得有点奇怪：这种癖好同我心目中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太不协调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好象一点也不为这种可以引以为荣的推荐感到高兴。他不大情愿，但是又只得服从。

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是……默默无闻。这是在分支机构很多

的党的机体内部的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和……对失败负责。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性格、他天生的爱好更适于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体面的职务。这儿的一切他都很喜欢：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早宴、午宴、晚宴、看戏。授勋、颁奖也很惬意。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获奖者的讲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他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必须作出许许多多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很难预料的后果的决定。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有意见，但是别说拒绝，连表示不满的话都张不开口。他只是对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1964年2月10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了。这是最后一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召开的全会。中心议题又是农业。父亲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不能说他没有探索过能够发挥生产者的主动精神、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经济新方法。这些问题曾在会议和报刊上讨论过，也搞过试验。不过可惜他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求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和农艺方面的具体方案上了，而且这些方案必须象魔杖一挥似地解决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全会上，由农业部长沃洛夫钦科作报告。曾几何时，

这位农场场长官运亨通，竟一跃而为部长。他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炮打响，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某些建议。父亲便抓住不放。父亲认为我们在农业上的挫折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他以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以使情况有个根本的改变。

沃洛夫钦科就这样当上了农业部长。然而奇迹并未出现。此刻他正在作报告，题目就很花哨：《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看来，连题目都是面面俱到的……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农业专家、学者。实际上这已不是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父亲采取了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作法，在会上详细讨论某些经济问题。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机关干部认为，这样一来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谋反”的想法。

父亲那种力求亲自深入考虑问题、弄清事情本质的愿望给他的工作作风打上了明显的烙印。有时这种作风带来积极的效果。他的干预对工作推动很大，例如火箭制造业就是如此。不过往往也有适得其反的意外之事，例如李森科的事情。

关于我父亲生涯中这一并不光彩的篇章，我只想讲讲我亲眼所见的情况。

50年代初，我对李森科和遗传学问题的了解，只限于中学课本和科普书

上的内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 把那些唯心主义伪学者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些人不去解决我国农业的重大问题，却

“摆弄”什么果蝇。现在我们则走的是米丘林的正确道路。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当年我对这类问题兴趣不大。

1956年4月我在《真理报》看到两则用大号字排印的短消息大为吃惊，它们刊登在不常登短讯的第二版右上角。

第一则消息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洛巴诺夫同志调任他职，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凯维奇接任该职。这位副主席原来专管农业工作。

稍稍靠下是另外一则消息。我全文照引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消息。苏联部长会议同意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任命帕维罗·帕甫洛维奇·洛巴诺夫同志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消息到此为止。并无调任其他职务和别的字样。这样的行文别说是50年代，就是今天也隐含着完全失去一切地位的意思。

消息没有放在最后一版的右下角，却放在不寻常的位置，还有铅字的大小，这些都说明赋予消息一定的意义，说明这不是职务变动，而是政策的改变。

我感到愕然，等父亲下班刚进家门，我就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说话的细节我自然已不记得了，不过他答复的大致意思是说，李森科卷入不好的事情（当时“镇压”一词还不通用），对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已有许多学者表示异议。因此“上边”决定对他的无限权力加以限制。应当由较为客观的人来当指挥。李森科嘛，就让他干工作，在学术争论中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好了。父亲对于李森科和遗传学家之间争论的实质不甚了了，我想，他不大思考这个问题。

应当说，当时父亲和我的心目中“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框框是牢牢地扣在了“遗传学”这个字眼上的。在我看

来，那简直就是骂人话。

李森科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并不屈服。他在等待时机，拼命加强自己的地位，在中央委员会和农业部招兵买马，拉支持者。他干起这事来十分在行。父亲的农业助手安德列·斯捷潘诺维奇·舍夫钦科及后来成为中央书记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波利亚科夫都让他“拉了过去”，成了他的热烈支持者，而且一有合适机会，他们就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说好话。

众所周知，父亲认为解决粮食和种子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推广玉米。我不打算涉及“玉米问题”，我只是想说，任何一项好创举只要毫无节制，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败坏明智的想法的声誉，有时甚至无法挽回。今天，任何为玉米辩护的论据已经对非本行的读者不起作用。众所周知，玉米的王国在美国。美国人喜欢种植玉米，也善于种植。父亲知道这个情况，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代表团远涉重洋去开开窍，学习先进经验。他们返国后向父亲详细汇报了所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其中也谈到杂交种子产量最高。当时就下令火速到美国采购杂交种子并在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平行研究。

李森科那伙人坐不住了。因为杂交玉米的成功就是一条对他们的对手有

利的论据。他们决定小心地来摸一摸赫鲁晓夫的底。

“我对你们的理论争论不感兴趣，”父亲回答说，“杂交种子在美国取得了好收成。这些种子也可以为我们服务，至于理论嘛，让学者们去研究好了。”

仗打败了，但李森科不肯投降。他在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了。

列宁格勒州苏维埃主席斯米尔诺夫本人是农艺师出身，他访问奥地利归来。当时的出国旅行还很稀罕，父亲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访问印象、新技术和“世界上的新奇事儿”。斯米尔诺夫十分着迷地介绍说，奥地利人的秧苗是连同一立方土以及腐殖质与泥炭

的混合物一起栽种的。这个过程可以实行机械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主要的是秧苗不会遭受病虫害，产量也提高了。

父亲以他所特有的热情开始在我国“推动”来自外国的主张。这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不知是舍夫钦科还是波利亚科夫找他来了。那是个星期天，见面地点在别墅，他们经常来看看父亲栽种的东西，顺便也办自己的事情。在田间讨论着各种问题时，客人仿佛是不经意地向父亲诉苦说，简直把我们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给忘了。魏斯曼和摩尔根分子压得他抬不起头，妨碍他的工作。他们自己什么也提不出来，却拿这位对农业实践贡献甚多的真正学者出气。他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自己的东西，只承认外国来的东西。那些泥炭腐殖质营养钵就是最新的例子，大家都对它赞不绝口，承认它很起作用，可前两天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来了，讲了好多有趣的事情。他对如何提高产量和如何提高产乳量都有很好的建议。

顺便说说，他带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牢骚满腹。原来他几年前就建议在蔬菜种植中推广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他找过好多单位。到处碰壁。还取笑他。可同样的想法从国外一来，大家全都当宝贝。我们看不起自己的科学家。我们全都拼命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屁股后面跑。老是大家一窝蜂地都搞果蝇，至于如何提高产量、让老百姓吃饱，他们并不操心。

客人从公文包里取出那篇文章的单行本，交给父亲。上面确实实谈的是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从照片上看这些营养钵同奥地利的一模一样。缺口打开了。父亲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关于我们崇洋媚外和必须支持苏联科学家的话，并且当下吩咐给李森科提供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保证他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争论归争论，”他最后说，“但是大家都应该有进行工作的条件。”

要的就是这个。余下来就是技术问题了。吹嘘合意的指示和

阻挠不合口味的最坚决的指示，机关干起这种事情来可说是得心应手。李森科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所失去的地位。他给中央写报告，保证快出成果，他又成了各次会议上的职业演说家。他在党中央农业部的支持者们善于掩盖失误。可只要这位冒险主义者有一句话得到证实，那就受到没完没了的吹捧。一有了成绩就争先恐后地向父亲报告。至于表示怀疑的声音，那根本听不见，更不用说批评的话了。

对李森科一伙有利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事情很小，可它生动地说明，任何小事只要好好“加工”和善于“呈送”，它可能具有怎样的心理效果。

两位院士——齐钦 和李森科，开始争论谁的小麦产量高。父亲一贯对育种工作有兴趣，他对新品种的主要数据倒背如流，十分高兴地视察种子试验站，认识许多育种专家——小麦、向日葵、马铃薯新品种的发明人。他对此事也兴趣甚浓，甚至把两位院士请到别墅来作客。

争论双方都援引了大量论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是谁非无法分清。于是父亲决定略施小计，建议来个竞赛。离我们的别墅不远，在莫斯科河对岸有一块地。父亲主动找农庄主席谈判，让对方把土地拨给两位竞争者种一季庄稼，由父亲作保。每个人种自己的那一半，运用自认为必需的农业技术，让收成来说明谁是谁非。就这么定下来了。把地翻耕了，施了肥，播上种。每到节假日，只要天气暖和，父亲就当划手，我们坐在小船上。父亲喜欢这样划船游玩。从我家别墅所在的乌索夫到试验田所在地伊利英斯科耶并不远：路程需要 40 分钟左右。父亲的小船后面，远远地跟着卫兵的船，卫队长坐在船头，警惕地注视着周

围的动静。值班的卫兵保持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因为父亲不让他们靠近，有点粗鲁地叫他们回到原处：

“你们紧跟着我转悠干吗？是用鼻子嗅吗？离得远点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登上左岸。李森科或者齐钦照例已在田间等候。附近的小丘上是莫斯科州党委的疗养院“伊利英斯科耶”。莫斯科州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这里度过节假日。父亲 1949 年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后，习惯在游玩时到疗养院去，在那儿拉上一帮人，大家一起在田间边走边讨论工作，或是就象父亲所说的那样“取笑逗乐”。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仍然没有丢掉这个习惯。

总之，参观试验田的人有时很多。自然，大家都关心究竟谁胜谁负。起初从种种迹象看来齐钦领先：他那半边的庄稼长得又厚又绿。可这时李森科夺得了心理上的胜利。一个星期天，父亲照例来到田间，他给李森科来了个激将法：

“齐钦的小麦可长得好一些。”

李森科默不作声地在小麦地里走着，开始在自己这半边，然后又到对手那边。他连根拔起几株小麦，仔细看了看，表示不能同意。他声称他会取得原来保证的收成，齐钦则将一无所获，因为麦苗营养过剩，就是说，不会结籽。秋天，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于是李森科在父亲的心目中威信大增。

当然，这只是我所记得的一些片段，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片段：事实上，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时李森科可以对自己的敌方下手了。不时可以听到关于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分子压制学者的抱怨。愈来愈坚决地强调指出李森科的成绩和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毫无成果。于是父亲投入战斗，去捍卫“真正”的学者。李森科便重新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人。

应当说，随着父亲对李森科的正确性的信念日益加强，我却正好相反，日益对此产生怀疑了。学术性刊物上东一篇西一篇的

文章描述了遗传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遗传信息载体——基因的实

尼·瓦·齐钦（1898—1980）苏联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有农作物远缘杂交方面的著作。

验结果。我感到困惑不解：既然这一理论引用了纯属物质的对象，怎么会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呢？

我曾几次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个话题。但时机错过了，他已对李森科确信不疑，不需要我的论据了。不仅不需要我的论据。库尔恰托夫、拉夫连季耶夫、卡皮察三位院士和其他人都试图说服他。然而这些努力均未奏效。一方面，“农业专家们”一致拥护李森科，并保证快出成果。他们已经看见过，亲手摸过并请赫鲁晓夫本人看过这些成果。照父亲看来，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农业的门外汉：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不愿考虑这些人的论据。

记得有一次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正好同拉夫连季耶夫院士站在一起。当时我已经明白了谁的意见对，谁是在撒谎。我已经毫不怀疑。我可说是一心投入战斗。我既知道拉夫连季耶夫的观点，也知道父亲对他有多么敬重。他俩早在基辅就认识，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后，父亲对拉夫连季耶夫更是倍加赞赏。我认定自己找到了同盟者，于是谈话中为了抛砖引玉，泛泛地提到真正遗传学如何正确，李森科的观点又是如何错误。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拉夫连季耶夫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成了拨弄是非的人，他喃喃他说：

“我已经不管这事了。”

说完就走开了。

我象遭了雷击似地呆立不动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读到生物学家饶勒斯·梅德韦杰夫的书，该书记述了（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李森科如何发迹和生物科学如何被断送的全部经过。这本用打字机打印的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小图书馆的书架上。我读完全书后，不禁毛骨悚然。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父亲擦亮眼睛，认清真相，使他免受羞辱。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论据，寻找无可辩驳的理由，等待合适的时机。我有几次都是用仿佛无可争议的前提开始谈话的：

“你干吗往里掺和？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吧，况且已经得出的结果证明基因确实存在，已经有人看见基因了。”

可是毫无效果。父亲阴沉着脸，大为光火，“顶撞”我说：

“你是个工程师，这方面一窍不通。别人一怂恿，你就跟个八哥似地人云亦云。那些专家，懂行的人，说法可正好相反。”

他的论据中也有自己的逻辑，因此我更感到难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他在其他科技领域都赞成竞赛的精神。设计师们提出各自的方案，互不相让，只有最终结果才能说明他们的正确与否。可父亲在这方面不知为什么坚定不移，他最后一条驳不倒的论据就是指责对方是唯心主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渗透的说法。

伊·瓦·库尔恰托夫（1902/03—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技工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核反应堆（1946），制造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1949）、世界第一颗热核炸弹（1953），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1954）。

米·亚·拉夫连季耶夫（1900—1980）苏联数学家、力学家。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第一任院长。在函数论、微分方程论、连续介质力学和应用物理方面创立了新的流派。

彼·列·卡皮察（1894—）苏联物理学家，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组建者和第一任所长。发现液态氮的超流动性（1938）。研制出利用涡轮冷气发动机使气体液化的方法。

他经常要碰到去中央反映问题的学者。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必须由他最后决定支持某一方并且拨出不少财力物力来实施某个方案。他最讨厌盲目地作决定，通常都是在学者中找一个其客观态度完全信得过的人。他最怕成为某些人达到一种目的、即使是纯科学目的的工具。他在学者中间物色了很久。最终选中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

他们最初的密切交往始于1956年4月访问英国期间。尤其是在往返途中的巡洋舰上接触最多。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身上，学者的知识同国务活动家的睿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同原子能的军用及和平利用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有似乎同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哲学、生物学、宇宙学。

当时，1956年，他在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鲁埃尔发表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第一次谈到苏联所进行的研究。从前这些材料可是绝对保密的。

院士那一脸又宽又密的黑色胡须同样引起英国人的注意。在那我们两国刚刚重新开始接近的遥远年代，大胡子被认为是俄国人形象中必不可少的象征物。除了布尔加宁蓄着“教授”的山羊胡子外，代表团成员全都把脸剃得光光的。却来了这么一个大胡子。整个访问期间，只要库尔恰托夫在大街上一出现，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

回国后，父亲同库尔恰托夫过从甚密。他们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见面。库尔恰托夫还不止一次地到我们的别墅来。原来，两人想到一起去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为科学发展的前途甚感焦虑，他那充满活力的天性需要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库尔恰托夫有一次到我们的别墅来时，抱怨说父亲不得不更多地过问科学上的问题和作出重要的决定。可为此就需要有高深的学问，而且不仅是专业知识。他说，必须深入了解学者们的后台工作，他当下毛遂自荐愿当父亲的科学顾问。看来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索、十分成熟的想法。

父亲不喜欢人家强加于他。尤其不喜欢缠磨。我原以为他会很有礼貌地拒绝。但是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看来是在考虑答案，然后他说，库尔恰托夫说到了点子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而且不止一次地想到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照父亲的说法，有两个因素使他望而却步：库尔恰托

夫就是我国的全部原子能计划，而这件事情可丝毫马虎不得。除此而外，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学者、院士，而顾问则是官员的角色。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库尔恰托夫当时反驳说，“而且我建议把顾问当成社会工作。”他微微一笑，“不要报酬，我仍然在原单位上班。”

这番话正中父亲的下怀。当时就作出决定。讲好了等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稍事休息之后就走马上任。

遗憾的是，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库尔恰托夫休息之后再没有回来。他猝然去世。人们打电话到别墅向父亲报告了噩耗。他吩咐在红场上举行葬礼。放下听筒后，他若有所思他说：

“多好的一个人。可惜还没有一起共过事。我对他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啊……”

在这类事情上，想象是靠不住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实现，李森科就会十分困难，很可能就无法继续把父亲愚弄下去了。可现在他是畅

通无阻。我和姐姐拉达 不知有多少次试图让父亲了解真相，却屡屡因他不理解而碰壁。

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 1964 年夏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我们坐在面朝莫斯科河的凉台上。父亲在一张藤制小桌上铺开白天没来得及看的文件。他看上去很累。周围坐着拉达、我和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大家各忙各的。象这样大家坐在一起是习以为常的了。父亲突然丢开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没头没脑地迸出一句，说的是李森科的成就和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魏斯曼—摩尔根分子的诡计。

我们弄不清他说这话究竟何所指，却又不能不答话。拉达和

我便小心翼翼地论证说，遗传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其中没有丝毫的唯心主义。李森科所谓基因谁也没有见过的说法是很荒唐的。原子也是谁也没见过，原子弹可确实存在。这个论据在我看来是驳不倒的。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也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这次谈话把父亲惹恼了。尽管他在家从来没有训斥或者骂过人，连嗓门都没有提高过，那天却动怒了，他高声重复着自己的老一套：说我们让坏人利用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晓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声称不能容忍家里有人给外人当传声筒，我们要是坚持下去，那就不要让他看见。总之是大吵大闹了一场。大家玩没有玩成，又生气又难受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拉达跟丈夫回家去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呢？原来父亲快下班时，来了一帮农业“专家”。他们牢骚满腹，埋怨“唯心主义者”不让“真正的”学者，特别是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生活和工作。他们没有忘记点我们的名。说拉达和谢尔盖也在跟着帮腔，当然不会有什么恶意，不过是欠考虑罢了……

近来父亲身边有人专挑他特别劳累的时候，诽谤那些要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唯心主义“蜕化变质分子”。这些滑头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望引起父亲的恼怒和激烈反应，他们好趁机会煽风点火。遗憾的是这一招往往奏效。刚才提到的那一次，父亲已是疲惫不堪，无法立即作出反应，所以只是默默地把话听完，心绪不佳地乘车回家。整个晚上这一切在心中郁积起来、沸腾起来。最终发泄到我们身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不提昨天的事。父亲看来是为自己的不能自制感到羞愧，但特洛菲姆·杰尼尔维奇的目的却达到了。我们让父亲参加关于遗传学的谈话的努力从此中断了许久，而十月之后，讨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此后几年我再没有同父亲提起过李森科，我是不想给他增加不快，因为现在的观点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尽管如此，看来

他还是不肯根本改变观点。有时客人向他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他诚然没有特别冲动，不再骂“魏斯曼—摩尔根分子”了，却替李森科辩解，认为这是个为我国农业贡献颇多的实际工作者。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 1964 年的二月全会吧。除了农业部长的报告外，还听取了许多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副报告。父亲也在全会上讲了话。这是最后一次了。

许多当年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则保持沉默，不过如果把以某

拉达·尼基季奇娜；阿朱别伊是我的亲姐姐，学的是生物专业，现任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副主编。同记者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结婚。——作者

种方式参与过那段时间的事件的各色人等的点滴材料综合到一起，就可以满有把握他说：1964年1—3月这段时间中央书记处内部形成了赫鲁晓夫的对派，其中有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这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还未完全明朗，看来角色也还没有分配好，但活动却开始了。

需要摸清中央委员、州委书记、军界领导人的心态。1957年的教训仍记忆犹新，当时中央全会站到了似乎已经彻底失败的赫鲁晓夫一边。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其中包含着一旦计划落空的不小危险。现在，当年的一些参加者和见证人已经把1964年发生的事件讲了出来。

例如，原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在同一名记者谈话时说，逼赫鲁晓夫下台的准备工作早在免职的大约八个月前就开始了。他说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因为离开他谁也别想开始。

另一位见证人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讲出了确切的日期——3月14日。他讲述说：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住在一幢独院住宅里……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前来祝贺。大家在餐桌旁边坐了很久，酒也喝了不少。说话基本上围绕着国内情况……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犹犹豫豫，我觉得他们象有什么心事。他们讲到上层相互关系中的难处，中央机关工作不协调……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抱怨命运不

济，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当时我就产生了恐慌不安、尴尬的感觉。我还不知道这一切之后……过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我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想法还没有，但是感到了恐慌不安。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恐慌。不过总隐隐约约有一点预感……他们不大信得过我。是在摸我的底。”

看来，就那几个月的准备工作而言，“摸底”是个关键词。

进行着不易觉察、却十分坚决的工作：串连，谈话。这一切都伴之以对父亲的过分吹捧：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开始上映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该片是按照不久以前的“优秀”传统拍摄的，充满了毫无节制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曾让父亲看过这部片子。他默默地看了一遍，并未夸奖，但也未禁止。编好了赫鲁晓夫彩色相册，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相片。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还有一部分始终未能问世。每次讲话，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要提到父亲。这场运动的调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定的，其他人则拼命地随声附和。

这时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记得不知是1962年还是1963年的夏天，在去休假途中，父亲决定按老习惯到乌克兰州去巡视。他想看一看收割前的田野，视察工业企业。这已成了习惯。他不过是眷恋着乌克兰的广袤土地。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次视察的计划中包括视察不久前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电站旁边发展成了整整一个城市，名称不大好听，叫克列姆水电站市。

一列车队从基辅出发。前面是赫鲁晓夫和波德戈尔内及其他

共和国领导人，在他们之后是长长的一条“尾巴”。我在很靠后的地方。我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骄阳似火。我们驱车来到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城市。我

蓦地大吃一惊：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

几年前根据父亲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不以至今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的决定。许多人起来反对，不知为什么伏罗希洛夫反对得最起劲，不过决定还是通过了。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十分愤慨地回想起战前的年代，当时出现了一股风，弄一大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和村镇。简直是一场竞赛：又是莫洛托夫市，又是莫洛托夫斯克，又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又是基洛瓦巴德，真是别出心裁，无奇不有。

车队停在市委大楼前面。我挤到前面去，根据周围的人的反应可以看出：父亲没有作声。地方领导人本来绷紧的面孔绽开了笑容。大家参观了城市，到大坝去兜了一圈，在市委里座谈了一阵。父亲仿佛根本没有看见指路牌。最后驱车前往码头，余下的路程是乘轮船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轮船起航了。大家都聚集在船舱内，即将开始午餐。

父亲在讲话的开头表示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荣誉。在座者无不点头称是，争先恐后他讲起父亲的功绩，说他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甚多，倍受爱戴。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了。从进入市区的那一刻起，我就老是觉得局促不安。我以为父亲会提出抗议的，所以这样的开头使我感到沮丧。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头。

“你们难道没有看过中央的决定吗？要不就是认为决定可以不必照办？！”父亲接着说。“我坚持禁止用领导人名字给城市命名。可这儿出现了我的名字！你们把我往哪儿搁呢？”

接下来便狠狠地批评一通。次日报纸上登出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视察克列姆水电站市的消息。

可惜未能做到持之以恒。

工作中的不顺遂总是引起不满，迫使人们寻找罪魁祸首。父亲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今天我们很难去判断当时关于人事调动的那些决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很难判断调动的原因和理由。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些调动并不乐意，同情并不在赫鲁晓夫这一边。1963年12月9—13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先是通过了关于广泛实行农业化学化的决定（按照美国的榜样，父亲认为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然后又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选举，谢列斯特接任此职，父亲对谢列斯特并不十分了解，是波德戈尔内极力推荐的。波德戈尔内在不久前调到莫斯科之后，很快得势，最近几年的十月革命节纪念会上，正是由他来作报告。而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我们不知道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据说，赫鲁晓夫最近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汇报很不满意。也有许多关于他的副手们在他的职务调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议论。父亲同这些人曾在乌克兰共过事，对他们言听计从。中央全会后谢尔比茨基又当了一段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不久就到一个州去任书记了。人们对这一决定的普遍不满几乎公开化了，因为谢尔比茨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

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1月6日，父亲同他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之邀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父亲在仲冬时节通

常都要遵照医生嘱咐休息上十来天。波兰领导人请他去打几天猎，于是他带上马祖罗夫，打算同往常一样兼顾休息和工作；帮助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

关系。再说总的说来他对马祖罗夫抱有好感，也很敬重。1月中旬，我请假到边境去迎接他们。父亲打算在白俄罗斯再呆两天。他住在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别墅里。一次出外游玩，马祖罗夫用很长时间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看法。具体讲些什么我没有听，尽管我一直跟在身边。象这类有我在场的谈话不在少数。我只记得父亲不喜欢马祖罗夫的想法，并加以纠正。马祖罗夫不同意，便产生了龃龉。他们来了个不欢而散，然而彬彬有礼、友好地分手的。当父亲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突然对前来迎接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夫时，我真是太吃惊了，他说两人谈了许久，但马祖罗夫的建议不合格。应当考虑把他撤掉。大家都对这番话感到意外，诚然，没有人表示异议。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看来，父亲冷静下来之后再次仔细想了想当时的谈话，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至少再没有提起解除马祖罗夫职务的事情。肯定有人马上把父亲的话密告马祖罗夫，此后他决不会属于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列了。

这样的步骤不会提高父亲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威望。

与此同时，生活照常进行。象往常一样，除同迫切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有关的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外，又加上了会见、招待会、出行。冬天和春天父亲曾去过匈牙利、乌克兰、列宁格勒。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中央领导的大权愈来愈落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更自信更自由。他的归来愈来愈不受欢迎，因为他妨碍人家贯彻自己的路线。父亲事无巨细全要过问，这样的监护自然叫他们觉得冒火了。我觉得历史学家们低估了父亲与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晤。许

多人在文章中说父亲把年轻的美国总统教训了一通，时间都花在毫无成果的争论上了，肯尼迪则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据我所知，在维也纳发生了最主要的事情——相识。父亲自维也纳归来时，对此人印象极佳。他认为这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谈判对手，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是个讨他喜欢的富有魅力的人。

他们在一次交谈中产生了就当时而言十分大胆的想法：安排苏美联合登月旅行。当时有一股席卷全球的太空热，我们和美国人在比赛看谁最先登上月球。他们认为联合登月设想对加强信任大有好处。两人都赞成这个想法，但事情毫无进展。无论在我国还是在美国，均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后来那两年父亲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把该设想付诸实施，却屡屡受到军方人士的抵制：因为只要实施这一想法，就得向美国人公开我们的军事秘密，展示火箭，而在民用宇宙飞船中许多工艺方案与军用火箭完全一样。父亲暂且还未下决心向军界施加压力，以克服这一严重障碍：老观念的惰性实在太强了。美国总统所遇到的情况，看来也是大同小异。

我记得在达拉斯发生悲惨事件之前不久，父亲在列宁山上的住所周围散步时曾再三提到对他颇有吸引力的想法。然而一声枪响中断了肯尼迪的生命，而父亲又不想同继任者讨论这个问题。他对肯尼迪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1963 年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好感和信任，而在父亲的生活中内心的好感与反感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作为政治家能够加以克制，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就总是受自己的好恶所左右。

他也是这么爱上了范克莱本：爱他的直率开朗、才华横溢，爱他那迷人的微笑，父亲几次去听他的演奏，并邀请钢琴家星期天到别墅来作客。他对这位可爱的美国青年始终保留着最亲切的

回忆。

春天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播种。必须要有一个好收成。前两年的挫折迫使我们到国外购粮，烤制品的质量也降低了。父亲认为进口粮食是仅此一次的非常措施，权宜之计，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了。我们毕竟应当学会种庄稼嘛。对那种把收成不好都归罪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说法他是根本不予承认的。

“这是替官僚主义者辩护，敷衍塞责，”他通常这样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这儿旱了、那儿涝了的事情年年都有，可是其他地区收成不错嘛。所以总是可以找到为自己经营不善辩护的理由，总是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天旱或者阴雨连绵上面。不要对我作这样的解释。收成好坏，全看我们大家干得如何。”

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这不，在日常的劳碌中4月悄然而至。4月17日，父亲满70周岁。

这一天跟以往的生日一样快乐，却又令人悲伤：煽动起来的对父亲崇拜的浪潮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妈妈对所有这一切“过火行为”特别敏感，却……保持沉默。我们发现父亲也不喜欢这种热烈的颂扬，但他也保持沉默，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全家人都让巨大的响声吵醒了：卫兵们正在往餐厅里抬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子：是在中央和部长会议一起共事的同志们送的礼物。这份礼物是绝无仅有的。父亲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严格要求不要给他的生日送礼，尤其是苏联的单位别送。

“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什么礼物也别送。”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这一禁令也适用于家庭成员，不过我们当然没有遵守指示。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也没

有理睬它。

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上午9点钟，前来祝寿的客人就陆续到齐，他们是亲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没有别的时间了，余下的时间要举行正式活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

我们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会。

1953年以前，父亲、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许多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家人都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大楼里。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多层楼房中的生活使父亲觉得不舒服。我们在基辅住的是一幢一层的独院房（是革命前一位万事亨通的药铺老板的住宅），周围是一个大花园。那里可以散散步，可以在板凳上小坐，思考问题，稍事休息。

父亲到了莫斯科，也没有改掉下班后散步的习惯。他经常拉上住在我们

楼下的马林科夫出去。顺着加里宁大街，去红场，围着克里姆林宫转。有时去亚历山德罗夫公园，或者改变路线。从高尔基大街返回。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让人设计了政府官邸，准备建在郊区，列宁山上，莫斯科河畔。马林科夫让父亲看了图纸，起初父亲有些犹豫——是不是太花钱了，但后来同意了。原来计划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迁入新居。不过没有全都决定搬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还有别的什么人迁至格拉诺夫斯基大街。

官邸的第一层是正房：大餐厅和客厅。这一层还有两套两居室住房，房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在第二层。

前来祝寿的人愈来愈多了。新来的人进入客厅，三三两两地相互交换新闻，讲着笑话。没有人抽烟，因为父亲受不了烟味。

寿星姗姗来迟，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父亲终于出现在洒满阳光的柞木楼梯上。客人们涌向前去。握手，祝愿健康幸福——总之是象通常一样什么都说，同被祝寿者的官阶大小无关。勃列

日涅夫亲吻了父亲。那股热闹劲儿渐渐平定下来了。父亲请客人入席。大餐桌上摆好了生日宴的美味佳肴。往常即使碰到喜庆日子，客人也很少有坐满半桌的时候，今天则座位不够，大家挤着，房间角落里也坐着人。

这个房间是许多大事的见证人，包括家庭大事和国家大事。当初，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正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直到深夜。父亲曾在这里口授致肯尼迪的信。诚然，事件的最高潮时他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

1963年一个秋天的晚上，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正是把电话打到这里来，报告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十分不安的父亲要求马上与美国大使联系，了解详情，久久不见答复。父亲等得不耐烦了，再给葛罗米柯去电话，回答是已经要了华盛顿的长途。

“我是说给美国大使去电话。这样来得快些。”父亲纠正说。

几分钟后，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去世。当即决定派苏联代表团去美国。由米高扬任团长……

而今天，这里却喜气洋洋。

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分首先致词，他朗读了由在场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值您七十寿辰之际，我们，您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谨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全体鼓掌）

我们同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把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看成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英勇战士。（掌声）

您热烈紧张的政治和国务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无穷的精力和革命意志、坚忍不拔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全体苏联人对您的深深爱戴和尊敬。（掌声）

我们十分幸运地能同您并肩工作，并以您为榜样，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党的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贡献出

自己的全部力量，向着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

衷心地祝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您在宏大而神奇的活动取得新的成绩。（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认为您才只度过了前半生。希望您至少再活这么多岁，也活得这么辉煌，这么富有成果。值此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们亲切地拥抱您。

以下签名的是您在座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全国还有许许多多人一并在此致意。”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是动情，他拭去眼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拥抱在一起。大家都走过来，碰杯，讲两句应景的话。最后大家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于是勃列日涅夫把漂亮的文件夹面交被祝寿的人，里面是刚才读过的贺信，按字母表顺序和职位高低签名如下：

列·勃列日涅夫	.叶弗列莫夫
根·沃罗诺夫	基·马祖罗夫
安·基里连科	B.姆扎瓦纳泽
弗·科兹洛夫	彼·谢列斯特
阿·柯西金	尤·安德罗波夫
奥·库西宁	彼·杰米切夫
阿·米高扬	.伊利切夫
尼·波德戈尔内	鲍·波诺马廖夫
.波利扬斯基	维·波利亚科夫
米·苏斯洛夫	亚·鲁达科夫
尼·什维尔尼克	维·季托夫
维·格里申	.谢列平
沙·拉希多夫	

这个文件夹使它的发起者们始终不得安宁，直到被祝寿者去世为止……

我把贺信重读了一遍，不禁想起当初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名字上报都是毫无例外地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因此每次父亲的名字都排在后面。至于今天这个把总书记放在第一位的顺序，如同这个标题本身一样，已是由勃列日涅夫确定的。

面交贺信仿佛算是正式祝寿的结束。通常这种场合所特有的那种闹哄哄的情况开始了。那些与父亲共同走过如此不平常道路的战友们先后起立致词。祝贺、祝愿、祝酒词滔滔不绝。两个小时后，该散会了：接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晚上则是大型招待会。

前来参加生日庆典的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各兄弟党的中央书记。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也来了。他同父亲之间有着多年的友情。

许多人都是带着勋章来送的。因此庆典结束时，让讲话和握手弄得精疲力尽的父亲身穿的上衣又加重了不少分量。

第二天，一切都步入往常的工作轨道。生日已成过去，需要考虑未来的事情了。

当时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4月19日，波兰代表团回国，25日又是阿尔及利亚总统阿赫迈德·本·贝拉前来访问。五一节

后父亲同他一起去克里木。送走客人后，他想稍事休息后，从雅尔塔乘轮船到埃及进行正式访问。那里正期

待他去参加阿斯旺水坝放水仪式。

父亲认为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看来，我国同阿拉伯世界的联盟较为牢固，因为赫鲁晓夫成功的外交手腕为之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功的外交手腕在许多方面促成了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停止对年轻的埃及共和国动武。

父亲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喜欢回忆自己同当时的英法领导人艾登爵士和摩勒所举行的谈判，谈判导致战争的迅速结束和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

1956 年的事件使阿拉伯世界大为震惊。这些国家从前一贯依靠西方，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同样很不了解。对埃及青年军官的惩罚行动的失败，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改弦更张。父亲不断发展了业已取得的成绩。阿拉伯国家先是运去了捷克武器，后来又运去了苏联武器，扩大了经济援助。当中东的盟友面临威胁时，我国的全部强大军事力量都示威性地调动起来。

诚然，父亲批准同以色列断交，内心里是很不情愿的。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把加强同拥有亿万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的友谊放在优先地位。应当说，父亲经常在考虑让敌对双方言归于好的可能途径，曾不止一次地同纳赛尔谈过此事。

他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却又不止一次地怀着好感回忆起他同梅厄在莫斯科的几次会见。

“有朝一日那里也会实现和平的。什么都有出头之日，”他常常发表这类哲理性的见解。

同埃及发展友谊的高峰是签订关于建设高大的阿斯旺水坝和赫勒万炼钢厂的协定。这些步骤向全体阿拉伯人表明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国并非人人都赞成父亲的中东政策。有人说这是

任意挥霍老百姓的钱，说我们不该进行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

在中央内部形成反对派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可以被人巧妙地加以利用。为了反驳所谓给欠发达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是白扔钱的议论，父亲通常是举阿富汗的例子。他说，我们给国王几千万卢布，帮助他修建道路、工厂，发展农业，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安宁的国境线。为了巩固边防，需要耗资几十亿卢布。所以我们在提供援助时，可以直接从中得到好处。

在上述的那个时期，还曾尝试过实现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想法。父亲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合并持怀疑态度。他提醒纳赛尔在同叙利亚合并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他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别很快会引起冲突。

父亲为我国在中东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它看成自己的功劳，现在则想去亲自看看。长期以来阻碍着对中东进行访问的，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共产党在大多数中东国家被取缔，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在准备访问的整个过程中，这个问题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来。我国领导人提出条件：不解决深受铁窗之苦的共产党员的问题，访问就不可能进

加马尔·阿布杜拉·纳赛尔（1918—1970）1956年起任埃及总理。

戈尔达·梅厄（1898—1978）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

行。

最后纳赛尔保证放人。父亲假装他对这一保证感到满意，访问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排除了。

父亲决定让我也一起出访。我不能同他一起去克里木，因工作脱不开身，所以就在出访前乘飞机去。代表团成员已全部到齐，他们是：葛罗米柯、格奥尔加泽、格列奇科、萨秋科夫、阿朱别伊等。

代表团乘坐“亚美尼亚号”这艘小轮船出发。轮船已停靠在雅尔塔码头。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同其他任何一次国事访问相比，除了南方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而外，并无多大的差别。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是勃列日涅夫。

在临行前的忙碌中，列昂尼德·伊里奇举止上莫名其妙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一贯与众不同的是讨人喜欢的满面笑容、随时挂在嘴边的玩笑话。这一次却阴沉着脸，甚至对父亲的应答都只有片言只字，近乎粗暴。对其他的人更是不予理睬。可就在几个星期以前那次见面时，他还喜笑颜开，张开双臂呢，接下来必定是满嘴喷着名贵白兰地酒和名贵香水气味的亲吻。

我感到困惑不解。答案终于找到了。勃列日涅夫正在生父亲的气，因为不久就要丢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了。他又不能拒绝，眼下正难受着呢。

这个肤浅的解释多年来一直支配着我。直到最近，当年的许多情况逐渐为人所知，一切都大为改观了。显然，到5月份，搞掉赫鲁晓夫的决定已经最终形成。看来只需仔细考虑一下细节和可能的期限了。当时在雅尔塔，勃列日涅夫想必是无法掩饰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态度了。

当然啦，在那个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过多去深究勃列日涅夫心绪不佳的原因。

轮船驶离码头，开始了航行。父亲和助手们埋头看文件，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则沐浴在五月的阳光里或者忙着自己的事情。当时任何娱乐都不兴。都有点怕父亲，而他又不喜欢娱乐，认为那是虚度光阴。足球也好，多米诺骨牌也好，扑克牌也好，统统提不起他的兴趣，占用不了他的时间。他不在的时候，同僚们也没有表现出对这类消遣的兴趣。极少有例外的情形。大家宁可交谈。话题是建设、农业或者军事问题，视情况和参加者而定。至于父亲回到自己房间去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不禁回忆起不久前的往事。当时父亲正在观看黑海舰队的演习。我国经验丰富的设计局也在展示自己的成就，我是参加者之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发射，饶有兴趣地讨论着文职专家和军事专家的报告。后来宣布休息两小时。父亲习惯地收拾起自

己那个鼓鼓囊囊的棕色文件夹，叫上助手，往舱内走去。

“我走了，看看报纸，再把关于舰队的决定加加工。”他随口说道。

父亲去了。甲板上留下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格列奇科、乌斯金诺夫，还有部长、海军将军、设计师们。列昂尼德·伊里奇那副紧张专注的神情不见了。他的眼睛里漾着笑意。

“怎么样，科利亚，”他对波德戈尔内说。“来玩一盘接龙吧？”

多米诺骨牌送上来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格列奇科津津有味地打开牌了。待父亲回来时，桌上已撤得一干二净。

“亚美尼亚号”穿越黑海，驶向海峡。除父亲外，大家都在休息。傍晚，我们驶入海峡。为我们护航的黑海舰队在鸣放礼炮后返航了。

第二天，父亲一整天都在为面临的会谈作准备。代表团成员、顾问、助手们都围坐在甲板上一张轻便的小桌旁。问题很多，但主要议题是埃及人的支付很不按时以及他们的毫无条理。我国货船在港口里等上几个星期才能卸货。还出现了其他不好办的问题。军界人士对埃及军队的状况感到不安。尽管有现代化装备，其战斗力仍然极为低下。

航行终于接近尾声。我们在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受到纳赛尔总统和其他高级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在前往开罗的上百公里的道路上，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埃及人成群结队的热烈欢迎。

纳赛尔以其坚毅性格和改变国家面貌的真诚愿望赢得父亲的欢心。诚然，他的观点中有许多东西引起了父亲的警觉：如阿拉伯社会主义原理的含糊不清，又如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国家的计划。

谈判是艰苦的，甚至充满了斗争。会议一再拉长，事先确定的程序受到破坏。在一次会谈中纳赛尔要武器的胃口愈来愈大，父亲同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坚持埃及必须同邻国和平共处。有好

几次是看来已经找到了一致的解决办法，只剩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措词了……却又马上全部推倒重来。

不过，争论并没有影响到彼此的友好情谊，当谈判间的大门打开时，两国领导人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矛盾终于消除了。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是从开罗到阿斯旺。要由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一起按动电钮，以炸掉阿斯旺水坝的围堰。前来参加大坝落成典礼的有友好的阿拉伯各国领导人。父亲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同他们讨论该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盼望已久的盛事终于实现。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同时按动电钮，响起了爆炸声，尼罗河水汹涌澎湃地流入基坑。出席者每人都得到一枚金质纪念章。早在抵达埃及那天，纳赛尔即宣布授予父亲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最高奖赏——尼罗河项链勋章，该勋章只授予具有特殊功劳的人，且得此殊荣者也是凤毛麟角。此举是想表示对我国的深深敬意，并突出阿拉伯地区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因这一授勋而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许多歪曲的言论。既然它们同后来的事情有直接联系，我就来详细地谈谈吧。

按照通常的国际礼节，为了表示两国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必须对于东道国进行相应的授勋。问题就来了：可以为纳赛尔总统和副总统、武装力量总司令穆罕默德·阿梅尔授予什么样的苏联勋章呢？

这类问题以前也曾出现过。对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比较好办。他们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卡尔·马克思勋章或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的等价物不难找到。

碰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变得复杂了。首先，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不愿意拿与我们的思想原则、共产主义原则有关的徽章来授勋。父亲曾几次考虑过设立一种新的勋章，其颁发条例应能反映在加强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友谊方面的功勋。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并未持续下去。他并不赞成增加勋章的品种，新出现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他就对新的勋章失去兴趣了。

埃塞俄比亚国王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授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该王国最高勋章，大家都陷入困境了，总不能给

一位君主颁发列宁勋章或者红旗勋章吧。最后总算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授予他苏沃洛夫一级勋章。人们回想起这位贵宾曾领导本国人民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这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询问道，我国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回答是：“最高级的。”我国不带直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这种奖励是苏联英雄称号。人们想起了曾有过将此称号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亚诺什·卡达尔的先例。

因此父亲略加思索就批准了关于授予纳赛尔总统苏联英雄称号和（根据格列奇科元帅的建议）授予阿梅尔元帅苏联英雄称号的报告。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是个非常仔细、能体察到国际关系中的细微之处的人，他同意这一决定。

向莫斯科发去了相应的密码电报，不久即收到以由勃列日涅夫签署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的形式出现的肯定答复。还送来盖上火漆印的一包勋章。

父亲在庄严的气氛中给纳赛尔和阿梅尔授勋。看来，问题解决了，也遵守了国际礼节和仪式。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突然开始听到令人不愉快的议论，说赫鲁晓夫在国外访问时，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自作主张地到处给勋章，根本不把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放在眼里。除此之外，还有人添油加醋他说父亲接受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贵重礼物。

我考虑了很久：在回忆中要不要谈谈类似的微妙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而任何辩解或者反驳即使在最友好

的读者看来都显得颇为可疑。保持沉默倒省事得多。然而我还是决定不回避对那年夏天出现的歪曲言论进行讨论。今天我确信：这是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在败坏父亲的名誉，制造舆论，摸清力量的配置。

后来提出的指控的第一部分，实质上是两点。人们指控说，父亲在尚未得到中央主席团的批准时即公开宣布要授勋，而且纳赛尔总统根本就不配受到这一奖赏。现在要弄清第一条指控有没有道理是相当困难的。许多年过去了，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去重现那些事件是根本做不到的。旁观者在 25 年之后的今天则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赞成或者推翻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个问题纯属捏造：第一，过去就有过先例；第二，身为代表团一员的外交部长和外交部礼宾司都证实了颁奖是适宜的。我上面说过，命令随之而来，没有表示异议。

至于说一个友好国家的首脑接受与他级别相符的奖励是不是当之无愧，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庸人之见。国家间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好恶的基础之上，而是遵从最高的国家利益。如此看来，所谓纳赛尔和阿梅尔是否配得上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显然提得不合规矩了。重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苏联在中东所奉行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只要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对东道国最高机关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颁奖的回报，是否需要给当时公认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颁发相应的奖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过逻辑归逻辑，流言的传播是按照另外的规律，而且突出的重点也不一样。流言的制造者之聪明和机灵是不可否认的。令人感到手段相当高明。

关于珍贵礼品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这方面照例是大家什么都明白，“谁

也骗不过”。道理很简单：人人都收，谁若是不收，那就说明收得太多，再收也没处搁了。

不过我只得让“好心人”失望了：当时也好，再早些也好，我

家从未存放过珍贵的礼品。这个问题妈妈很注意。所有的珍宝都上交中央，往往原封未动，或者仅仅让父亲粗粗看过一眼。他本人对于珍宝和饰物兴味索然，这点同基里钦科和勃列日涅夫大不相同：那两位只要见了漂亮的小玩艺儿就会欣喜若狂。至于这些珍宝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曾一度有人想搞个博物馆的，但父亲对于斯大林礼品博物馆记忆犹新，他坚决否定了这条建议。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收入帐上并且放在固定的位置。我手边保存的妈妈的遗物中时常见到已上交物品的清单。

当然，家里积存了许多贺信、纪念品、小匣子和绘画。矿灯模型特别多。无论是谁，也无论因什么事，都给父亲送这个：大家都记得他原来的行当。至今我家书架上还放了十来个呢。在列宁山上的宅邸的一楼，专门做了两个大柜子来存放纪念品，是两个内壁带镜子的陈列柜。父亲退休后，这两个柜子还放在那儿，里面的物品原封未动。

在策划权力更迭的条件下，所谓赫鲁晓夫手脚不干净的流言无疑是很利。流言的传播者都精于此道。他们精心地让流言久盛不衰，并刻苦灌输，一旦旧的流言不起作用，马上又换上新的“事实”。而且直到父亲退休后仍在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痛苦的事情已成过去，生活稳定下来了。父亲住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从克里姆林宫的车库中给他拨了一辆小车，供他偶尔出行使用。这是一辆“吉姆”——整个车库中唯一的一辆过时牌子的汽车。那里停放着政治局委员的专车——“吉尔”、“海鸥”、“伏尔加”。有人说出现了“奔驰”、“凯迪拉克”和其他外国名牌车，不过我本人其实没有见过，因为当时我已经进不去了。

司机们对“吉姆”车牢骚满腹：车子旧，毛病多，零件又没有，得上全国各地去找。

这辆“吉姆”车上标的是……私车号。车库里的车什么号都

有，有定期更换的，也有固定不变的，但都是公车号，只有一辆是私车号……

……回过头再来说埃及之行吧。

阿斯旺的庆祝活动后，纳赛尔邀请父亲到红海去钓鱼。5月14日停靠在拉斯一本纳斯的“阿里—古姆胡里亚号”总统快艇上，除了纳赛尔总统本人、副总统阿梅尔元帅及其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高级领导人、父亲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伊拉克总统阿梅尔元帅、也门总统阿斯—萨利亚尔元帅及其他“渔夫”。

第二天，在远离海岸、记者和外人耳目的快艇上，大家开诚布公地就该地区的和平与战争、奉行一致的政策、阿拉伯世界的前途、这些国家建立联邦的意图等等进行了谈话。看来在政治的地平线上已经矗立起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在一起的大阿拉伯国了。我上面提到，父亲对这个想法持怀疑态度，他在这里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担忧，不过他保证苏联将千方百计地支持新的先进制度。

鱼儿安然无恙，因为整整一天中顶多只甩过一两次钓杆，而且那也只是为了向北方来客展示一下红海的异国情调而已。

第二天，回到阿斯旺。访问一帆风顺，按照精心制订的计划进行。

5月25日，星期一，父亲终于乘机返回莫斯科，6月15日又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始新的访问。赫鲁晓夫又不在。那些正在策划搞掉他的人放开了手脚。控制着国家和党的全部线索都集中到他们的手里。

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下7月中旬举行。会议将要审议的两个问题，看来即使是不懂行的人也不会从中去留意会议筹备期间将会上演的种种幕后戏。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执行苏共纲领中提高人民福利部分的措施

问题：（1）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2）提高教育、卫生、住宅与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门类的工作人员的工资；（3）向五天工作周过渡。

问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报告人为赫鲁晓夫。是根据他的倡议提出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议题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每次开会都是老生常谈，这个议题似乎根本无关紧要。然而焦点恰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终于下定决心最终作出把勃列日涅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

我尽量按照我今天所认为的事态发展先后顺序来复述。当然，我的某些推测可能有误，谁要是认为他可以纠正不确切之处，我将十分感谢。

1963年4月，科兹洛夫一病不起，可父亲还指望他重返工作岗位。但工作实在太多，于是1963年6月勃列日涅夫再次当选为中央书记，分管某些科兹洛夫主管的问题，首先是国防工业。他同时保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科兹洛夫康复以前，勃列日涅夫需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然而，看来从此便开始形成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联盟或者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联盟。

据我的理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当时同这二人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而且显然很不喜欢赫鲁晓夫提拔上来的这两个乌克兰人。

1963年底，父亲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犹豫来犹豫去，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来，到1964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对勃列日涅夫的期望是至科兹洛夫康复前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然而，看

来就是在这段时间萌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想法。

大概当时也出现了同谢列平的联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吸收了谢列平的老朋友——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参与其事。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摸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底。不过依我看来，勃列日涅夫仍然举棋不定。他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十分满意，而除掉赫鲁晓夫过程中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显然又使他望而生畏。

春天，看来是在4月，父亲最终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意图。他毫不怀疑，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而勃列日涅夫又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他当时还没有关于具体入选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个荣誉职务，让一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是不明智

的。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元首。担任此职者应是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党和人民都很熟悉的人。

他最后选中了米高扬。这是一个国内备受尊敬和享誉世界的名字，而且米高扬明年就满 70 周岁了。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他担任此职是适得其所。

父亲一宣布自己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大概就铁了心了。从此他就成为倒赫行动的积极参加者。

七月会议上要决定米高扬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问题。后来的事态表明，勃列日涅夫始终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看得那么重要和那么有吸引力。后来他刚刚得势，就拿自己的主要盟友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1965 年取代了米高扬）开刀，终于再度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美名。

夏日将至时，发起人的集团便形成了。其主要执行人之一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不难明白，离开他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1957 年第一次试图推翻父亲，当时任克格勃主席并继续忠于中央及中央第一书记的 . . . 谢罗夫将军在挫败那次阴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谢米恰斯内当然对种种计划都了如指掌。

6 月份，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勃列日涅夫提出各种各样除掉赫鲁晓夫的建议，使谢米恰斯内极为厌烦。据谢米恰斯内证实，这些建议根本谈不上绅士风度。

父亲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归来前夕，勃列日涅夫一心要毒死他。谢米恰斯内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很乐意参加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活动。这决定着日后的飞黄腾达，因为他属于谢列平的部下，谢列平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部位上。但是他不打算干触犯刑律的事情。谢米恰斯内找出各种反论据来反驳勃列日涅夫。

以下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回忆：

“勃列日涅夫向我提出：‘要不，给他下毒？’我当时说：‘除非先把我搞掉。绝对不行。我决不会干这种事。我不是阴谋分子，也不是凶手……再说国内的情况不允许，这种办法行不通。’

问：怎么下毒呢？

谢米恰斯内：得有人去干。我要给自己的部下发命令……让厨师出面。

问：这样会使自己冒风险？

谢米恰斯内：对，傻瓜才会干。当时我专程来表示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才同意毒死赫鲁晓夫的想法无法实现。

据说几天后勃列日涅夫有了新的计划——在从开罗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制造飞行事故。

‘飞机停在人家的机场上，人家的国家里。全部罪责都将落到外国特工机关身上，’他劝说道。

‘给赫鲁晓夫开飞机的是忠于他的机组。首席飞行员是齐宾，

您知道，他早在 41 年还是中校的时候就给他开飞机。整个战争期间都熬过来了。再说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眼下是和平时期。

除赫鲁晓夫而外，机上还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机组人员，最后还有我们的人——肃反工作者。这个办法绝对无法实现，’谈话的对方斩钉截铁地一口拒绝。”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安全返回莫斯科。谁也不知道那次谈话。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未善罢甘休，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开幕日期无情地迫近了。

6月初父亲打算去列宁格勒。9日计划在那里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举行一日会谈。父亲提前一天去，他决定了解一下列宁格勒的住房建设进展情况，为会谈作些准备，而且很想到彼得宫去看看已经修复的喷泉。

当时勃列日涅夫产生了制造车祸的念头，但是这次他显然又没有找到支持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议开幕前一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到国内。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在这个无暇思索、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建议：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时逮捕赫鲁晓夫并把他送往加里宁市附近的扎维多沃狩猎场。勃列日涅夫害怕把这样一名俘虏送往莫斯科。然而这个建议同样既未得到谢米恰斯内的赞同，也未得到其他参与其事者的赞同。他们都宁愿采取较为可靠和风险较少的办法。

可惜谢米恰斯内对此事的追述太简短。他只是说：

“这持续了很久……下面这个方案也是如此，就是等他从瑞典回来时，在扎维多沃区的某个地方挡住火车，逮捕并且押回。这样的方案也曾有过……”

这时开始起劲地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州委书记、部长、军界人士谈话。对有些人是开诚布公，对有些人只是小心地摸摸底，还有一些人，则决定不到时候不让他们知道底细。因为稍一走漏风声都有前功尽弃的危险。作出最后决定的日期尚未确定。大家在

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结这件事情。

勃列日涅夫只得乖乖地丢掉国家元首交椅。

另外一件事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败坏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誉，使他彻底失去民心。看来，为此已经竭尽全力。在那些已同该地领导人找到共同语言的地区，商店里的食品、日用必需品统统不见了。无论买什么都要排上好几个钟头的队，买面包也不例外。只有到“万恶之源”下台后货架才能重新摆满商品，而且简直就在下台后的第二天。

从这个角度出发，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就使得有些人忧心忡忡了。

父亲早就提出过给农庄庄员设退休金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措施，而且是一大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农庄庄员就可以同工人平起平坐，取得同所有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同时，他还想解决另外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提高教师、医生和服务行业工作人员那少得可怜的工资。

退休金和增加工资，尤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耗资不多，但筹集资金也十分困难。父亲在年初即同专家、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许多小时的谈话。结果把钱凑齐了，于是他起草了在这次会议上要作的详细报告。

取消这些决定或是阻止作出这些决定都无法办到了。问题酝酿的时间太长，研究得太细了。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十分着急。看来他们的思路很简单：“赫鲁晓夫一作报告就会再次把自己的名字同保证改善许多人生活条件的措施联在一起。这定会提高他那因不久前食品提价而

受到损害的声誉。人们在他下台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很难预料……”

这种担忧并没有十分充足的依据，可担忧大概是存在的。然而他们又无能为力。问题仍然摆在会议的日程上。

父亲关于实行每周休息两天的建议，情况就不同了。这个问题

同样从年初就进行过详尽的研究。起初并没有遭到特别的反对，因为当时几乎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安排劳动时间的。可是到了6月突然出现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有人开始向父亲论证向五日工作制过渡会使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工作陷于混乱。其主要论据是具有不间断生产性质的企业可能出现困难，包括冶金、化工、石油化工等部门。还表示这样的担心，即：尽管工作周按小时计算的总时间不变，但在向五日工作制过渡期间总产量可能下降。

对赫鲁晓夫的压力有计划地来自各个方面：主管部门、部长会议机关和中央书记处机关。父亲进行争辩，提出反论据，毫不动摇最起劲地反对向五日工作制过渡的，是负责工业工作的中央书记——鲁达可夫。

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父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来，就埋头对报告进行最后的加工。这项工作他从来不交给助手干。父亲在第一阶段通常是向速记员口授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零零散散的。誊清的稿子由助手来润色，并视讲话题目分别吸收国际、工业、军事、农业及其他问题的专家参加。

然后稿子回到父亲这儿，开始审订。他对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再口授或者删去某些字句，直到自己的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为止。他对这项工作的积极参与到此结束——这时助手和专家再找出合适的例子、语录，搞出最后的文本。父亲再仔细阅读，作一些最后的改动，讲话稿就写好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他经常在讲话中不喜欢照“稿子”读，干脆丢开写好的讲稿。他喜欢重复彼得一世的一条自白，彼得一世禁止照稿宣读，“以便看出每个人的愚蠢”。这样的风格使他的讲话形象生动，这样可以对具体情况作出灵敏的反应，可以弄清听众的反应如何。

平心而论，有时他兴之所至，也讲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那是在讲话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东西。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在审阅即

将见报的讲话稿时就只得去掉有纰漏的地方。

这一切当然并不涉及所谓的礼仪性讲话，即迎送外国代表团、在招待会上和其他类似场合所发表的讲话。这些讲话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由有关的班子起草，待送给父亲最后宣读时已是最后定稿了。

眼下他正在“加工”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鲁达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他说服了阿朱别伊设法向父亲施加影响，我真不知道哪些论据对阿朱别伊起了决定性作用，反正他同意了。

那年夏天，父亲经常在离“戈尔克2号”农场不远处莫斯科河畔松林中的别墅里过夜。这幢别墅是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修建的，但是人们在谈及此事时都是含糊其词，窃窃私语。莫洛托夫后来占用了这幢别墅。

父亲喜欢这一大片土地，围墙旁边是一条长长的供散步的小路，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他对上下坡已经愈来愈敏感了。父亲每天下午下班后都要沿着这条小路转上一圈。散步到把别墅园地与莫斯科河分开的草地上为止。

父亲迄今为止所居住的乌索沃那幢别墅的围墙与莫斯科河之间的空地没

有围起来，天气晴好时那里挤满了前来晒太阳和洗澡的大批莫斯科人，而在莫洛托夫住过的这幢别墅中，去草地的通道两旁都拉着铁丝网。诚然，铁丝网的状况欠佳：东一处西一处地露着大窟窿。

卫兵定期沿着这条通道巡视别墅四周，撕开的铁丝网成了在周围森林中漫步的一对对情侣独特的诱惑物。于是在最“有趣的一刹那”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冒出一个身穿军服的人，请他们出示证件。通常都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偷越者”悄悄溜走，警惕性很高的值班卫兵再绘声绘色地讲述一番。

有一次，卫兵在这里，在莫斯科河岸边扣留了一对奇异的男女。小伙子在卫兵要求出示证件时老是吞吞吐吐，当他明白别无出路时，便掏出了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证件。

双方都大为震惊。卫兵惊恐万分，便把两个人扣留了，尽管“预谋犯”用明白易懂的话解释说，他们是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通常夏季休息的去处——尼科林山滨河浴场乘小船来此的。值勤卫队长不知如何是好，便匆匆赶来向父亲报告，说被扣留者可能蓄意侦察通往“目标”的要道。

父亲微微一笑说：

“你们那个‘间谍’的女伴讨人喜欢吗？”

“挺讨人喜欢的，”军官语塞了。

“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吧。别妨碍人们休息。恐怕你们说的那个‘侦探’对她比对我更感兴趣得多吧，”父亲把手一挥，了结了这场“国际争端”。

我们迁到这里时，草地上绿草如茵。右边角落里有一小块沼泽地。夏天这里有长脚秧鸡出没。父亲一听见这种从小就很熟悉的叫声，便停下来侧耳细听，脸上绽出了笑容。这种鸟是我们的一大名胜。森林边缘的草地上有一个圆形的绿色凉亭，亭上放了一张藤编桌子和几把藤椅。夏天每逢星期日，父亲都在这里阅读文件或者报纸。我家家的常客也在这里聚会。记得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访苏期间到我家作客，就在这里给我们全家人照过像。

父亲决定在这片草地上搞自己的试验田。沿着小路边上种下一丛丛茼蒿。父亲既很喜欢它春天开的白花，又很喜欢它秋天结出的一串串红色果实。小路两旁都开出了小畦。生长着各种蔬菜：胡萝卜、黄瓜、西红柿、西葫芦、莴苣——总之，凡是好菜园里的东西应有尽有。

还单独开出小畦来种植父亲对其某一点特别感兴趣的作物。我记得起初是黍子和谷子。父亲早在顿巴斯时就记得谷子，便决定亲自来验证一下有关这位中国来客如何高产的传闻。谷子种了

几年。小米粥成了我们的一道固定菜。然而关于产量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莫斯科郊外的气候对它说来太严酷了。

谷子的地盘后来让玉米占领了。一畦又一畦地播下不同的品种，播种时间错开，田间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父亲仔细地观察作物的生长情况，这不仅是一种爱好，他想亲自验证，亲手摸索一下结果。他不大相信汇报，知道收成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早在乌克兰工作期间，他就养成了下田间的习惯，要亲眼看见播种以及后来的收割。

每次中央第一书记来到州首府，当地领导都尽量先设宴接风。据说用餐后赫鲁晓夫心肠就会软下来的。当时他到各共和国视察多半是乘敞篷车。这样可以更好地看清田间的情况，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来问问庄稼人，了解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比官方的汇报更加宝贵。

规定政治局委员乘坐的“吉斯 110”装甲汽车他不用。那辆车在中央委

员会的车库里落满尘土，无所事事。

父亲在经历了几次“热情”欢迎之后，想出了对策。他买了一口大铁锅。怕在汽车的后盖里弄脏了，又订制了一个铁皮盒子。如今他在快到州首府时，不慌不忙，在道旁树木中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停下来休息。迅速点起篝火，取出不久就变成神话中物件的铁锅，放上猪油，做西红柿煎鸡蛋。做出的东西够所有的人，包括助手和司机受用的了。

父亲喜欢绘声绘色地讲述同州委书记们会见的情况：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路辛苦了，请入席吧。”

父亲狡黠地一笑：

“谢谢，我们刚刚吃完饭。还是先谈工作吧。咱们下田间，你们在车上给我讲。”

当然，这种巧计很快就为大家所知晓，不过父亲也并没有对自己的计谋保密。他达到了主要目的：到州委后先谈工作，晚上很晚再用餐。

再回过头来说说 1964 年 7 月发生的事情。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前一周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除了父亲、我和阿朱别伊而外，可能还有其他人。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以他所特有的能言善辩和坚定不移论证说，实行五日工作制没到时候，尚未作好准备，可能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父亲默默地听着。

我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我当时很年轻，很想有两个休息日。我渐渐发现父亲开始动摇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必要的论据。于是我决定参加谈话，并胆怯地表示了异议，吭啼了半天，父亲只是把手一挥：

“别碍事儿。”

他终于屈服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眉开眼笑。第一项议程的第三个问题取消了。它成了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遗留问题。

会议顺利举行。7 月 15 日，在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的法令》后，父亲再次讲话。

“代表同志们！”

大家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 1963 年 6 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认为，让勃列日涅夫同志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分集中精力抓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适宜的。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请本次大会审议。同时考虑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我想没有必要对米高扬同志作鉴定了。大家全都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中过去和现在一直从事着多么重大的政治工作和国务工作。他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他的活动在数十年间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他不但在国内名闻遐迩，而且蜚声世界。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米高扬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担当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同志们！

我们希望代表们会赞同和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不揣冒昧地在表决之前（尽管这可能显得有些超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衷心祝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其实一切就到此结束了。代表们一致赞成米高扬当选，并通过了如下决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决定：

鉴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忙于苏共中央的工作，解除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

早已成熟的决定形成了法律条文。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走马上任后，对于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遇到的情况极不喜欢，他决定进行整顿，从干部队伍入手。他点名要免去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职务。勃列日涅夫只得在中央委员会给自己的朋友找个职位。这倒没有费多少周折。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闭幕和彻底转到新的岗位后，看来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有些放心了，因为尽管会议的决定不大令人高兴，但他的营垒中又增加了支持者，而且看来已胜利在望。另

一方面，他大概还在担心：只要赫鲁晓夫稍微生疑，会出什么事呢？不过权力更替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需要的是会见，谈话，吸收愈来愈多的人参加。想改变计划为时已晚。

会议闭幕后，7—8月的休假期开始了。生活放慢了节奏。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前往克里木……

父亲暂时还不曾考虑夏季疗养的问题：7月底是波兰的盛大节日——人民的国家成立20周年。哥穆尔卡几次打电话来请他去，因为他特别重视赫鲁晓夫的访问。父亲当然无法对自己的老朋友表示拒绝。

事后自然一定要视察我国的东部地区，亲自看看垦区的收割准备工作。

父亲再次离开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又正在休假，便留下波德戈尔内“看家”。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都特别顺利。

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为机不可失，对不再来：州委书记、州执委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里木和高加索的疗养院中会合。这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以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摸摸他们的心思。而周游各州和各共和国可是会引起不必要的好奇心的。

诚然，中央第二书记的新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着上等白兰地酒杯谈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疗养期间什么话题没有啊？……

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当时在克里木同许多人都谈过话。总的干部形势对他有利：看来所有的人都对赫鲁晓夫不满。党委书记对把州委一分为二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满。而且许多领导人当时不得不离开莫斯

科到全国各地去。当时拼凑起了由不满者组成的稳定多数。从力量配备上看，赫鲁晓

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上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对赫鲁晓夫的颂扬在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这段时间的讲话中比比皆是。

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次谈话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请看彼得·叶菲莫维奇本人是如何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的。

“……勃列日涅夫来访。

我在克里木休养，他忽然来找我。那是1964年7月的事情。他没有劝我，他只是嚎啕大哭。他可是个演员，一个大演员。甚至可以在喝酒后爬到椅子上朗诵起来。念的不是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也不是叶赛宁的诗，而是自己的双关俏皮话。……他来找我。

‘生活好吗？近况如何？’

‘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答道。‘工作不好搞。’

‘你怎么样，有人支持吗？’

‘要是没有人支持，那就没法再干了。只好提上讨饭袋滚开。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对我帮助很大。他经验丰富。各州党委书记也都挺支持。’

‘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

‘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

‘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

‘也许他骂得对吧？’

‘不，跟他没法共事。’

‘那你在他70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人，列宁主义者等等。你干吗不讲！

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

‘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我决定保持一定距离。

‘你们自己去研究吧。我们在基层工作。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

我还是表现出了有所克制的好奇心。

‘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

谈话到此结束，这倒更象是一次小心的试探。勃列日涅夫岔开话题，后来就走了，看来谢列斯特的回答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父亲不久去了波兰。勃列日涅夫留下来“当家”，他仍在克里木休养。

我上面已经提到，父亲在克里木或高加索休养时，那里经常举行我国领导人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会见，在附近休养的我国知名学者、设计师、政府成员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见都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参加者全都带上家属，因为是来休养的嘛。通常这样的活动都在雅尔塔山上原亚历山大三世宫中举行。

看来，值得介绍一下克里木各宫殿的情况。

战前它们都作疗养院使用。战争结束时为筹备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首脑会议，对利瓦季伊宫、阿卢普金宫及其他一些宫殿进行了紧急修复和改建，以

供各国代表团居住。会议结束了，宫殿则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已经没有人记起“宫殿应该属于人民”这个老口号了。

利瓦季伊宫算是斯大林的别墅，尽管他在那里只休养过一次。莫洛托夫住进了沃龙佐夫宫和阿卢普金宫。其余宫殿均无个人依属关系。斯大林去世后，父亲想起了多年前作出的将贵族宫殿交给人民使用的决定，并设法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它们用作工会疗养

院的政府决定。然而这些宫殿很不适于供大众疗养，不久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博物馆。只有亚历山德罗夫宫一直是国家别墅。决定用作接待外国贵宾的府邸。它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父亲在克里木休养时，有时到那儿公园里空荡荡的林荫道上散步。看来，他就是在散步中萌生举行这种聚会的念头的。客人们通常是一早就聚集于此，大家一起散步，玩击木游戏，打排球，坐在长凳上闲聊。最后以露天宴会告终。父亲不在时从不举行这种活动。起初看来因为这是他的主意，后来呢，显然是因为谁也不敢占据他的位置。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当了发起人。

需要说明，尽管这类聚会总的说来无拘无束，这里却有一套严格的礼节。客人是带上家属来的，但是不请一家之长而单独邀请夫人或者子女的情况自然是从来没有过。

那年夏天，我姐姐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在雅尔塔一所疗养院里休养。当她接到参加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这种聚会的请柬时，特别吃惊。看来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邀请中，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在起作用。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想显示一下，看来首先是向自己显示一下他眼看快成为这里的主人了。另一方面，他邀请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又说明他怕赫鲁晓夫，想借此表露一下忠君的感情。

姐姐对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会上的表现感到不胜惊讶。而且她是在父亲下台前谈到这点的。用她的话说，勃列日涅夫简直象个大权在握的主人，无论对谁都是异常亲昵。她从来没见过他的这种表演。晚会快要结束时，他甚至爬上椅子朗诵起自己赋的诗来。种种迹象表明，他特别自满自足。

类似的表现从前谁也没有见过。勃列日涅夫举止中的急剧变化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没有人猜得出变化的动因。按照我们的惯例，大家都认定他是喝多了。

8月份，类似的事情又出在我身上。父亲当时不在莫斯科，他到垦区视察收割工作去了。我因公与同事一起去宇航员训练中心。我们受到热情欢迎。我们在大厅里漫步，仔细观看练习器，同宇航员交谈。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卡马宁将军，他当时任空军副总参谋长，主管宇航员训练工作。这次参观即将结束时，我们到一个实验室去参观第一艘可操纵宇宙飞船“东方号”。卡马宁的副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说：

“将军同志！请赫鲁晓夫同志给勃列日涅夫同志去电话。刚才中央委员会来电话了。”

我当时的惊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的呀，我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呢？……我赶快同副官一起到卡马宁的办公室，拨了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号码。

他拿起听筒：

“是这么回事，”我听他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在，明天要

开始打野鸭了。我们全都去扎维多沃，请你也去，你能去吗？”

“当然可以。谢谢您，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星期六晚上去，”我傻呵呵他说，一时完全惊呆了。

我万万没有料到会接到中央主席团委员个人发出的去打野鸭的邀请！父亲也曾带我去过，但那仅仅是以“免费捎带”的身分去的。有时季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也带上儿子。然而同父亲一起去打猎是一回事，而这次却突然受到以平等身分参加的邀请。无须隐瞒，当时这样的邀请真使我受宠若惊。

我回到实验室，卡马宁以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我。

“大概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常给您打电话吧？”他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便喃喃地说：

“对。不……不太多……”

当时我没有太多地想过这次电话，只把它当成一种关心和喜欢的表示。

父亲回到莫斯科后，问我：

“打猎打得怎么样啊？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我说，他没有忘记你，带上你去扎维多沃了。”

看来，这次电话是又一个“讨好”父亲的步骤。说真的，我找不出别的解释。

然而，打野鸭未必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及其他“猎人”在这个季节去扎维多沃的主要目的。

在舒适的小屋内，避开他人那好奇的耳目，他们可以从容自如地给那些他们在犹豫再三之后决定透露自己计划的人做工作。

请看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根那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这一切筹划了一年左右。联络网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猎的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上每个名字后面画上正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负号。对每个人都搞过个别谈话。

问：对您也一样？

‘对。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联络网不仅伸到扎维多沃，而且伸到克里木、高加索和我国的其他角落。

那时我当然并未料到我命定要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一个即使不算积极的参加者、也是个积极的旁观者的角色。

第二章 十月

夏天结束了。天气变凉，树叶也发黄了。1964年收割季节的忙碌、对各农业区的视察均已成为过去。1964年预定进行的出国访问也告结束。

秋天，父亲希望休整一下，设法静下心来，想一想今后的打算。计划相当宏伟：11—12月份将举行例行的中央全会，会上要作出重要决定。中心议题之一是农业状况。十年来农产品的产量增长了，但效率远未达到父亲所力争达到的预想水平。国外购置的全套畜牧场设备不能保证在我国的条件下达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许诺的产量。

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干部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老化：其大部分成员均已年近60，而父亲本人则刚刚过完70岁生日。他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谁来接班，由谁来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斯大林一去世，大家就分道扬镳，出现分歧，类似的情况决不能再发生，出路只有一条：通过法律程序实行领导人轮换制和公开性。如果每个主席团委员知道他的任期比方说为两届、每届为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四年，那么他就会更多地考虑工作，做事更大胆，就会少一些左顾右盼。况且中央和州委机关中的年轻一代也有个盼头了。

上一次即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党的领导人实行轮换制的决定，但这只是第一步。需要继续往前走，在新的宪法中把这些原则固定下来。早已决定准备制定新宪法，成立了起草小组，却始终没有时间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老是有眼前发生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在分散精力。

起草新宪法工作的最佳时间是休假。那里，在皮聪达海角，“十万火急”的问题的干扰要少一些。当然，电话不能掐掉，送来的文件要占时间，但无法同莫斯科的忙乱相比。再说，在南方的松树下思考问题效果也更好一些。

我听说过父亲的计划。全会上打算增加中央主席团的组成人员。近几年来涌现出一批年轻人：谢列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萨秋科夫、哈尔拉莫夫、阿朱别伊。都是一些富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他们对新的建议反应很快，能迅速捕捉新的思想，加以发展，并立即提出一大堆建议来。有他们的参加，工作更有趣更活跃。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中央主席团委员，应当把业已形成的状况通过正式手续固定下来，也就是对中央主席团进行更新。况且这批年轻人也应该接班了。不过这一切需要再三进行考虑。

遗憾的是，10月以前无法去休假。视察新导弹设施一事从春天开始就拖延至今，而马林诺夫斯基又一再催促；需要作出以新型洲际导弹装备部队的决定。到一个试验场去观看各种新型导弹一事曾多次延期了，最后定在9月份进行。陪同赫鲁晓夫前往的有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部长、军区司令员和设计师们将在试验场上迎候他们。

到9月，一切准备就绪，诸如由谁来陪同高层领导人之类的细节也已谈妥。因为想去的人数超过座位数目许多倍，名单经过中央委员会吹毛求疵的审查，国防工业监督人伊万·季米特里耶

维奇·谢尔宾毫不留情地划掉了多余的名字。

我很想进入幸运者之列，因为从前每次检阅我都是作为新武器装备的演示者出现的。不久前完成了一种新型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现在正在决定它的命运，将要听取赞成和反对双方的意见，并作出批量生产的最后决定。

我很高兴自己还留在名单上。开始了出发前的奔忙。然而命运却偏偏作出另外的安排。出发前几天我的腿痛起来了。起初我对这类小毛病并不在意。可是过两天就行走困难了。只得向医生求助。

“出差绝对不行！”医生直挥手说。“我们必须让您住院。”

经过时间不长的争吵之后，住院的问题排除了，决定让我在家治疗。但我自己明白，以这样的身体状况到了试验场也没有用。

我的同事们都已出发，并祝我早日康复，两天以后，父亲也走了。我躺在床上，看书，心情忧郁地望着窗外：正是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偶尔有电话来，我便一瘸一拐地去接。

几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试验场那边音信杳无，再说也不可能有消息：大家全都在那儿。我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好，打算再过几天就去上班。

在列宁山上的小楼里我与妻儿占用了一层带洗澡间的两间房，这好象是一套单独的住宅，门朝着过道。对面是个大餐厅。

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时间很少。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多会儿方便多会儿吃。只是到了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大家才一起吃着茶点，互相交换新闻。然后父亲拿上文件，找个没有餐具的地方坐下，就开始看起来。全家人用茶点至此结束，夜间的工作开始了。为了不妨碍他，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或者默默地坐在这里的沙发和安乐椅上，看书看报。

我有一部单独的市内电话和一部与这里的值班卫队长联系的分机。父亲用的几部电话放在客厅挨着餐厅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

上。那分别是政府专线的市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还有一部普通市内电话及一部直通卫队值班室的电话。父亲很少打电话，只是万不得已时才用，他认为工作时间结束了，应当让大家休息，不应当用本可在白天完成的事情去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不喜欢不遵守通行的休息制度，不喜欢有人晚上加班。那会使他想起斯大林时期的晚间值班。

“您晚上加班，并不说明您很努力，而是说明您不会好好地安排时间，”他经常这样说。“白天的工作7点结束。7点以后去看戏，去玩儿，别在办公室里把裤子坐破了。不然您第二天就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

人们知道这个情况，晚上因公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就特别少，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每次政府专线的电话都算我们家里的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在场者莫不竖起耳朵，设法从片言只字中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在家养病的一天晚上“自动电话”忽然铃声大作，我就很吃惊：父亲又不在莫斯科，况且人人都知道的嘛。

听筒里传来陌生的声音：

“可以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电话吗？”

“他不在莫斯科，”我答道，同时感到莫名其妙：是谁会往家里打电话呢。凡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人，都很清楚父亲现在何处。

“请问您是谁？”问题随之而来。

声音里透出失望。

“我是他儿子。”

“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对方赶快说道。“我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

原先的卫队长，我从夏天起就设法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通话，我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可是一直办不到。现在我总算可以用‘自动电话’

通话了，我决定给他往家打电话，谁知又不凑巧。”

我很吃惊：伊格纳托夫原先的卫队长会找赫鲁晓夫说什么，他们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情况非同寻常。

“请让我把话说完，”加柳科夫匆匆说道，他担心我会放下听筒，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我听说有人在准备对赫鲁晓夫搞阴谋！我想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本人。这很重要：阴谋的事儿我是从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中听出来的，一大批人都参加进去了。”

“越说越离谱，”我想道。“这大概是个疯子。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会有阴谋呢？胡说八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应当找克格勃，找谢米恰斯内。这类事情归他管，再说您本人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会弄得一清二楚的，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我说道，为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自鸣得意。可是高兴得太早了。

“我不能去找谢米恰斯内，他本人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等人一起搞阴谋，算是最积极的一位，我想把这一切亲自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处境危。险您说他不在莫斯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几天再来电话吧。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试图安慰他。“我可能办不到。我能够用‘自动电话’而且能够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这已经够幸运了。这种情况也许不会再出现，可事情又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他口气坚决。“要不请您听我介绍情况，然后再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转达？”

“您知道吗，我……有点小病。”我说得又慢又不清楚，为的是赢得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精力去管这种事。万一这位是疯子，他那些谈话、毫无根据的猜疑、电话会搅得我不得安宁。我

干吗往里掺合……

可万一他是个正常人呢？万一他的报告中哪怕有一点真情可怎么好？哪我岂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宁把他拒之门外了吗？显然，总应当同他见面，弄清楚这是真情呢，还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幻想游戏。当然，父亲最讨厌家里人介入他的国家大事。我要是冒冒失失地跟他谈这个，肯定要挨他一顿痛骂，别看他对我有多么好。哪怕讨论一下新型导弹、肥料或者转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都好。可我这时要介入的是神圣的东西——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旁人绝对不能碰的禁区。

可万一这是真情呢？必须当机立断。

那边加柳科夫正等着答复。我略一迟疑，终于下了决心：

“好吧。把您的地址告诉我，我今天晚上去，到时候您把情况全都给我讲讲。”

“不不不！到我这儿不行。我这儿谈话很危险。咱们到外面谈谈吧。您知道库图佐夫大街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吗？就是您姐姐尤莉娅住的那个楼。告诉我您的汽车有什么标记，我在街角上等。”

“我的车是黑颜色，车号是 02—32。您等着，我半个小时就到。”我说。

我们说了再见。

我忐忑不安地去换衣服，我边走边让自己相信，所谈的一切都是近乎病态的幻想结果，等我回来时只会为浪费了几个小时感到惋惜的。然而内心很不平静……

我匆匆换好衣服后，就到大门旁边的车库。值班军官习惯地把高大的、涂有绿色油漆的铁制院门打开。一切如常。不寻常的只有此次出行和出行的目的。路途不远，至多需 15 分钟，我开始静下心来，为谈话作准备……

我当时不知道，我姐姐拉达早已对正在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1964 年夏天一名妇女给她打过电话。她没记住那人的名字。那

位妇女坚持要见姐姐，声称自己掌握了重要情报。拉达千方百计地回避见面，那位妇女感到绝望了，便在电话里说她知道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的那些人开会的住宅。

“您为什么要找我呢？这种事情由克格勃来管。您往那儿打电话吧，”拉达回答说。

“我怎么能往那儿打电话呢，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也参加这些会议的！要不我怎么会想起找您谈呢。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

谢米恰斯内当时同姐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很要好，常去他们家做客。

拉达觉得这个情报不够郑重，她不想浪费时间去进行不愉快的谈话，便回答说，很遗憾，实在是无能为力，她是个私人身份，而这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因此清不要再给她打电话此后就再没来电话了。

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瓦连京·瓦西里那维奇·皮沃瓦罗夫也向她提出过类似的警告。为他的电话，拉达甚至还找我家的老朋友、当时的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马尔科夫商量过。他建议对这个情报不必在意，他认为这是皮沃瓦罗夫疑心过重所致，拉达采纳了权威性意见，便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

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报也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原卫队长、上将尼基弗尔·特罗菲莫维奇·利托夫钦科在过了许多年后讲到了这一情况。这个情报传到了父亲的第一助手 F, T。舒伊斯基手里，他颇有远见地把这一情报“消解”了。其时舒伊斯基已经跟随赫鲁晓夫近 20 年，差不多是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不过看来他当时已决定转向……

我沿着莫斯科河的别列日科夫滨河街行驶。天空阴云密布。偶尔滴答两下。暮色开始降临。前面就是乌克兰饭店那个街口。几

分钟后，可以看见镶嵌着奶油色瓷砖的中央委员会大厦。角落里孤零零地挺立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身穿深色大衣，帽沿压得很低。

我停住汽车。

“您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吗？”

那人点点头，又环顾四周。看上去有 50 来岁。

“我是赫鲁晓夫。请上车。”

他小心翼翼地坐到前排，就在我旁边。我开动汽车。

“您都想说些什么？请讲吧。”

我的这位乘客神色不安。他几次回过头去，仔细看了看后窗户，犹豫不决地提议说：

“咱们到城外去吧。找个小树林。那儿平安一些。”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看后视镜，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库图佐夫大街上跟往常一样车水马龙。

“好吧，去城外就去城外。我们上环形路，到那儿再想办法。”

一路无话，前面就是横跨环行路的高架桥了。我们往右拐，从桥下穿过，

马路两边已经是莫斯科近郊的森林。脑海里浮现出侦探小说中令人头晕目眩的情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参与类似的事情，左边驶过一个宽阔的汽车站，旁边停了几辆小轿车和一辆带拖斗的大卡车——看来，卡车司机决定在这里过夜。我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交换了一下眼色：不，这里人太多，我们需要一个僻静的去处。又继续前行。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马上就要到基辅公路了。

右边出现一条通往小松树林的乡间土路。我们拐到土路上。过了转弯处，一大片林中空地迎面而来。已是暮色苍茫，低垂的云幕给周围宁静无邪的景致平添了某种神秘的气氛。

我终于把车停住。我们下车，顺着一条小径行走。小径很窄，并排行走不大方便：双脚老是踩到青草覆盖的小土坑里。

加柳科夫开始讲述。以下就是谈话的内容。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当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时候，我在他手下任卫队长。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可我很了解您。我跟‘主子’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别墅里去过，在那儿看见过您。

“反正生活使我老早就同伊格纳托夫在一起了，1949年我就开始给他当办事员。1957年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我就成了他的卫队长。我们之间不仅是工作上的关系，可以说是朋友关系了。我陪着他外出旅行时，就仿佛成了他的伴侣和谈话对象，他拿我当‘缓冲器’，有时候对我讲一些不会对别人讲的话。我对他也是忠心耿耿。

“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没有选进中央主席团，我同他一起为这件说得轻点是不愉快的事情感到难受。除此之外，如今他按规定没有卫队长了，可我跟他多年，自然有些恋恋不舍。

“‘别难过，’伊格纳托夫安慰我说，‘我来给你找个差事。你离开机关。你已经干够了年头，可以领养老金了。我还有一些朋友，会给你找个好工作的。’

“于是我在1961年办了退休手续，开始在采购委员会里当起主任科员来了。后来又该找个新的工作了。我给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打电话，他答应帮忙。当时伊格纳托夫已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很快就在手下的总务处给我找了个工作不忙的职务。那儿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休养或者出差，我通常都陪着。他喜欢把一部分假期放在春天过；莫斯科还是白雪皑皑，寒气逼人，我们却去中亚，那里已是真正的夏天。当地领导人按老规矩照最高的规格接待我们，这使伊格纳托夫十分满意。他往往推推我说：

“‘瞧，瓦夏，挺看重我呢……’

“要是不到中亚，就去高加索——他对那儿也很喜欢。

“我在他夏季休假时也陪着他，通常是在8月份。我的任务是确保舒适，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对于他在哪儿住、怎么住和同谁住都很重视。他希望条件不要与他以中央书记身份在国家别墅休养时已经习惯的条件有什么区别。

“今年也是如此。8月3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一进门，见他坐在桌旁颇为得意的样子，他气色不错，象是刚从休假地归来。

“他对我说，决定8号那天去高加索休养，并且好象有些犹疑地问道：

“‘要不，你也跟我一起去？’

“他打算去休养的事我已经知道，他事先就让我作好一切准备。”

“至于他提出一起去休养，我未作任何回答，由他拿主意。所以我只是汇报说，休养所需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我已同索契的‘俄罗斯疗养院’谈妥安排在一处单独的别墅。我们通常都住那儿。”

“这一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忽然大动肝火：

“‘商谈了，谈妥了……你谈话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感到莫名其妙：

“‘要不，我就不跟您去了？’

“‘到时候就清楚了，’伊格纳托夫嘟嘟囔囔他说。‘你可以去。’

“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分手时比往常冷淡，我走了，不明白怎么会引起这样的反应。我没有过错——一切都是照往常那样办的。”

“几天过去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那边没有动静。我想：‘他这是因为什么呢，是生我的气了？’

“8月6日，伊格纳托夫手下的秘书长给我打电话，转达让我给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打电话的指示。”

“7日早晨我给他去电话，他若无其事他说：

“‘你准备好了吗？明天我们飞索契。’

“这种出发我已司空见惯。我很快收拾好东西，并在第二天早晨给伊格纳托夫家里打电话。他和我住在同一幢楼里。我带上他的箱子，便一起乘伊格纳托夫的海鸥牌汽车去伏努科沃。我们当天就到了索契。”

“我们下榻在给我们预备的别墅——它单独建在花园中，离主要的建筑物稍远一点。饭后我们到疗养院的庭院中散步。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情绪极佳，有说有笑。他喜欢这座别墅。”

“‘别墅满不错嘛。够水平。’他对我说，又循着自己的思路补充说：

“‘反正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出发前建议我住到第四国家别墅。’

“‘那么要不要说我们占用这座别墅呢？’我问道。‘他们向赫鲁晓夫报告了吗？这些别墅可是主席团委员专用的呀。万一让他知道了，再搞得不愉快可怎么办？’

“伊格纳托夫没有回答，我们默默地沿着小路走去。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转身往回走，我在后面紧跟着他，保持半步的距离。”

“伊格纳托夫若有所思地冒出这么一句：

“‘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不听赫鲁晓夫的。’

“他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常事，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丢了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之后，不过那往往都是在酒酣耳热和因为某项具体决定才开骂。伊格纳托夫认为，他要是处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地位上一切都不会那样去做。不过，无论他对赫鲁晓夫如何说三道四，可以觉察出他有点怕赫鲁晓夫。可这回他公开暗示根本可以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这倒是个新动向。”

“‘需要解决食品和汽艇的问题。您有何指示？您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离开这个话题，问道。”

“‘全都没问题，我已经同谢米恰斯内谈妥了，什么汽艇阿，

食品啊，在我们的别墅里加设高频电话啊，都解决了。你去问问值班员：他们已经接到命令。’伊格纳托夫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哈哈一笑。”

“从前伊格纳托夫与谢米恰斯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伊格纳

托夫恨死他了，稍有疏忽就骂，不过当时他也害怕谢米恰斯内，知道此人同赫鲁晓夫关系不错，特别是与阿朱别伊颇有交情。要他去求谢米恰斯内，就在一年前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感到困惑不解。我给疗养院值班员和克格勃系统的值班员去电话，两边的回答都是已接到关于提供食品和汽艇的一切命令。

“我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

“他十分满意。

“‘到底有这样的好人——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他们对我是有求必应。’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如此变化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昔日遮掩得很不巧妙的势不两立一下子成了如此的亲密无间呢？这里显然大有文章……接着伊格纳托夫让我了解一下，附近还有哪些中央委员在疗养。

“我在别墅给索契市党委书记打电话，告诉他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正在‘俄罗斯疗养院’休养，首长很想知道哪些同志正在索契休养。这个问题很平常：凡新来乍到的人第一关心的是左邻右舍。

“市委书记任何时候都对情况了如指掌。他当即回答说，有几位州委第一书记在附近的疗养院疗养，其中有堪察加州、别尔戈罗德州和沃伦州的书记，最后这位书记的名字好象是卡利塔。我全部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

“‘谢谢你，不必再给市委打电话了。我们自己会弄清的。’他回答说。

“几天过去了。伊格纳托夫再也不打听什么人了。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我尽量少让他觉得碍眼。

“突然有人转告我，他有急事找我。几分钟后我到了伊格纳托夫那儿。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看见了车臣—印古什州委书记季托夫。当然，他当时离得很远，也可能我认错人了。你给疗养院登记处打电话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他。如果问你是谁，就说是州委机关的。’

“原来季托夫确实就在旁边的‘特等’别墅中休养。我打电话到他房间去，却回答说已外出。我请对方转达，是伊格纳托夫让打的电话，首长已在这儿的别墅里休养，他请季托夫同志给他去电话。

“第二天，伊格纳托夫十分满意地告诉我，季托夫来过电话了，已邀请他来作客。

“‘你来操办吧。’他说。

“举办宴会是我在我们一起休养中的一项任务，客人们到齐了。餐桌摆在凉台上。白兰地、鲟鱼肉、鱼子酱、烤羊肉串——全是老一套。

“除季托夫外，伏尔加格勒州执委主席奇姆托夫也来了，还有几个人，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也应邀入席。

“在频频举杯祝酒的间隙，伊格纳托夫回忆起自己在列宁格勒工作时的许多往事。奇姆托夫和其他人讲了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在座者开怀大笑。这次聚会并无任何可疑之处：大家聚在一起，喝上两口，闲扯一通，又各自散去。

“伊格纳托夫对此次聚会十分满意。他在散步时几次提到同季托夫的谈话。

“‘季托夫这人挺不错，我们用得着，很有价值。’伊格纳托夫说。

“8月快要结束了。

“29日伊格纳托夫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这次谈话我也在场。

“勃列日涅夫说，既然伊格纳托夫在索契休养，就请他花上两天时间到克拉斯诺达尔去一趟，参加向北高加索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克拉斯诺达尔油气联合休’授勋仪式。

“伊格纳托夫痛痛快地答应了。

“‘顺便再摸摸格奥尔基的底，’他允诺说（格奥尔基是指克拉斯诺达尔农业边疆区党委书记格·伊·沃罗比约夫，伊格纳托夫的老熟人）。‘廖尼亚，季托夫和奇姆托夫到我这儿来过。两杯酒下肚，便酒后吐真言。他们的话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这些话反映了普遍的情绪。不过我对格鲁吉亚放心不下。9月10日我休假回来，想到第比利斯去一趟。应当到那儿做做工作。’

“‘格鲁吉亚有什么让你放心不下的呢？’

“‘我看报纸上登了一封120岁女庄员致赫鲁晓夫的信。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看来，他们在那边认不清形势。’

“‘就这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勃列日涅夫安慰他说。

“‘这么说那是你的工作范围了？那就另当别论，’伊格纳托夫喜出望外。‘还有个事儿。我跟亚美尼亚的扎罗比扬谈了，他的思想不错。是我们的人。廖尼亚，不过我对你有个要求，一切都要在11月份以前完成。’

“他们又稍微谈了谈天气及勃列日涅夫打猎的收获，伊格纳托夫放下听筒，他眉开眼笑：看来，谈话很对他的心思。”

“我忘了交代，”加柳科夫忽然想起来，“伊格纳托夫刚到疗养院就预先告诉我，休假期间他打算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奥尔忠尼启则市和其他什么地方。”

“‘老呆在一个地方没意思。’他解释说。

“然而行期一延再延。

“‘再等等，不到时候。’每当我提醒说该张罗买票时他都这样回绝。

“我们是8月30日，就是与勃列日涅夫通话的第二天到克拉斯诺达尔去的。住在边疆区委的别墅里。当天晚上客人们来了，他们是巴伊巴科夫、卡恰诺夫、丘尔金等领导人。

“大家坐下来用晚餐。就餐中话题围绕着明天的授勋大会。对大会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人们各自散去。伊格纳托夫对这顿晚餐感到不满。看来，是沃罗比约夫的缺席破坏了他的情绪，沃罗比约夫一直没来。

“‘骄傲自大。不来……’他嘟囔道。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8月底，正是收割大忙季节，他们的粮食计划又吃紧。大概是在各个区里跑吧。’我试图安慰伊格纳托夫，但他只是把手一挥。

“8月31日举行群众大会，伊格纳托夫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颁发了勋章。按往常惯例，会后为当地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举行了盛大宴会。我们在宴会后回到区委别墅。卡恰诺夫和丘尔金与我们同乘一辆汽车。他们一直把伊格纳托夫送到门口，相互道别后就离去了。

“特鲁比林——边疆区执委会主席很快来了。他同伊格纳托夫一起等沃罗比约夫，沃罗比约夫是去为当天启程的萨拉托夫州委书记希巴耶夫送行。

对勃列日涅夫的呢称。——译者

· 扎罗比扬——当时的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作者

沃罗比约夫在晚上 11 点左右才来。他们三人在屋里坐了几分钟，伊格纳托夫就同沃罗比约夫一起到与别墅毗连的公园里去了。特鲁比林没有去，他留在屋内。我去找他，见他一人在房间里坐着，心绪不佳。看来，他也想参加谈话。我同他一起等伊格纳托夫和沃罗比约夫回来。每人喝了一杯白兰地。我谈起边疆区的成就、授勋，可特鲁比林没精打采地应付着，看来他的心思在公园里。时间过得很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伊格纳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仍在散步。这对伊格纳托夫说来是很不寻常的：他照例是 11 点上床，只有非常特别的事情才会迫使他违背自己的习惯。

“凌晨一点，特鲁比林开始坐不住了，他几次走到进公园的那个门口，试图看清这两位散步者。后来实在按捺不住，便起身去找他们。他很快就折回来了，脸色更加阴沉。

“‘还在散步，我明天要上班。我回家睡觉去。我已经跟他们道别了。’他对我那无声的问题作了回答。

“特鲁比林叫了一辆车走了。我也去睡觉，宴会后我困得睁不开眼。伊格纳托夫同沃罗比约夫仍然在公园的小路上徘徊。

“他们在谈什么，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沃罗比约夫又来了。我们刚刚起床。他带来一位新客人——罗斯托夫的米罗诺夫。又过了一会儿，巴伊巴科夫来了。大家一起坐下用早点。巴伊巴科夫饭后有事匆匆走了，其余的人则去公园散步。谈笑风生。我可以看见伊格纳托夫在论证什么问题，其他人都在洗耳恭听。

“他们没有走出多远，值班员就报告说勃列日涅夫打高频电话过来，请伊格纳托夫接电话。沃罗比约夫和刚到的卡恰诺夫同伊格纳托夫一起走进房间。

“我留在门外，不过隔着门可以清晰地听到谈话内容。讲的是授勋一事。

“起先听到伊格纳托夫的声音：

“‘谢谢，廖尼亚，一切顺利。谢谢您的帮助，要没有您就困难重重了。’

“原来是勃列日涅夫帮助批了举办宴会的钱，因为禁止用国家的钱宴请，这条禁令执行得很严。只有勃列日涅夫身为中央第二书记可以批准这笔开销。

“‘沃罗比约夫正好在我这儿，’伊格纳托夫继续对勃列日涅夫说，‘我跟他什么都谈到了。我还跟萨拉托夫的书记希巴耶夫谈了。起初相互不理解，不过后来找到了共同语言，所以他那边也没问题，我做好了他的工作。’

“他们说了再见，并相互祝福，又让沃罗比约夫接过话筒。先谈了谈授勋的事。沃罗比约夫感谢勃列日涅夫对他们的劳动的高度评价，保证再争取得到新的成就。接下来，卡恰诺夫又拿起听筒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通。

“通话后大家兴高采烈地来到门廊，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决定先顺道去边疆区委，再从那里出发去滨海阿赫塔尔区钓鱼。

“沃罗比约夫在途中离开我们，留在边疆区委了，卡恰诺夫和丘尔金与我们同行。一切都作了精心准备。丰盛的饭菜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篝火上咕嘟咕嘟地炖着鱼汤。第一件事是喝酒、吃点东西。这一切占去了几个小时。大家在餐桌上争先恐后地讲捕鱼和打猎的小故事，一个比一个难以置信，而每次举杯祝酒都要把过去的捕鱼量再往上抬高一点。

“大家稍事休息后便迎着晚霞出发了：有人拿着猎枪去打野鸭，有人带着绞竿去垂钓。

“第二天照样如此，直到9月2日傍晚我们才回到克拉斯诺达尔。”

“沃罗比约夫在别墅里等候。他和伊格纳托夫谈了谈，迅速作好准备又很快起身走了。他到晚饭时回来，晚饭后又是故技重演：他们两人又一同散步到凌晨一点，不知讨论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们要走了。前来送行的是沃罗比约夫、卡恰诺夫、丘尔金、特鲁比林。告别时伊格纳托夫邀请大家于本周六即9月6日到索契来赴便宴。还特地强调了勿带夫人。”

“9月6日，我们这里一共来了20人左右。其中有巴伊巴科夫、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长波波夫、应邀前来的克拉斯诺达尔领导

人及其他人。卡恰诺夫和特鲁比林晚到一步：他们在途中耽搁了。”

“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大家频频举杯祝酒。沃罗比约夫回忆起列宁格勒，回忆起当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伊格纳托夫坚持了多么正确的有原则性的立场。顺便也刺了刺科兹洛夫。”

“伊格纳托夫当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时，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强硬路线而著称’。当时对他的粗暴和缺乏涵养颇有议论。中央收到了许多文艺活动家联名的控告信。结果伊格纳托夫被免职，到沃罗涅什当州委第一书记去了——据说那里的人好对付，工作起来容易一些。”

“晚上10时许，宴会已近尾声。最坚忍不拔的人留下来继续吃喝，其余的人则各自东西。伊格纳托夫待客人全都散去后，把我叫去，吩咐我用高频电话给他接波德戈尔内在雅尔塔的别墅。”

“趁那边去叫波德戈尔内接电话的工夫，他用手捂住话筒，对我说：

“‘快让格奥尔基过来，只是可别让其他人也跟着。’”

“我把沃罗比约夫请到办公室。季托夫已经在场了。”

“我去找沃罗比约夫的当儿，波德戈尔内在那边已经拿起话筒。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好象是彼德戈尔内祝伊格纳托夫马到成功。伊格纳托夫却意味深长他说：

“‘主要的成功不取决于我们，就得看你的了。’”

这时他注意到我还在办公室里，便冲我点头示意：你可以走了。我悄悄地退出来，把门关上。

“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夜深人静时的窃窃私议，吞吞吐吐的话语、暗语，这些都引起了好奇心，使我产生了警觉。这回又把我撵了出来。隔着一道门听不清所说的话，我也不想充当窃听者的角色。‘归根到底，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暗自思忖，在过道里转悠了一会儿，便来到门廊上。”

“右边，办公室的窗户亮着灯，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围在电话机

旁的三个男人的身影。我看到这时拿着话筒的是季托夫。他的声音听得相当清楚，不过要分辨清他讲的话就困难了。”

“我很想听听他们究竟同波德戈尔内讲些什么，为什么要搞这种秘密活动。通常伊格纳托夫都喜欢炫耀自己同中央主席团委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冲着听筒大声嚷嚷：‘你好，廖尼亚！’或是‘你好，科利亚！’”

“我刚刚走下门廊，就发现小道上一个愈来愈近的身影。”

“‘瓦夏，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哪儿？’陌生人冲我喊道。”

“这是特鲁比林。他没有发觉伊格纳托夫、季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上哪儿去了，眼下正在满公园找他们。”

“‘全都在那儿聚会呢。’我让特鲁比林看办公室那亮灯的窗户。”

“他急匆匆地往里走，却马上又折回来了。”

“‘老是躲躲藏藏的。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您在说谁？’

“特鲁比林猛地一哆嗦：

“‘我不说了，去他的吧……离了他们我也什么都知道，所有的决定全得通过我……’

“他瓮声瓮气地咕哝着什么，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伊格纳托夫、季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从办公室里出来。他们边走边小声地说着，看来是在讨论同波德戈尔内的谈话。他们发现我在门廊上，便不作声了，开始道别。克拉斯诺达尔领导人留下来在旁边的别墅里过夜。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家了。”

“早上送走了克拉斯诺达尔领导人，伊格纳托夫邀我去散步。谈话围绕着昨天的招待会。”

“‘瞧见了，没有一个人为他祝酒。这太好了！’他颇为得意地说。”

“‘为谁？’我不明白。”

“‘赫鲁晓夫呗。’

“他又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

“‘季托夫是个好人。’

“这是他对周围的人通常的评价：凡是同意伊格纳托夫的意见、支持他的人都是好人，其余都是不好的人，这种人只有细微的差别。”

“‘没关系，瓦夏，’他安慰我说，‘稍微再等一等。你也有前途的。别着急。’

“我没有去追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话题又转到了钓鱼上。”

“此后索契再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了。休假即将结束，我再次提醒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原打算去亚美尼亚的。”

“‘不去了。扎罗比扬到莫斯科见过勃列日涅夫了。该准备回家了，’他回答说。”

“我们于9月19日回到莫斯科。星期一我去他的别墅，为他料理各种家务。伊格纳托夫经常把我当秘书使用，这次一见到我，就让我给他接通正在新阿福尼亚休养的基里连科的电话。值班员拿起听筒，问清是谁来的电话后回答说，安德列·帕夫洛维奇正在洗海水澡，不能接电话。”

“这一回答竟让伊格纳托夫紧张起来，我感到吃惊。”

“‘是真的在洗澡呢，还是不想接电话？’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伊格纳托夫坐立不安，他一个劲儿地往中央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接‘自动电话’的是个秘书，他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上班，今天不会来了。他有病。’

“这下伊格纳托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步，不停地

说：

“‘真病还是假病？他这得的是什么病？这病有没有必要生？’

“我感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便退出来。”

“我大约在一小时之后回到办公室。伊格纳托夫坐在皮面安乐椅上，心平气和地微笑着。”

“没什么。一切顺利。他不过是患了流感。一切正常。”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得流感倒成了正常？……不过我把这次谈话也加到了近一个月来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清单上“如果把所有这些细节凑到一起，就成了一幅令人生疑的图画。吞吞吐吐的话语、暗语，同州委书记的个别谈话，突然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要好起来，十分频繁地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通话……为什么提到11月？11月前必须做到什么？”

加柳科夫开始转述足以说明伊格纳托夫对我父亲的态度各种事情：有的是前些年往事，有的则刚刚发生。

“伊格纳托夫的坏脾气已是尽人皆知，他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对未能选入中央主席团耿耿于怀。过去伊格纳托夫也是几杯酒下肚就爱在自己的圈子里说什么中央的工作全靠他一个人撑着，其他人全是平庸之辈，游手好闲，赫鲁晓夫只会按照陈规旧套签署替他准备好的决定和发表演说……”

一切都必须不慌不忙地仔细斟酌，再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种事情急不得。

我看了看手表：我们散步已将近两个小时。天色完全黑了。我们转身回到车上。

我感谢加柳科夫提供了这些消息，并保证以充分信任和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这番话。我答应只要父亲一回来就立即向

他全部转告。为防万一，我要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以应急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大情愿地说了号码。

“谢尔盖·尼基季奇，不到万不得已时别给我打电话，”他犹豫不决地说。“请您在电话上什么也别提，只是约定见面。我的电话有人监听，我对此坚信不疑。我甚至还核对过：我有意长期不交电话费。按规定应该停机子的，可没有停。说明我的电话有人窃听。”加柳科夫最后说道。

我再次感到自己成了侦探故事的剧中人：又是监视跟踪，又是窃听电话，又是密谋策划。这一切都很生疏、有点可怕、不够现实。迄今为止，我一直坚信克格勃和其他机关都属于同盟者的营垒。他们值得信赖，可以依靠。打从我记事起，房子四周就站着穿蓝制服的卫兵。我一向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交谈者甚至儿童游戏的参加者。

转眼之间这个部门摇身一变。它已经不再起保卫作用，它在监视跟踪，你迈出的每一步它都知道。一想到这里，背上就直起鸡皮疙瘩。

我在内心深处抱着希望，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恶梦会很快过去，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生活又会沿着习惯的轨道往前运行。尽管如此，却老是有个什么东西在说：不，这很严重，无论今后事态如何发展，一切都不会完全照旧了。

后来才知道，加柳科夫和我在对克格勃的本事的估计上都是同样的天真。他担心家里电话有人窃听，其实只对了一部分。赫鲁晓夫家中的政府专线电话同样受到窃听，而我同加柳科夫的会面则自始至终都被录下来了。后来我们每迈一步，都逃不脱“主管机关”的火眼金睛。

可我们当初在约定“秘密联络”时，自然是对此一无所知。说得确切一点，加柳科夫感到惴惴不安，我呢，口头上同意他的意见，内心里则觉得好笑：真是杯弓蛇影，大惊小怪。不过我认为

小心点也没什么坏处。管他是真是假，这样他会放心一些：他也是怀着一片好意而来。

该口去了。我们顺利地走到大路上，环顾四周：没有“尾巴”跟着我们。天真可爱！……

半小时后，我让加柳科夫在他家对面下车，答应必要时给他去电话。我再次对他提供的消息表示感谢。

几分钟后，我驶入别墅院内。值班员把大门关上，我就同外部世界隔绝开了。这里，在院墙内，一切都如此熟悉、宁静和稳固。大门外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看来一点儿不真实、一点儿不危险。

父亲不在，他要过几天才回来，暂时可以干干别的事情。“阴谋分子”会等待一段时间，他们跑不了的。等父亲回来，情况一弄清楚，就会使一切恢复正常。

发射场上传来了第一批消息。武器演示即将结束，然而对我所在的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任总设计师的设计局来说，结果不大令人乐观。我们刚刚研制出来并进行过试验的洲际弹道火箭敌不住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利那个设计局的同类导弹的竞争。这两枚导弹是同时进行研制的，所规定的使命完全相同。

早在试验过程中，军界人士就开始偏爱扬格利的导弹。他们受到季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的积极支持。尽管他当时已不直接主管国防工作了，但他作为我国导弹技术之父中的一员威信特别高，他的话很有分量。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科兹洛夫患中风后，连同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一起把照管军事工业的任务也接替下来了，他因性格随和，不发表十分肯定的意见。几个月前，切洛梅设法求见了，此人以其特有的能言善辩使勃列日涅夫相信了他的产品的优越性，并且得到了全力支持的保证。然而8月份发生了“不幸”。乌斯季诺夫去找勃列日涅夫，

他们关起门来谈了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的意见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从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吞吞吐吐的话和他们对我们设计局总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对于领导人好恶的任何一点改变都能十分敏锐地捕捉到。

勃列日涅夫与乌斯季诺夫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他们最初要好起来是战争刚刚结束、勃列日涅夫还担任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的时候。年富力强的武器装备部长在城市重建的工地上同招人喜欢的州委书记相互结识了。自那时起，把乌斯季诺夫同勃列日涅夫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不算友情，也是连绵不断的相互的好感。生活使他们各自东西，他们多年不曾见面，但只要见面就愉快地回忆起40年代末的事情。精明能干和目标坚定的乌斯季诺夫让以性格随和著称的勃列日涅夫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8月份乌斯季诺夫跟勃列日涅夫都说了些什么呢？没有见证人，现在可以推测，主要的话题并不是切洛梅或者扬格利的导弹：看来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未来的安排。导弹问题只是一带而过——眼下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

我们当时怎么也料想不到这次谈话的内容，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去琢磨：乌斯季诺夫使勃列日涅夫相信了什么？（后来才弄清，我们没有猜到：这次是勃列日涅夫劝说乌斯季诺夫。）列昂尼德·伊里奇会采取什么立场？切洛梅焦急不安，没完没了地说：

“我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脾气。乌斯季诺夫说什么他都同意。乌斯季诺夫可以任意摆布他，他完全听从乌斯季诺夫的意志。

两种导弹的技术鉴定大体相当，因此最微不足道的论据都可以使天平向任何一方倾斜。

这时消息传来了：赫鲁晓夫发表了对我们不利的意见。尽管我们设计局不久前还得到一大笔订货，前途被想象得很美好，弹道导弹出师不利使大家感到忧伤。不过这只是最初的消息：赫鲁

晓夫和切洛梅都还在试验场上呢。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想了解第一手的全部情况。

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加柳科夫所谈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了。那里一切都未必真实，而这里眼下正决定着我们心血结晶的命运，决定着这几年顽强工作的成果的命运。

这些天来父亲在沙漠地带秋天的阳光下稍稍晒黑了一点，显得容光焕发。他对所见所闻十分满意，象往常一样急着要谈自己的感想。父亲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已向自己的同僚作了介绍，回到家里他的交谈对象就是我了。我在设计局工作，懂技术，父亲仿佛借助我来检验自己的感想，详细问到一些细节。

试验场上向他展示了三个座位的“东方号”新宇宙飞船，飞船将于近日内发射至人造卫星轨道，向他介绍了机组人员——科马罗夫、费奥克季斯托夫和叶戈罗夫。

父亲简直充满了为我国在宇航方面超过美国而感到自豪的感情。周围的人一个劲地随声附和，竭力维持一种错觉，似乎美国眼看就要落在后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成为头号技术大国了。

父亲从试验场回来的第一天，他没有回家就径直去克里姆林宫。他5点多钟到家，把公文包放在餐厅里，就唤我道：

“出去散散步吧。”

最近父亲把原来一直使用的皮制文件夹换成了锁上带有花字图案的黑色公文包。这个公文包是一位外国客人送给他的。他不知怎么喜欢上了，没有象往常那样交给助手并且过后就忘，而是留下来自己使用，直到退休从不离手。

傍晚的散步程序每天都要重复一遍：从小楼到大门，向行举手礼的卫队军官微微颌首致意，往左拐到一条沿着高大砖墙的狭窄柏油林荫道上。小道两旁种满了小桦树。拐角处是一小片草地，中间有一簇白桦树。到这里有一次小憩：不能不欣赏一番白桦树。这也成了习惯。接下来再往左拐。右边的围墙那边是相邻的宅邸，

和我们所住的这幢宅邸一模一样，从前马林科夫住在那里，后来是基里钦科，现在空着。围墙上有一道绿色小门，要是愿意，可以穿过隔壁的地段到沃罗诺夫家去，还可再往前走，到米高扬居住的宅邸。

今天，我们从小门旁经过往前走，从右边绕着小楼散步。小桦树完了是樱桃树。春天，这些树俨然是一个个郁郁葱葱、开满白花的大圆球，可眼下那纤细的枝头只是零零星星地缀着一张张淡红色的小叶片——秋天已到……

别墅已抛在后面，小径到莫斯科河的岸坡上就开始蜿蜒曲折了沿着回头弯道可以下到岸边，然后返回，正好兜完一圈儿。

我们一起散步，这已成为我俩的习惯。每天如此。有时拉达和阿朱别伊参加进来，妈妈很少参加。我俩这个搭档则是固定不变的。有一段路彼此都一言未发，看来父亲很累，不想开口。

我在他旁边走着，拿不定主意：开始讲同加柳科夫的会面呢，还是过后再说？我不想谈这个话题——可能碰到粗暴的回答：“别管闲事。”过去提李森科和遗传学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如今我的处境更加微妙：从未有人介入过高层领导人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话题是禁止接触的。连父亲自己也从来不当着我们的面谈他的同僚。可我不但要打破这条禁令，而且打算指控父亲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在搞阴谋活动。

即使从人情的角度出发，我也很不想干这事儿。勃列日涅夫也好，波德戈尔内也好，柯西金也好，波利扬斯基也好，他们全部经常在我们家作客，欢聚，说说笑笑，许多人我是从小在基辅就记得。我一直尽量让自己相信的这一切万一统统不过是那个不很熟悉的人的胡说八道、凭空捏造，那么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他们，他们对我又会怎么想呢？

总之，我决定缓一步再谈。

我没提这事儿，却问起他的观感和武器展示情况。父亲开始说了，起初不大愿意说，后来则愈讲愈入迷。两眼炯炯有神，脸上已毫无倦容。导弹是他的骄傲，他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导弹的型号，比较它们的性能，回忆起同总设计师和军人的谈话。父亲颇为自豪：如今我们在军事实力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他 50 年代初刚刚当上中央第一书记时，美国是可望而不可即，美国轰炸机可以击中我国国土上的任何一个地点。可现在呢，连美国总统肯尼迪本人也承认苏美军事实力旗鼓相当。才不过十年的工夫！确有值得骄傲之处。

我瞅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道：

“你觉得我们的导弹如何？”

父亲显然不想讨论问题，看来在试验场上对所有问题都议论够了，他答道：

“导弹不错，但是扬格利的更好。我们准备生产他的导弹。我们全都讨论过，也作出了决定。这个问题不要再提了。”

我不吱声了，其实心里对我们单位花了这么大力气进行研制感到很委屈。

父亲仿佛觉察到了这一点，便补充说：

“你们的许多建议很好。我们批准了作业计划。现正由斯米尔诺夫形成文件。”

一周结束了。星期六晚上，全家人照常来到别墅。生活按照早已成为惯例的程式进行：星期天早上一起吃早饭，然后父亲浏览一下报纸，把他感兴趣的文章勾出来，就去散步。

我们又两人一起散步了。小道在茂密的松树林中蜿蜒曲折。一路无话，我一直在选择时机，谈话迟迟没有开始。我们走近小门，穿出别墅的围墙，来到莫斯科河水泛地中的一小块草地上。

眼下草地到处都挖开了。遍地是水泥桩、水槽、管子。访问法国的农业代表团带回一样新东西——灌溉系统，水在水泥制成的水槽中流动，水槽则安在地里支着的水泥桩上。父亲很喜欢这个系统：水不会在土壤中浪费掉，沟渠也不会夺走作物的土壤。他十分热衷于新的想法，便决定在自己的别墅里搞试验。说到做到。一道命令下去，一周后建筑工人就来了。草地变成了

建筑工地。

此刻我们在林子的边儿上散步，父亲高兴地察看着这一切。他仿佛已经看见了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水槽，离地面有一米五高，潺潺流水从水槽中通过。每个小畦都可借助水槽内排列均匀的小孔得到灌溉所需数量的水，不多不少，一点没有糟践。

我们在草地周围走了一圈，便往回折了。不愉快的谈话不能再拖下去了，散步即将结束。回到别墅后，父亲马上就要看文件，然后是午饭，但主要的是周围有人，我又不想当着别人的面进行这次谈话。

“你知道吗，”我开始讲，“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这也许是无稽之谈，但是我没有权利不说。”

接着我简要他讲述了那次奇怪的电话和同加柳科夫的会面经过。父亲一言不发地听我把话说完，我正讲到一半，我们已经走到通往别墅的小门门口了。父亲略一迟疑，又转身往草地走去。

我讲完后便默不作声。

“你告诉我是对的。”父亲打破了沉默。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

“你再说说，这个人都点了哪些人的名字。”他说。“有伊格纳托夫、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谢列平。”我边想边说，想尽量搞准确一些。

父亲陷入沉思了。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

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会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他没有等待我的回答。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以后的事情不归我管了。

我们又转身回别墅去。一路无话。到了家门口他问我道：

“你对谁讲起过那次见面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啦！这种事怎么好乱说呢？”

“这就对啦，”他表示首肯，“跟谁也别说。”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星期一，我是病愈后第一天上班。我听了一大堆试验场上的新闻，把加柳科夫的事情完全置诸脑后了。晚上父亲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我已经在家。我看见驶近的汽车，便出门迎接。

父亲还继续着昨天的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好把我挖苦了一通。‘亏您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我一下子心慌意乱了。对我说来这还了得：在中央主席团委员中间去树敌！万一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那么波德戈尔内也好，他肯定要如实相告的其他人也好，永远也饶不过我。我所讲的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向他们挑衅。

我开始向父亲说起时，就曾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怕消息走漏出去，却没有料到会出这种事。

诚然，过去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前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反复询问我各种不

同的导弹系统的性能比较情况。我毫无保留地把所知道的情况全都对他讲了，并且尽量作到客观公正。我不想为自己的“公司”充当辩护士。应当用最精良的武器来装备我军，至于谁制造了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1941年因为主观主义

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些血的教训永远也不会忘记。可几天之后父亲在国防委员会上发表自己对于发展兵器工业的见解时，忽然脱口说出：“谢尔盖给我讲了什么什么……”

当有人把这事告诉我时，我心惊胆战起来！我当初就不该抢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来可以说，我不了解情况。我却“炫耀”自己在捍卫国家利益上的博学和热忱。这下可好，那些同我一起共事的人，只要父亲对他们哪怕提出一条批评意见，他们也不会饶过我的。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再不掺和这种事情。这回倒好——更糟糕，陷得很深，而且对手是些什么人呢？！是中央主席团委员！！“我星期三就照原定计划去皮聪达，顺路去克里木，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田间走一走，”父亲继续说道。“为了保险起见我请米高扬跟这个人谈谈。他会给你来电话的。让他去验证一下吧。他也打算去皮聪达，他在这里稍微耽搁两天，把情况弄清楚了，到那儿再告诉我。”

我心情沉重。如果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那干吗去说它？如果并非无稽之谈，那又怎么可以放掉手中的线索？既然要委托米高扬去调查，那怎么可以匆匆忙忙地交代，而且当着可能参与了密谋策划的波德戈尔内的面呢？一切都显得极不认真，极其荒唐。反正我是处于一种最荒唐可笑的境地。然而木已成舟，再难受也晚了。我对于事态进程已经无能为力。

“要不，你晚走两天，亲自跟这个人谈谈？”我胆怯地建议道。

父亲皱起了眉头。看得出来，他不会干这种事的。

“不，米高扬是个满有经验的人。他能够把事情办好的。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而且……咱们不谈这个了。”

“要不，我也去皮聪达？今年我没有休过假。到那儿跟你住一段，”我把话题引开。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毕竟还是他更清楚。

“当然可以！这样我还快活一些呢，”他喜出望外。“你把这位肃反工作者带去见米高扬，请个假就来吧。”

父亲飞往克里木，在那里呆了两天，然后途经克拉斯诺达尔，到了皮聪达。我则留在莫斯科，决定不再采取主动了。

有几天都在日常上班的忙碌中过去了。没有人来电话。有时，一种危险的预感向我袭来，不过我把它撵走了——没必要张皇失措。我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除此而外的事情与我无关。

在我出发前夕的一天，我桌上的电话机突然铃声大作。我拿起听筒。

“我找赫鲁晓夫。”我听到一种威严的声音。

这称呼至少是非同寻常的，我有点慌神了。

“我就是。”

“我是米高扬，”对方接着说道。“你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起过同一个什么人的谈话吧，可以把他领来见我吗？”

“当然可以，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您定好时间，我给他打电话，您说个地方，我把人领去，”我答道。

“别到我办公室来。今天晚上7点到我家去吧。你亲自领他来，尽量别

引起注意。”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最后这句话不知是请求还是命令。

“我不知道能不能马上找到他。我只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也可能不在家。”我没有把握。

“今天要是找不到，就明天带来吧。只是得事先通知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最后说。

我立刻拨了加柳科夫家的电话号码，算我走运，他正好在家，亲自接的电话。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是谢尔盖·尼基季奇，”我开始说道，故意不报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想跟您谈谈。晚上7点必须到他那儿，我6点40去接您。”

从加柳科夫的语气中可以觉出，他对我去电话并不怎么高兴，

当我提到米高扬时，他简直是感到惊恐了。

“我可不愿意人家把我认出来，扎哈罗夫认得清我，可能生出不愉快的事情来，”他喃喃说道。

“您放心吧。我们坐我的车直接去他家，我亲自开车。7点钟天已经黑了。卫队都认识我，我经常去他们家，跟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很要好。他们不会来查问是谁坐在我车上的，”我安慰他说。

不知道是我的这番解释对加柳科夫起了作用呢，还是他明白自己已别无出路。反正他再没有表示异议。

我们差5分7点来到米高扬宅邸的门口。不出我之所料，卫兵从小门往外一看是我，什么也没问就把大门打开了。我们驶近楼房的入口，迅速走进没有上锁的大门。楼前的林荫道拐了一个弯，从大门口看不见我们。门厅里空无一人，这难不倒我，我对楼内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我们宽衣后登上二楼，敲了书房的门。

“进来，”这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声音。

米高扬站在房间中央迎候我们，冷冷淡淡地寒暄了两句。他身着严整的深色西装，只是脚上穿着便鞋。

我向他介绍了加柳科夫。

往常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对我都是亲切接待，询问我的近况，开开玩笑。这次他却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冷淡样子，以此来突出表明他对我们的来访很不欢迎。这样的接待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这就是我管闲事的下场。往后会怎样呢？

列宁山上的所有官邸都象孪生子一样地彼此雷同。甚至房间里的陈设也毫无二致。同我家里一样，米高扬书房的墙壁都镶有胡桃木护墙板。一面墙让大书橱占满了，橱内全是列宁、马克思、

恩格斯的著作和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在靠窗户的角落里放着一张红木大写字台，旁边是两把包有棕色皮革的安乐椅。桌上一个挨一个地摆了四部电话：一部笨重的“高频”电话，一部裹得紧紧的、带了一根新近问世的卷曲电线的“自动电话”，一部较为简陋的市内黑色电话，没有拨号盘——专供与卫队值班军官联系之用。紧挨着的一张小桌上是一张大幅照片，那是一位身着革命前军服、蓄着卷曲的八字胡、胸前佩戴有四枚乔治勋章的士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的赠物。

.C. 扎哈罗夫——1964年10月为克格勃领导人之一，原先任卫队局局长。——作者

米高扬请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己则坐在桌旁。气氛极其正经。

“有钢笔吗？”他问我。

“当然有啦。”我不懂得他的用意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

米高扬指了指桌上的一摞白纸。

“这里有纸，你来给我们的谈话作记录。然后把笔记整理出来交给我。”

此后他比刚才略微和蔼一些，对加柳科夫说道：

“把您对谢尔盖讲过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尽量准确一些。只讲您确实了解的情况。推测和设想就免了。您明白您提供情况以后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吗？”

这时加柳科夫已经完全镇静下来。当然他也紧张，不过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我完全清楚所承担的责任，我自己说话自己负责。我只对您讲事实。”

加柳科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我们在树林里见面时他所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记录得很快，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加柳科夫讲述时，米高扬时而点头，仿佛以示鼓励，有时又微微皱起眉头。不过他渐渐明显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

加柳科夫讲完了我已知道的那些事情，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米高扬。

“您很早以前就同伊格纳托夫在一起工作了吧？讲讲他的情况，也许过去就有过引起您的警觉的事情？”米高扬问道。

加柳科夫开始回忆起多年以前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同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不谋而合。

“应当说，伊格纳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随着他在仕途上的升降起伏而发生变化的。而他的升迁又老是同降职交错在一起。降职期间开始恶狠狠地咒骂赫鲁晓夫。我们从列宁格勒州委调到沃罗涅什时，伊格纳托夫极为不满：把他从第二首都发配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州。

“记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曾到沃罗涅什来参加农业会议。他当时跑遍了主要农业区，检查了播种工作，同积极分子进行了座谈。赫鲁晓夫走出车厢，他坐的不是专列，而是普通的火车。周围熙熙攘攘，人们各忙各的：有些在接吻拥抱，有些已经在往出站口搬东西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不过谁要是拿眼睛死盯住他，身着便服的警卫就会客客气气地举手示意：请从旁边绕着走。这一切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当地的领导人自然前来迎候赫鲁晓夫：照例是州委、州执委、军方人士都出动。我们刚刚靠近，人就渐渐多了起来——都出于好奇，看看到底在迎接谁。这时有人认出赫鲁晓夫，开始鼓掌、致意，响起了表示赞许的喊叫声。伊格纳托夫什么都看见了，当我们把赫鲁晓夫送到为他准备好的寓所，又回到自己的汽车上时，他十分满意地说：

“‘没人喜欢他。你没见大家迎接得多么草率吗？’

“会议开得挺热闹。与会者不仅是沃罗涅什的人，还有邻近几个州的负责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经常打断报告人的话，提出问题，插上一两句尖刻的批评意见。其他几个州都挨了批评，他却表扬了沃罗涅什州。

“会议休息时，伊格纳托夫从主席团的房间里出来，我向他表示祝贺：

“‘祝您成功，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单

只表扬了我们。’

“‘怎么，我费的劲儿还小吗？’伊格纳托夫挑衅地答道。

“‘往往你一个劲儿地干，挺卖力气，可领导人一来就把你数落得一无是处。’

“‘哼，只要他敢这么干。看我不把他痛骂一顿。’他说完话就走了。

“又比如那年秋天我们同往常一样在索契休养。我得知赫鲁晓夫要来休假。我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建议到阿德列尔的机场去迎接。

“伊格纳托夫骂了我一顿：

“‘接赫鲁希？你跟他去吧……你要想接就自己去吧。’

“这里要说明一下，他在发火时从来不把名字说完整，而是蔑视地简化成‘赫鲁希’。

“后来我们又从沃罗涅什调到高尔基州委。伊格纳托夫到了那儿也仍然念念不忘把他赶出列宁格勒的事情，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赫鲁晓夫后来不仅是中央书记，而且是第一书记了。伊格纳托夫马上评论说：

“‘瞧，他给自己加了个头衔。没什么了不起，他长不了。顶多再有五年干头。他年岁已经不小了。’

“一谈到讨论农业的中央全会和会议，他总是鄙薄地说：

“‘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全是空话……’

“后来一切都起了变化。赫鲁晓夫来到高尔基州，他当时建议延长还债期限。他与伊格纳托夫谈了很长时间，伊格纳托夫这时已判若两人——他开始逢人就大夸特夸赫鲁晓夫。我想，他们那次谈话的内容是关于调伊格纳托夫到莫斯科工作。

“1957年6月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伊格纳托夫（他当时还在高尔基市）和梅拉尔希科夫（苏共中央农业部长）到自己的别墅参观庄稼。他开始给我们介绍所种植的谷子和玉米。当时赫鲁晓夫对谷子很着迷，希望能在我国的条件下种植并获得高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弄清这一作物相当费工而且变化无常后，便对它失去兴趣，此后再未提起大力推广的想法。

“赫鲁晓夫和梅拉尔希科夫稍稍走开时，伊格纳托夫招手让我过去。

“‘告诉梅拉尔希科夫让他走，别久留。我要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谈。

“梅拉尔希科夫很快就走了。

“这时反党集团起来反对赫鲁晓夫。伊格纳托夫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赫鲁晓夫同伊格纳托夫久久地散步，向他讲述，看来是在向他介绍中央主席团内的现状，谈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其他人所采取的立场。

“我和赫鲁晓夫的卫队长跟在他们身后，稍微保持一段距离，自然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只是到谈话末了才有伊格纳托夫的一句话传进我们耳朵里：

“‘……这事很有必要。应当作出决定。’

“看来，他们讲的是马上就要召开的讨论主席团内所出现的分歧的中央全会。在这次反党集团受到谴责的全会上，伊格纳托夫进入了中央主席团。他高兴得如登天堂，不过尽量不露声色，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很快就操心起主席团内部如何分工以及他会分到什么职位的问题来。他不敢就这个问题去找赫鲁晓夫，便让瓦连京·皮沃瓦罗夫去弄清这个问题，此人当时在赫鲁晓夫接待室里当秘书。

“皮沃瓦罗夫很快就告诉伊格纳托夫说：

“‘我找赫鲁晓夫摸了摸底。你是中央书记。’

“伊格纳托夫喜出望外。他指望会当上第二书记。他对此深信不疑。很快就大为失望：选举基里钦科为第二书记，伊格纳托夫却成了主管农业的书记。

“他愤怒到了极点。

“‘我哪点比基里钦科差？怎么，我比他脑袋瓜笨吗？’

“对赫鲁晓夫的好感又变成了几乎不加遮掩的仇恨。赫鲁晓夫仿佛成了他丢不开的念头。有一次他仔细看我的脸，突然说：

“‘瞧你长的这副嘴脸。你跟赫鲁希一样，也是个粗暴警察型的人物。’

“还有一次，他坐在安乐椅上，一言不发，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他真愚蠢……’

“‘您在说谁啊，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我问。

“‘赫鲁希呗，还能说谁？我也可以当。有人对我说，让我担起领导责任。本该让我上的。’

“‘可是担子太重啊……’我小心翼翼地表示异议。”

这段插曲引起了米高扬的注意，他追问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说不准了，只记得是1959年。看来，这种观点是伊格纳托夫跟朋友们谈话中形成的，这些人是多罗宁、基谢廖夫、热加林、杰尼索夫、赫沃斯图辛、列别节夫、帕托利切夫……”

“加柳科夫同志，”米高扬又插话了，“您亲口说的伊格纳托夫早就对赫鲁晓夫没有好感，可您到现在才来找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您为什么会产生怀疑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加柳科夫早有准备，看来他没少考虑这个问题，他答道：

“怀疑可能出了什么事的想法，是今年在索契产生的。原先我对伊格纳托夫的那些议论都不怎么在意：要饶舌就由他饶舌去吧。

我们一起散步，他骂开赫鲁晓夫了，骂起来就没有个完。他对于二十二大上没有选入主席团耿耿于怀，抱怨说：‘1957年的全会都是我的功劳，没有我他们成不了。连‘二十人小组’也是我的功劳……我干了多少事啊！可他把农业给耽误了。我只要有两三年就可以把什么都搞上去，他只是空话连篇，不干实事！’

“到夏天议论就更有针对性了。此外，他同许多人的关系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去年夏天以前，伊格纳托夫对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其他人的态度都不好。对他们连一句好话也不说的，可如今这些人个个都成了好朋友。伊格纳托夫本人并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什么事情把他们都套在一起了。1957年以后，直到前不久，

伊格纳托夫一有机会就要说勃列日涅夫的坏话：‘占了个位子，可他都干什么了？发个言都发不好。拉扎尔冲他一嚷嚷，他就吓得差点儿没背过气

“二十人小组”——由20名苏共中央委员组成，该小组在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一伙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支持尼·谢·赫鲁晓夫，并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作者

去。还算什么“斗士”。’

“后来伊格纳托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稍微平和一些了，不过仍然十分嫉妒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伊格纳托夫一直希望回中央主席团，而且满心希望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今年年初，听说勃列日涅夫很快就要集中精力抓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了，伊格纳托夫开始起劲地四处打电话，探听打算让谁来填这个空缺，他的机会如何。这时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伊格纳托夫不想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但经常与波德戈尔内交谈。波德戈尔内转述了自己在克里木同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给他吃了定心丸。两人在谈话中曾提到主席团主席的问题，看来，赫鲁晓夫当时对于推荐谁还没有个准主意，赫鲁晓夫对于波德戈尔内提出的关于计划让谁担任此职的问题未作任何答复。

“据波德戈尔内对伊格纳托夫说，他便决定直截了当地问：

“‘也许伊格纳托夫合适吧？’

“赫鲁晓夫未置可否：

“‘再看看，再商量吧。’

波德戈尔内就凭这次偶然的谈话要让伊格纳托夫相信，他已经说服赫鲁晓夫，而且语气肯定地许愿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我的意见，他正在考虑决定你的任命问题。’

“伊格纳托夫曾经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

“‘万一是真的呢？……’

“他对于梦寐以求的理想能够实现这点是半信半疑。因此就追问波德戈尔内，赫鲁晓夫还讲了些什么，这一切究竟准确程度如何？

“波德戈尔内自然是什么也无法补充，谈话是很短促的，此行中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他让伊格纳托夫满怀希望，后来则更感到大失所望。伊格纳托夫一得知是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当上了主席团主席，他整整一个晚上把您和尼基塔·谢尔盖

耶维奇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年，从外面回到家里，经常仿佛是无意地说：‘今天我们在尼古拉（指波德戈尔内）那里呆了很久’，接下来便意味深长地不作声了。有时候则随口说道：‘今天到勃列日涅夫那儿去了。谈谈很有好处。他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

“应当说，自从波德戈尔内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后，伊格纳托夫就跟他打得火热，尽管从前他们两入关系冷淡。就拿去参加阿塞拜疆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即大大地扩充了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规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书记。斯大林去世后这些机构又缩小成原来的规模。只得给“失业者”找个差事。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主任，这对他说来无疑是不大荣耀的职位。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命运的这个转折期心情很不舒畅。形势稍微缓和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想起了自己的老战友，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当上中央书记，1957年在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上，他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辩论十分激烈。轮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发言时，他开始讲一些为自己观点辩护的话，可是没人听。卡冈诺维奇（“拉扎尔”系卡冈诺维奇的名字。——译者）更是粗鲁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瞎掺和什么，你来教训我们还嫌太嫩了点儿，没有人请你发表意见。你在海军里还没有呆够吗？小心着，再把你撵回去，可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会上的力量对比对赫鲁晓夫不利，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勃列日涅夫吓坏了，他力不从心，挨了这一顿抢白后，竟当场昏迷过去。只得把医生叫来抢救。——作者

并入俄罗斯 150 周年庆典来说吧。伊格纳托夫很想以莫斯科派出的代表团团长身分到巴库去。似乎满有把握，不料到最后一刻却让波德戈尔内来率领代表团。又是议论个没完。

‘他到那儿去见鬼吧！……我们又成了次要角色……’伊格纳托夫数落道。到了巴库他处处觉得不顺眼，尤其不喜欢阿洪多夫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多处引用赫鲁晓夫的话。伊格纳托夫很生气：‘这个阿洪多夫想干什么？他干吗跟个鸚鵡似地跟他一唱一和？一点儿也不知道形势……’

“我们在巴库与波德戈尔内同住一处别墅，可伊格纳托夫几乎跟他不打交道。只是寒暄两句就各自东西。波德戈尔内要准备讲话，伊格纳托夫则无事可做，他为了消磨时间，就成天围着住处散步。他需要有听众，我必得陪着他。无论谈什么话题，他都要逐渐扯到波德戈尔内身上来。似乎伊格纳托夫就不会想别的问题。他不知在担心什么，经常若有所思地重复说道：

“‘这个人危险。咳，危险……你们这些警卫员平常都是怎么议论他的？’

“记得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不谈这个。相互之间不接触这类话题。’

“‘好吧。也许这样做是对的。不过他这个人危险。十分危险。’

“谈话到此中断。

“在巴库，伊格纳托夫寸步不离住处，看来，他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只同扎罗比扬见过一次面，坐了两个来钟头，至于都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加柳科夫不作声了，看来是在整理思想。

“还想起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我说不了太具体，反正伊格纳托夫经常提到军人的不满情绪。他说：‘他们也因为裁减军队讨厌赫鲁希，讨厌透了。他们一直盼着把他……’

“伊格纳托夫当时话没说完，只是意味深长地把大姆指一竖。”

米高扬问道：

“您以为他指的是谁？”

加柳科夫一时语塞。

“不知道。他没有点名。他倒是经常同科涅夫元帅见面。他们曾一起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的葬礼，在那里关系近乎起来的。科涅夫退休后他们的关系仍然热乎。他们相互通话，互致节日问候，但真正的亲近、友情谈不上。其他人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件小事。勃列日涅夫出访保加利亚前曾给伊格纳托夫来电话，讲什么问题我忘了，但是有一句话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已经在相互道别了，伊格纳托夫提醒说：‘廖尼亚，你要注意，我 1960 年去过那里，我和日科夫曾作过单独的长谈。他也有看法，甚至对我说：‘你们那位的举止真奇怪……’不过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还有一件事。

“印度总统拉德哈克里什南来访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际联络部的维索津给伊格纳托夫来电话，预先通知说贵宾去全国各地访问要由他陪同。伊格纳托夫喜欢这样的旅行，这对他说来是个好兆头，说明还记得他，而且离了他不行。可是这次落空了：维索津刚打完电话，晚上格奥尔加泽就给伊格纳托夫来电话。他先表示歉意，然后说是受米高扬之托打电话的：

“ ‘ 我们原来计划让您陪同拉德哈克里什南访问的。今天讨论了访问路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建议访问亚美尼亚。您如果不反对的话，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想亲自陪同印度客人。阿富汗国王很快就要来访，您就陪同国王访问吧。 ’

“ 伊格纳托夫没有表示异议，却十分扫兴。

“ 第二天早上我到他家去。大家都围坐在餐桌旁用早点。桌上放了一大堆早上送来的报纸，看来是刚刚翻阅过的。伊格纳托夫的儿子列夫继续因我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不满地说：

“ ‘ 报上并没有说米高扬陪同代表团嘛……就是不想让你去。

你明白吗，这是个政治问题。 ’

“ 伊格纳托夫沉下脸来，点头称是：

“ ‘ 对，一切都没那么简单。他们想让我退居次要地位。 ’ ”

加柳科夫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了，他以疑问的目光看了看米高扬：

“ 您让我畅所欲言，小事情也可以讲。也许这是件小事，不过我觉得它可以很好他说明伊格纳托夫的总的情绪。 ’

米高扬点头道：

“ 畅所欲言。 ”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接着说：

“ 还有这样一件事。伊格纳托夫每天都要计算赫鲁晓夫在报上被提到多少次，要是有照片，就仔细端详。看着看着，便得意地冷笑道： ‘ 不管怎么说，反正这副尊容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

“ 近来伊格纳托夫显得极易冲动，经常发火训人，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为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去休假。不久前甚至破口大骂： ‘ 他这个鬼东西，干吗不去休养？ ’ 我觉得，对赫鲁晓夫休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关心同所发生的一切有某种联系。 ” 加柳科夫补充说。

“ 您只讲事实，结论由我们来作。 ”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重复道。

“ 应当说， ” 加柳科夫又接着说， “ 伊格纳托夫对其他主席团委员的评价也不怎么高。例如他对波利扬斯基只有一个叫法： ‘ 滑头 ’。沃罗诺夫在他看来是目光短浅。他给柯西金起了个绰号叫 ‘ 克伦斯基 ’，老是说此人不懂业务，干什么砸什么。他对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 ”

加柳科夫发现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不感兴趣，便改变了话题：

“ 最近几天伊格纳托夫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想，我同谢尔盖·尼基季奇谈话的事情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显然，有人在监视我们，并且报告了伊格纳托夫。他如今警惕性很高，再也不开诚布公地同我谈什么问题了，总之是对我敬而远之。我很难举出具体的事实，不过我感到他再也不信任我了。

“ 前两天他在动身去参加第一国际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给我来了个电话。那是 4 点钟的事情。我不在，我晚上 7 点回家，听说伊格纳托夫找我，就马上给他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是他接的电话。伊格纳托夫过分关心地询问我近况如何，有什么变化。

“ 我回答说，一切如常。

“ ‘ 我刚刚参加庆祝大会回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上讲了话，他讲的太好了。 ’ 伊格纳托夫夸起来没完。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策划反对苏维埃的叛乱，后逃亡国外。

“这番话我感到有些刺耳。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最近他一张口就是‘赫鲁希’，可这回居然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的太好了……’这样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很不喜欢。9月30日我又给伊格纳托夫去了个电话。心里很不平静。是他亲自接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他问道。

“‘刚才我看见窗户里有亮光，决定检查一下，也许屋里有外人。请让我进去把计数器上的读数拍下来。’

“‘行啊，行啊。明天来吧……’伊格纳托夫没讲完就把电话挂了。

“他显然是想躲开我。唔……就是这些。”加柳科夫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

我放下笔，揉揉发麻的手指。我面前放着一堆写满缩略语、半截词的纸页——我很着急，尽量做到一字不漏。

书房里是一片怀有戒心的沉默。

米高扬陷入沉思，对我们丝毫未加理睬。他的思绪到了很远的地方。最后他把头转向我们，面部表情坚决，两眼炯炯发光。

“感谢您的报告，……”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忘了怎么称呼，他望着我。

“加柳科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我赶快低声地提示。

“……加柳科夫同志，”米高扬接着说“您所讲的一切都很重要。您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希望您知道这是在向我正式汇报，也知道这样做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懂得责任很大。我在汇报前考虑了很久，也反复斟酌过，我对自己汇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肃反工作者，我只能这样做。”加柳科夫坚定地回答道。

“这很好嘛。我毫不怀疑您向我们通报情况是出于一片好心，我对您表示感谢。我只想说，我们认为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多年来为我国人民的利益、为共产党的利益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仍然把他们当成自己共同斗争的战友！”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见我放下了笔，便简短说了句：

“把我说的话记下来！”

这一切使我有点慌神了：如此词藻华丽的宣言是讲给谁听的呢？加柳科夫讲了自己的怀疑，米高扬这席话却把前面所讲的一笔勾销了。

加柳科夫困惑不解地看了米高扬一眼。目光中掠过一丝恐惧。而我则再次想道，真是不该往这件事情里掺和。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到此结束。

“您要是有什么补充或者新的消息，就给谢尔盖打电话。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叫您。”米高扬最后转身向我说道：“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我。我3日去皮聪达。”

“我也去，想到那儿度假。”我回答说。

“那就把记录带去。任何人也不让看，一个人也不让看。我全都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再合计合计。”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向加柳科夫伸出子去。

“谢尔盖送您回去。”

我们沿着明光耀眼的楼梯下来，到了空无一人的门厅。匆匆地穿上衣服，免得有人发现我们。加柳种夫焦躁不安，他尽量掩饰自己的紧张，因而就更加焦躁不安。我们上了汽车。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不相信我。我们根本就不该来。”加柳科夫伤心地说。

我便安慰他说：

“您做得完全正确。他最后那些话带有一般宣言的性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情况尚未核实之前不想败坏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名声。”

加柳科夫没有同我争论，不过看得出来，他极其沮丧。我们约好必要时电话联系，便分手了。

此后我再未见过加柳科夫。事情很快急转直下，哪里顾得上

见面。我很替他的命运担忧：想必伊格纳托夫什么都知道，肯定要收拾这位“叛徒”的。也许他已被捕。后来我从旁得知，加柳科夫遇到了麻烦，不过没有把他太当回事，很快就被撂到一边儿不管了，直到1988年秋天这个片断在《星火》杂志上登载后，加柳科夫才打电话到编辑部去，我们又见面了。他安然无恙，在苏联部长会议机关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休假前需要把欠下的帐还清，象往常一样，许多事情堆在一起：一些设计结束了，另一些设计又开始了。主要是得把谈话速记稿赶快整理出来。

整理我倒是在整理。可下一步怎么办？我不会打字，而把这个秘密告诉局外人又绝对不行。当然，我们有个打印绝密文件的打字室。要不，往那儿送？不，太冒险了。只得用手写了。我的字写得实在太难看，却又别无选择。

我铺开稿纸就干了起来。写得工工整整，几乎成印刷体了。工作进展缓慢。我回忆起每一句话，尽量做到一字不落。渐渐熟悉了，谈话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大号的字母写满一页又一页。不知怎么产生了一种因介入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而飘飘然的感觉。近日来的惶恐不安退居次要地位。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眼下米高扬已到皮聪达，他们在那里会弄清来龙去脉并作出必要决定的。

只剩最后一页了。我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那段声明省掉了：它同前面干巴巴罗列事实的整个文风有点不协调。我写的又不是宣言，而是备忘录。

我把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整整齐齐地归在一起。还不错，读起来不费劲。字母全都清晰、工整。闪过一个念头：“本该用复写纸多弄一份的。”当下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干吗？材料太秘密了。谁知道会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去？”

当时我想象不到这份记录的实际命运。后来正是根据我的速

记稿来回忆这一切的，好在多了个心眼，没有一把火烧掉……

现在只需同切洛梅告别就可上路了。切洛梅马上接见了。他满脑子全是最近试验场上会见留下的印象，对我们出师不利颇为痛心。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季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身上，说了乌斯季诺夫许多难听话。火气渐渐消下去了，话题又转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上来。

“你应当多多帮助我。”他突然说道。

我有点不知所措，便讲起我们的工作、拟议中的决定、自己的想法。

切洛梅打断我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再不要在萨莫伊洛夫手下当设计局副局长了。这个设计局应当由你自己来领导。这样对工作更有利，你就可以多多给我帮忙了。该有长进了。”

我同任何人一样，因这一提名感到很荣幸。夸奖的话总是叫人听着舒服。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很满意我的职务，我没有想过升迁，而且认为自己的上司都很称职，也很在行。

我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

“您打算把萨莫伊洛夫往哪儿搁呢？”

“会找到地方的，”切洛梅把手一挥，“这个你不用操心。”

可我仍然穷追不舍。感觉得出来，他没有个准主意，便临时现编。

“我们让他当零件生产负责人。让他去落实你的研究成果。再说你替他操什么心呢？我不满意他的工作，该换人了。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就合适多了。”

这样的安排我无法同意。萨莫伊洛夫当了多年设计局长，工作干得不比别人差。又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去占他的位子。

不过我不争辩。当时我无论说什么，无论做什么，同加柳科夫的谈话、他的警告老是象一根尖刺扎在下意识里。于是我想到：

“有趣的是，切洛梅要是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情况，他又会怎么说呢？他还会继续自己的谈话吗？”理智和我们特种设计局内相互关系的实践回答说：不会的……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休假前讨论这些有什么意思？等我回来，要是您没有改变主意，可以再说嘛。”我回答道。

“我已经反复斟酌过，定下来了。你就这么认为吧。等你休假回来，再正式任命。”切洛梅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此后再也没有继续这次谈话……

于是我就开始休假了。

经过短暂的飞行之后，我们乘的汽车已经停在皮聪达别墅熟悉的绿色大门前面。别墅里一切都按早已定好的作息时间表进行。父亲正忙着看午后的一批邮件。我们简短地彼此问好。

“你去吃午饭吧，我得先把这些东西看完。看完咱们就去散步，”他边说就边埋头看起带有红色通栏大字的薄薄纸页来——那是破译出来的驻各国大使的报告。一切如常。

一两个小时，工作完毕，我们踏上沿着海滨浴场延伸的林荫道。不过最先来到隔壁的米高扬家。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却没有发问。如有必要，他们自会说的。

我终于按捺不住，插入他们的谈话：

“我把记录带来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怎么处理呢？”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交给阿纳斯塔斯，”父亲替米高扬回答。“昨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书记沃罗比约夫来了，”他接着说。“我们问了他所有这些同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他矢口否认。原来根本没这回事。他向我们保证说，这个人（我忘了他叫什么）的情报是凭空想象的产物。他在这里整整呆了一天。带了两只火鸡来送给我们，漂亮极了。你去后院看看。”

父亲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谈完，又回过头去讲日常的工作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这么说来，他们这几天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对策，而且甚至没有试图弄清所得到的情报是否真实？！

“同沃罗比约夫谈过了”，——可如果他确实同伊格纳托夫有过什么协议，了解一些情况，那么毫无疑问是什么也不会对他们讲的。真有意思，他们原先想听到什么呢？是承认正在策划搞掉赫鲁晓夫吗？这叫什么？天真？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呢？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了父亲这番举动的缘由。他不相信。不愿相信事情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受到指控的那些人，可都是同他有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啊！要是连他们都信不过，那还信得过谁呢？此外，年满七旬的父亲十分劳累，心力交瘁。他既无精力又无愿望去参加夺权的斗争。让一切都听其自然吧，我不往里掺和，显然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小路很窄，不能三个人并排走。我稍稍落后一些，沉缅于自己那不快的思绪中。暮色将至。飘起了小雨点。我们终于回到别墅。米高扬说他要回去，晚饭后再过来。父亲请他晚上来看莫斯科送来的新片。

趁他们说话的工夫，我跑回自己房间，拿来装有谈话记录的文件袋。诚然，我已经弄不明白它在这里，在皮聪达还会对谁有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没有打开文件袋，塞到腋下就回去于是我算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只需坐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了，当然，假定事情会发生的话。但是没想到当天我注定还要参加一件诚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晚上，电影放完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让我过去一下。我困惑不解地跟着他走了，米高扬独自一人住在别墅里。我们登上二楼，他打手势请我进卧室。他打开三开门的衣柜，弯下腰去，把手伸到底层一格高高的一摞衣服下面。摆弄一阵后，取出了我那个文件袋。

“全都记得不错，只是在最后得加上我的那段话，就是我们完全相信而且并不怀疑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正直，我们决不认为他们可能采取分离主义的行动。”

米高扬说“我们”是出于习惯，代表中央主席团，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从卧室出来到了餐厅，餐厅同我们别墅里的那个完全一样。甚至连家具和罩子都毫无区别。

“坐下写吧。”

我坐下来开始写。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站在旁边，时而越过我的肩膀看上两眼。我写完后把手稿递给他：他仔细地看完最后一段，满意地点点头。他思索了一会儿，又把记录稿给我递了回来。

“把名签上。”

我感到吃惊：这又不是正式文件。

“签名干吗？”

“这样好一些。不是你作的谈话记录吗？”

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给父亲念过的许许多多速记稿上，下面总是标出：“谈话记录：某某人。”

我拿过来就把名签上了。

“现在一切都妥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把纸页理整齐，放进文件袋，默默地朝卧室走去。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略一迟疑之后，也默默地跟着他去了，只见米高扬打开衣柜，把文件袋塞到一摞衬衫下面。他转过身来，发现我那困惑不解的

目光。

“这儿保险一些，”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而且你领来的这个人看来编造得太多了。沃罗比约夫昨天全盘否认，有时候人们过分多疑。”

我试图小心地插言，说如果加柳科夫所讲的情况属实，那么自始至终参与其事的沃罗比约夫未必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立刻承认。

“好啦，你回去吧。”米高扬回答道，他显然不想讨论问题。

我回来时，父亲已经回自己房内去看晚间的一批文件了。

10月12日早上，迎接我们的是个风和日煦的好天气。初升的太阳温暖宜人。别墅周围的防栅柱上鲜艳的大丽花风姿绰约，美人蕉鲜红似火——那是正在逝去的夏季的最后一批花朵。没有人想起加柳科夫和他的警告。米高扬没有来，父亲在用过早点和进行按摩之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游泳池露天凉台的安乐椅里，游泳池就修在水边上。这里有一张藤制的小桌，桌上是高频电话。

我坐到旁边。

“咱们都有些什么东西啊？”父亲问助手道，助手一只手拿着今天收到的厚厚一袋来自莫斯科的文件。另一只手提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包里装着正等排上号的文件：与新宪法有关的材料、报告书、需要研究的决定草案。

“没有急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答道。今天轮到他来呈送邮件了。

“好吧，现在就来看看。宪法材料的情况怎么样了？”

“这几天就把您的意见整理出来让您过目。”列别节夫象往常一样客客气气地笑着说。

“我们在这里趁有空的时候正起草新的宪法条文。这件事情拖下来了。想在11月份的全会前拟出一篇讨论稿。我口授了自己的想法，眼下他们正在加工，”父亲对我解释说。

这番话并不需要我回答，我可以默默地听他们汇报，直到该讲秘密文件的时候。到那时父亲通常都是简短地说一句：“你去散会儿步吧……”

“明天您要接见法国的部长哈斯顿·巴列夫斯基。他乘晚上的飞机到，”列别节夫提醒道。“这是有关他的情况。”

“好吧，先放下。客人的事情这么办：您两点来钟把他送来。我跟他谈谈，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再共进午餐，”父亲回答说。

列别节夫把装有简况的薄纸袋放在桌上，旁边放有几个厚厚的文件袋：绿色的是外国报刊材料，红色的为大使密报译文，灰蓝色则是来自各主管机关的文件。他本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准备汇报。近来由助手们念材料的情况愈来愈多，父亲的视力不如从前了，眼睛很快就感到疲劳。只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文件才由他自己来看。

今天父亲没有急于开始读邮件。这个日子不很平常：载有三个人的上升号飞船应于早上发射并进入轨道。

父亲注视着每一次发射。火箭和航天技术是他所钟爱的事情，他对每迈出的新的一步都极为关注，象孩子般天真地为成功感到高兴，为故障感到痛心。宇航员从未出过发射事故，但是谁也不能保险不遇到事故。正是因此，他严禁把这样的发射正好安排在节日进行：以防发生不幸。

“从从容容地干，不急不躁，别赶什么重大节日。一定要作好周密准备

才送人上天，”他不止一次地对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说。

发射的时间是知道的，父亲不时瞅瞅那块小小的长方形怀表，怀表是著名美国物理学家列奥·斯齐拉尔德送给他的。他很珍惜这块表，谁想看他都很高兴给人看。怀表装在一个钢制表壳内，表壳由向两边开启的两半儿组成。表壳一开，就可看见表盘。一开一台，表就上好弦了，这点最受父亲喜爱，他喜欢巧妙的技术设计。他对这个礼物系由斯齐拉尔德这样的世界名人所赠也颇感荣幸。

父亲喜欢回忆斯齐拉尔德赠表时对他说的话：

“我一直想送给您一件能给您带来愉快的纪念品。不想搞形式主义的馈赠，这块表很方便，我自己也戴：它可靠地装在外壳里，掉在地上也不会摔坏的。还不用每天早上上弦。我们上年纪的人往往戴手表嫌沉，手表也妨碍血液循环。我想您会用这块怀表的。”

这番披肝沥胆的话使父亲深受感动，并印在他的心中。此刻他坐在安乐椅上，摆弄着怀表，时而把表盖打开，合上。

“发射完毕，”他宣布道，并看了看电话。电话却一声不响。

“还早，大概还没有得到消息。”

通常是刚一发射，负责火箭技术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就要打电话向父亲报告结果，然后是科罗廖夫的电话，有时是马利诺夫斯基的电话。每个人都想抢先告诉好消息，并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恭维话。父亲自己则不打电话，从不问情况如何。

“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干。我给他们一点帮不上忙，上级的电话只会使人焦躁，大家开始赶工，就可能出错。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许出错。”父亲这样来解释他的态度。

这一次电话却半天不出声。父亲看开文件了，但思想集中不起来。他时而瞅瞅那部笨重的白色话机。没有人来电话。半个小时，40分钟过去了，沉默愈来愈叫人觉得离奇。

如果一切顺利，宇航员早已进入轨道，如果出现延误或者事故，也早已报告……

我感到局促不安。看来，把赫鲁晓夫忘掉了，不予考虑了，而且已经没有人再来关心他的意见、他的吩咐。电话机一声不响，这是个不祥之兆。心里觉得难受，不禁又想起了加柳科夫，想起了近几周来的事情。

“不，这肯定事出有因。”我想。

看来，父亲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吩咐列别节夫：

“给我接斯米尔诺夫的电话。”

“斯米尔诺夫等着通话。”过了一会儿列别节夫报告说。

线路畅通，父亲拿起话筒。

“斯米尔诺夫同志，”他有所克制地说，“科罗廖夫那里送宇航员上天的情况如何？为什么没有报告？”

声音里含有恼火的成分。斯米尔诺夫大概是回答说，发射一切正常，宇航员已进入轨道，自我感觉良好。

“那您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恼火升级成了愤怒。

“您本该马上向我报告结果的！”

斯米尔诺夫看来是说没有来得及打电话。他当然已经什么全知道了，因而没有急着给父亲打电话。在他看来，权力更替实际上已经发生……

毫无疑问，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会引起父亲的警觉，可他身在皮聪达这个地方也无可奈何……

“什么叫‘没有来得及’？！我无法理解您！您的行为令人愤慨！”父亲大发脾气。

从反应来看，斯米尔诺夫在进行无力的辩解。

“斯米尔诺夫同志，请注意，我要求您提高办事效率！您解决问题老是拖拖拉拉！”父亲马上换了一个话题。“试验场上就让您起草关于科罗廖夫新火箭的建议。期限早过了，可没见到建议！请记住，我对您很不满意！”

父亲扔下话筒。怒气渐渐消下去了。父亲吩咐接通科罗廖夫的电话。热烈祝贺他又一次取得胜利，祝愿工作集体再立新功。待平静下来后，他又干起了日常的工作。

“你干吗闲呆着，”他微笑着对我说，“给我读读塔斯社的电讯，让列别节夫休息一会儿。”

我打开厚厚的绿色文件夹，开始念塔斯社的电讯、外电的报导。列别节夫悄悄走了。半小时后他回来报告说，很快就可以同

宇宙飞船直接联系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您要向宇航员问好吗？”

“当然啦。这样他们会很高兴，对我说来同他们讲讲话也是一种乐趣。通知一下米高扬，让他也来。”

“最好把线接到小书房去，那就可以不上二楼了。记者们很想照相。您不反对吧？”列别节夫事先就知道答案，却希望得到正式的允许。

“当然不。什么时候全准备好了，给我打个招呼。”

父亲很喜欢同宇航员进行这种通话。他以孩子般的天真佩服这种从别墅书房即可十分简便地与飞船通话的技术。他为这些成就感到骄傲，觉得其中也有自己的一分劳动。

“让他们高兴高兴，体会到我们的关心。他们在那儿也不易。”在有人同他谈起向宇航员问好或者在莫斯科隆重举行欢迎他们的仪式时，父亲总是这样说。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来了。他们开始讨论工作，一边等着人们请他们去通话。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终于来报告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小书房是将近 15 平米的一间位于一层餐厅旁边的房子。墙上罩有红木护墙板。角落里放了一张写字台，也是红木做的，铺着绿色呢子，桌面上也放了一组电话机。还有几只皮面椅和弧形靠背的长沙发，这就是全部陈设了。家具这么一摆，房间就显得有点小了。书房的门正对着面向大海的大凉台。

原先这里是门厅。近来父亲爬楼梯有些吃力，而所有的电话都在二楼的书房里。于是就装修了这间小书房，这样父亲在凉台上工作时，可以毫无阻碍地同莫斯科联系。

应当说，父亲不喜欢利用书房，通常都是在二楼大餐厅的餐桌头上铺开他的文件，再不是在楼下露天里工作。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游泳池旁边的那个露天凉台。

此刻房间里挤满了手持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人们，角落里放着照明灯，向四周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地上横七竖八地拉着粗大的电线。

父亲和米高扬从阳台门走了进来。照相机咔嚓作响，出现了这种场合下常有的拥挤。值班通信兵报告说，线路一两分钟内即可接通，他并未放下手中的话筒，只稍稍往旁边一闪，让父亲到桌旁的安乐椅上坐下。米高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列别节夫挎着相机，同记者们站在一起。我留在门口，尽量不上镜头，里面已经没有地方了。

“线路通了。”值班通信兵洋洋得意地宣布。

父亲拿起话筒。相机咔嚓作响，照明灯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电影摄影开始了。

谈话同过去与进入轨道的宇航员的交谈大同小异。相互祝贺和预祝成功中间穿插着玩笑话。

“米高扬就在我的身边，他要抢话筒了。”父亲最后说。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走到电话机前。又是一番祝贺和预祝成功返航的话语。

“宇宙飞船快要失去联系了。”值班通信兵警告说。

问候至此结束。人们纷纷散去。

午饭时间到了。大家在一起吃午饭。饭后父亲留在餐厅里看开自己的文件了。旁边坐着列别节夫。我捧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凑合坐下，列别节夫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递文件时说：

“这是阿朱别伊所写的说明。”

我丢下书，聚精会神地听起来。父亲默默地看完了打印的文字，把那几页纸放在一边。

我感到困惑不解：出什么事了？

不久前阿朱别伊以赫鲁晓夫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了西德。阿登纳时代宣告结束，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探寻相互接近的基础。阿

朱别伊的波恩之行就是相互之间迈出的一步。他是个合适的人物：一方面是非官方人物，报纸主编，另一方面又是总理的女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会传到预定应得到信息者的耳朵里。父亲对此行寄以很大的希望。此行如果成功，他本人打算访问西德。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大声提问说：

“出了什么事情？”

父亲抬起头来。

“我自己还不清楚。从谍报渠道传来的消息说，阿列克谢在波恩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我让他给中央主席团写个说明。也许是寻衅滋事吧？……”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对于苏联旨在建立两国之间直接接触的试探的结果各方都很感兴趣：苏联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缓和必然会改变欧洲的整体政治气候。阿朱别伊的访问引起一些兄弟国家的特别注意——对他们说来许多问题都要取决于苏联与西德之间的关系如何。

尽管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交换政治信息，这些国家的谍报机关却对阿朱别伊在波恩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尽量做到一字不漏。

这种尽心竭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篇密报材料说，阿朱别伊在回答俄国与西德的关系改善会不会对柏林墙的存在发生影响这一小心试探的问题

时，似乎说过等赫鲁晓夫来了，亲自看到德国人有多么好，那么柏林墙就会夷为平地了。

这个故事令人生疑，但我们的朋友报告说，谈话是录音的。情况特别微妙……

谢米恰斯内把这一切都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

阿朱别伊在自己的说明中矢口否认。当然，也不排除联邦德

国特工机关偷偷塞上录音带、试图在两国关系中加进楔子的可能。不过如果加柳科夫的情报属实，那么这盘声名狼藉的录音带就来得正是时候了。这可不只牵扯到阿朱别伊，而是牵扯到赫鲁晓夫，是赫鲁晓夫把如此重要和微妙的任务交给他的。

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弄清：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退休后再也没有人去问过。看来，游戏已经结束，波恩的那段插曲谁也用不着了……

……夜幕将临。又是一天平安地过去了，父亲和米高扬正沿着海边的林荫道从容不迫地散步。走出去 900 米，再往回走 900 米。警卫人员在后面跟着，尽量不让他们看见。天色已晚，天空中云彩的隙缝里亮起了最初的几颗星星。

散步让跑过来的值班员打断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苏斯洛夫同志请您接电话。”

大家都转身往别墅走去，父亲和米高扬走进安有高频电话的小书房。我跟在他们后面。卫兵留在花园里。

父亲拿起话筒。

“喂，苏斯洛夫同志。”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苏斯洛夫不知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父亲说。

又是一阵停顿。

“我在休息嘛。什么事情会这么紧急？我再过两星期回去，到时候再讨论吧。”

父亲开始急躁了。

“我一点不明白！‘全都到齐了’是什么意思？农业问题我们要在 11 月全会上讨论。还有时间讨论一切问题！……”

苏斯洛夫仍然咬住不放。

“好吧，”父亲终于投降了。“既然事情这么紧急，那我明天坐飞机来。只是我得了解一下有没有飞机。再见。”

他把听筒放下了。

“是苏斯洛夫来的电话，”他对米高扬说。“说什么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齐了，产生了一些农业方面的紧急问题，需要在全会以前讨论。他们坚持要我明天就乘飞机回莫斯科。你听见了，我本来想拖到休假结束时再说，可他们不干。只得坐飞机走了。你也走吗？”

“那当然啦。”

“好吧。要决定一下明天的会见怎么办，让他们准备好飞机……值班员！”父亲往朝阳台开着的门外唤道。

卫队的军官进来了。

“我们明天要乘飞机去莫斯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也走。跟齐宾联系一下，让他把飞机准备好。把接见法国人挪到上午。跟他谈半个小时。”

午饭取消。谈完话吃点东西就走。起飞时间定在 12 点左右，只要飞行员来得及就行。就这样。”

卫队军官转身出去，消失在树木中了。

我们又回到林荫道上来。散步继续进行。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

父亲最先开口。

“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并没有什么迫切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同谢尔盖讲的那件事情有关。”

父亲叹了一口气，扭头发现我正紧跟在他们后面。

“你忙你的事儿去吧，”他转身对我说。

我落在后面，底下的话没有听见。直到后来我才听说，父亲对米高扬大致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涉及到我，我是不会抗争的。”

而当我独身自处时，我不禁想道：“开始了……”

……今天，以当年事件参加者的回忆为基础，可以相当准确地再现此时此刻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是谢米恰斯内和谢列斯特的回忆录。谢米恰斯内 9 月份在热列兹诺沃德斯克休养。杰米切夫也住在那个疗养院，而谢列平则在相邻的基斯洛沃德斯克。他们经常见面，一起去栋巴和其他地方，也没有忽略打猎。他们在一起共呆了一个星期。谢列平和杰米切夫匆匆回到莫斯科，谢米恰斯内则留了下来。

几天后谢列平打高频电话来，要他立刻回莫斯科去。谢米恰斯内不想中断休假，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但那几次都很快弄清了全是徒劳。勃列日涅夫害怕采取果断行动。而当他得知父亲已对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时，简直吓得魂不守舍了。

当年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此事是这样回忆的：

“我只能补充一点，勃列日涅夫本人在 10 月初听说赫鲁晓夫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情报后吓坏了，一点不想从民主德国回来，他当时正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德国访问。”

勃列日涅夫最后还是回来了，却仍然害怕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谈话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把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结局掂量来掂量去，“事情”却毫无进展。

因此谢米恰斯内便追问说，这次的希望大不大。谢列平毫不动摇。

“这次就成了，”他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谢米恰斯内不再犹豫了，“我明天就去莫斯科。”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所有知情者在勃列日涅夫家中开会。几乎全体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都在场，谢米恰斯内也从休假地赶来了。决定给赫鲁晓夫的皮聪达别墅打电话，叫他回莫斯科，借口是讨论同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有关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可他始终没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好不容

易把他说服了，硬把他拉到电话机旁边。”谢米恰斯内证实道。

勃列日涅夫到最后一刻还是怯场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电话。

应当考虑到，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让苏斯洛夫参与策划这次行动。看来是因为他既不算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乌克兰帮”，也不算谢列平的“青年帮”。

请看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对此事的叙述：

“苏斯洛夫直到最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有人对他说起时，他嘴唇发青，嘴直打哆嗦：
‘真的吗？要打内战的……’他只能说出这两句话。”

然而苏斯洛夫很快就认清了形势，他在与父亲的上述谈话中沉着而坚定。

不仅苏斯洛夫是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的。照谢米恰斯内的说法：

“事发前一星期去找柯西金谈时，第一个问题是：

‘克格勃态度如何？’

当告诉他我们参与此事时，他说：

‘我同意。’”

“马利诺夫斯基是两天前通知的，”谢米恰斯内证实说。“我已经把莫斯科军区那些特别处处长集中到一起。我没有讲事情的实质，但是警告说：

‘这几天只要有一名摩托兵带上武器、带上机枪等离开部队的驻地，那就当心：拿你们是问……未向我汇报前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部长还不知道〔酝酿中的事变〕。军区司令员不知道，却一切都作好了准备。

再过两天就开全会！！！

您能想象到吗？……”

我们在皮聪达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父亲同米高扬在松树下的小径上徘徊，我则留在岸边的小路上。瞥视了一下海面。我的注意力被海天相接处的军舰轮廓吸引住了。“边防军的护卫舰，”我无意识地暗自想道。在父亲休养期间，他的寓所也受到海上的保卫。左边，在离别墅几公里远的鱼类罐头厂码头旁边，一直有一艘边防艇在守护：防备有人从海上登陆。谁也没有去注意它，大家都习以为常，把停靠在那里的舰船当成了景色的一部分。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电话，便下意识地注视着愈驶愈近的军舰。军舰那动作迅速的轮廓线总是引人注目的。这回护卫舰举动异常，它没有在海湾里绕个大弯子，以便来个急转弯驶向码头，而是在几百米的距离内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行驶。军舰在别墅的正对面停车，一动不动了。这里海水大深，无法抛锚，于是微风渐渐把它的船头吹得朝向海岸。甲板上看不见人。不知是什么机器的声音在夜晚的宁静中发出隆隆的回响。

这一切都很不寻常，而由于近来的事件——加柳科夫的警告、苏斯洛夫的电话——甚至看出一点不祥之兆。

我在不远处发现了值班员。他身为卫队军官理应什么都知道。

我走到他面前，让他看那个黑魆魆的轮廓。

“它在这儿干什么？”

“我也弄不明白。我们询问过边防哨所，他们回答说，军舰是根据谢米哈斯内的命令开来的。我要求边防军把军舰调回原处。它不该停在这儿。它的位置在码头边上。”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漆黑的夜色融掉了不祥的轮廓，只有舷

窗的淡黄色小点闪着亮光。过了一会儿，军舰苏醒了，响起了口令声，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叮当声和轰隆声。护卫舰慢腾腾地、似乎不大情愿地驶向码头，却没有停留，而是掉转船头向着大海，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艘船开来的目的一直不清楚。在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中，谁也不再关心这类细节了。未必会有人认为父亲决定泅渡到土耳其去或是同登陆部队一起在苏呼米区内登陆吧。

然而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黑魆魆、阴森森的轮廓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一暗影同总的忐忑不安心情十分协调。“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暗影仿佛在说。

父亲是否看见了这艘军舰，或者他并未察觉军舰的出现——谁也不知道。自然谁也没有想到过去问这个问题。

父亲同米高扬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散步后各自回家了。我也走进别墅。天色已黑。父亲站在餐厅角落里的小桌旁喝波尔若米矿泉水。一副疲惫不堪和心灰意懒的样子。

“别来缠我。”他见我张口打算发问，便警告说。

他喝完水后，又端着杯子站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桌上，转身缓缓地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晚安。”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很想跟谁说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商量商量。我简直无法再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留在脑子里了。应当采取行动。毫无疑问，除了父亲，谁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况且我同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没有联系。但是我必须采取哪怕是无法实现的行动。

父亲不想跟我说，我也不抱这个希望。我在他的眼里是个娃娃，而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从来不找娃娃商量的。我又不想同助手或者卫队的人谈。不清楚他们掌握了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况且列别节夫早就名声在外，说

他是“右派”，是苏斯洛夫的人。

我在几个房间里徘徊。我到了列别节夫那儿。他正默默地把文件装到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们互相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诸如：走得真不是时候啦，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还没有休息好，他十分劳累啦。我们象事先约好了似的，都没有触及主要的问题。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闪现了给谢尔戈·米高扬打电话的念头。他是我的老朋友，跟他可以无

事实上并非如此——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列别节夫在困难时刻对父亲的事业和父亲本人忠心耿耿。他大义凛然，结果被解除中央委员会内的职务，身患重病，不久即离开人世。谁也不曾怀疑的舒伊斯基却原来（我上面已经提到）掌握了酝酿中的事变的情况，但在父亲面前守口如瓶，他因此受到“赏资”：留在中央工作，平安无事地一直干到退休。——作者

话不谈。况且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又直接参与了整个过程。需要把目前的事变给谢尔戈通通气。

我知道谢尔戈不会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他跟我一样地无能为力。不过多一个人多一个主意。我走进小书房，摘下高频电话的听筒，要求接通米高扬在莫斯科家中的电话。谢尔戈正好在家。

我对他说，父亲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将火速返回莫斯科，发生了一些事情。

“请你务必到机场来接我，”我说，“需要商量商量。”

当然，我在电话上哪怕一丁点消息也不敢讲。

谢尔戈满口答应，其实这毫无意义。他老是忙忙叨叨，见面总迟到，甚至压根儿没去。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我又说了一遍：

“一定来接。”

“是，是，那是当然。”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放下听筒就去睡觉了。……

苏斯洛夫的电话不光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常规。据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说，连勃列日涅夫也是寝食不安。

“勃列日涅夫每隔一个小时就给我打电话：

‘情况怎么样？’

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因为〔赫鲁晓夫〕得通过我、通过我的部门要飞机。

直到深夜 12 点值班员才给我……来电话说，皮聪达来电话了，要的是早上 6 点的飞机。要求飞机 6 点就到那里。

我马上给他去电话。把情况讲了。这下大家才多少放心了一点。”

“放心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勃列日涅夫、冷漠而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审慎的柯西金、自以为是的谢列平，各人都有怕赫鲁晓夫的地方。

谢米恰斯内回忆道：“……他挫败了乌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挫败了。大自然和妈妈把什么都给了他。意志和力量，机智……思维敏捷、明智。

我每次去向他汇报工作，都要作好充分准备。在廖尼亚面前我可以……闭着眼睛瞎说。可以讲上两则笑话就算汇报了。”

大家都认为赫鲁晓夫会采取迅速果断的对策。皮聪达的沉默令他们提心吊胆。谁也想不到父亲居然……去睡觉了。

谢米恰斯内必须提供详细的情报和提供保证。可他那里来的消息很少。

“我……得到报告，他同米高扬乘飞机来。好吧……我接受了这一切。我……不知道他带多少卫队来。如果他想得到，他可以再想出新招。同马林诺夫斯基已经谈过，因此他这个总司令已经不会向部队发布命令了。〔马林诺夫斯基可以把部队冻结起来。〕

因

为万一出事，反正他也会受到追究。”

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斯克大街和卢比扬卡大街上10月12日至13日的整个夜晚，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戏剧性的激动不安中度过的……

10月13日是赫鲁晓夫“光荣的十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早晨是以温暖宁静来迎接我们的。作息时间并未受到破坏。表面上父亲绝对平静。早餐的餐桌上，他同往常一样跟女服务员说说笑笑，并抱怨自己的定量饮食。然后就同助手谈起了日常工作。

早餐后父亲浏览了文件，尽管如今这无论对他还是对那些呈送文件的人都不需要了。然而多年的习惯要求照章办事。却只有一样非同寻常：电话机全成了哑巴……

值班卫队长报告说，飞机已准备停当，定于1点起飞。父亲只是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游泳池旁边的露天凉台上已摆好藤椅，送来了水果和矿泉水——准备接见客人。

我无事可做，又坐不住，便来到海边。海滩上空无一人。远处码头旁边耸立着昨天那艘护卫舰。

父亲坐在即将接见客人的游泳池边的凉台上，懒洋洋地翻阅着什么文件。

助手们站得稍远一些，互相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小道上终于出现了一群陌生人。父亲已经发现他们。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把搭在旁边安乐椅椅背上的西服上衣拿过来穿上，便带着好客主人的微笑迎上前去。

往常在正式谈话之前他都要介绍客人同一起休养的家人认识，带他们参观公园，然后才谈正题。这次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他笑容可掬地同客人、译员及其他陪同人员一一握手，用手势邀请他们到凉台上入座。大家都围坐在一张露天小桌旁。列别节夫在周围转来转去，待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停当后，便坐在一旁，

随时准备听候召唤。

谈话很简短。不到半个小时，客人就走了，父亲则回别墅去。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正式接见宣告结束。该准备去莫斯科。行李已经运到机场。

备好了简单的午饭——菜汤、烧梭鲈鱼。父亲遵照医嘱最近在节制饮食。餐桌上没有人讲话。象往常一样，与我们同桌进餐的是助手们和父亲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别祖比克。

这是一次告别午餐，同父亲十分喜欢、既有松树又有大海的别墅告别。任何告别都会使人感伤，这一次更加上前途未卜……

这时午餐结束。该出发了。

身为主人的护士——别墅的“主宰”在门廊上等着我们，手里捧着一大束秋日的鲜花。她总是这样来迎送高贵的客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却一切都显得异样，更显得意味深长。

“再见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惜您休养的时间太短了。欢迎您再来。”她递过鲜花，把这句惯用的话又说了一遍。

父亲对她的好客表示感谢，把花束交给站在旁边的卫队长，便在吉尔牌汽车的前排就坐。

汽车开动了。前面就是大门。左边那扇门边挺立着一名哨兵。出门后，有个人朝汽车奔跑过来。

“停车。”父亲下令说。

卫兵把后面的车门打开。

“我是高加索军区司令员，”跑得有点气喘吁吁的将军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送送您吗？”

“上车吧，”父亲漫不经心地答道。

肥胖的将军费力地爬到可以折叠的座位上。

“请原谅，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在莫斯科的巴尔维哈休养，贾瓦西什维利同志又到各区

视察去了。我们没想到您会走，无法通知他了。”将军道开歉了。

“这是对的，让他工作吧。您也没有必要来，”父亲不满地嘟哝道。“既然来了，那就坐着吧。”他把准备下车的将军拉住。

汽车开动了。

往常父亲来休养都是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和部长会议主席贾瓦西什维利来迎送。父亲总是冲他们抱怨说：

“我这是休假，你们却白白浪费工作时间。给你们记旷工。”

然而从来没有真正动过气，于是这个迎来送往的传统就保留下来了。

姆扎瓦纳泽当时用一句玩笑话敷衍过去：

“那我们就加班加点地做工偿还吧！”

这次他们没有来。这同走得急毫不相干，将军的解释显得没有说服力。看来，两个人（姆扎瓦纳泽和贾瓦希什维利）已提前去莫斯科以便参与后来的事变。将军则必须来圆圆场，顺便也可监视父亲和米高扬离开时的行动。

将军一路上向客人们通报了格鲁吉亚的农业情况。父亲沉默不语，不明白他是在仔细听呢，还是在想自己的心事。

终于抵达机场。吉尔牌汽车驶到飞机旁边。机组人员在舷梯旁一字儿排开，父亲的私人飞行员齐宾将军作了例行的报告：

“飞机准备起航！没有故障。航线上天气状况良好。”

他那宽阔的脸膛上漾着笑容。父亲跟他握了手，就敏捷地沿着舷梯登上飞机。米高扬紧随其后。他们二人都到了尾舱。政府专用的伊尔—18型尾舱去掉普通的旅客座位，安放了一张小桌、一张长沙发和两把宽大的安乐椅。这是机史上最安静的地方。

父亲不喜欢孤独，航行中“尾巴”上总是有一些旅伴：他要同助手们讨论问题，修改自己讲话的速记稿，或是与陪同人员随便交谈。这次情况就不同了。

“让我们单独呆会儿吧，”他简短地吩咐说。

于是我们开始了空中航行。飞机空着一半座位。机舱里坐着这两位国务活动家——总统和总理的助手、卫队和速记员。精明能干的列别节夫打开自己那个其大无比的黄色公文包，在无数的文件袋里搜寻。需要具有极强的记忆力，才不致在这片文件的海洋中迷失方向。

空中小姐用托盘把瓶装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和小吃送到后舱，但一分钟后又原封不动地端回来了。顾不上……

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对大多数人说来这是一次普通的航行：他们已经随父亲跑遍了国内外不知多少地方。

在后舱里，两个人关起门来制订行动路线，摆出了各种方案，试图猜测在那里，前方的伏努科沃2号机场，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是热烈的欢迎吗？怕未必……

是军队把机场团团围住吗？更加不可思议。时代不同了。不过肯定有事儿……

而此时此刻在颤动的机舱内所作出的决策，又决定着未来。而且岂止是他们个人的未来，还有国家的未来，事业的未来——这两位老人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一事业……

……飞机开始降落。已经可以分辨出一棵一棵树木了。最后是一次轻微的震动。着陆总是十分出色。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齐宾一起飞行了多少公里？真该算一算了。包括战争期间乘“道格拉斯”飞机的全天候飞行、后来在乌克兰境内飞行以及从莫斯科前往我们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飞行。

飞机滑行到了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政府专用候机楼前面。马达最后的轰鸣声消失了，周围一片寂静。下面阒无一人。飞机前面的广场空荡荡的，只是远处仁立着两个身影。这里看不清楚那是谁。不祥之兆……

最近几年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迎送父亲。他假装皱起眉头，责骂前来迎送者是“游手好闲”，嘟哝着说：“我怎么啦，没有你们就不认识路了不成？”不过看得出来，这样的迎接使他感到高兴。

这回倒好，下面一个人也没有。

舷梯慢慢地驶了过来。神秘莫测的身影也随之来到跟前。这下就可以认出来了：他们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和卫队局局长切卡洛夫。格奥尔加泽也匆匆在后面跟着。

父亲为旅途愉快向空中小姐道谢，并率先走下舷梯。其他人跟在后面鱼贯而下。

谢米恰斯内走到父亲跟前，客客气气、却有所克制地问好：

“祝您安全到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然后与米高扬握手。

切卡洛夫在两步开外的后面立正站着——这是他的职责。脸绷得很紧。

谢米恰斯内俯身向着父亲，仿佛表示信赖似地悄声说道：

“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集中了。等着您呢。”

看来，角色均已分配停当，并作了过细的安排。

父亲转身朝着米高扬，沉着冷静，甚至有些快活地说：

“咱们走吧，阿纳斯塔斯。”

他略一停留，眼睛在搜寻着什么人。对我未予理睬。他一眼看见齐宾，便微笑着往旁边跨出一步，紧紧握手——为此次航行表示感谢。仪式就此结束。

最后，他向自己的同行者点头告别，就和米高扬一起快步走向候机楼。稍后是谢米恰斯内，我跟他后面，由切卡洛夫压队。他落在后面几米远处，仿佛把我们同飞机上留下的一切断开了。

我们在空荡荡的镶有玻璃的候机楼里行走。脚步声在大厅里回荡。卫兵挺立在远处的角落里。值班员事先把用整块玻璃制成

的大门打开，门对面的人行道旁停放着父亲的专车——车身很长的“吉尔”。广场上停放着一排黑色轿车：另一辆吉尔牌——供卫队用的，米高扬和谢米恰斯内的海鸥牌轿车，还有几辆伏尔加牌轿车。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登上汽车。卫队军官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并在前排就座。轿车飞快地启动并消失在拐角处了。其余汽车随之疾驶而去。谢米恰斯内跳上正在减速的海鸥牌轿车，切卡洛夫从我旁边跑过。

“把您带上吧？”

“不用了，谢谢。有人来接我。”

“那就再见了。”

他简直可说是飞入自己的伏尔加牌轿车，又尾随着疾驶而去，但听得到车胎在拐弯处吱吱作响……

请看谢米恰斯内本人是怎样来讲述机场上的这次迎接的：

早上我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去电话。

‘谁去接呢？’我问。

‘没人去，你自己去吧。’他答道。

‘什么？’我一时语塞。

‘当前的情况下干吗要倾巢出动？’他拉长了声音说。

总的说来这是对的……

‘那他不就明白过来了吗？’我不安地问道。

‘你〔给自己〕带上卫兵就去呗。’勃列日涅夫最后说。

我带上‘九局’的一个小伙子。我带了一把手枪，他带上了‘家伙’。

问：您当时紧张吗？

‘不紧张……我了解赫鲁晓夫，我相信他不会采取对抗行动

的。你明白吗，这类轻率举动〔不象他的作风〕。这不过是我自己过分谨小慎微罢了。’

飞机着陆了，他下飞机时多少有些阴沉着脸。

他同米高扬上了一辆车。我跟在卫队的后面，我的前面坐着卫兵……而那些〔前面那辆车上的赫鲁晓夫的卫兵〕老是转过头来看：为什么我的前面突然坐了个卫兵……他们有所警觉了。

在从伏努科沃到莫斯科的半路上，我对自己的司机说：‘在这儿停一下。靠路边吧。’让他们开过去。我车上有电话。我打电话，说……”

……我一个人留在机场上了。一切都发生得异常之快，哪儿也见不着谢尔戈。他不在停机坪上，也不在这里。我所有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请求都没有起任何作用。我挺难受。此时此刻我十分需要他。要是他在家还好。

我登上汽车。刚才那阵紧张情绪稍稍缓和了一些了。仿佛并未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我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大家都在抓紧这最后几个好天儿。前面就到沃罗比约夫公路了。右边出现了一大片黄色砖墙。我让司机在米高扬家的大门前停下：毕竟还得找上谢尔戈才行啊。

我运气不错，他正在二楼上忙合什么。谢尔戈脸上露出熟悉的、略带歉疚的笑容，他说：

“你明白吗，我给忘了。过后想起来也晚了。反正有车把你送过来。没出什么事吧？”

“把你的事情撂下，有件重要事情相告。我们到外面去吧。”我对他说。

人人都知道隔墙有耳，不能在房间里说话。诚然，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人窃听我们的谈话，脑子里没有这个念头，只不过觉得在户外谈要好些。

“走吧。”他随和地表示同意。

宅邸一幢接一幢：米高扬是34号，我家是40号。可以不走街上，径直穿过邻家的院子，可那样一来就得去找小门的钥匙。从大街上走要省事得多。

我从与加柳科夫的谈话开始，一直讲到在伏努科沃机场受到的欢迎，尽量不漏掉细节。我越说越起劲，甚至开始觉得这是与我无关的旁人的事情。近日郁积起来的惊慌不安心情仿佛有些缓解。现在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情了。可此时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只能凭猜测了。克里姆林宫里的情况谁也不了解。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分析各种可行的方案。产生了给阿朱别伊打电话的念头。他可是《消息报》主编。也许他知道点什么吧。至少这也是一种采取行动的幻想。我们决定不进屋，为的是不把此事告诉亲人。没有必要不的时候就引起慌乱。我们在卫队值班室拨了阿朱别伊的电话号码。我们是用政府专线电话打的，他本人接的电话。

阿朱别伊回答说，他现在很忙，根本来不了。我便劝他。阿朱别伊愈来愈不客气，愈来愈恼火。

我不想在电话上说明是怎么回事，何况又当着什么都能听见的值班员。但我还是说：

“父亲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从皮聪达被紧急叫了回来，参加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我和谢尔戈都很担心：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是想找你弄清情况。”

阿朱别伊一无所知。

“过10分钟再来电话，我设法打听一下，”他说。

10分钟后他的声音变得叫人分辨不出来了。谁也没有告诉他任何消息，只是克里姆林宫的值班员回答说，确实正在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却不知道会议的议题。

“我同谢尔戈一无所知，可我们有一些想法。如果你能来，就到家里来吧。”我对他说。

阿朱别伊看来手头再没有国家大事了。

“我这就去。”他喃喃道。

20分钟后，他到我们家来了。

我把那些情况又讲了一遍。阿朱别伊四处打电话。给塔斯社的戈留诺夫去电话，他无可奉告；给克格勃的谢米恰斯内去电话，本人不在；给中央委员会的谢列平去电话，说正在开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格里戈里扬去电话，答复是无可奉告。

阿朱别伊沮丧起来。很清楚，他帮不了什么忙，在这种情况下同他商量也是徒劳无益。

与此同时，发生了以下的事情。父亲和米高扬顺顺当地到达克里姆林宫，并来到中央主席团开会的房间。他们刚刚进门，事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发展。

这里我再次利用一下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的叙述：

“我们抵达克里姆林宫，他们进入会议室后，我立即换掉接待室的卫兵。住处和别

墅的卫兵也换了。我事先就已经让卫队长去休假。那是利托夫钦科，上校。

我让一名年轻小伙子接替了他。叫瓦夏·布纳耶夫。我在克里姆林宫的通道里紧紧逼住他：‘听着！现在正开着中央主席团会议。什么情况都会出现。我代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意愿。你是共产党员，对一切都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将决定着你的命运。记住，不经我批准，〔不得执行〕任何号令、命令、吩咐。我禁止你这样做。’”

显然，指的是赫鲁晓夫可能发出的命令。然而后来并没有这类命令。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发现门口值班室出现了新人。表面上一切如常。再回过头来看谢米恰斯内的叙述吧：

“我甚至没有对参观者关闭克里姆林宫。人们走来走去，可……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克里姆林宫内凡是需要的地方我都部署了自己的人。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安排。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不放心。

我回答说：‘不用画蛇添足。不要造成政变的印象……’”

时间在流逝。

我们直到晚上也一无所获。谢尔戈回家去了，我在宅邸周围漫无目的地徘徊，尽管双脚已累得隐隐作痛。

晚上8时许，父亲回来了。他的汽车按照习惯停在大门口。他顺着围墙里边的小道走去，这是往常的路线。我追了上去。默默地走了几步远，我什么也没问。他一副心灰意懒和十分劳累的样子。

“一切都和你说的——一样。”他首先开口。

“要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我问道。

“暂时只辞去其中一项职务，不过这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开始……应当做好最坏的准备……”

父亲不作声了。

“别提问题了。我很累，还得想一想……”

接下来一路无话。顺着围墙走了一圈，又开始了第二圈。他突然问我：

“你是博士吗？”

我慌了神。

“什么博士？”

“是科学博士吗？”

“不，是副博士。”

“好吧……”

又是沉默不语。

我们走完了第二圈，父亲便向楼内走去。阿朱列伊听到砰地一声关门，来到门厅。他目光中有个无言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父亲默默地朝他点点头，就朝楼上的卧室走去。他让把茶送去。谁也不好再去打扰。

谢尔戈来电话。过几分钟他就来了，但他的消息更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回家后就同院士阿·阿·阿尔祖马尼扬一起散步。讲些什么不知道。

阿·阿·阿尔祖马尼扬（1904—1965）苏联经济学家。著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以及工人阶级状况等方面的著作。

谢尔戈建议等阿尔祖马尼扬离去时紧随其后，到他家里再详细询问。大概他和米高扬此刻正在谈当天发生的事情吧。

谢尔戈回去了。又得等待。时间过得实在太慢。阿朱别伊试图给谢列平家打电话。没有人接。又往别墅打。没有回音。给波利扬斯基和其他什么人打电话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过了几天我才得知，父亲走后所有主席团委员都约好了一律不接电话：怕的是赫鲁晓夫万一挨个儿给他们去电话再把什么人争取过去就麻烦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心神不宁。晚上，他再次给谢米恰斯内去电话：

“ ‘ 沃洛洼，我们刚刚开完会。赫鲁晓夫就要走了，他会去哪儿？ ’
‘ 回家呗。 ’
‘ 要是去别墅呢？ ’
‘ 就让他去别墅吧。 ’
‘ 那你呢？ ’
‘ 我在那儿也行，这儿也行，到处都作了安排。决不会有任何意外。 ’
‘ 万一他打电话，向人求援呢？ ’
‘ 他电话打不出去。线路都在我手里！……克里姆林宫专线，高频电话全在我这儿，至于市内电话就让他打去吧。 ’ ”

父亲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晚上 9 时许，谢尔戈又来了，说阿尔祖马尼扬已经回去。我们赶紧跳上我的汽车，冲出大门。我开足马力穿过沿沃罗比约夫公路延伸的林荫道，来了个左转弯。一个身分不明的人从黑魆魆的树林里朝汽车冲了过来。我从他身旁疾驶而过。他不想阻拦我们，只是聚精会神地从后面看着。他主要是想弄清车号。

我们直奔列宁大街。阿尔祖马尼扬住在那儿的科学院大楼里。没有想到检查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钉梢。大家都太激动了。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汽车就停在外面。现在要找到单元门。人行道上空荡荡的。只是前面拐角处仁立着两个突出的男人身影。我们从旁走过，他们未加阻拦，只是紧紧盯住我们的面孔。

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阿尔祖马尼扬对我们这么晚了去登门拜访并不感到吃惊。他听到那些消息很是激动，也想一吐为快。我们围坐在餐厅的餐桌旁。一盏罩着沉甸甸的布灯罩的电灯发出昏暗的光。

谁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谢尔戈打破了沉默，他在这里不算外人了。谢尔戈简要地讲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情况，并且问今天开会具体都讲了些什么。

“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要求对我们的谈话保密， ” 阿尔祖马尼扬犹豫不决他说。“ 不过我可以对你们讲，情况十分严峻，给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意见，主席团委员要求让他下台。会议经过精心的策划：除米高扬外，大家形成统一战线，把赫鲁晓夫说得一无是处，又是农业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啦，又是对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尊重、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啦，不一而足。但

关键不在这里，人人都有错误，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错误也不少。 ”

大家都点头称是，阿朱别伊利用这个空档儿插了一句：

“请您讲讲，会上都说我什么了？”

阿尔祖马尼扬惊讶地抬起头来。

“您？关于您什么也没说。现在问题不在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错误，而在于他所体现和执行的路线。要是他下来，斯大林主义者就可能上台，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必须起来斗争，不能让赫鲁晓夫下台。可是我担心这很难做到。不过也不能袖手旁观，咱们来试试做点什么。”

他的话使人产生了希望：父亲并非孤身一人。1957年大多数主席团委员不是也要求他下台吗，中央全会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如今则一切情况都说明这种希望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把1957年的经验也考虑到了，而且中央委员的大多数都不满赫鲁晓夫的许多措施。

我们在阿尔祖马尼扬家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想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但他自己也知道得不是太多。对父亲提出的主要指责现在清楚了。这些指责反映了领导国民经济的不同作法。赫鲁晓夫一贯主张领导人直接接近生产者。为此他坚持实行分散的地区经营管理体制，搞起了国民经济委员会。他的出发点是，地方领导人更了解本地区的需要和可能，因此解决起所出现的问题来就会更加得力。至于那些大部分已改组成为国家委员会的各部，就让它们只去监督本部门国家政策基本原则的执行情况吧。他建议把州委和州执委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班子，是因为他在这方面也认为领导人应当更接近生产，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任务变得复杂了，很难找到既通晓工业又通晓农业的人。还作出了其他决定。

自然，所有的建议事先都经过讨论，并且得到了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的批准。

但是那些赞成按部门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的人虽未公开表态，却仍然反对新的措施。眼下这种分歧公开化了，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

有关赫鲁晓夫轻视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对他们的态度有失分寸、不把他们的意见放在眼里的指控是郑重其事的。这一切都属于党的高层的人际关系问题，不知情的人很难对以上指控是否合理和是否言之有据作出判断。人与人之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不过这里看来是有相当的正确成分：我自己就曾亲眼目睹父亲不顾有人在场就为某个主席团委员主管问题中的失误而对此人大加斥责。

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意见情况属实，不过我认为它们在严肃的争论中属于非原则问题。这类意见甚多。只能略举数例。

父亲在力求使领导接近生产时，坚持让农业部迁出莫斯科，而且竭力迫使官员们几乎是亲手种植试验田。又如在全国引起普遍不满的授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和副总统苏联英雄称号一事。

这类例子还可一直举下去。尽管所有决定都是中央主席团集体作出的，但赫鲁晓夫确系起草人。

如今这些指控陆陆续续地全都落到他的头上。每个人都想起了旧怨新仇。有些意见纯属无中生有，不过在不知情者看来却有相当的分量。

例如，指责父亲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带上妻子或子女，而且他们的旅费由国家负担，然而主席团委员都很清楚，这个问题上的倡议者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外交部，外交部又受到“西方专家”，早在战前就曾周游各国的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支持。这条建议的依据在于，它在西方已成惯例：家人一起出访可使访问带有一点非正式的性质，并有助于造成相

互信任的

气氛。我国不用多花一分钱，因为在国事访问中接待客人的费用均由对方负担，而任何一次出访的专机上空座位相当多。尽管如此，这条指责表面上看起来颇为有力，后来更是广为流传。

阿尔祖马尼扬对我们说，数谢列平和谢列斯特跳得最高。谢列平代表与会者历数父亲的错误，他把什么都混为一谈，其中既有原则性的东西，又有无稽之谈。

“对啦，”阿尔祖马尼扬对我说。“谢列平还说您没有经过答辩就被授于科学博士学位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不禁脱口而出。

在座的都转过身来看我。

“今天父亲还问我是不是博士来着。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向他解释说三年前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还说明了副博士与博士这两种学位的区别。现在清楚了，为什么父亲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至于博士论文嘛，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谎言固然卑劣，但我却因此感到十分难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总是在我面前表示友好，那即使不算友谊，也是明显的好意吧。他往往最先打电话来祝贺节日，总是体贴入微地询问我的成绩。他在这点上与自己的同僚不同，那些人对我的关心仅限于对同事的儿子的关心。一位中央书记的友好态度自然使我感到快意了，不过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觉得谢列平有些虚情假意。但是我始终把这种感觉压住，不让它发展。瞧这种毫不掩饰的叛卖。真是不择手段……

“沃罗诺夫表现得十分粗暴，”阿尔祖马尼扬接着说。“他出言不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主席团委员是自己的朋友，他打断话头说：‘这里没有你的朋友！’

这段插话甚至引起了格里申的反驳。他说：‘您说得不对，我们全都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朋友。’其他人说话比较克制，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则始终一言不发。米高扬建

议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时间不早了，我们起身告辞。只好等明天了。阿尔祖马尼扬的话多少使人得到一点安慰，也唤起了一种似有却无的希望。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决定不作斗争自行告退。夜间他给米高扬去电话说，既然大家都想解除他的现任职务，那他就不反对了。

“我已经老了，也累了。让他们现在就自己去干吧。我完成了主要的任务。我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作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难道谁会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可以对斯大林说我们觉得他不合适、建议他退休吗？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彻底完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恐惧心理没有了，讲话都是以平等的身份。这是我的功劳。我不会去斗争的。”

电话受到了窃听，转眼之间他的话便传到了有关人的耳朵里。我们却一无所知。

10月14日整整一个上午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下午2点左右，父亲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值班员终于打电话来说，父亲已经往家走了。通常他白天从不回家，为了节省时间，就在克里姆林宫吃午饭。我在大门口迎

到了他的汽车。

他把自己的黑色公文包往我手里一塞，下面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断断续续地吐出来的：

“……完了……退休了……”

沉默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没有跟他们一起吃午饭。”

一切都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一切都不取决我们，只好等待了。

“我亲自写了因健康状况请求免除我的职务的报告。现在就只等着全会形成决定了。我说了我遵守纪律，执行中央委员会作出的一切决定。我还说让我住哪儿都行，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去外地。”

会上还有些什么情况，父亲没有说，我也不想拿问题去伤害他。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详情。

据说，1964年10月13日和14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速记记录没有找到。看来是销毁了，为的是避免将来对它进行研究。1964年10月14日晚上举行的中央全会材料看来是保存下来了。

保存下来了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会议期间所作的札记的片断：

“赫鲁晓夫意志消沉，孤立无援。他已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却仍然有力量和勇气说：

‘毕竟还有人对我的活动说了好话，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高兴，总的说是为它的成熟感到高兴。我对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也尽了绵薄之力。’这番话竟出自一个挺住了两天骇人听闻的指责、精神和肉体都处于十分痛苦状态的人之口。”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根据谢列斯特的叙述，父亲在自己最后一次发言中说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她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与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若是过去让谁受到了委屈、对谁态度粗暴的话，再次请求原谅。工作中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我想说，对我提出的许多指控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可能把所有指控都回忆起来并且一一答复。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有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

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客观地说，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你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要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又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是的，我承认自己对艺术和科学工作者曾有过举止失当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我对科学院的意见有失分寸。可我国科学在许多问题上落后于西方科技，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嘛。我们把大量人民的钱财都作为科学投资，我们提供了一切条件，以便进行创造和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国民经济中去。应当强迫，应当要求科研机构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可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真理。”

中央主席团委员照例都在一起吃午饭。这成了一种传统。经常在饭桌上，讨论国家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

谢列斯特写道，接下来赫鲁晓夫论据充分地解释了当初为处理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加勒比海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他在发言中说：

“你们指控我撤走了导弹。那么怎么办，我们当时非得打一场世界大战不成？”

（谢列斯特指出，撤走导弹也算作他的过错。）

“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异口同声地指责我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了冒险行动，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大家一起商定的吗？”

拿在柏林修建边界墙来说吧。当时你们也是全都赞成这个决定，可现在责怪开我了。我错在什么地方了？话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决定具体怎么办，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过而且现在也未必提得出建议。又如我们同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关系相当复杂，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你们再过四五年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在所有的相互关系上，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不要丧失阶级嗅觉，

不要丧失政治灵活性和策略灵活性。

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全会上我不想讲话，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

谢列斯特写道：他还没有说完，他想提出什么要求，勃列日涅夫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后来他干脆哭了……看着真叫人难受……我想，（谢列斯特猜测道）他想说：‘同志们，原谅我吧，要是有什么不周到之处的话。我们都一起共过事嘛，当然，没有做到事事如意……’

我想。他不会说别的。他可是孤掌难鸣啊，什么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害怕全会上有人会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只要他一回答就会展开辩论。因此他当机立断：不提任何问题。

赫鲁晓夫接着说：

“显然，现在是你们说咋办就咋办……也好，我是罪有应得。我作好了一切准备。你们知道，我本来就想过我该退下来了，问题一大堆，我这么大年纪了解决起来很困难。应当提拔年轻人。我明白，今天有些人缺乏勇气和诚实……不过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至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结论的……现在我要求写一份关于我下去、退休的报告，我要在上面签名。在这个问题上全指望你们了。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开口了：

‘这又是何必呢？’

大家全都支持这个意见……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按照设想，报告应由勃列日涅夫或者至少是波德戈尔年来宣读。勃列日涅夫胆小怕事。波德戈尔内也推辞不干，他说：

‘这个反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不能作。我跟他一起共事多年。人家会怎么理解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倒想把谢列平推出去，他能说会道，可是太嫩点。’

于是就决定：‘让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出面讲吧，他可是我们的思想家……’”

另外一位同样重要的见证人谢米恰斯内，尽管论级别不能出席中央主席团的会议，却对围绕 10 月 14 日下午会议的形势自有一番见解：

“阿朱别伊在文章里说，他〔赫鲁晓夫〕是被“秘密”免职的。怎么是秘密的呢？是在全会上免职的。没有讨论，但是这类问题是不提交讨论的。我第二天〔10月14日〕给他〔勃列日涅夫〕去电话，把他从主席团叫出来，说：‘惹出批评来了。快收场吧。这第二个晚上我可挺不过去了。列昂尼德·伊里奇，你们再这么开下去，不是您进监狱，就是赫鲁晓夫进监狱。我不需要这个。一天来我两边的意见都听了个够。’

有些人激动不安，他们想搭救赫鲁晓夫，另有一些人呼吁搭救您。还有一些人问，你怎么在契卡里坐着袖手旁观？我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当时已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人们从各地叫来了，让他们呆在跟前，这样全会说开就能开起来。这些人焦躁不安。四面八方都给我打电话。

勃列日涅夫哀求道：‘亲爱的同志们，请再稍等一下。我马上去商量。’大约30分钟后他给我来电话说：‘听我说，让大家放心。我们说妥了：凡是没有发言的给他三四分钟。主席团委员全都讲过了，只剩下候补委员和书记。让每个人都表表态。6点开全会。’

‘我觉得可以。可以宣布吗？’

‘那就宣布吧。’

接下来谢米恰斯内简要他讲了自己参加全会的感受。

‘……我甚至不知道取消了讨论……我对此感到愤慨，后来对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都讲了。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动过脑筋的。他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生怕会伤着其他人，可能已经商量过……我想，这些老家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担心自己的……老骨头，便想尽一切办法不在全会上展开讨论，没有向大家把事情交代清楚。’

会场里一片混乱。我坐在那儿从旁观察。

只见最狂热的马屁精喊道：‘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那些较为沉着的人则一言不发。因此，认真的、批判的、有分析的发言，让人感觉到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一篇没有。主席团替中央委员会包办一切，把决定好的、现成的、不知研究讨论过多少次的东西抛出来：‘表决吧！’”

以上的叙述显然有许多主观的成分，不过我想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叶戈雷切夫也提到全会上取消讨论是事先设计好的，他说：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点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并非无缘无故地反对在全会上展开讨论。讨论中因一时冲动可能说出许多以后会捆住他手脚的话。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脑子里显然当时已有另外的计划。”

我想再举一件小事。

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奥莉加·伊利尼奇娜·伊瓦先科说，她于10月初已得知酝酿中的事变，便试图用高频电话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打电话。却打不通。赫鲁晓夫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了。全会没有让她参加，另一位中央委员济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尔久克也是同样的遭遇。主事者特别担心出事。不久，他们二人被解除职务，提前退休。

……还是回过头来讲10月的那一天吧。

父亲午饭后外出散步。这一天一切都非同寻常，有些生疏——

无论是占用工作时间的散步还是散步的目的或者说漫无目的都显得异样。过去他下班后散步一个小时，为的是驱除一天的疲劳，稍事休息再看晚

间的文件，这一个小时卡得很死，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

如今只有最后几份文件（中央主席团例会的材料、麦克纳马拉学说简述、塔斯社电讯稿）留在公文包里。这些材料一直没有打开，被人遗忘地放在包内，直到父亲去世。他再也没有往这个公文包里瞧过一眼……

今天散步的时间不受任何限制，就是为了消磨时间，稍微摆脱一下连日来的神经紧张状态。

我们默默地走着。阿尔巴特在身旁懒洋洋地慢步小跑，它是家里一只德国牧羊犬。是我妹妹列娜的狗。先前它对父亲无动于衷，对父亲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兴趣。它往往走过来摇摇尾巴，

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今天却寸步不离左右。从这一天起，他就老是跟在父亲身边。我终于耐不住沉默，提了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

“都任命了哪些人呢？”

“勃列日涅夫当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是个称职的人选，”父亲对人进行鉴定时拿某个职位去衡量的习惯仍然在起作用。“早在解除布尔加宁职务的时候我就推荐过他担任这个职务。他对国民经济了如指掌，肯定能胜任工作。至于勃列日涅夫就难说了：他太软弱，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这已经与我无关，我如今退休了，这不关我的事。”说着嘴角现出了痛苦的皱纹。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晚上米高扬上我们家来。午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已经没有父亲参加了。米高扬是奉命来

向他通报会上作出的决定。

大家坐在餐桌旁，父亲吩咐上茶。他喜欢喝茶，用一个薄薄的透明杯子喝，杯子上带有一个象茶碗那样的把儿。这个带把的杯子是他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带回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别出心裁的杯子，而且老在客人面前夸耀，并演示用它来喝热茶是多么地方便、不烫手。

茶端来了。

“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你转达下面几条，”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犹豫不决地说。“这处别墅和城内住宅〔列宁山上的宅邸〕仍由你终身使用。”

“好。”父亲意思含混地答道。

很难弄清这是表示感谢呢，还是仅仅证实一下他听清了上面的话。他略加思索，又把已经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准备让我住哪里就住哪里。”

“卫队和服务人员也留下，只是得换人。”

父亲表示理解地哼了一声。

“退休金将定为每月500卢布，配专车，”米高扬踌躇起来。“有人想保留您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诚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还提议给您安排一个中央主席团顾问的职务，不过我的提议被否决了。”

“这个你大可不必，”父亲口气坚决地说，“他们决不会同意的。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后他们还要我干吗？我的建议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只会捆住他们的手脚。再说同我见面对他们说来也不是什么乐事。……当然啦，有个什么事儿干干倒也不错。我不知道我怎么过得惯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不过你不该提这个建议。但是要谢谢你，感到自己身边有个朋友是件高兴事儿。”

谈话到此结束，父亲出去把客人送到门前的小广场上。

这几天一直天气暖和，几乎跟夏天似的。此刻也是温暖而晴

朗。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当时领导人之间没有接吻的习惯，因此这次告别使大家都很有感情。

米高扬快步向大门走去。只见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隐没在拐角处了。父亲目送着他离去。此后他俩再没有见面。

第三章 退休

于是，父亲退休了。

这几天生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需要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主要是父亲需要确定一种目标，因为生活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习惯于大家都需要他，习惯于始终处于事变的中心，习惯于认为离了他不行。在什么岗位上并不重要，职务的高低并不重要——居支配地位的是这种经常不断的必需感。内战中大家都需要营政治委员，大家都需要区委书记，在长长的官职阶梯的每一个台阶上、直到巅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泱泱大国的部长会议主席，莫不如此。

他的时间是高度浓缩的。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当时十分普遍的那种类型的领导人，这些人力求亲自去弄清一切问题的本质，力求深入了解细微末节，甚至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一直到弄清本质后，才不顾一切地前进，冲破横在贯彻某种思想或者技术建议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住宅建设、垦荒、导弹、转炉炼钢及其他许多问题莫不如此。

父亲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人，对于这一不算十分独到的见解的

证明我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的：在著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里，从大量的电报、语录、文件中，可以看出他那种亲自弄清将在与希特勒搏斗中采用的新型大炮、坦克、飞机的优点的渴望。因为只有他才有权作出最后的决定，全部责任也压在他的身上。

对事业的这种态度要求自己的一切，一分钟的空闲时间也不能有。一切想法总是服从一个目的，脑子始终只考虑主要的问题。

当然，需要具有出色的自制力和巨大的意志力，才能在如此充实的生活之后不致在新的情况下迷失方向，才不致被震动搞得垂头丧气，才不会受对自己的怜悯和对他人的仇恨所支配。

如今父亲要同所有这一切遭遇上了。

昨天，大家还在等待着最后拍板，正是他应当最终决定，向联合国提出哪些新的建议，是否裁军，是否扩大播种面积，是修建水力发电站还是火力发电站，是优先发展化学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钢铁工业。

可今天呢？去散步或者看电视？要不看看书？或是擦擦猎枪？不过，未必还能有机会去打猎了……

最初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什么也不想干。最近的事变所造成的精神压抑太严重了。从前顺便讲一讲退休，把它当成必不可免、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慢慢地作好准备是一回事，而象这样全速前进中突然急刹车，突然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又是另外一回事……

无论朋友和亲人设法用谈话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塞给他一件什么事情，还是医生别祖比克关切地送来的镇静剂，统统无济于事。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一个念头：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

退休后的第一个上午——1964年10月15日上午就是这样开始的：

暂时还是大家都一无所知，莫斯科只有暗中的传闻，然而报纸上赫鲁晓夫签署的贺词已经不见了，司空见惯的致宇航员、农庄庄员的电报没有了……

10月14日夜，宅邸中的父亲私人卫队换人了。最近几天值班室里出现了许多新的面孔，但老熟人照旧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现在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干了。一切都是高效能地悄悄地进行的，大家都一无所知。我们直到早晨

才发现各个岗位上全换成了陌生人。

难怪值班卫队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布纳耶夫晚上告别时带有某种特殊含义地同我握手，并且小声地说：

“瞧这搞的……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他当然知道即将进行的换班了。

在斯大林时代，中央政治局（后改称中央主席团）所有委员的卫队都在特设的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管辖之下，只有他可以支配卫队的行动。这种状况在酝酿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引起领导人的极大不安。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其他人在讨论实际措施时，遇到了他们确实完全被掌握在贝利亚手中的状况。因为他们的私人卫队只服从他这位内务部长，只能通过他发布命令。贝利亚可以正式发布任何命令，大家当然都感到自己是置身于陷阱之中了。

除掉贝利亚后，私人卫队交给受保卫者本人来支配。现在只有他们支配卫队的行动，只有他们的指示才是保卫人员必须执行的。当然，克格勃设有卫队局，但它只负责一般的组织问题和经济问题。最近以来谢米恰斯内所担心的，就是父亲的私人卫队可能干预事变的进程。自然，第一步就是更换卫队和人员。跟随父亲多年的契卡工作者不见了，他们被解除武装和转入预备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命运也定了下来：有人退休，有人去了其他领导人的卫队，有的后来又重新出现在父亲的别墅里。不过这

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而退休第一天陌主人的出现却引起了惊慌不安。

那么多电话机都不作声了。卡掉的不仅是政府专线的电话机，几部市内电话机中只有一部能使，还有一部同卫队室联系的电话可用。那些哑巴的话筒不再发出低沉的嘟嘟声，象是死去的一样海鸥牌轿车从清早就一动不动地停在大门口，也不再鸣笛叫人，那辆大家都坐惯了，按规定国内只有三个人——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可以乘坐的吉尔牌轿车已经换掉。海鸥牌轿车没有在门口停留多久。当天就悄悄地不见了，就象它悄悄地出现一样，半小时后原处来了一辆伏尔加牌轿车——低一个“级别”的汽车。

当时这些变化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脑子只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停着海鸥牌，开走了，又出现了伏尔加牌……

这次神秘的换车把戏事后才真相大白。父亲退休后第一天给他拨来一辆海鸥牌时，一位长官回忆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取消或者至少削减专用小车。父亲这一小车倡议曾引起各级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如今轮到他们出气了。甚至有人给我们转达了某位匿名长官的话：“他不是想让我们坐‘伏尔加’吗？现在就让他自己来试试吧。”

后来还有许多类似的卑劣的奚落话等待着父亲。

一天开始了。记得当天父亲下楼来用早点比平常晚，今天已经不必坚持他在斯大林去世后自己定下的工作日规程——9点前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夜之间面容消瘦了，并且有些发灰，动作变得缓慢了。尽管医生别祖比克送来安眠药，他夜间几乎不曾合眼。

父亲食而不知其味地用过早点后，来到院内，他习惯地绕过小楼，径直朝大门走去。一位陌生人匆匆向他迎面而来。

“早上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陌生人停在两步开外的地方，开

始说道。那微微弯曲的半是鞠躬的身躯表现出敬意，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老天在个头上没有亏待他。圆圆的俄罗斯人面孔使人不禁产生好感。

“我叫梅利尼科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您的新卫队长，”他自我介绍道。“您不记得我了吗？从前我在体育宫的政府包厢里干过。我在那儿见过您。您有何吩咐？”他半转过身去，指指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也许您想去别墅？”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显示出一副愿意效劳和帮忙的样子，但是他身上决无半点巴结逢迎的忙乎劲儿。他在保持尊严的同时，尽量表现出对离任总理的敬意。

父亲向梅利尼科夫伸出手去：

“您好，”对方所提的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思想还停留在很远的地方。“您摊上了这个无聊的差事。我现在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您跟着我会寂寞得生病的，”父亲顺着自己的思路答道。“不过咱们呆在这儿干吗。走吧。”

我们一行三人向别墅进发：父亲、梅利尼科夫和我。妈妈尼娜·彼得罗芙娜尚未从她休息和疗养的卡尔洛维瓦雷返回。

车窗外熟悉的去处一一闪过。汽车在别墅紧闭的大门前停下来，不耐烦地响着喇叭。

往常事先得知父亲要来的卫兵，都是在敞开的两扇门前垂手直立迎候。这次听到喇叭声后，一个陌生人从气窗内探出头来。这里的卫队也换了。梅利尼科夫招手示意：开门。

于是半边门微微开启，形成一道缝隙，一位戴着中士的浅蓝色肩章的年轻小伙子探出头来，他不相信地仔细往车里看，一认出是父亲，就轻松地微微一笑，赶紧把门打开。汽车驶过林荫路，停在楼前。

父亲从车上下来，在正门前来回转了一会儿。

“咱们到田野里去散散步吧。咱们这些退休的人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已经干满了年头。”他故作高兴地对我们说。

最近几年形成了一条习惯的路线：顺着铺上柏油的林荫道走到大门口，再往前下坡。

下面的沟壑里，小溪潺潺作声。小溪两边杂草丛生，这里的草是不割的。小溪上架了一座小桥，从别墅大门出来的路由此通过。过桥左边的小丘上，便是一片田野。夏天，这里国营农场的玉米象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这块地侍弄得特别精心：当地的领导想取悦赫鲁晓夫，博得他的好感，摄影记者经常来此采访，后来《星火》杂志或者什么地方还刊登了一张几乎完全隐没在玉米丛中的骑马人的照片。

眼下地里光秃秃的。潮湿的土里露着一根根几乎贴着地面削平的玉米杆。

柏油路从大门往右拐向乌斯片斯基公路。我们沿着一条环绕田野的羊肠小道往左走去。

梅利尼科夫起初照规矩离得较远。但是父亲招手让他过来：

“过来吧，我们又没有秘密。”

此后我们就是三人同行。父亲想起来夏天这里曾长着怎样的玉米，便愈来愈入迷他讲起了畜牧业、饲料单位来了。他凭记忆引用数字，对比各种作物的产量，当即换算成每公顷饲料的肉类增重。他讲得引人入胜，有说服

力，生动准确的词汇随手拈来，比喻和例子一语中的。

这是原先的父亲，只不过此刻不是在某次堂而皇之的全苏会议上讲话——听众只有上尉梅利尼科夫和我。梅利尼科夫很有礼貌地下住点头称是，提出问题——父亲的热情不知不觉地感染着他。由尽管业已离任、毕竟曾是总理的人亲自作的有关农业发展途径的讲演，可不是经常能够听到啊。

谈话兴致正浓时，父亲突然沮丧起来，目光黯然失色。

“现在我对谁都没用了。我没有工作可干什么去，可怎么生活——无法想象，”他自顾自地说。

我们便故意显得信心百倍和非常乐观地反驳他，把休息——散步、读书、看电影的乐趣说得天花乱坠。父亲黯然神伤，避而不答。

到了田野尽头，在稀稀落落地长着几颗松树的小丘下面，莫斯科河在粼粼闪光。

我们经过草地回别墅去。曾几何时，我还在这里同父亲散步，我曾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对父亲讲加柳科夫透露的那条不可思议的消息。如今灌溉系统的安装工程停了，周围仍然是翻乱的土地，胡乱堆放着的水泥管。父亲的这一方案也永无实现之日了。

有一段时间这样的散步成了我们主要的活动。我还在继续休假，我成天同父亲呆在一起，不愿让他独自一人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别墅内新修的电影厅里有时放映新片，但是影片提不起父亲的兴趣，他脑子里想着别的，银幕上发生的事情有如过眼烟云，没有留下印象。《农庄主席》多少引起一点兴趣。影片肯定了近年来的农业政策，突出了我们的成就。当时这部影片被当成对父亲活动歌功颂德的东西。上头对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是否公开放映？

我们全都期待着父亲的反应，可他只是发表了一条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意见：

“片子不错。”

我前面已经讲过，妈妈尼娜·彼得罗芙娜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洛维瓦雷休养。今年她照常同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一起去。

父亲开完全会回来，很是着急。

“得把妈妈叫回来，”他对我们说。“可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设法给她去个电话吧。”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十分习惯的高频政府专线不通了，从前只要拿起听筒，要卡尔洛维瓦雷，接尼娜·彼得罗芙娜·赫鲁晓娃的电话就行了，至于普通的线路……谁也不会用。

我们向卫队求助，当时还没有换人，值班员过了一会儿报告说，尼娜·彼得罗芙娜已经找到，她第二天乘飞机回来。

值班员对我们说，妈妈听了很着急，因为那里还一无所知。只是告诉大家都很健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她马上回来。

第二天，问题又来了，得去接机。可以派现在拉父亲的那辆汽车去吗？梅利尼科夫保证决无问题。飞机晚上到达，天色已黑。

汽车终于开到，妈妈下车时手里捧着一大束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这是布拉格机场上捷克妇女送我的，”她仿佛辩解似地说。“我已经知道出事了。”

我们走进楼内，大家很快在餐厅里聚集，半年前的4月17日早上，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曾坐在这里一个劲儿地向赫鲁晓夫道贺。墙边还放着里加的电唱收音机——他们送的礼物。

父亲对所发生的事情讲得很简短，他显得神情沮丧。

“现在我退休了。昨天举行了让我离任的中央全会。我说准备服从任何决定，他们认为我必须住哪儿我就住哪儿。所以你就做好搬家的准备吧。”父亲强颜苦笑道，看来，他是想起了自己非常好动的气质和每次搬家老要给妈妈带来不少麻烦。

妈妈和往常一样处之泰然。她一点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颇有自制力，而且显得沉着冷静。她说，她在机场上受到捷克妇女的欢迎，其中也有安托宁·诺沃提尼的妻子，大家都祝她和父亲一切顺利。

父亲回自己房间去了。这时妈妈讲了她在卡尔洛维瓦雷最后一天所经历的一段“趣闻”。

她和往常一样与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住隔壁。尽管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双腿有病，她们仍经常在一起散步，当时任苏联驻捷大使的米·瓦·齐米亚宁曾几次去看望她们，在妈妈面前极尽恭维之能事，还送去纪念品。出发前夕电话机响了，接线员说，齐米亚宁同志请妈妈接电话。她当时一无所知，也想不到这边会出事，不过接到我们从莫斯科打去的电话后十分不安，齐米亚宁寒暄两句之后说，他刚刚从莫斯科回来，那里举行了撤掉赫鲁晓夫职务的中央全会，他齐米亚宁在会上把赫鲁晓夫式的领导方法狠批了一通。妈妈没有答话：齐米亚宁毫无觉察，便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向妈妈表示祝贺。妈妈却依然一言不发，看来，这使他不安起来，他动开脑筋了，最后才明白自己是习以为常地让接话员接通尼娜·彼得罗芙娜·赫鲁晓娃的电话，而本该要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的电话！……他支支吾吾地咕哝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真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儿！他本想抢头功向勃列日涅娃报告的，却搞得这么尴尬……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每天都大同小异。外面发生的事情几乎引不起父亲的注意。

正式宣布高层人事变动的中央全会决定见报了。父亲只是若无其事地打开报纸。把各版翻了一遍，看也不看就放到一边。

我曾几次去米高扬家。我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讲话，却与谢尔戈长时间地讨论时事。我们试图推测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米高扬家里也处处让人感到惊慌不安。突然事先不打招呼就要清洗他家餐厅里那些其大无比的水晶玻璃吊灯。干活的都是一些陌生人，他们把家具都挪到一起，在天花板下面鼓捣了半天。“安窃听器，”我同谢尔戈得出结论，并且从此只在户外说话。

关于我的博士学位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据谢尔戈说，米高扬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

“谢列平对我们说，谢尔盖·赫鲁晓夫没有答辩就得到了博士学位。我问谢尔盖了。他很吃惊，说根本没这回事。”

有点下不来台了。柯西金又来个火上浇油：

安·诺沃提尼（1904—197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7—1968年任该国总统。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究竟谁说得对呢？您的话有什么根据没有？”

谢列平狼狈不堪，他支支吾吾他说，这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过他可以进一步核查。下一次会上谢列平说，他说得不确切：赫鲁晓夫的儿子没有被授予博士学位。据说报告送到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去了，但是压了下来。

谎言花样翻新了，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从未收到过任何报告，不过这个问题自然已经无人关心，也从不提起了。然而我却始终有一种沾上什么肮脏东西的感觉。

后来得知，当时中央主席团还讨论了另外一个同我本人有关的问题。我同加柳科夫的接触并非未被发现，而且成了我党最高机关的注意对象。有人建议对我和加柳科夫进行某种制裁，因为我们曾向赫鲁晓夫通报了酝酿中的事变，从而使如此精心策划的行动有夭折的危险。

当时可能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幸而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支持，因为已经大获全胜，各位主席团委员更操心的是未来。与会者中甚至有人反驳说，儿子得知一切情况后去给父亲敲敲警钟，怎么能够指责儿子呢？这可是天经地义的啊。

问题自行取消，加柳科夫也同我一起得救了。

正当这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三名字航员仍在轨道上继续航行。父亲在皮聪达最后一次与他们通话时，曾答应举行隆重

的欢迎仪式。如今航行已告结束，在发射场对宇航员进行了观察，但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仪式却一拖再拖。

终于报纸上宣布：仪式将在次日，好象是星期六（10月23日）举行。日程安排已经知道：机场上的欢迎仪式，盛大的车队通过莫斯科，红场上的集会和克里姆林宫的结束宴会。一切都同先前一样，只是……没有赫鲁晓夫参加。

从早上就开始了在伏努科沃机场进行的实况转播。妈妈打开电视机，如今这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从前父亲不爱看电视，再说也根本没工夫看。此刻他也捧着一本书坐在隔壁房间里。可是读不进去，欢迎宇航员的仪式在牵动着他的心。

当机长科马罗夫上校作口头报告时，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加入了电视观众的行列。他坐了不一会儿，嘴里咕哝着“不想看”就散步去了。他在小楼周围兜了几个圈，却无法平静下来。我们仍然坐在电视机旁。恰在这时车队抵达红场，领导人纷纷登上陵墓主席台。

父亲偶然注意到了停在大门口的汽车。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正在同司机谈话。“咱们去别墅吧，”他对梅利尼科夫说。他们登车走了。自然除了梅利尼科夫而外，谁也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行踪。值班员象往常一样马上用专线报告，说赫鲁晓夫已离开宅邸，去向不明。

汽车正在滨河路上行驶时，消息飞快地逐级上报。在鲍罗金桥旁边，往右拐通红场，往左拐去别墅。汽车会往哪边拐，谁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也没有料到，几分钟后我们从屏幕上看到勃列日涅夫背后出现了值班员，附在他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勃列日涅夫脸色陡变，朝旁边那位俯下身去。主席台上的人都动弹起来，没有人再听讲演者讲话了。谢列平

匆匆朝领导人背后那个在陵墓顶层专门修造的房间走去，室内除了一张在此种场合例行的放有小

吃的桌子而外，旁边小桌上堆放着电话机。需要采取措施，不许赫鲁晓夫出现在红场上。谁知道这个容易冲动的人会冒出什么念头！……

慌乱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很快就传来令人放心的消息——父亲乘坐的汽车往左拐了，他去别墅……

傍晚，什么也没有料到的父亲回到家里。一天的游玩使他精神焕发、心平气和了。然而对于因父亲突然出走而引起的骚乱，上面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不出一个小时，梅列尼科夫就来到楼内。一副难受的样子。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让您从明天起搬到别墅去住，暂时不回城里的住宅，”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眼睛看着一边，小声地对手捧茶杯坐在餐桌旁的父亲说道。

“好吧，”父亲无动于衷地回答。

父亲面对接踵而来的刺激作出这种与他的惯用方式十分不协调的平平淡淡的反应，我们对此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了。看来，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激动的了：去别墅就去别墅，到西伯利亚就到西伯利亚。

坐在一旁的妈妈却急了：

“这怎么行，明天搬走就不再回来了？我们可是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

父亲对这番话未作反应，梅利尼科夫则解释说，这道命令只涉及父亲本人。家属多会儿想来可以来，直到给我们在城里另外配房为止。

总之，命令父亲离开莫斯科，这个花招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从别墅到市区得花一个钟头左右呀。这样一来，下台总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第二天，我们迁到位于戈尔基第二的别墅。父亲在那里足不出户地一直住到迁往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为止，其间只是偶尔去过

一两次医院。

1964年11月举行了例行的中央全会。父亲本来就是打算在这次全会上讨论新宪法的，如今全会却将要通过完全与此毫不相干的决议。

对某些十月事变的积极参加者的命运进行跟踪观察倒是颇有意思。当年，凡是同那些在决定我父亲命运中起过相当恶劣作用的人有关的每一句话，我都尽量不放过。当时是蛛丝马迹，如今则是连贯的叙述。信息是一点一滴凑集起来，逐渐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的。有时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相互印证，有时却互有出入。这时就需要去伪存真了。因为要通过正式途径了解“高层”发生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我在叙述某些细节时也许有错误之处。不过仅仅限于细节，决非人人都得到了最初希望得到的材料。

在策划领导人更迭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大概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父亲离任后，原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自动成了第一书记。当务之急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台，谁也不想为可能出现的分歧创造先决条件。只要推荐其他任何人担任党内官阶的最高职务，自然就会产生分歧。因为每个人在内心里都自认为配当第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眼下，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最初几天或者几个月，团结犹如空气一样地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赞成自然更替：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

记，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接替主席。

然而这样的接替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首先是谢列平不会满意。谢列平认为自己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只不过是通向党内高位的第一步罢了。

表面上似乎一切顺利。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性人物，暂时不能没有他，不过有朝一日只需大喝一声，他就会自愿让出宝座的。

看来，谢列平在 1964 年底就是这样或者说大致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国内许多重要的岗位上都安插了他的老朋友和追随者：谢米恰斯内控制了克格勃，季库诺夫握有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其他级别低一些的岗位上也有自己人，他们都是只等一声令下。

然而谢列平在主要问题上失算了。他在 1964 年 10 月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其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人们事先就在提防着他，而这几乎就已预示着失败了。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而且暗地里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很快结成了对付他的统一战线。任何再次更替领导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不过看来谢列平不明白这一点，他还对未来充满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立足点开始动摇：人们巧妙地去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支柱。可起初似乎一切顺利。

十月事变后，谢列平最亲密的追随者、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当即大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感谢参加十月事变，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一名助手也戴上了将军的肩章，然而这只是可悲结局的乐观的前奏曲。三年后安德罗波夫取代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没有大轰大嗡，也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据当时的说法，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同志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陪同前来的是负责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联络事宜的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需要与克格勃的积极分子会见。对于眼下正在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双方都不露声色。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据谢列斯特回忆，冠冕堂皇的借口是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

卢耶娃逃往西方一事。谢米恰斯内在辩解时证实，他当时坚决反对她去印度，是柯西金亲自拍的板。然而没有人要听他辩白。

此刻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要完成一项颇不容易的使命——宣布对克格勃机关的决定并介绍新任主席。中央委员会和克格勃的人都感到神经紧张。谁也不知道谢米恰斯内会对自己被削职作出什么反应。他可是大权在握。情况与将近 15 年前的形势极为相似，只是规模稍小一些罢了。诚然，如今克格勃主席手中已经没有军队，然而他手中还有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委员会的卫队。为防万一，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莫斯科卫戍区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主持者宣布由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讲话。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苏斯洛夫登上主席台。

一上来他长篇大论他讲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经常加强警惕的必要性，套话讲起来滔滔不绝。但是此刻苏斯洛夫开始讲到中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这些机关的领导，并任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

德罗波夫同志为委员会主席。”苏斯洛夫谈明了来意。

他一时语塞，警视全场。下面的反应是有所警觉的沉默。与会者正在消化这则早已料到、却仍然出乎意料的新闻。僵持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会场后面响起了羞羞答答的掌声，很快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扩展开来，因为谁也不甘落在邻座的后面。

接着是安德罗波夫讲话。然后又是什么人讲话，不过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

谢米恰斯内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他在这里已经不能对莫斯科的事态施加任何实际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这是继贝利亚之后第一次由一位很快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来担任克格勃主席。

1953年在父亲的倡议下作出决定，改变内务部（当时尚未分为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作用，缩小其职权和性能，使之较易驾驭。父亲是在设法限制这一具有无限权力的机关的权力，使之不可能再凌驾于国家和党之上。

国家安全部从内务部中分出来，改组为委员会，论级别比部低。当时任命A.谢罗夫将军为主席。无论他还是继任者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进入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班子。不过克格勃的威力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对国防部和外交部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这两个部的领导人不能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父亲提出这一建议的论据很简单：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手中握有大量兵力。应当严格按照中央主席团和政府所作出的有关决定来动用兵力并被派去执行这些决定。这两个机关的领导人应当向中央主席团汇报工作。否则一旦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他们就会利用职务之便来达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

谢米恰斯内本人在其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说：

“……后来他把安德罗波夫塞进克格勃并让他当了政治局委员。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也是一个错误。不能使这些机关〔不受监督〕。随时都可以告马利诺夫斯基的状，告葛罗米柯的状，告他们所管的部门的状，事后谁也不会去追查。

如果说过去党中央的一个部可以把我的副手叫去，那么现在就叫不动了，因为主席是政治局委员。他怎么会知道某项指示是谁发出的呢？他实际上甚至不必回答，只需说‘是主席兼政治局委员给我布置的任务……’就行了，他可以不受批评……”

这样，勃列日涅夫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的传统。

当然，刚才提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和微妙，也可能存在颇有分量的反论据。不过我是想追述同这个重要问题有关的父亲的论据。

因谢米恰斯内的调动而在克格勃内引起的变化当然不会就此结束。上校切卡洛夫的命运十分离奇，他就是10月13日在机场

上迎接我们的那位卫队局局长。他刚刚戴上少将的肩章，就到坦波夫去当了威望不太高的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卡洛夫在那里没干多长时间。发生了不幸。这位身体健康、面相年轻的男子汉在当地运动场做早操时突感不适。照谢米恰斯内的说法，最后的结局是：“……护士来了，打了一针，小伙子就死了……”

许多克格勃的领导干部在短暂的提升后即各奔前程：有的退休，有的被派去加强各部的人事部门。

调整并不是突如其来，也不是同时进行，而是逐渐完成的。实际上，只要是稍微不配受到领导绝对信任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都无一幸免。

同时又向内务部门开刀。对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他原先也是共青团干部，对他则另有高招。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强大的全苏内务部改成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治安部。当时的说法是随着向共产主义迈进，该部的职能将愈来愈转入社会各界的手中。

父亲离任后，这种结构曾一度原封未动。然而有一天季库诺夫被叫到中央委员会。谈话可归纳为几条：必须改正业已铸成的错误。内务部门的作用必须提高。有一种恢复旧名称和恢复全苏内务部的意见。季库诺夫欣然同意，他喜欢这个建议。

谈话中当即请他上书中央，因为如果成立全苏的内务部，那么它也可履行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职能。在莫斯科同时设两个部未必合适。当时建议他按照这个观点来写报告。

几天之后，报告连同改组方案均已写好。季库诺夫等待着上面的决定，他毫不怀疑自己会当上新内务部的部长。诚然，上面老是不见动静，这使他多少有些不安。报告送上去不知为什么有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人叫季库诺夫去中央了，看来，那里对这个问题已失去兴趣。

不久即真相大白，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一天早晨，季库诺夫打开报纸，我想，他看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解散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和成立苏联内务部的命令，肯定大为吃惊。“苏联内务部部长由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同志担任。”

季库诺夫直奔中央委员会。这次的谈话就显得冷淡多了。接待者颇为吃惊地责备他太不冷静，因为从国家利益出发，建议成立苏联内务部和解散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的，恰恰是季库诺夫自己。怎么会有意见呢？决定可是以他亲笔写的报告为基础的啊……

在一阵与《钦差大臣》结尾颇为相似的哑场之后，季库诺夫被转为预备役……

据谢米恰斯内证实，他在听说晓洛科夫这个人选之后，曾经同谢列平一起“大吵大闹”，但为时已晚。勃列日涅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交表决，尽管这次没有得到全票，建议毕竟还是通过了。

调整仍在继续。谢列平的战友们，当时称之为“共青团员”的那批人，陆陆续续都离开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得来不易的莫斯科职位，奔赴全国各地，甚至奔赴世界各地，其中有的人获得了特命全权大使的高位并前往赴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懂得，在力量搞得如此分散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成为所谓的光杆司令，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稍微延续一下业已开始的过程。中央政治局的同僚们一致跟他作对。

不久便轮到了谢列平本人。良机已到：迄今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又一名“共青团员”尼·格·叶戈雷切失去荷兰当大使了。他的职务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接任。

出现了空缺。按照惯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一职应由

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候补委员来担任。建议由谢列平出任。从位

于列宁大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大厦自然是更难对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正在酝酿中的决定产生影响了。谢列平显然懂得这是又一次失败，却也无可奈何。政治局的同僚都一致赞成对他的提名，如果公开拒绝，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然而他并未善罢甘休。他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时间对他有利，只需忍耐，等待时来运转的那一天。眼下需要治好创伤，重整旗鼓。

他象 1964 年那样开始物色一名有威信的人物，此人可在幕后使劲，拼凑出一个反对派，如今已经是针对勃列日涅夫了。1964 年是由伊格纳托夫来充当这个角色，这次谢列平注意到了米高扬。米高扬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照谢列平看来，这大概是个最佳人选。谢列平想必是认为米高扬离开政治局后肯定心怀不满，肯定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持敌视态度。而抓住这点就可以做文章。此外，米高扬在党内以至全国都享有盛誉，他说话还是管用。事情一旦败露，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他当保护伞。

亲自去见米高扬太危险。还不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听了建议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会干脆把你轰出来，要是把你出卖了，把来访的事告诉不该知道的人，岂不更糟。再说谈话的事情也未必能够做到保密：自己的卫队或者米高扬的卫队肯定要向上面汇报这次奇怪的相会。需要找到中间人，当然还要找到能够给米高扬留下印象的论据。他知道米高扬这个人极端墨守成规，便决定利用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装修别墅耗资数百万卢布一事作为诱饵。如果他“上钩”，就可以转而讨论政治问题，摸他的心思，接下来便可见机行事了。

但是出师不利。老练而谨慎的米高扬当即觉出来者不善，并有所戒备。他对为装修别墅而挥金如土不以为然，却完全拒绝了讨论和批评勃列日涅夫行为的企图。据在此次谈判中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谢尔戈·米高扬说，他父亲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列昂尼

德·伊里奇花这么多钱修自己的别墅当然不好。这样做不大体面，我也不赞成他的做法。不过这是他的良心问题。但总的说来我同他在目前所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我赞成这一政策，并认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米高扬最后归纳自己的意见时，又补充说，他也不年轻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再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也不打算重返第一线了。

可见，谢列平在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也许米高扬对让他退下来感到委屈，但阴谋家的野心从来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已经打消了重返政治局的念头，更不愿意让别人当枪使。这次谈话秘而不宣。米高扬当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谢列平可能不仅找过米高扬，他可能在不同的方向进行过试探。米高扬拒绝合作未必会使他放弃自己的计划。谢列平为实现梦寐以求的打算所进行的其他尝试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都是无功而返……

岁月流逝。曾几何时，1964 年十分强大的“共青团员”联盟已土崩瓦解。登上党和国家高位的幻想愈来愈显得渺茫和不可靠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也不顺手，这项工作显而易见的没有前途只能让人感到恼火。然而，当年人称“钢铁般的舒里克”的谢列平却不肯放弃阵地，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亲自找勃列日涅夫谈话。谢列平想不惜任何代价重返中央领导机关。为避免空口无凭，他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书面报告。其要点如下：

他，谢列平，因不具备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愉快地胜任全苏工会

中央理事会主席，也不能发挥在其他领域可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他请中央政治局解除他的现任职务，调他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自然，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完全有理由指望当上一名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仔细听完了所有的论据，答应考虑考虑，把他交来的报告装进自己的文件袋。谈话毫无结果。

但是这次没有结果的谈话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线希望：勃列日涅夫病了。传说他已不能重返工作岗位。

谢列平决定先找苏斯洛夫谈谈。此人在一旦同非正式的现任第二书记基里连科发生冲突时是天然的同盟者。1964年勃列日涅夫就是从第二书记任上接替赫鲁晓夫的职务的。毫无疑问，苏斯洛夫也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作好了准备。

谢列平去找苏斯洛夫。当然，这种微妙的谈话最好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但始终没有找到借口。只有将就着在中央书记的办公室里进行正式谈话了。

三言两语谈了日常问题之后，谢列平即小心翼翼地讲到主要问题，说他谢列平，大概苏斯洛夫也一样，最关心的是党的命运，国家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来统率中央委员会。现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重病在身，不知他能否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至少最近这段时间是如此。况且我们人人都要死的。也许有必要商量商量，考虑一下换班的问题？

苏斯洛夫对此反应冷淡，他说如果谈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病，那么消息很不准确。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大有好转。因此所谈的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

这是又一次失利。只好寄希望于苏斯洛夫保持沉默了。

但是希望落空了。第二天苏斯洛夫就去探望病中的勃列日涅夫，并统统作了汇报。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毫无反应，却把这一情报牢牢地记在心里，看来是决定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英国要举行世界工会活动家代表大会。决定苏联代表团由谢列平任团长。这不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蓄意安排，反正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履历中一个微妙的情况：从前他曾担任过克格勃的主席。谁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既

然如此，英国公众将会怎样欢迎我国的代表团。

自然，工会代表团到达英国的第一天就大丢其丑。舆论界定了调子。当过秘密警察头子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工会运动呢？就这个题目做了各种各样的文章。要求把谢列平撵出英国去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形势日益白热化。结果谢列平提前奉召回国了。

回到莫斯科受到冷淡的欢迎。尽管如此，这里谁也没有象在我国驻伦敦使馆里那样对那次丢丑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莫斯科习以为常的忙碌中英国之行变得十分遥远，甚至不那么真切了。真希望谁也不要再去回忆它。

中央委员会打来的电话使谢列平又回到现实中来。通知他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访英汇报。

政治局会议象往常一样开始了。由勃列日涅夫主持。据见证人说，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未经讨论就通过了，有些问题则引起了短暂的讨论。

最后轮到谢列平。他简要地介绍了代表大会的情况并强调指出，围绕苏联代表团的叫嚣是某些势力怀着挑衅目的煽动起来的。

讨论开始了。大家依次发言，但每篇发言都围绕着一个主要的核心：代

代表团团长未能圆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在重要的国际活动中吃了败仗。

讨论结束，通过一条决议：确认我们的失利，认为责任全在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身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但勃列日涅夫并未就此罢休。照他的意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情况显然很不正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取决于谢列平同志本人。时间表明，他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其实谢列平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勃列日涅夫说着就打开了放在面前的文件袋。其中有谢列平致政治局的书面报告，他要求调他去做党的工作，就是他因一时

疏忽交到勃列日涅夫手里的那份报告！

勃列日涅夫慢条斯理地宣读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但是快要念到要求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那句话时就不往下念了，并抬起头来：

“谁赞成满足谢列平同志的要求？”

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大多数赞成，”列昂尼德·伊里奇说道，于是政治局转而讨论下一个问题……

几天后，谢列平被正式免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让他担任劳动资源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小小的职务。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还不到退休年龄，因此需要安排工作。例行的中央全会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谢列平的政治前程到此为止了……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

他当然毫不怀疑他那热烈紧张的活动必将得到报偿，而且除掉赫鲁晓夫后他即可重返中央主席团。同许多中央委员联络，向他们讲明酝酿中的变动的意义，正是他承担了这一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啊。几乎要征得每个人的同意，以便全会上进行讨论时大家都采取共同的立场。幸而一切顺利。待入选主席团委员之后就可以开始角逐第一书记的职位了。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生活却作出了另一种判断。伊格纳托夫力图在党和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想法，如同他搞阴谋的癖好一样，都为许多人所熟知。伊格纳托夫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那么按照逻辑，现在就该把他甩开了。

他对赫鲁晓夫的恶感已是人人皆知。人们知道，自从1960年解除了他在中央的职务后，恶感更成了仇恨。凡出自伊格纳托夫之口的任何反赫鲁晓夫的言论都显得十分自然。万一伊格纳托夫的“活动”败露，很容易把他当成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当成反赫鲁晓夫行动的唯一主谋。赫鲁晓夫未必会认真地进行调查——他

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再说伊格纳托夫这个人物也太小，顶多把他撤职就完事了。

但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结果是一帆风顺。解除父亲职务后的十月全会只解决了主要的问题：由谁来接替空缺的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至于主要的调动，都推迟到11月进行。届时伊格纳托夫将是中央全会上极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会挑起公开的争吵。而问题本来就一大堆。

办法可说是信手拈来。政府代表团要前往泰国和柬埔寨访问，便任命……伊格纳托夫为团长。他起初试图反对，但后来就老实了。

伊格纳托夫出发时愁容满面，尽管似乎还有缺席当选的一线希望，但他心里明白：一切都完了。全会的结果伊格纳托夫是在曼谷听说的：谢列平当

选为主席团委员，伊利切夫和波利亚科夫被免去中央书记的职务，阿朱别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是没有关于他的片言只语，仿佛压根儿就没有他这个人。回莫斯科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伊格纳托夫阴沉着脸同欢迎者一一握手，他没有提任何问题。仪式刚刚结束，他就登上自己的“海鸥牌”回家了。

他再没有机会同欺负他的人算帐。他始终未能从所经历的震动中缓过劲儿来。病魔接二连三地向他袭来，药石无灵，机体已无抵抗力。伊格纳托夫于1966年去世，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这就是那起难忘事变的某些积极参加者的下场。

我们还是回到1964年的秋天来吧。

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还很不平静，父亲却渐渐开始养成了新的习惯，他每天早上浏览报纸，不过如今已不象原先那样标出国际国内生活中应予研究和领会的文章了。他把报纸往旁边一放，就开始在公园里散步，朝下走到莫斯科河岸边。往后还有十分漫长的一天。

“应当学会消磨时间，”这些天他老是重复这句话。

父亲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挑了一大堆书——从前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如今时间倒有的是，可读得并不入迷：不久前所经历的事情太刻骨铭心了，他只是无意识地翻动着书页。书撂到一边，他又开始自己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象往常一样，家里的生活都由妈妈来掌管。她样样不落，要让大家都吃上饱饭，要让父亲总是穿上干净的白衬衫，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她在干这种事情时，圆圆的脸庞上老是挂着满有把握的、慈样的笑容。仿佛并未发生任何意外的灾难：不过是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例行的决定，这次是关于她丈夫退休的决定，她一如既往地执行这一决定。妈妈习惯于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始终规划着我们生活的决定。直到若干年以后，父亲已不在人世，她才对我讲起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夜里对勃列日涅夫的长时间独白。就是这样，她看上去沉着殷勤，却比我们都更善于掩饰内心的感受。

妈妈性格的力量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她还是年少中学生就成了红军侦察员，曾经屏息静气地往来于白军的阵地：最近几年她作为大国的第一夫人，也总是善于找到同从工人到总统的所有人打交道的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

于是，她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仿佛悄悄地把全家掌管起来了，大家二话没说，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接受了下来。

没有人来看望父亲。先前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川流不息的来访者突然减少了。有的人如今已没有必要来找赫鲁晓夫，因为需要赶快结识新人；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害怕，而且怕得并非没有根据，这种人占大多数。每个来访者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尽管没有人问他要证件，但第二天谢米恰斯内的桌上就会出现详细的情报：来见赫鲁晓夫的是何许人也，他的父母、朋友是谁，本人是干什么的，持有何种观点，这种接触有无危险……

一个星期天，我请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瓦列里·萨莫伊洛夫、尤拉·季亚特洛夫和沃洛佳·莫杰斯托夫到别墅来玩。他们原先就经常到我家来。我想设法让父亲散散心，排遣他的烦闷。

客人一到，父亲就活跃起来，大家一起出去散步。父亲象原先那样热情地领客人参观别墅中不久前建成的水栽法温室。水栽法，蔬菜在营养液中无土栽培，是他最近的一种爱好。父亲一进温室就神气活现，他又成了我们已司空见惯的那副样子。

“只有水栽法才能保证我国城市的全年蔬菜供应。否则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如今全世界都在搞这样的农场。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使冬天的鲜菜不再是难得的美味食品。”他热情地向听众论证说。

客人们很有礼貌地不住点头称是，纷纷抚摸着碧绿的黄瓜和正在变红的西红柿。父亲谈兴正浓时突然打住话头，不再作声，两眼失去了光泽。

“现在这已经不是我的事情了。你们也不大在行，咱们回去吃午饭吧。”说着他就来个急转身，朝出口走去。

饭后客人们纷纷回家去了，星期一我们工作的那个单位即受到查询，要求指出昨天我家客人的姓名并提供最详细的情况……

赫鲁晓夫令人生畏。被废黜的他显得危险，大家都估计他会有什么意外之举、某种未可预料的行动。谁也不愿相信他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很难想象精力异常充沛的父亲会当个不想介入政治活动的退休老人。每个来访者都被当成可能的“联络员”——似乎赫鲁晓夫眼看就要同支持者建立联系，结束幽居生活，如同当年波拿巴王朝进军马赛一样胜利进入莫斯科了！

没有比这更脱离实际的。父亲太沮丧了，而主要是当时，1964年10月，他主意已定：要是同僚们希望他下台，他就告退。

他一再重复这样的意思：

“我的同志们无论做得对不对，他们能够要求我下台，要求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下台，这就是我全部工作的主要成就

所在。这说明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已经得到恢复。难道我们在斯大林时代能够想象这样的事情吗？我们不得统统报销？现在呢，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啥说啥，不受拘束。即便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凭这一条也值得活下去。”

父亲甚至把下台也看成自己的胜利，看成他在1956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方针的胜利。

说到这种神经过敏的疑心很重的气氛，不禁想起一段插曲。那是1964年12月初的事情。

我因工作需要去列宁格勒一趟。我办好出差手续就和同事——我们的主要专家谢苗·阿布拉莫维奇·阿利别罗维奇和阿列克谢·季米特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一起登上了火箭列车。

我们次日早晨抵达列宁格勒，便直接去办事。一切问题均很快得到解决，午后再没什么问题了，只剩一个小小的手续尚未办妥。我们打算留到次日再办，就去找旅店。我们跑遍了所有知道的地方，却处处都是千篇一律的答复：“客满。”最糟糕的是天气很冷，零下10度再加上波罗的海刮来的湿润的风，足有零下25度。是一起共事的雅沙·卡夫捷拉泽这位威武的海军大尉为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他在喷泉滨河街上遇到我们，便统统拉到他家里去住下。这样一来，我们就从那些应当时刻盯着我们的人的视野里消失了，从而引起了不小的惊慌……

我们办完事情回到莫斯科。马上就碰到一种神经过敏的窃窃私语的气氛。原来，批准我们出差的谢苗·鲍里索维奇·普兹林因丧失警惕已受处分。阿利别罗维奇受到长时间的盘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列宁格勒，是否真有必要，为什么以前不去，主要的是，他是否发现了我的异常举动。感到不安的谢苗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往后的几个月我再也不出差了……

别墅里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父亲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定期来探视，开点镇静药，说说生活，讲讲新闻和“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之类的话，临走时不忘提醒说，他过几天再来看望。

父亲的隐居生活突然让通过梅利尼科夫转达的去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打断了。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要同他谈话。父亲仍然意志十分消沉。他根本没有精力进行辩论。谈话中勃列日涅夫通报说，决定每月给父亲发个人退休金 500 卢布，他原来领取的是部长会议主席工资。决议还规定了居住的地方。

提供莫斯科市内住宅和一处别墅，还拨给一辆属于克里姆林宫车库的专车。列宁山上的宅邸和戈尔克第二的别墅应当腾出来。附带也提到其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讲完后站起身来，示意接见到此结束。父亲简短地说了两句感谢的话，二人就冷冰冰地分手了。此后再也没有见面。

我们开始忙于迁入新居。住宅很快就挑好了，现在我们要住在旧马厩胡同的 19 号楼，离阿尔巴特街不远。肖洛霍夫一度曾在此住过。这是一幢旧楼，是 30 年代继“滨河街公寓”之后为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建造的。楼内连垃圾道都没有。房子不大舒适，但父亲一贯对个人的舒适要求不高，仅仅为了应付差事才去看了一看就表示同意。而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挑。此外，他现在对于他在哪儿住、怎么住根本不大关心。

马上开始搬家不行，因为需要修理。我们很清楚室内要安装窃听系统，这当然需要时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特工机关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在哪儿安装接收机，这不是一天两天和一月两月的事情，也许要窃听许多年。父亲身体好看呢。特工机关只得在低两层的布尔米斯坚科家找了一间房子，此人原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41 年从法西斯军队围困的基辅突围时牺牲。在他家给父亲搞了个值班室，安上接收机。

别墅的事情遇到了一点阻碍。父亲的警卫是由保障中央主席团安全的克格勃第九局负责的。政府别墅也是第九局的管辖范围。父亲本想不要卫队，借口是自己的退休者身分，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

接谈的那位长官不放过刺一刺父亲的机会：

“瞧您说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没有卫队可不行。您甚至都想象不到周围有多少人在恨您呢。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赫鲁晓夫把手一挥，再也没有重提这个问题，只是偶尔忧伤地开玩笑说：

“叫你一下子都弄不明白究竟是保卫谁防备谁。不知是保卫我防备周围世界呢，还是保卫周围世界防备我。”

因为警卫局负责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物质保障工作，它所管辖的自然都是最好的别墅了。父亲目前就住在这样的一所别墅里。然而根据领导人的意见，这些别墅中没有一所适合下台的赫鲁晓夫居住。要物色规格低点的。

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1964 年父亲解职后还有一些同他接触频繁的机关工作人员被免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斯捷潘诺夫即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把他腾出的别墅分给了父亲。剩下来的事情就只是把它由苏联部长会议移交给克格勃和安装窃听器了。

12 月底，我们去看新别墅。搬迁须在新年之后马上进行。

父亲喜欢这所别墅。这是一幢涂有绿漆的一层原木屋，它座落在小河伊斯特拉那长满松树的高高河岸上，离伊斯特拉汇入莫斯科河的入水口不远。

房屋周围的松树早已砍掉，腾出的地方成了苹果园。苹果树之间蜿蜒着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道旁花枝环绕。窗下长着一簇簇丁香和茉莉。一条柏油路从大门通向原木屋，至门廊前面的长方形小广场为止。

房屋内部宽敞舒适。妈妈把我们这个人口多的家庭按房间进行了分配。大台球室决定作为餐厅，全家人可以在此聚会，包括子女、孙辈、侄儿，人人都有坐位。

看完房子，大家都穿好衣服来到院内。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想让我们看看卫队住处和园地。门廊左边有几处建筑物：那是竖有高高烟囱的温室。温室那倾斜的玻璃屋顶正好对着居室，透过一块块四方玻璃即可看见一排排放花的业已变黑的架子。没有往里走。

“温室后面是夏天的厨房，”梅利尼科夫指着一座小板房说，“其实这就是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子，里面有两间房，一间很小，一间稍大些。那边靠大门还有一处小屋，有暖气。”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起我在别墅没有摊上一间房，就接着说：

“我们想在那儿搞个卫队值班室，还富余一间房。可以给谢尔盖住。”

我们把这处房子也看了，里面有三间房和一个不大的安有玻璃的凉台。我对给我提供的这间房颇为满意。但是我始终没有住进去，其原因是梅利尼科夫由于天真而没有估计到的特殊情况。当我们开始搬家、我拿着家什正要往自己的“栖身地”走时，梅利尼科夫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窘迫得满脸通红，对我解释说，这座小屋现在才知道是当成工作用房，按照领导的意思，我不能进去住。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一味坚持，并提到上次的谈话，不过最后我决定不低三下四，便转身往回走了。

不久，一切都真相大白。其实，这是原先就可以料到的。我们当时还没有彻底意识到父亲是个受到监视的人。自然，我们对别墅里安有麦克风这点毫不怀疑，至于接收装置和录音机在哪儿，谁也没有去动过脑子。我们对此有点不感兴趣。后来才知道，窃

听装置就安在值班室里，我要是老在那儿呆着，任何时候都可随意进去的话，那无疑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困难。

应当说，装置的运转相当一般，窃听也搞得马虎，尤其是父亲生前的最后几年，接替梅利尼科夫的警卫人员经常不开录音部分，而是乱按按钮，用来转录。于是从父亲房间的墙内就传来压低了了的乐曲声、器乐曲、舞台录音——麦克风竟成了扬声器。

我居然开过两次玩笑。我在听到乐曲声后假装吃惊，提议找找神秘的声音来自何方。转眼之间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看完新别墅后，我们又返回所谓的九号别墅。

我上面提到了，在向新生活过渡的艰难时期，最受父亲欢迎、来得最勤的客人是他的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近几年来他俩彼此习惯了。医生不仅在莫斯科给他看病，而且陪着他在国内外奔波。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应当说，父亲对许多医生，包括名医的话是注意听的，不过带有某种讥讽的成分。他听到过许多忠告，便悟出了一条主要的道理——无论病人知道诊断结果还是压根儿没有想到，医生都必须安慰病人。因此，医生就故意装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而且不轻易说话，只是作一些预言——因为病人也并不简单。

别祖比克要聪明一些。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保护对象摸透了，并且采用了另外一种口吻——友好的开诚布公。如果他没有彻底弄清病因，就公开承认，当然，他保持了职业所要求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距离，讨论可供选择的方案，他并不规定如何治疗，而是提出忠告。

这样的作风引来了父亲开诚布公的反应。他俩渐渐成了友好的交谈者，常常相互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与医学毫不相干的题目。父亲喜欢用并无恶意的玩笑话去挖苦别祖比克。对方幽默地作答，但话里总是含有深意。父亲很认真地看待这些谈话。总之，别祖比克只要在场，就会对父亲起有益的作用。眼下

父亲更是特别需要他。医生一到，把信心和亲切温暖也带来了，在我看来，这是如今已被遗忘的家庭医生、朋友、保守秘密者，在困难时刻可以依靠的人。

应当说，别祖比克同父亲相处多年，从来不贪图私利。他不但不削尖脑袋往研究院里钻，而且连教授的学衔也没有奔上。他认为以这种方式向上爬不体面，所以一直是个副教授。

在1964年年底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别祖比克想尽各种办法来使父亲摆脱精神压抑，丢掉思想包袱。他俩长时间地交谈，他时而开这种安眠药，时而又开那种安眠药，并开一些镇静剂，然而眼药并不见效。显然，只有时间才能扭转局面。父亲默默地散步，心事重重，一圈又一圈地沿着围墙把别墅走遍，我和梅利尼科夫也跟他一起散步，时而并排走，时而跟在后面。

沉默令人感到难受。我们设法分散父亲的思想，谈起莫斯科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但父亲毫无反应。他偶尔打破沉默，痛苦地重复说，他的生活结束了，说他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曾经生活过，而现在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了。往往说着说着就珠泪盈眶。我们当然感到紧张了，但别祖比克让我们不要惊慌。“这是震惊的一种后遗症，”他解释说。于是没完没了的散步又继续下去，父亲仍然孤僻冷漠……

1965年新年就在这样的不安和烦恼中来临了。

已经作好了搬家的一切准备，但新年我们却是在老地方——九号别墅光线昏暗的大餐厅里度过的。餐厅的墙壁都照斯大林的风格甲柞木护墙板一直包到天花板。自从原来的主人离开后这里几乎原封未动，只是窗间墙上挂的马恩列斯肖像少了最后的一幅。那片光秃秃的墙壁格外引人注目。靠墙放着不舒服的黑色皮面长沙发，中间是一张可坐30—40人的餐桌，餐厅里有一个灰色大理石壁炉，壁炉禁止生火，是出于防火安全考虑，而且照例又是凭空虚构的考虑。

12月31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到齐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家庭新年聚会。

父亲一贯特别好客。直到退休前，我家星期天总是有客，他们是各级党的干部、军人、设计师，有时甚至是美国大使。

斯大林去世后，父亲建议向人民群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当时最初的大型活动之一是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耶夫大厅的青年新年舞会。克里姆林会议宫落成后，我上面已经提到，那里开始举行新年招待会。父亲总是愿意接近人们，接近生活，接近运动。赫鲁晓夫下台后新领导的一项新的举措就是取消新年招待会。当然，这已经与我们无关，父亲是上不了应邀出席的名单的。

尽管那一年我们根本没有心思过节，大家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量

显得精神和快活。大家一直等到 11 点便纷纷入席。我们全家老小加在一起人数不少，也没有占满那俨如飞机跑道的大餐桌的一半。大家举杯辞去旧岁，希望新的 1965 年会更加幸福。父亲心平气和地坐着，对眼前的一切都无动于衷……

别墅的电话机都放在餐厅隔壁的客厅里。这些电话统统闲置无用，只有市内线路的电话机还在响。祝贺的电话很少。我跑来跑去接电话，大部分是我朋友打来的。偶尔有一些很久以前的老相识——顿巴斯的同事、妈妈在灯泡厂时的同伴请求向父亲转达问候。但没有人给父亲来电话。

因此，当我拿起听筒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时不禁大吃一惊，那声音说：

“我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当时我的思想正好调在“另一个波长”上，因而就没有特别去动脑筋想，这个特别胆大的通话人是谁。我又认为不宜询问对方是谁，便多少有点慌乱地冲着打开的门喊道：

“爸爸，你的电话！”

父亲抬起头来，没有马上起身。看来，他正犹豫：接还是不接，而且这会是谁打来的呢。不过他并未发问，只见他慢腾腾地站起来，象老人一样走路不抬脚地来到电话机旁。（如今他走路已成这样的姿势。诚然，不久就复原了，父亲的步履又轻快如初。）

“喂？”父亲拿起听筒。

我们都仔细听着。

“谢谢你，阿纳斯塔斯！”父亲的声音变得年轻了，几乎和先前一样。

“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代我祝贺家里人新年快乐……谢谢，我精神还好。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养老。我要学会休息……”他试图开两句玩笑。

谈话很快结束了。仿佛一下子青春焕发的父亲出现在门口。

“米高扬打电话来，祝大家新年快乐。”父亲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他的目光又渐渐地暗淡下来。老朋友的电话只使他精神振奋了一会儿。我们全都为父亲感到高兴：对他说来，这个电话毕竟是件小小的乐事。可见，并不是每个人都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我们也为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感到高兴：为了给父亲打电话，需要有一定的勇气。

这个电话并非未被察觉。第二天谢米恰斯内就把关于这次通话的情报呈送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并未轻易放过：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表示了极度的不满。

此后，凡是还会有所失的人再也不向父亲表示祝贺了……

时针敲了 12 响。香槟酒瓶打开了。这时几位在家中服务的妇女——厨娘、服务员、清扫工来了。她们带来了特地为过新年烤制的大馅饼，摆在父亲的面前。他多少活跃了一点，给每人斟了一杯香槟酒。妇女们说，她们是来辞行的——她们已调往他处，但她们将始终保持对父亲的亲切感情，并且记住他这位善良的大好人，她们在他身边工作得十分愉快。

这番令我们大家都颇受感动的話未了，她们已是热泪盈眶，父

亲也落泪了。至今我家仍对这几位妇女怀有最亲切的情感，妈妈在世时她们经常来跟她说话，帮她干干家务。如今我们则偶尔在新圣母公墓父亲的墓前同仍然健在的几位相遇。

新年聚会就这样在告别声中结束。半个小时后大家就散了 1965 年初，我们彻底迁入新居。整整那一年，父亲也好，我们也好，全都对他退休者的新

地位习以为常了。此外，由于神经震颤，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甚至怀疑是胰腺癌，但未能确诊——这不过是炎症罢了。别祖比克规定了治疗方案，父亲认真坚持治疗，后来彻底康复了，只是得实行严格的节食，而且直到临终前滴酒不沾。不过父亲向来不狂饮，尽管他并不虚伪：逢年过节不反对喝上一两杯上好的白兰地。1964年4月的生日礼物——存放70年的一瓶白兰地他只在当时尝了尝，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瓶酒一直在餐柜中放到1971年，在葬后酬客宴上才喝完父亲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对时事感兴趣，并且找事儿干了。

退休者通常的消遣似乎就是钓鱼。这是可以理解的：花掉的时间最多，而费用和罗嗦事儿最少。父亲从来没热衷过这事儿。记得我们只是在基辅才曾经两次从位于陡峭的第聂伯河右岸渡河到低矮的左岸去。一行有好多人，十分热闹。我们随身带着渔网，当时还没有禁止使用这种渔具。大家吵吵嚷嚷地乘上小船尽量朝河心里走，把网拉开，撒下网去，就开始拉。这帮渔人收获不多，不过晚上够炖一桶鱼汤了。我们燃起篝火，谈笑风生，直至深夜。记得还唱过乌克兰民歌。这些河滩、鱼网和最后一刻从网中溜走的鱼儿，我终生难忘。

如今大家争先恐后地全部建议父亲去钓鱼。他对建议持怀疑态度，但决定一试。在储藏室里找到了一盒钓线和带钩鱼形金属

片——那是乌布利希早年的礼物，我拿来钓竿和线轴。父亲用几天工夫拾掇渔具，看钓鱼的专业书。最后一切都准备停当，他就到伊斯特拉河上去了。河的两岸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垂钓者。他们没有认出父亲来，于是他顺利地在看中的地方坐了下来。

使劲把鱼竿扔了出去，便开始等待。咬钩照例很少，也咬得不好。他提起来，检查一下诱饵，又扔出去。我不记得他是钓到了什么鱼还是空手而归，反正试验以失败告终——父亲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闲坐颇为恼火。

“坐那儿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简直可以听见鱼儿在水下拿你开心呢。这个我干不了。”他对自己的感想作了总结。

他此后再没去钓过鱼，只是在河边散步时问问垂钓者收获如何。钓竿就这样闲置无用，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之日。如今这些钓竿照样安安静静地放在我这里……

他的新生活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本来是信息丰富，信息来源也不少——国家渠道、党的渠道、经济渠道、外交渠道、侦察渠道、秘密渠道、我国和国外的报刊，现在却只剩下报纸、电视、广播这条细小的、经过仔细过滤的新闻渠道。这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同别墅墙外生活的联系。从前他一见我们看电视就说我们游手好闲。今非昔比，父亲打趣地说：“我的任务是养老，让‘他们’去拍板吧，我就看看今天有什么节目，给咱们看点什么。”他外出散步，“山鹰牌”小收音机不离身。他一大早就照老习惯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经常不满地冷笑道：

“味同嚼蜡……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这叫什么宣传？谁会相信这个？”

父亲显然觉得信息不够。他找出了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

早在50年代送给他的“顶峰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西方的那些“之

乌布利希（1893—1973）德国统一社会党创始人之一。1950—1971年任该党总书记（第一书记）。1960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音”。消息并不令人高兴。他的所有革新措施陆续都被取消。最初的步骤之一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统一管理。被取消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纷纷到莫斯科来争部长的职位。人多房少，只得赶紧找必需的地盘。柯西金注意到了新开通的加里宁大街上尚未竣工的住宅。下令改造为新的机关。改图纸代价很高，因为住宅和办公处所在功能上是互不相容的。于是不惜耗费巨资，新生的各部要有自己的地盘，现在该它们大显身手了。

父亲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并不是唯一的住户。这里还有几所别墅。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阿·列谢奇科和弗·尼·诺维科夫、财政部长阿·格·兹维列夫住在那里。他们一见面就尽量表现出对父亲的敬重，不过看来对于现在怎么跟他谈、都谈些什么拿不准，他们还是照老习惯，又像汇报，又像介绍自己的工作，仿佛在等待着吩咐或者建议。这些见面和谈话都让父亲觉得累赘。他便尽量避免同自己原来的部下接触。

别墅区配备了一个小小俱乐部，其中的电影厅定期每周两次放映新片，不过父亲实际上没有去过。区内的别墅与别墅之间用严实的绿色围墙隔开，围墙上都开有木制大门，朝着同一条柏油路。别墅区的大门由一位非本部门卫队的老太太看守，我们的别墅大门则由克格勃的官兵来把守。父亲散步是以别墅的大门为起点的。

迁入新居的几年之后，父亲就开始拄着拐棍散步。许许多多的拐杖——嵌花的和过分装饰的，在不同时期赠送给他的，他统统不要：太沉。他自己用铝管做了一根心爱的拐杖，将把手弯成半圆形，再裹上蓝色绝缘线。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带有花条棉坐垫的折叠式铝制小椅，（这种椅子在体育商品里很多）——万一想坐一坐或是心脏出毛病（如今这种情况愈来愈多）时就可以用。通常椅子由阿尔巴特用嘴衔着，这只德国牧羊犬每逢父亲散步时均

陪伴左右。阿尔巴特要是心绪不佳，就只好由父亲自己拿了。父亲的胸口上老是挂着一副望远镜——阿登纳首相的礼物。可惜这副望远镜也同父亲其他许多纪念物品一样不知去向，看来是永远不见踪影了。

林边的松树之间放着一把长椅——这是父亲心爱的休息去处。

从林中空地望去，附近的田野尽收眼底。田野从围墙开始，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这片地上时而种燕麦，时而种大麦，产量都很低。河滩地灌溉成本低，广阔的莫斯科市场就在眼前，应当种蔬菜。可以得到一笔很丰厚的收入。父亲是这么认为的。经营不善使他难受和生气。起初他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后来憋不住了，就开始注意人们在地里的走动。他想从中辨认出哪位是当地的领导。终于有一天走运了：有个人是坐嘎斯车来的，父亲到地里去，试图开导这位不知是农场场长还是生产队长的人（此人未作自我介绍）。然而毫无效果。

“上面给我们下计划，规定什么地方种什么，还要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所以这里没工夫听什么建议，只知道叫你快点干。”他听到的答复就是这个，此后，他再不提什么建议了，却仍然抱怨这骇人听闻的经营不善。

若是想看看高高的木板墙外面的情况，则可以登上一座不高的“游蛇山”。小外孙这样叫，是因为爬出来晒太阳的游蛇很多。就在这里，“游蛇山”上，父亲有一次让隔壁疗养院的一些休养者认了出来。疗养院是最普通的，因此休养者不必担心同赫鲁晓夫见面会引出什么后果。起初是隔着墙彼此呼唤，后来父亲就要求在这里开一道小门。通常大家都是成群结队地坐在空地的长凳上，摄影留念。至今还偶尔有当年同他谈过话的某个人，怀着自

豪的心情冷不丁地把一张父亲居中、周围是一群休养者的照片拿给我看。父亲向他们讲述往事：战争啦，斯大林啦，逮捕贝利亚啦，或

是对当前国际问题发表评论。大家都屏息静气地听着：因为哪儿还再有机会听到不久前亲自制定内外政策的人讲政策呢。

人们提出问题。父亲很乐意地详加解答。不过要是问起勃列日涅夫、勃氏周围的人或是他的政策，赫鲁晓夫便用玩笑话搪塞过去：

“我如今已经退休。我的任务是散步，而不是批评。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吧。”接着就转到别的话题上去。

这样的会见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他当着这些人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自己也找到了他们这些知音的听众。不久，走访赫鲁晓夫就成了疗养院文化活动计划的一个部分。应当说，恶意的带挑衅性的问题几乎没有，即使有人提出不相宜的问题，政治活动家的经验也使父亲很快找到了适当的答案。对这类问题他从不生气。父亲讲述的题目一再重复，可当我有一次问他老重复同样的内容是否觉得厌烦时，他狡黠地眯起眼睛回答说：

“我们都是老头了。这些东西都会同我一起作古的呀，而这样一讲呢，没准儿会有人记住呢。我现在所讲的这段历史，现在有人真想把它隐瞒得再严实一些。但真相是埋不住的，它早晚要冒出来……”

我再接着讲房子、物品以及它们所勾起的思绪吧。

走进双层（带外室）上端镶有玻璃的双扇柞木门，我们就来到前厅。一进门右边，是我妹妹列娜和她丈夫叶夫列英诺夫，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居住的房间，她丈夫是个年轻的化学家，在院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苗诺夫的研究所里工作。她同我其他姐妹不一样，在父亲离任后才出嫁，因此维克托在个人升迁上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帮助了。如今他是化学博士，仍在那个研究所工作。我同他经常见面。

房间不大，有点暗。左边墙下摆了两张床头靠墙的床，中间

用床头柜隔开，右边屋角上是一面用光泽很好的木头做的三扇镜，一进门右边，在窗户的另一端放着一个三开门的衣柜。房间显得挤。紧挨着列娜房间，有一道门通向一条小小的走廊，从走廊向左拐，可以进储藏室，室内摆满了架子，架子上是各种用具和不大用得着的东西。

进门的左边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一道双扇玻璃门进去是个不大的、十分明亮凉爽的房间。因为有三道门通进来，在这里居住就有困难了。于是不常来的客人就在角落处的长沙发上过夜。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大幅镶有金黄色镜框的格卢先科的画《春到第聂伯河》，是用粉红和浅蓝的色调画的。这幅画是女儿尤莉娅祝贺父亲70寿辰的礼物。

1971年后，妈妈把画送还尤莉娅，如今她俩都已不在人世，那幅画则遗失在基辅的某处了。

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大三扇窗下，是个其大无比的大柞木桌，上面摆满了信件、照片和其他文件。这里是妈妈的天下。

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有本国同胞写的，也有国外寄来的。他本人实际上不管信件：都由妈妈来整理，也是由她把认为有意思的信读给父亲听。

父亲在散步和谈话后，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七年。房间不大——将近15平米；两面墙几乎完全被窗户占据：一面朝凉台，一面朝花园。

一进门的左边角落里，放了一个“办公用的”大保险柜，漆得象柞树，是按照“最好的”办公室样式，也就是粗粗拉拉地绘有棕色花纹。保险柜是父亲让安上的，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安上干吗，很可能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得有个保险柜来存放秘密文件和武器。现在保险柜里空空如也，连党证也放在桌子里，因为开一次保险柜门得费好大劲。

保险柜上有一帧木画。黄色的背景上是黑木镶饰，描绘的是

一个姑娘伸出一只手坐在树下，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手持弓箭的小伙子。这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赠送的礼物。旁边墙上挂着一幅绿色色调的水彩画——小河一瞥，还有画家波里亚·茹托夫斯基的一幅画——一头黑熊和一只红色的瓢虫。画家为父亲75寿辰送的这幅画。茹托夫斯基曾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一起在马涅日受到父亲的激烈批评，但是并未怀恨在心：他明白当时的问题不在赫鲁晓夫身上。父亲退休后，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定期地、尽管不是经常地看望父亲的人中之一。

唯一的一面没有窗户的墙下，头靠墙放了一张床。床的一侧是带小灯的床头柜，另一侧是印度出产的椭圆形小桌，带有孔雀形状的象牙镶饰。这也是尼赫鲁的礼物。桌上放了一台录音机，起先是基辅厂出的，那台坏了之后，就换上了它的原型——西德的乌赫尔牌录音机。磁带上录有早操节目。后来，这台录音机在口授回忆录中大显神通。

桌上还放着一台盛在非洲木匣内的英国电唱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礼品。父亲同他一度关系很好。旁边放着鲁斯拉诺娃、济金娜、什托科洛夫灌制的唱片。有许多乌克兰民歌和现代歌曲的唱片。父亲很喜欢听，还一定要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来，飨以音乐。而且，他不知道分寸，没完没了地要人家听。

爵士音乐和现代音乐他根本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穆斯科姆·马戈马耶夫这位当时的偶像。他认为此人的演唱风格过分矫揉造作。

角落里通往凉台的那道门边，放着明斯克工厂那台有些年头的电唱收音机。它声音嘶哑，只能勉强“收到”莫斯科。屋角里窗间墙上挂着用光泽很好的木头做的三扇镜，上面有父亲近年来使用的布劳恩公司出品电动剃须刀、花露水、药品——日常必需品应有尽有。

朝花园的那扇窗前，是一把红黄色的安乐椅——乌尔霍·吉

科宁总统的礼物。椅背一受压力就朝后仰，椅子底部也随之抬高，这样就可保持半躺姿势。坐在这把椅子上看书或者膝盖上放一只西伯利亚猫打瞌睡是很惬意的事情。椅子旁边是带弯曲金属腿的小桌，小桌上和背后又宽又长的窗台上，全都堆满了书。父亲退休后，手不释卷，以补上他日理万机无暇读书那个时期欠下的帐。

我把最后一次送医院那天桌上和窗台上的书收集起来，如今这些书都放在我家一个单独的书架上。书名五花八门：埃尔捷利的《斯捷普尼亚克笔记》，沙霍夫的《在巴尔哈什芦苇丛中》，海明威的《节日与你永远同在》，哈利夫曼的《十字形天线识别密语》，本特利的《工业水栽法》，《“绝密”》。只限指挥人员阅读。法西斯德国对苏作战战略。文件与材料》。这本书父亲在回忆录中讲到战争初期时曾多次提及。还有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战略》，两卷奥斯塔普·维什尼亚的作品，《19世纪法国法庭演说家》，《苏联国民经济，数字与事实》，图波列夫特别设计局的飞机广告说明书，以及其他书籍。

顺便说说，我当时同图波列夫院士之子阿列克谢很要好，我们都在一幢大楼里住。

父亲一直对航空事业很有兴趣，从前他经常视察特种设计局，人们向他介绍最新的研制成果。60年代末，他有一次问我：

“很想知道图波列夫现在有什么新东西。过去我了如指掌，现在是落后了。请阿廖沙给我看看新飞机的画册吧。”

我不知道他有何打算，但他的请求使阿列克谢左右为难。由于我父亲同他父亲之间的老朋友关系，阿列克谢无法拒绝，要满足他的要求吧又有些害怕。

出路找到了：过了一两天，他把一本飞机出口彩色说明书交给我，上面有父亲当然十分了解的图波列夫特种设计局的客机的图片。我给父亲看时，他翻了翻，脸上现出忧伤的神情，只说了一句：

“替我谢谢阿廖沙。”

他把小册子放到窗台上，直到临终前从来没有摸过。

总之，父亲这段时间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他最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他看了几遍，每次都觉得有新意。顺便提一句，这是他当政时喜欢在睡前阅读的不多几本书之一。他很喜欢列斯科夫、库普林的作品。他也读过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家史》一书。

当然，这几年他还读过其他许多书：我们尽量按照自己的口味给他带新书来，但我们的爱好往往不一致。有时他自己也点上一两本书，照例都是经典作品。我还给他带过“禁”书。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父亲读了很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我不能说他不喜欢这本书，但是他也没有象对列斯科夫和库普林的作品那样同人讨论或是摘引个别篇章。只是在一次散步时说：

“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稍微澄清一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悲惨遭遇：50年代大家都对把书交给西方出版社出版这件事特别气愤。这一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举动使父亲马上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反感。还不应忘记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不错，不久前举行了二十大，然而“外国人即敌人”的思想根深蒂固。是敌人就得当敌人来对付。接下来一切都按照轻车熟路的斯大林方式发展了。“思想家们”只是火上浇油，他们讲种种荒唐话，打小报告。

我记住了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页《日瓦戈医生》的打印摘录，是用来证明该书反苏倾向的，自然，这个提要同任何有倾向性的摘抄一样，证明了摘编者所要达到的意图。别的不去说他，我们有本事用摘录把任何荒唐的事情说圆。看来，父亲看了这几页东西后，就批准了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行动。

谢米恰斯内是反帕斯捷尔纳克最积极的斗士之一，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斗士。他在自己的札记中提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惨经历。我对他的整篇文章不好妄加评论，但所谓赫鲁晓夫亲自口授了谢米恰斯内的报告、其中加进骂帕斯捷尔纳克的话之类的说法，却不大可信。说什么父亲把自己的评价加到别人的报告里，我感到特别难以想象。况且就我记忆所及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老实说，我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只有很模糊的印象。

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中都是作为一种背景反映出来的，只是后来才成了重要事情。

不过，我倒记住了一件足以说明“共青团员”一班人的情绪的小事。

阿朱别伊到别墅来，他刚刚同谢米恰斯内交往过，好象是一起讨论过足球。他在那里带来了一则新俏皮话。

“您知道吗，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他打着哈哈对父亲说，“现在有个说法，叫莫斯科有三个不幸——拉克、‘斯巴达克’和帕斯捷尔纳克。”

父亲的反应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不喜欢听笑话。

……父亲现在承认自己做得不对，这已经晚了许多年。然而在那个困难时期，他尽管已到了最后一刻，毕竟停止了对诗人的迫害。他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后，大致说了如下的话：“行啦。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停止吧。”

要不然，那些热心的积极分子就会象他们剪掉“穿奇装异服者”的裤子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总之，父亲同艺术活动家的相互关系远非今天许多评论家所描绘的那样单纯。这里我想再讲一件那些对我们的“纯洁性”十

分热心的人未能得逞的事情。

正在举行又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当时还没有形成把几项大奖只授给我国影片的传统。评委会把大奖授给了意大利大导演费杰里科·费利尼执导的《八个半》。这项决定是自然而公平的。却引起了我国的“思想家们”特别激烈的反应。主管宣传的中央书记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利切夫持特别否定的立场。

论据很简单，而且归结为通常的公式：影片远离现实主义传统，并以其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我国这个健康而纯洁的社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传统的结论：影片禁止上映，大奖不给，解散评委会。

不难想象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仿佛又是在马涅日……

他们照常决定借父亲之手来安排一切。

伊利切夫向他汇报了“挑衅活动”。建议看看影片并给予客观的党性评价。父亲同意看影片，晚上就送到别墅来了，在餐厅里临时搞了一个电影放映室。往常别墅放电影要把全家人都一一通知到，这次父亲却一个人也没叫。

当天我偶然去了别墅。别墅里不见一人。我问父亲在哪儿，回答是他正在看电影，片子是中央委员会送来的，而不是象往常那样来自电影发行系统。我顺便走进放映室。往银幕上瞥了一眼，大为吃惊。

应当承认，我同伊利切夫一样，都以为父亲对影片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样的作品要求具有一定的修养、阅历，普通观众往往很难弄清作者的意图，有时上座率只有一半。不必隐瞒，连我都觉得片子不那么好懂。

情况比较复杂。我走进放映室，在长沙发上与父亲并排坐着，我等了几分钟，便压低嗓门对他说：费利尼是怎样一个天才导演，他的影片在全世界怎样受到热烈的喝采，他象征着什么……这时

我讷讷不出于口，父亲却发怒了：

“走开，别碍事儿，我这又不是图自己开心。”他嘟囔道。

我扫兴地走了。

电影不久就放完了。父亲出门来到公园，我们去散步。

“拉克”为音译，意思是“癌症”；斯巴达克指斯巴达克足球队。

“你觉得片子如何？这是个著名的导演……”我开始说。

“我不是说过叫你别烦人吗，”父亲打断我的话说，这时已经是善意的了，“我得把片子看完，它在电影节上得了大奖。伊利切夫反对，他让我看看片子。”

“怎么样？”我稍微提了一下。

“我一点儿没看懂，可国际评委会给它授奖了。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他们最明白，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一定要让我往里掺和……我已经给伊利切夫打电话了，让他们不要干预。让专家们去评判吧。”

我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这招没奏效。话题又转到别的方面，我们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费利尼这个话题上来。

伊利切夫在当时我国意识形态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决不那么单纯，甚至可说是一个谜，因为他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他懂艺术。不久前电视上展示了伊利切夫院士向苏联文化基金会赠送自己的藏画的情形。他的藏画决不仅仅出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之手……

谈到电影，我想起父亲对《库班哥萨克》一片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为影片粉饰现实，片中餐桌上充斥着美味佳肴，他简直对此片恨之入骨……

……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讲父亲的阅读范围吧。

他还读过些什么呢？

他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初入炼狱》和《癌病房》，还有奥威尔的《1984年》。这些书他都不喜欢。说起来挺让人吃惊，父亲居然不喜欢看回忆录。我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让他爱上这类书籍，送来

丘吉尔、戴高乐的书、瓦卢耶夫的日记，维特的札记，但父亲只是翻了一下就不看了，把这类退休者十分爱读的低级读物放到以后再看。

对于当时发表的军人回忆录，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描写战争的电影也是如此。他一回想起当年的种种惨状就痛之入骨，而在阅读中我国所遭劫难便历历在目。主要是他认为回忆也好，关于战争的文艺作品也好（他对这类文字也不大赏识），都未能反映真相，歪曲了事实真相，要么是为了迎合读者，要么是为了迎合时代。

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历过撤退与进攻，曾经历过基辅、巴尔文科沃、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等战事的人，父亲又不能不回想起战争。战争始终活在他的心中，直至他去世。所以他才在听说战友的“背叛”时如此痛心。他在言谈中不止一次地寄语战友们，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辟出篇幅去讲他们。

一切都是从曾与父亲并肩度过战争中一半岁月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将军开始的。有人对父亲说，在一次不知是战争胜利周年纪念还是纪念苏军节的会上，有人向巴托夫提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问题，并具体问到赫鲁晓夫是否到过斯大林格勒。

将军略一迟疑，犹犹豫豫地说，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去过斯大林格勒，而且根本不知道赫鲁晓夫战争期间都在什么地方！

其实，类似的“健忘”是合乎情理的：如今赫鲁晓夫的名字不是处处都给抹掉了吗。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只是为了做到能够提上一句赫鲁晓夫曾任他们并肩战斗时所在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费了好大的劲。

当时许多“目击者的叙述”中有不少关于父亲的凭空捏造和似是而非之处。这方面许多人都表现突出。甚至包括格奥尔基·

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他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赫鲁晓夫，第一次说他去父亲那儿，是因为那里可以美餐一顿。可他们初次相见是1941年6月在利沃夫近郊的前线，而且直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和库尔斯克战役打完、强渡第聂伯河之后，朱可夫要西去柏林时才分手的。他曾亲自向父亲许下战争结束后把被俘的希特勒装在铁笼子里带回基辅来的“诺言”，却始终没有兑现。

朱可夫还有一次提到父亲，是瓦图京将军受伤一事，据说是用身体掩护赫鲁晓夫时负伤的。朱可夫是在瓦图京负伤后一天接替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父亲当时根本不在该处。父亲曾作出多少努力来保护自己战友的身体啊。瓦图京血液开始感染，出现坏疽，只有抗菌素方可奏效，可这时斯大林偏偏不准用美国产青霉素给瓦图京治疗，理由是帝国主义者什么都可能往里掺。到后来就晚了……

父亲建议不要把瓦图京安葬在墓地，建议安葬在基辅市中心的公园里。

“让基辅人永远不要忘记是谁率领部队来解放他们的。”当时父亲这样说。

不错，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以为朱可夫的回忆录不是亲自写的。他当然是搞错了。

在回忆录领域最为突出的是什捷缅科将军，不错，父亲也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个平庸之辈，马屁精。

“他只会给斯大林拿拿地图。”他常常重复这句话。

所有这些缄口不提、卑劣的有意刺激都达到了目的。父亲很伤心，但尽量不露声色。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控制不住，那是在临终前的1970年，他看见卫兵胸口上戴了一个陌生的徽章。那个卫兵解释说，这是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纪念章，颁发给曾在战争中服役的每一个人。

父亲一言未发，但是对于把他“忘掉”这点却耿耿于怀。他

曾几次回到这个话题。我们怎么劝他别往心里去也是枉然……

总之，当时刺激父亲、对他妄加诽谤的机会实在太多。反正他也不能公开答复。我上面已经提到关于他的种种无稽之谈。但编造者老是嫌少，他们杜撰出花样翻新的“事实”，并且四处传播。

不久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科列斯尼克对我说，1965年开始，国内即广泛流传一则谎言，说我的哥哥列昂尼德（空军飞行员）在战争中被俘并出卖军事秘密。“事件”原来是这样往下发展的：战争结束后他落入我方手中，他作为叛徒即将受到无法逃脱的正义的惩罚。于是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苦苦哀求给儿子留一条活路，斯大林照例蔑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没有帮助过自己的英雄儿子，你的儿子是叛徒，就让他受到人民的惩罚吧……”

这则故事清楚地勾画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根由，从而把领袖表现得庄严和高尚。

幸而这则卑劣的谣言一直没有传到父亲的耳朵里。

我哥哥的真正经历同千百万与他同样在1941年即开始卷入战争的人的遭遇一样，既平凡，又悲惨。

廖尼亚（轰炸机驾驶员）当时23岁，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前线。1941

年年底他受了伤。不久我们就听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出院后列昂尼德想方设法从轰炸机中队转入歼击机中队。他嫌轰炸机飞得太慢。他生命的悲惨结局实在太典型了：他在刚刚开始驾驶歼击机执行战斗任务时被击落。下面是一大片沼泽地：飞机也好，飞行员也好，往往踪影全无。只是追授了一枚卫国战争勋章……这是 1943 年发生在沃罗涅日前线的事情。没有发刻板的“阵亡通知书”，而是由方面军司令员给在附近作战的父亲发了一封唁函。唁函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家里。哥哥的子女均已长大成人。儿子尤里继承父业，成了一名飞机试飞员。女儿尤莉娅新闻系毕业后到新闻社工作。后来我们曾设法寻找列昂尼德的殉难处，却未

能如愿以偿。

……我再来继续描写父亲的房间吧。靠门放了一个三开门衣柜，贴面板是红木的。那里保存着父亲的私人物品。柜子上有一个红木匣，匣内是三支手枪：巴拉贝伦手枪，瓦尔特手枪，另外一支不知是什么手枪。这是克格勃机关在父亲 70 寿辰时所赠的礼物。我们没有手枪子弹。梅利尼科夫离任后，接替他的卫队长康特拉绍夫曾经提出让父亲交出武器，但父亲朝他瞥了那么一眼，于是这个问题再也无人提起了。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小幅描绘流放中的列宁的画，系出自纳尔班尼扬之手。地板上铺着漂亮的白色地毯，按照父亲的要求在上面加铺了亚麻布狭长地毯。

母亲住在父亲的对门。从前那是一个不大的凉台，可以穿过它绕过小楼，从台球室下到花园里去。原先的房主人把凉台封起来，增添了取暖设备，便成了开着两扇窗户的明亮的小房间。

要去原先的台球室、现为餐厅的大房间，需从走廊里向右拐弯。一拐弯，我们就到了约有三四米长的又宽又暗的“澡堂更衣间”。这里有一个长长的放猎枪的柜子，带有可拉开的柞树花纹贴面的小门。

父亲在他一生中的积极活动时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爱好。打猎算是例外。他在打猎中得到休息。他在基辅和莫斯科工作期间都定期去打猎。只是 50 年代初期不曾打猎。斯大林不喜欢他的战友们在一起扎堆儿。当时，这样的打猎会使所有参加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父亲喜欢摆弄自己的猎枪。他有 20 来支——那是战后途经基辅回国的将军的礼物和外国客人的赠品。

打猎中，或者有懂猎枪的人来时，父亲喜欢夸耀自己的猎枪。连客人的猎枪也当场拿出来看。所有猎枪都受到吹毛求疵的检查，每个在场的人都来瞄准和试用一番。察看猎枪时往往相互交换。父亲并不吝啬，他要是发现客人喜欢猎枪，就主动提出交换，通常

都是客人占便宜。

然后他挖苦说：

“瞧见了把，他把我蒙了还挺得意！”

父亲退休后已经不去打猎了。他偶尔取出猎枪，仔细端详，爱不释手地抚摸枪管。擦洗完了再上足油，又放回原处。1968 年父亲决定把自己收藏的猎枪分送给大家。

“让它们都落到好人手里吧。他们可以见物思人，老念着我。要不然我死后就得给偷光。”他有一次这样说——而且看得很透。

他把猎枪送给我，送给孙辈、医生、自己的卫兵。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主要是有来复线的武器——造型漂亮、口径各异、来自不同国家的猎枪和马枪。

卫队长在同我们谈话时提醒我说：

“你去领个枪证，再不就把枪交了。否则会惹出麻烦的。准要是对你挑刺儿，这是个绝好的口实。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判五年。”

我们在葬礼后缓过劲儿来时，我把所有猎枪的枪号都逐一进行登记，给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允许我把这些武器作为对父亲的纪念保存在家里。我打听到电话号码后，就打电话到接待室，把自己的问题讲了一遍。是晓洛科夫亲自接的电话：

“明天5点以前来吧，”他说。

5点我到了奥加列夫街六号。穿过“将军门”。已经有人在等我，并陪我进去，出入证也免了。

晓洛科夫十分亲切而客气地接见了。他详细询问了父亲的情况，讲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亲切话语，还问了妈妈的身体如何。然后转入正题。他看完我的信后说，容他考虑考虑：

“一星期后来电话吧。请放心，一切都会得到圆满解决的。”一星期后，秘书接到我的电话便转告说，部长正等着我去。我于约定的日期和钟点到达，当即受到接见。部长同上次一样地客气，却拒绝了我的要求。

“你有将近20支枪呢。可以武装一个排了。你要正确理解，我们不能把枪放在你家里。应当放在更为可靠的地方。”

我反驳说，我这个地方可靠，我所在的大楼里住有政治局委员。他们受到严密的保护。

“再说，枪可能弄坏，枪管一受虫蛀就不成其为武器了。”我最后说。

晓洛科夫不同意这个意见。

“我们把枪送博物馆，给你搞个摄影画册。”他未了说，并叫来几名工作人员。

我难受得落泪，却又无可奈何。

来了一名将军和一名上校。

“现在就跟谢尔盖一起去他家。把枪取回来。枪要送博物馆，”晓洛科夫吩咐说，又加了一句：“只是一切都要干得漂漂亮亮的。”

五分钟后我们就到了。我爬到阁板上，开始把带皮套的猎枪、瞄准器递给他们。

“完了。”我递出最后一支可装十发子弹的小口径猎枪。

“好吧，”将军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补充道：“把枪套解下来。枪套就留着，瞄准器也留下。”

“可那怎么行？……”我很吃惊，因为说过要送博物馆的。

“没事儿，”将军斩钉截铁地说。“这又不属于禁止存放的范围。可都挺值钱的。”

他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眼前发生的事情显然不对他的心思。

“我们现在就把东西搬到我们的车上去，您对哨兵说，我们是同您去打猎的。”将军在执行部长指示的最后说。

答应第二天给我打收条。但我既未收到收条，也未收到晓洛科夫许诺的摄影画册。我没有再给他去电话。后来我听说，他不过是把父亲的猎枪据为己有，也许还要送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从前曾不止一次地欣赏过这些猎枪……

……凹槽里放猎枪的柜子对过，摆了一个很大的结实的柞木柜。里面存

放着父亲的军服——既有战场上穿过的旧军装，也有他在苏军建军 40 周年时缝制的新制服，当时他身着中将服，在纪念大会上引人注目，还同我合影留念。

“看来是最后一次了。”他有一次去换装时忧伤地说。这确实确实是最后一次。

记得当时安·安·格列奇科元帅忽然想起要授予父亲苏联元帅军衔。

“您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我们的上司，”格列奇科狡黠地挑起话头说，“我们军人可有自己的规矩。给军衔低的人当部下有点不对头。您要是有个元帅军衔，那就另当别论了。”

父亲不喜欢这个提议，他回答得相当粗暴：

“眼下是和平时期，暂时也打不起来。所以我只要有将军军衔就可以对付您了，万一发生战争，到那时候再正儿八经地授勋。别跟我提这种荒唐的问题。”

格列奇科微微一笑，以将近两米的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把一切都当成玩笑了。他跟父亲算老朋友了，既在战争中共过事，又在基辅一起工作过，当时格列奇科任军区司令员。

……就在这个澡堂更衣间里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有一台 16 毫米的幻灯放映机。当最后弄清父亲不会去俱乐部后，我找出了长期闲置不用的南斯拉夫电影放映机和德国银幕，并在大房间里东拼西凑地搞了个电影放映室。片子是向电影发行公司租用的，一切都相当简单。有时朋友们给我提供外国新影片。父亲最喜欢迪斯尼公司的《鸟》和根据米哈伊尔·沙特罗夫剧本拍摄的《7 月 6 日》。在此之前不久，孙女尤莉娅把沙特罗夫领到我们别墅来。父亲陪他久久地散步，夸耀菜园里的作物。父亲精神振作一些了，看来他喜欢这位客人，便尽量讨客人的欢心。沙特罗夫送父亲一本登有他的剧本的《戏剧》杂志，上面写有恰如其分的题词，并邀

请父亲去看《布尔什维克》一剧的演出。

当时父亲很少去剧院——他听力开始不行了，常常听不清演员的对白。这使他感到恼火。观众对他的兴趣也搞得他很难堪——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稀奇古怪的展品。总之，在他退休生活中文化活动较少。父亲偶尔抽工夫去马涅日看画展，有一次曾去博罗季诺。

这回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喜欢这出戏。幕间休息和终场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在剧团团长的办公室里度过的。父亲对演员表示感谢，并回忆往事，让大家开开心。

就是在这次上剧院之后，他让我搞来《7 月 6 日》影片。他喜欢这部片子，他说，影片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后来他又把登在沙特罗夫所送的那本杂志上的剧本反复读了几遍。

应该说，来拜访父亲的人并不多。罗曼·卡尔缅带上妻子迈娅和女儿阿廖娜来过两次。他们在树林边上坐了很久。父亲对他讲了很多话。当时父亲说，很后悔在马涅日讲的那些话和在几次会上所讲的粗鲁话，他承认自己那时是让我们的思想家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牵着鼻子走了。

1970 年，尤莉娅把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领来见父亲。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天。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当天维索茨基没有给父亲唱

歌，他没有带吉他。而且我觉得维索茨基的演唱风格未必对父亲的心思。

他们也不可能说“推上机画展”。父亲靠的是说服的力量，靠的是声带。至于动用机器来证明绘画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优越性，他是不会想出这个主意的。在同艺术上的不良倾向作斗争中动用机

器的做法已经是赫鲁晓夫后时代的事情。

还想起父亲的哪些客人呢？

施特拉和彼得·亚基尔来过几次。战前父亲同他们的父亲过从甚密，对约纳·亚基尔的被捕和遇害深感痛心。他很高兴见到老友的女儿，为他们后来遭到的不幸感到难过和同情，却又爱莫能助。

波兰共产党老党员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戈斯金斯卡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作客的时间较长。父亲在同她交往中讲述过去的经历，这样就把说话同工作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回忆录到磁带上。她则不断提问，提起他的精神。总之有许多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2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夫妇曾和戈斯金斯基夫妇同住在基辅奥利金大街上几家合住的楼房里。后来命运使他们天各一方。不久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判刑，在劳改营里颠沛流离。50年代囚徒获释，什么证件也没有就把他们塞进火车往本国送。火车在边境线上被截住了——谁也没有护照，既无苏联护照，又无波兰护照，签证就更不用提了。只有释放证。他们在那里忍饥受饿呆了几天。直到请示苏共中央才放行，于是他们这些过去的波兰共产党积极分子回到了祖国。

已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儿克里斯金娜·贝鲁特也有时来父亲这里作客。

也出现了新的朋友。其中有著名苏联内分泌专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茹科夫斯基教授。起先他是来给同姥爷住在一起的外孙瓦尼亚看病。米哈伊尔·茹科夫斯基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他向尼基塔·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仔细地听答案，并且作了笔记。父亲也多次去他家作客。至今茹科夫斯基珍藏着父

亲送给他的纪念品。

我们的朋友，主要是我和我两位姐妹的朋友，算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同父亲一起散步，跟他一起久久地坐在篝火边，听他讲故事。这些客人同政治毫无瓜葛，没有引起当局的不安。

但是对有的人就不讲客气了。这样便使父亲的飞行员齐宾将军无法来访，他原先的卫队长利托夫琴科也不能同父亲保持联系。有些实际上根本不会因此遭殃的人也忘记了到父亲家来的路。很多人不愿冒险来拜访曾一起共事数十年、现已下野的朋友。有一次父亲最老的朋友、当初顿巴斯时期的伙伴叶夫格拉夫·伊万诺维奇·切列波夫来莫斯科参加矿工代表大会。他们曾一起在尤卓夫卡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起在该校的执委会工作。他打电话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电话上说了几句，但谢绝到家里来，推说时间太紧——要看女儿，还得赶回去，工作不等人……

经常有人问我：米高扬来看过父亲吗？

不能忘记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1964年10月主席团会议上所采取

指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一次动用推土机取缔“非法”画展一事。

约·埃·亚基尔（1896—1937）苏军将领，一级集团军级。1925—1937年曾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1937年惨遭迫害。

的原则立场。他在会上曾表现出不小的勇气。当时米高扬提出保留父亲一项现任职务，一名与会者（据谢尔戈·米高扬说是谢列平）根本不顾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年事已高，粗暴地一口回绝：“绝对不行！！您还是免开尊口为好，要不保不齐连您也一起捎上。”

威胁并未奏效，米高扬庄重地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我们又不是在这儿瓜分馅饼，而是在决定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命运。赫鲁晓夫的活动是党的巨大政治财富。请不要威胁我。”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来看过父亲。他们偶尔通电话。后来连电话也中断了。

当然，米高扬自己也身处逆境，也许处境比父亲稍好一些，他不想再冒风险了。这是情理中事。每个人都较多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是我相信假如再次出现需要捍卫原则立场或者捍卫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会议无反顾的。至

于因同老友相聚喝茶而冒风险，并且不知是什么样的风险嘛，那就……

米高扬开始写回忆录了，就给他派了一名女秘书帮忙，当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别墅，他妻子早已亡故，儿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于是这位妇女渐渐把家务也承担起来了。毫无疑问，她也有一项监视被保护人行动的任务。

米高扬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友谊使新领导感到不快。他俩每个人的威望都很高，所以就不能让他俩相互串连：谁能知道这两位下台的政治家会想出什么主意来呢。大概因此就决定用最简单的，但是可靠的办法把他俩拆开，这办法就是散布流言飞语。

据谢尔戈·米高扬对我讲，有人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打小报告，说父亲的司机对米高扬的司机讲，赫鲁晓夫每次上车都要把米高扬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场面从物理上来说是不现实的：父亲坐的车属于克里姆林宫车队，米高扬坐的车则属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车队。此外，就我记忆所及，父亲从未说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一句坏话。然而这则谣言却起到了作用：米高扬生父亲的气，具体行动就是不再给他打电话了。父亲自己是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的，他不愿意使对方和自己陷入窘境：万一他的电话不受欢迎呢？也许还有其他的传闻或者流言飞语传到了米高扬的耳朵里。不管怎么说，反正米高扬退休后没有同父亲见过面。

那些始终没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看望过父亲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不是在尽量忘记赫鲁晓夫的存在吗？在克里木，甚至把尼基塔植物园所在的古老的尼基塔村也改名为植物村，以免途经该地前往别墅的勃列日涅夫联想起他的前任。

这一切父亲都默默地忍受着。

自然，退休后连外国友人也不再同他来往了。因此不难想象，有一次父亲收到一箱附有亚诺什·卡达尔及其妻子玛丽亚热情洋溢

的便笺的卓纳坦苹果时，是怎样地喜不自胜。父亲爱吃这种苹果。卡达尔夫妇知道这个，从前每到秋天必定给他寄苹果来。于是卡达尔这个亲身尝过斯大林铁窗滋味的人决定无视新任领导不成文的禁令。

我还记得一位来访者，不错，此人的拜访并未实现。

理查德·尼克松在那场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竞选运动开始前，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他来到旧马厩胡同父亲的住宅，但没有见着人。尼克松的名片和便笺随着每天的邮件送到别墅来了，他在便笺中对未能晤面深表遗憾，并要求能在回美国之前见上一面。其时尼克松已经离开莫斯科，见面

一事就自然而然地告吹了。但毕竟可以看出，父亲对美国国务活动家这番厚意感到高兴，尽管他对尼克松的评价相当不高。

据我所知，对尼克松的不好印象是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形成的。父亲牢牢记住了关于苏联火箭使用何种类型燃料这个不得体的问题，那是尼克松在他们参观美国展览会时在厨房的谈话中提出的问题的。

父亲很生气：

“跟他谈什么呢？他当时在厨房里的表现不象国务活动家，倒象个小小间谍。他身为美国副总统，竟问我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的洲际火箭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燃料！当然我不会对他说的，不该是他这个级别的人来打听我们用的是固体燃料、液体燃料还是别的什么燃料。有专门的特工机关干这个。需要想想你提的是什么问题。”

当时父亲认为尼克松是个狡猾的政治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尼克松未能实现的拜访使父亲感到满足。不过，如上所述，来访的客人寥寥无几，因此对他说来唯一了解世界的窗户就是电视机，这也是退休者共同的习惯。

埃及总统纳赛尔所赠送的收录电视组合机也搬到别墅来了。

里面是个黑白电视机，但图像很清晰。荧屏前放了一把带有放脚小凳的舒适的安乐椅。除电视机外，组合机内还装有收音机和录音机。父亲正是用这个录音机开始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很喜欢搞革新的他用小块木头做了个踏板，一踏就停，便于他集中思想。组合机上面放了一台我国最初生产的速度牌彩色电视机。我知道父亲多么喜欢各种技术上的新东西，便想到用彩色电视机让他高兴高兴，可以说，这个主意奏效了：直到临终之前，这都是他心爱的“玩具”之一。但那都是后话了。

我们每年都要绞尽脑汁：4月17日给父亲送什么生日礼物？因为他实际上必需的东西样样俱全，而小玩物、装饰品、丁当响的玩具他又不喜欢。于是我就决定安排在生日前买一台彩电。父亲嘴上责备我乱花钱，但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很满意。最初几天他几乎象孩子般高兴和喜悦地仔细端详当时作为插图出现在屏幕上的色彩斑斓的玫瑰花，还叫大家都去欣赏玫瑰花的各种色调。父亲在彩电旁边的屏风上挂了一大幅世界政治地图——他每每在地图上搞清从新闻节目中所听到的事件发生的地方。他对非洲的变革、新独立国家的诞生特别感兴趣。这个过程早在他执政时就开始了。他对正在获得解放的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感同身受。他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都曾有过亲切友好的关系。

父亲对卢蒙巴之死深感痛心。下面这件事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有多么悲痛。刚果事件发生时父亲正在休假，顺便去了基辅。该地领导人聚在一起，当谈话从讨论经济问题转到别的话题时，奥莉加·伊利尼奇娜·伊瓦先科开了个玩笑，重复了当时流传的一则俏皮话：

卢蒙巴

要是聪明，

乔姆贝

就一无所获。

父亲喜欢说笑，自己也很会讲笑话，这时却皱起眉头，面有温色。他讲了刚果的形势，说卢蒙巴是个聪明的领导人，但他的时间尚未到来，刚果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待成熟。于是这则笑话便显得不大得体……

……冬天过去了。时间多多少少抹掉了父亲的烦恼。生活中逐渐有了一定之规，产生了新的习惯和爱好。

父亲早上7点起床，跟着录音做早操，用早点。最近几年早上有几个小时用来口授回忆录，然后是带小狗阿尔巴特散步，阅读报刊和书籍。午饭后又是口授。晚上看电视，吃晚饭，读书和睡觉。

应当说，他退休后好不容易才适应了日常的规矩和习惯，他实际上还是个20年代的人，退休前他在另外一个空间中生活。

起初，他忽然担心起来：他怎么进城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党支部会。我不明白，就又问了一遍。

“难道现在党支部不是每周开会了？那日常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父亲感到很吃惊。

他挂名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党组织，这些年来他一次也没有接到让他去开会的通知。

按我们的标准看来极其普通的事情都让他觉得奇怪。而且有时难以预料什么问题会触痛他。他对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事情最是痛心疾首。有个卫兵在言谈中提到自己违反交通规则，只好花钱，给民警塞了张三卢布钞票才算了结。这给父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次提到此事，给客人们讲，最后痛苦地说：

“难道可以想象吗！执法的人收受贿赂！我们可怎么建设共产主义？……”

卫兵从邻近的工地上弄了一些材料到别墅来，父亲就坐不住了：

“他身为克格勃的军官怎么能这样干？……我们在往什么目标走？”

幸而他对自己原先的战友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逐渐地恢复常态了。他很想有个事儿干。他想起了水栽法。早在离任前他就听人说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种作物。他十分急切：他从中看到了解决大城市首先是莫斯科蔬菜供应问题的一种办法。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从旁鼓劲，介绍了古巴接受美国人的遗产时接受了一批大型水栽法设施。

“这简直是你们的金库啊，”父亲当时羡慕不已。

结果父亲便要求在我国也制订一项在莫斯科近郊修建水栽法蔬菜暖房网的计划。作为试验，在总理别墅里也修了一个水栽法小暖房，父亲自豪地向客人们展示放满石子的水槽里结出的黄瓜。

现在，他又回到了他曾一度入迷的想法上来。

我姐姐列娜一生爱养花，甚至会侍弄兰花，她给父亲买了一本M·本特利的《工业水栽法》。父亲对该书进行了详细的研读（现在这本书放在我的书架上，书页上画满了许多着重号、钩号和其他符号）。父亲在掌握理论后，开始修水塘，配制混合液。当时塑料薄膜才刚刚开始应用（父亲在即将离任前，就曾以他的特有的毅力设法使几家工厂投产）。因此没有材料修暖房，于是露天的水槽就摆在凉台上。父亲把房前的水泥花瓶也装满了石子和溶液。我们全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加了这项工作。栽种了黄瓜和西红柿。并未收到特殊的效果。水栽法技术已经属于工业，需要有准确的规定用量，需要搞自动化。在家庭的条件下搞起来很难。父亲的水栽法设施没有存在多久，一两年后就化为乌有了。又换成了通常的菜畦。

春天，父亲决定练习练习摄影。他年轻时曾搞过摄影，战前他有一部莱卡相机。当时的照片只有几张保存下来，因为我们家的全部财产 1941 年全都留在基辅，当然已荡然无存。

1947 年基辅的军械厂不造武器，开始用德国运来的设备生产相机。人们把第一批相机中的一部送给父亲。当时他患严重肺炎刚刚勉强康复，那是十年来第一次让他去休养。他在那里又重操旧业。可是假期结束后，相机又失业了。父亲退休后想起了自己早年的旧业。我买了一大堆照相用品。父亲用泽尼特相机装备起来，开始寻找照相素材。第一张底片是他自己在浴室里冲出来的。效果不错。

但是成天跟化学制剂打交道不合他的心思，我提出把底片送到店里冲洗，他欣然同意。

不久相片又换成幻灯片，这时父亲真正是对拍摄景物入迷了。他忽而发现一根奇妙的繁花似锦的树枝，忽而发现一簇艳丽的花揪，忽而发现一株银装素裹的优雅的松树；他花了很长时间去选择需要的角度，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

他总是要把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子女、孙辈和客人看。在一个大房间里挂起窗帘。父亲取出德国半自动幻灯放映机。先鼓捣半天。又挑选幻灯片。最后开始放映，应当说，幻灯片质量不错。他学会了选择构图。

摄影毕竟不能真正地使父亲全神贯注。倒不如说这是在消磨时间。

那段时间他经常忧伤地重复一句话：“现在我只有一项任务：设法消磨时间。”

几年过去，父亲把周围的景物都反复拍照过多次，他便对摄影彻底地厌倦了。他把照相机扔到一边，只在有客人来访的特殊情况下才拿出来。这时他自己拍照，或者与客人合影。

给父亲带来最大乐趣的是篝火。他身披略带绿色的驼色斗篷，酷似一名法国警察，无论天气如何，即使下雨，也要在林子里拣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火光。篝火使他想起遥远的童年、夜间放牧、马群、烤土豆、故乡卡利诺夫卡。每逢假日我们全部坐在身边，但平日里他唯一的伴侣就是始终不渝的阿尔巴特狗了。

春天来临，父亲就在菜园里找到了固定的事情。有了塑料薄膜，他着手修建温室。他把乱扔在别墅地面上的水管集中起来，弄弯，上漆，砸进地里。温室的骨架出来了。他干起活来忘乎所以，

从来不会懒懒散散。子女、孙辈、客人、卫队中的年轻人全部参加了菜园劳动。卫队长梅利尼科夫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弯管子、

挖地。他的副手洛德金则与此不同：他自己不干，而且他值班时也不准部下给父亲帮忙。

温室在小楼旁边盖起来了。结出了优质的西红柿和黄瓜。父亲是按照科学方法来培育的：他搞了一个小型农业图书馆，注视着这方面的动态。在下面草地上的露天菜地里种有土茴香、小洋萝卜、土豆、南瓜、向日葵，当然

这件斗篷是布萨克先生送给父亲的，此人系法国专营纺织品的大企业家，反动的、“右翼的”（当时人们这样向父亲介绍）《震旦报》的老板。父亲访问法国时两人相见，彼此都有好感，他们的交往便持续下来了。每逢节日布萨克都给父亲寄纪念品：有时是一瓶酒，有时又是别的东西。斗篷就是这样到了他的手中。父亲很喜欢斗篷那合理的简洁，他直到临终前几天从未离开过斗篷。——作者

还有玉米。

父亲只是对白嘴鸦有些穷于应付。菜园旁边的树上栖息着它们的群落，它们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作物。玉米和向日葵刚刚出芽，

白嘴鸦一大早就从树上倾巢出动，揪断嫩苗，啄尽谷粒，撂下一行又一行整整齐齐的茎秆。同它们的作战互有胜负。有人建议使用火器，用猎枪捕杀白嘴鸦，父亲当即回绝。他可怜这些鸟。因

此他尽量采取消极的办法来自卫：在出土的小苗上方用带刺的树枝设置障碍物，支上稻草人。白嘴鸦对稻草人不屑一顾，象小猫一样灵巧地在树枝之间穿行。

然而它们同父亲并没有“反目成仇”，他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捡了一只从鸟窝里掉下来的小白嘴鸦，把它养大了。它简直被驯熟了。父亲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从他手中啄食。如今他们成了三位同行：父亲、阿尔巴特和白嘴鸦，家里还有一只西伯利亚猫、一只金丝雀，起初都是孙辈的玩物，后来全扔给爷爷了。花园中放着蜂箱——那是列娜的产业。

活儿愈来愈多了。白天的时间已不够用，而且父亲又不能事必躬亲。精力已大不如前。一星期下来攒上一些活儿，父亲预先作好准备，让子女们来干。星期六给每个人都布置作业，父亲管这叫功课。并非人人都喜欢这个。孙子尤拉，上校级试飞员，倒是乐于帮助干钳工活儿，可自从在菜地往往把黄瓜拔掉只剩杂草后，就被取消下干农活儿的资格。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常闹点小病。他患脊神经很炎，可惜不能干体力活。听力也开始不行了，他不是听不见父亲叫他，就是自己提了问题后没听完就走了。阿朱别伊一家渐渐到我们这里来得少了，自己搞了个别墅。

列娜和她的丈夫维佳为“逃避”父亲的功课，便拿蜜蜂作掩护。他们的蜂箱放在房屋旁边，蜜蜂需要照顾。当然，我也千方百计地躲避，因为菜园的活儿无法使我陶醉。

父亲见我们偷懒，只是笑笑，也不生气，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干起活来倒是齐心协力。我们的“生产队长”对自己的钳工活颇为自豪。他指挥说：

“我要让你们看看该怎么干。你们都号称工程师，可是不会弯管子。”

最后他搞了一套钳工工具，弄到麻刀、麻、油漆，干起活来

象是个地地道道的钳工。当然，这方面他也不遗余力。他成天搬运管子，用螺钉把管子连结起来，他决定把管子通到下面草地上的菜园里。当时新来的长官已经不准卫兵给他帮忙了，于是年轻小伙子们便从自己的“岗位”上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一根又一根地搬管子。

*

*

*

……父亲去世后，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别墅当即拆除。据说现在那里盖了一所寄宿学校……

第四章 回忆录

父亲的回忆录已被译成 16 种文字出版，已在世界各国传阅将近 20 年。唯独没有苏联版本。而且这是在我国中央委员会档案馆中保存有全文——200 多个小时口授录音材料的情况下发生的。多年来没有一个官方人物过问过这些材料。这是我们对待自己历史采取轻率和鄙薄态度的绝妙写照。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也好，最高当局围绕回忆录所进行的政客的卑鄙勾当也好，从父亲写作回忆录的第一天起直到该书在西方出版为止，几乎处处充满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波折。

……最初关于回忆录的谈话早在 1966 年父亲病后康复期间就开始了。当然，那时无论是谁，包括父亲在内，对于回忆录的内容、篇幅以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将起的作用都一无所知。当时我们想把父亲的注意力引到某一项工作上。谁也不会想到他决定开始写回忆录一事会引起怎样的风波。不过，父亲并不是因回顾历史而惹出麻烦的第一人。

想当初，国家安全系统的“热烈的捍卫者”们向他报告说，朱可夫元帅开始写回忆录了。他们建议把回忆录偷出来，让他写不下去。

父亲的反应却与此不同：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写去好了。现在他无事可干。别采取任何措施，他认为需要干什么就让他干去吧。这一切对于我国的历史说来十分重要。朱可夫因为犯有过失解除了职务，但这既同他从前的活动无关，也同今天写回忆录无关。”

我们在建议父亲写回忆录时，曾满有理由地指望“上面”也会采取这种立场。却是事与愿违……

父亲对我们的谈话起初毫无反应，有时一笑了之，但避而不答的时候居多。甚至连他通常爱说的“别缠人！”这类话也没有。岁月流逝，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有一天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廖瓦·彼得罗夫再次提及回忆录。作为“诱饵”我们决定以正面范例去怂恿他——让他爱看回忆录。当时我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活动”。我四处去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可惜我们的努力并未奏效。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如今父亲无论同谁见面，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谈话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问他是否在写回忆录。他们一听到否定回答，就开始表示难过，并异口同声地劝父亲，说这是“犯罪”，因为他脑子里装着应当成为历史财富的罕见的事实。

事情终于摆脱僵局，1966 年 8 月，廖瓦拿来一台录音机，父亲就开始口授。天气暖和。他俩在花园里坐下来，开始谈话。

回忆录没有提纲，因为我们甚至想象不到这项工作会有多么宏伟。再说实际上这还不算写作，仅仅是比赛前的训练，那不过是把父亲十分慷慨地对客人讲的话记录下来罢了。但这个过程不长。工作很快就从业余爱好性质变成了专业性。

起初，父亲因为窃听系统不想在室内口授。所以开头几盘带子上他的话常常被飞机的轰鸣声所淹没。后来他对窃听“不屑一顾”，便继续在室内口授。

第一次录音讲的是加勒比海危机当时这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

情。人人都很关心几乎导致两个大国兵戎相见的那个事件的戏剧性发

展。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廖瓦一再要求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插曲，他把录音带带回家去，整理成文字，一星期后，把经过润色的笔记拿来。父亲不喜欢。廖瓦不是对记录进行加工，而实际上是边听着录音，边把一切都重新改写了。换句话说，这仿佛已不是赫鲁晓夫的作品，而是彼得罗夫根据赫鲁晓夫提供的主要内容改编出来的东西。失去了特色，风格起了根本的变化，而对有些事实的叙述则改得面目全非。

应当说，父亲的初稿不好加工。口授既不是谈话，又不是演讲，赫鲁晓夫谈话或演讲时总是引人入胜、形象生动地阐明自己的想法。而这是一连若干个小时一个人面对录音机讲话的结果。况且带子的转动又在起催促作用，规定着速度。你会情不自禁地着急起来。出现许多不必要的口头语，时而缺谓语，时而缺主语，时而措辞不当。加工润色时，要把一切都集中在一起，不歪曲原文，保留意思和特色。工作需要极其耐心，也需要时间。如用自己的话改写，那不知要容易和快捷多少倍。彼得罗夫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预先在这里交代一下，时隔不久，整理和加工的全部工作都压到了我的身上。我加工出了1500个打字页。渐渐地有了一定的速度。埋头工作一天的成绩可在10页左右。尽管我十分努力，父亲却认为效果不大理想。

父亲看完整理出来的文字，不容反驳地宣布廖瓦的稿子不能用。如今妈妈开始给他帮忙。她可以边打字边改稿。工作情况有所改进，质量提高了，但工作进展的速度不能让父亲满意，照这个速度到生命结束的那天口授的材料也加工不出来。

于是我也参加了回忆录的写作。起初我建议父亲请求中央派打字员和秘书来帮忙。

“这又不是个人的事情。中央应当关心回忆录。这是历史，”我劝他说。

他不愿去找中央：

“我不想向他们提任何要求。要是他们主动提出来，我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我的回忆录。只会从中作梗。”

我们决定独立进行工作，不去求援。

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哪儿能找上一个信得过的、经验丰富的打字员。因为得有把握做到材料不致丢失或落到他人手中。任务相当艰巨。我把自己的疑虑讲给朋友——谢苗·阿利涅罗维奇和沃洛佳·莫杰斯托夫听。我们经过对形势的分析，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当时她在我们单位的生产车间工作，经常同我们一起去试验场出差。是一位优秀的专家和十分正直的人。我向她提出这个建议，洛拉欣然同意。余下来的只是技术问题了。我在普希金大街上买了一台打字机。我自己有一台格留恩迪格牌四声道录音机。我们只是在上面安了一副耳机。决定在我家打字，因为我认为不能让磁带离开我。

记得那是个秋天的晚上，大概是1967年吧，洛拉来到我们居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装配录音机和打字机，为的是便于开关声音和同步打字。她和我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装配花了不少时间。最后一切都弄好了，便开始打字。

洛拉尽管技艺高超，却明显地跟不上录音，加上有些词发音不清晰。时

即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下同。

而停下来，再返回去，一小时后就全清楚了：照这样下去不行。照这个办法可以打出几十页，顶多不过一百来页。可我们一共有好几百页甚至几千页的东西要打。我们有些灰心了。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夜间。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决定先停下

来。一起去喝茶。谈话一直围绕着困扰我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只得把活儿拿到洛拉家里去干，因为她在家里时间多一些。

回忆录写作初期，“该感兴趣的人”暂且还对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兴趣，因此技术设备迁往列乌托夫一事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

从那天起工作进度加快了。父亲每天口授几个小时。洛拉打得很快，也仍然跟不上他。我简直疲于奔命。我在家时和单位的每一刻空闲时间都用于加工和改正了，平时和假日都是起早贪黑地干。可即使如此，我还是跟不上他们，还老是催洛拉。我担心会来不及。总有一种预感，不可能一切都那么顺当。

父亲凭记忆口授，不动用任何文献资料。而且他这样做甚至不是因为挑选书刊有纯技术性的困难。这项工作我倒勉强可以胜任。但是父亲早已习惯于同人打交道的生气勃勃的实际工作，“不愿去钻故纸堆”。他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和自己的记忆力上，而且应当说，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脑子里怎么能装下如此大量的信息——事件、地点、姓名、数字呢？并且传达给听众时，几乎没有重复和杂乱无章的地方！

父亲逐渐习惯了同我合作，于是录音中愈来愈多地出现对我讲的话：

“我讲了马赛之行，忘掉那个陪同官员的名字。现在想起来了：叫若克斯。我说得对吗？对，对。若克斯。你改的时候把它加上。”

再如：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一名团员走到我面前，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接下来是对此人相貌的描述）。要查一查，把名字加上。”

曾经要求核对战争章节的部队番号。这里没有多少错误。父亲的说法准得出奇。这可以有一种解释：当年的事件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了。数字、姓名和日期也丝毫不差。

他在试图凭记忆回想某次国事访问中事件的连贯性时要出

错。比方说讲1955年同布尔加宁一起访问缅甸的情况时就是如此。父亲试图回想起他们是在何处受到谁的接待，他们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通常一个人是不记得这些东西的，父亲脑子里有个基本轮廓，却把他们在哪个城市里受到国家划船队的欢迎，又在哪个城市里受到骑着大象的列队欢迎这些细节弄得颠三倒四。我得把这一切恢复原貌，便根据早已见报的总结报告对录音记录进行校对。

工作很忙。父亲干得认真，也干得多。他每天口授了3—5个小时，安排在上午和下午。

“有听众的时候我就讲得好些。面前是个活人，而不是叫你哭笑不得的盒子。”他不止一次地抱怨道。

然而听众远非时刻都有。不错，听众一来事情就干得又快又好，这通常是来往上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老熟人、退休者。于是录音带上就可以听到对话。面对“盒子”时语言则欠生动，不流畅，往往有长时间的停顿。父亲秋冬两季最出活儿。夏天菜园的事情提到首位，口授只能抽空进行。

父亲对每个题目都长时间地认真准备，他在散步时反复考虑讲什么和怎

么讲。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都牢牢地印入脑海。这些事件他曾反复讲过多次。其中包括 1942 年巴尔文科沃近郊的失败、逮捕贝利亚、斯大林去世、二十大等等。他的讲述中实际上与最初的讲法毫无出入，1960 年与 1967 年说的一样，尽管父亲老是抱怨说：“人老了，记忆力不行了。”

父亲口授了几千公尺录音带的材料后，愈来愈感到苦恼：他的回忆录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一切都是白费。无效劳动。全都保不住。我人一死，他们会把什么全都拿走销毁，或者掩埋得不留一点痕迹。”他在我们的星期日散步中不止一次地重复道。

我们从来不在屋里谈这些话题，因为牢牢记着有人窃听。我

尽量安慰父亲，不过内心里倒是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我明白，今天平安无事，这绝不意味着以后会永远如此。

为防万一，我们决定采取保护措施，多复制一份录音带和文字记录，并把两份分别保存在可靠的地方。看来问题解决了，但我们对于职业暗探在这种情况下神通有多么广大实在太了解了。

绝对安全的地方是没有的。在一次散步时的谈话中我们产生了在国外寻找一个秘密地点的念头。父亲起初有疑虑，担心手稿在那边会失去我们的控制，可能受到歪曲和用来干危害我国的勾当。从另一方面说，在那边更有把握做到完好无损。父亲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斟酌和权衡利弊之后，终于让我把这个方案也周密考虑一下。自然，我俩对这个决定守口如瓶。不过说实话，当时我甚至想象不出大体的行动方案……

回忆录的内容是什么呢？

从一开始父亲就声明，不打算从童年时代开始描述自己的一生。他受不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叙述，这使他感到厌倦。

“我想讲述我曾亲自目睹的我国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首先讲斯大林，讲他的错误和罪行。因为我看到，又有人想洗掉他手上的鲜血，把他捧得很高。我想讲讲战争的真相。广播和电视上向人民灌输的那些陈词滥调实在让人厌倦了。应当讲真话。”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提纲的简要说明。

起初他不打算讲自己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那个时期，不知是认为这样做不谦虚呢，还是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觉得不需要讲。我论证说，他本人的一生、斯大林之后发生的事件，在历史上说来同样有意义，同样重要。父亲没有表示异议，一言不发。不过当时这种争论是无的放矢：他才刚刚开始执行预定计划。

父亲从 30 年代、从自己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作期间开始，然后他转而讲战争的酝酿、战争的悲惨开端、在德军打击下的撤退。他所讲的情况与当时官方认可的对战争初期历史的描述、同许许

多多颇值得怀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大相径庭。他对 1941 年那些悲壮事件的描述令我这个读者十分吃惊。我尽量做到一字不漏，丝毫不歪曲作者的原意。对我说来，父亲是唯一正确的消息来源。如今为子孙后代保存这部回忆录已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战争完了是战后时期：乌克兰的经济恢复，饥荒，倾轧，卡冈诺维奇来到基辅及其调离，父亲调往莫斯科，“列宁格勒案件”。流产的“莫斯科案件”等等，不一而足。

材料已经非常之多。我们不知不觉地搞糊涂了，弄不清哪些问题讲了，

哪些问题没讲。决定对工作进行整顿。我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来拟订提纲，就是把我认为应首先谈到的问题开个别具一格的清单。星期天我们讨论提纲，父亲拿走了那几张纸，以便空闲时详加考虑。一星期后我们搞出了提纲初稿。后来几年就是按照这个提纲进行工作的，完成一项划掉一项，要不就加进新的、起初被遗忘的内容。

打算阐明当代生活中所有主要的问题：垦荒和农业问题，发展工业，改组国民经济和途径，国防问题——部队整编和国防工业，我国社会民主化的方式，父亲同知识界的关系问题。我们也没有忘记国际事务：维护和平的斗争，在日内瓦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初次会晤，各种各样的接触和访问，和平共处问题，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问题。

虽然父亲是按照提纲工作的，但由于自己的性格他经常忘乎所以，扯得很远，根据类推法回忆起同本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来。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原订计划都能实现。父亲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的途径的想法，他对于规定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对于选举制及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公开性、对于确立维护公民权利、使 30 年代的恐怖不再重演的宪法保证等想法都始终没有录制下来。

关于创作知识界的那一节也没有写成。父亲原想对他执政后期所发生的事件作一评价。他很想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动机。但时间不够了。他临终前不久的最后一次录音恰好是讲这个问题的，却未能如愿以偿……。

总的说来，工作进行得协调一致，效率很高，我们这三个人（父亲、洛拉和我）配合默契，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却也搞出了许多东西，口授材料的总时间接近 200 小时。

那么我家为数不少的新闻工作者都上哪儿去了呢？廖瓦·彼得罗夫的情况我已经讲过了。他后来也曾给父亲帮过忙。诚然，这次合作的时间不长。廖瓦身患重病，不久即离开人世。尤莉娅忙着带自己的几个小女儿，而且论专业的结构她同政治新闻业也相去甚远。

拉达从不介入回忆录工作。她装出一副仿佛根本不存在回忆录——无论录音还是打印的事情都不存在的样子。她一门心思编杂志。她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的次数本来不太多，每次来了便舒舒服服地往沙发上一坐，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幅表现第聂伯河春汛景色的画，她在那儿看校样，改《科学与生活》杂志的稿子。小狗趴在一旁享福。父亲看到对他的工作不闻不问心里很不高兴。

当时我投入了原来所不熟悉的劳动，陶醉其中，把回忆录写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我时刻挂在心上，没完没了地给父亲提建议，出主意。我仿佛看到了装帧精美的一卷又一卷回忆录。因此，我把对我的新“教区”的任何干预都当成不速之客的入侵，抱着生怕别人分享的态度。所以姐姐的漠不关心倒正合我意。

父亲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看来，起初他正是把主要希望放在阿朱别伊身上，认为他是主要的助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前些年阿朱别伊经常陪同父亲出访，他同其他知名记者进入了第一书记的工作班子，帮助他起草讲话稿、文

件、新法律草案。再说他本人（原《消息报》主编）也著述颇丰，是公认的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如今他们二人都已下台，当女婿的应该当仁不让地帮助岳父从事“文学”活动。

起初，一切都在朝这方面发展。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积极支持写作回忆录的想法。诚然，他并未主动表示愿意帮忙，不过当时事情才处于开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态度渐渐起了变化。他不再提回忆录的事情，同父亲说话也开始回避这方面的问题。看来，他决定表现出小心谨慎，因为敏锐的政治嗅觉提醒他这种合作危险，当时正值60年代中期，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尚未失去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他从经历十一月中央全会（1964年）之后的震颤中多少有些回过神来，在探寻着返回积极政治活动的途经。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同谢列平联系起来。曾几何时，彻底灰心丧气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又昂首挺胸了。他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时，一会儿把这个人，一会把那个人叫到外面去，神秘地说：

“很快就要大变。廖尼亚坐不长，谢列平要上。舒里克不会忘掉我的，他没有我玩不转。只需稍稍等待。”

这样的传说确实很多，事态的这种发展也决非不可思议。阿朱别伊还以同共青团朋友的谈话作为佐证：他忽而引格里戈里扬的话，忽而引戈留诺夫的话。有一次甚至神秘地说，他见到了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本人。

我对这些话半信半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没有赫鲁晓夫的阿朱别伊对谢列平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能够因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心想重返政治舞台就责怪他吗？我想不能。他当时也才刚40出头啊。自然，在这种情

况下他认为最好还是同父亲保持一段距离，并且要让人察觉到这一点。

可见，参加回忆录的工作只会对他有害。不久就清楚了：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是过渡性人物，而且懂得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力。谢列平掌权的问题已自动消失，但这时又发生了使阿朱别伊连想都不敢想参加回忆录写作的新事件。它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既触及父亲，也触及到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回忆录的命运。1967年以前，人们似乎把赫鲁晓夫完全遗忘了，他的名字突然又惊动了世界。并未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美国人决定拍一部关于原苏联领导人的传记片。我们则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甚至是反苏攻击。

问题在于1967年勃列日涅夫已经连简单地提一下赫鲁晓夫都不能忍受了。这种气质的人一方面善良软弱，另一方面又虚荣心重，对自己干的坏事抱着一种特殊的态度，且有与众不同的感受。他们在于完坏事后，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受害者身上，试图以此向自己和周围的人证明自己干得对。提到父亲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有碍于巩固他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当时勃列日涅夫要记到自己帐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在他之前许久就开始了的，而且眼下愈来愈明显地失去了加速前进的势头。自然，上司的这种情绪也使下面的人受到感染。

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推出关于赫鲁晓夫影片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国暂时还没有人看过这部片子，只有这方面的报道。据说该片是以在

指勃列日涅夫。

指谢列平。

别墅内的拍摄为基础制成的，父亲在片中有几次答记者问，一次比一次可怕。我看到了这部片子，可惜那已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果然不出所料，片中没有任何耸人听闻或者谋反的镜头。素材全部来自档案材料，包括相片和纪录影片材料，风波完全是由

片尾一段两三分钟的镜头引起的：那里是父亲身穿“布鲁萨克雨衣”坐在篝火旁，身边是阿尔巴特狗。父亲正在讲述什么。说话的声音压低了，加上了画外音——讲青年时代，然后是古巴……父亲生活中这种坐在篝火旁的场景很多。

我当时在搞电影摄影，老是背着一台8毫米摄影机。来访的客人中许多人也带着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至于隔壁那家疗养院的休养者就更别提了：同父亲合影留念已纳入“文化计划”。只要愿意，胶片很容易弄到国外去。这没有什么可受指责的地方。比方说，要是有人找到我，我也会亲自拍这个片段的。

但影片中的镜头不是我拍的。

解说词可以使用父亲1964年以前的录音片段：父亲当时经常讲他生活中的顿巴斯时期，讲自己的朋友，矿工诗人潘捷列伊·马辛那。不过，这也可能是现在的录音。他喜欢当着客人的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加勒比海危机也是他爱谈的话题。

影片引起的反应真是说来就来。没有去动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他。怒气发泄到了周围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是卫队长梅列尼科夫。

上面早就对梅列尼科夫不满。认为他太“亲赫鲁晓夫”，认为他尽量在各方面讨好赫鲁晓夫，能帮忙的地方就帮忙，总之，他在想方设法点缀赫鲁晓夫的生活。他的行为不符合时代精神，影片倒是整治他的绝好借口。他的罪名是丧失警惕性，他怎么能够容许父亲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呢？至于从来没有一个记者，不仅没有外国记者，甚至没有苏联记者到过别墅，那是谁也不关心的。

结果是，梅列尼科夫被撤销职务并调出克格勃机关。我后来曾见到他。他在疗养院里当管理员，人老了，头发白了，视力很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是来告别的。

梅列尼科夫的职位由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康德拉绍夫接任，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较为“现代”的工作人员。他设法在

小事情上刺激父亲，无论提什么要求他都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请示上级。几天后照例是这样的答复：

“不行。您不可以。”

也许这并不是他的性格特点：他不过是牢记着前任的下场，严格地执行指示罢了。按照上面的意图，撤换卫队长就应对父亲起警告作用，提醒他今天实力和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而父亲装出一副这种变动与他无关的样子。甚至在与我们谈话时他也几乎不触及这个话题。当局的这一举动对回忆录写作并未产生影响。父亲不但没有中断口授，反而干劲倍增。回忆录写作的最高峰是在1967与196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得势，并且开始密切注意自己这个人在历史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小地》和《复兴》看来还属于遥远的计划，不

过已经开始冒出个人崇拜的苗头了。

关于赫鲁晓夫正在口授自己回忆录的密报使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决定迫使父亲停止工作，可怎么落实呢？

大概权衡了各种方案。对别墅来一次搜查？强行没收磁带？不行。免不了要引起轩然大波。那样就会以粗暴警察的形象闻名世界，而使赫鲁晓夫获得蒙难者的名声，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同赫鲁晓夫谈话，劝他停止写回忆录，并把现有的部分交给中央。劝说成就来硬的。总之是要吓唬吓唬。

勃列日涅夫不想亲自同自己原先的庇护人见面，1965年的那次会见已经够受了。

勃列日涅夫把叫赫鲁晓夫来谈话并设法枪毙回忆录的事情交给自己在中央的第一副手基里连科去做，这是个对人粗暴、蛮横无礼的人，谁都不放过的。同时让阿·亚·佩尔谢参加，此人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他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党的监察委

员会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第三位是彼·尼·杰米契夫。他过去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因此在必要时出来圆圆场，甚至可以劝赫鲁晓夫别干蠢事。1968年春天大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只需付诸行动了。

1968年4月父亲生日前夕，我照例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过星期天。父亲不在屋里。妈妈说，他到林子边儿上晒太阳去了。

“父亲情绪很坏。昨天基里连科叫他到中央去，要求停止回忆录写作和把现有的部分上交。父亲很激动，在那儿大发脾气，大闹了一场。他自己会把情况全讲给你听的，”她接着说，“只是你别太纠缠他。他精神过度紧张了，身体很不舒服。”

我心情沮丧地沿着小路往下走去。父亲坐在小板凳上。阿尔巴特趴在身旁。父亲没有发现我走到跟前来，待我默默地在旁边坐下，他也没有立即转过头来。我们一语不发，父亲显得劳累，面色发灰，更显苍老了。

他转身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吧，妈妈给你讲了吗？”

我点点头。

“一帮坏蛋！我把对他们的看法全都讲了。也许说得过头了，不过没关系；这对他们有好处。要不他们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

我决定把事情搞清楚。

“妈妈其实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说基里连科把你叫去，要求停止回忆录写作。”

“没错。这家伙坏透了！”父亲重复了一句，便开始讲述。

讲着讲着他面部表情活跃起来，目光中透着怒气，看来，他在重新体验着每一句话、每一段对白。

我记得父亲身体很不舒服，便试图把话引开，设法安慰他。但父亲不想离开这个话题。他满腔怒火，把在中央发生的那个令人

愤慨的场面从头至尾向我复述了一遍。后来他又不止一次他讲过那天的事情。

我把那件事的经过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还趁记忆犹新时作过一些笔记。以下就是他的讲述。

基里连科的办公室里除他本人外还有佩尔谢和杰米契夫。基里连科开门见山，连这种情况下通常关于自我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都没有提过。

他说，中央委员会了解到，父亲长期以来一直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中讲到我党和我国历史上的各种大事。实际上他这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明党的历史、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乃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者的事情。因此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

基里连科讲完这番话后，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看来，说出这番话对他说来也相当不易。佩尔谢和杰米契夫一言不发。基里连科曾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共事多年，又在莫斯科与他共事——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中做他的第一副手，深知父亲那一点就着的性格，而且懂得这番话对四年前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说来又是多大的侮辱。显然，他满以为退休者这种新的地位、事无巨细都得叫他们摆布的这种处境，会使父亲变得更随和更好说话。总之，可迫使他就范。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环视面前这几位原先的战友。他回答时起初还平心静气，愈说愈激动。他说，他弄不明白基里连科和那些派基里连科来的人要他做什么。世界上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我国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现象。回忆录不是历史，而是每个人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回忆录可以对历史起补充作用，可以成为我国未来历史学家的好素材。既然如此，他就认为他们所提的要求是同宪法相抵触的对一个苏联人的人身侵犯，并且拒绝接受。

“你们可以动用武力把我送进监狱，或者动用武力没收这些材料。今天你们可以对我采取这一切措施，但是我坚决抗议。”他补充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向您转达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您身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不然的话……”基里连科坚持说。

父亲没让他把话说完。

“你们敢于对我采取的行动，就连沙皇时代的政府也不敢做。我记得只有一件事情与此类似。你们想对我采取的行动同尼古拉一世对塔拉斯·舍甫琴柯一样，流放他去当兵，不准他在那里写书作画。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切——退休金、别墅、住宅。这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不感到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糊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还记得怎么干。要不，就背上包去讨饭。人们会给我施舍的。”

他瞥了基里连科一眼。

“换成您就连面包渣也没人给的。非饿死不行。”

佩尔谢懂得赫鲁晓夫不会再跟基里连科讲话了，便插了进来，他说，政治局的决定人人都必须照办，父亲也不例外。这些回忆录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那就是佩尔谢的错误了。

“那么政治局可以给我派速记员和打字员来嘛，让她们把我口授的东西记录下来。这是正常的工作。她们可以搞两份出来——一份留在中央，一份我口授时用，”父亲说得较为心平气和了。但这时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便恼火地补充说：“还有一件违反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

大家都清楚谈话该结束了——父亲不会自愿交出片言只字的。

临走时父亲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是无法剥夺的。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

的，他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我们苏联的领导人 and 国家有所裨益。愿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成为我们未来生活中的教训吧。

父亲退休后第二次去中央就这样结束了，可惜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次会见使父亲脱离了常轨。他很伤心，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谈话时的情况。父亲把口授丢在一边了，只是偶尔恢复写作。1968年他很少口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里连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父亲又在为那个问题苦恼；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们在远离那些把每句话都记录下来的窃听器的地方散步时，父亲又开始重复道：

“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会罢休的。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敢，等我一闭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我看得清楚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需要真实的历史。”

我一直让他放心，可自己却无法放心。得找到一个可以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重见天日那一天的办法。各种各样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方案都不是绝对可靠。只要专业人员（这种人多是）动手查找，我们那些一知半解的秘密方法就会马上败露。

在同父亲讨论回忆录的命运时，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在国外给手稿找一个可靠的隐蔽处的想法。这时才首次产生了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材料被没收时作为对策必须出版回忆录的念头。出版彻底解决了材料的完好无损问题，而且自然会大大减低没收和销毁材料的愿望。试问，如果书可以在店里随便买到，还有什么必要去查找呢？你又不可能把书全部买光。无论有多少秘密工作经费都不够用，西方可不缺纸。

父亲在中央那次激烈的谈话之后多多少少平静下来了，他又忙开菜园的话，5月将至，应当准备播种了。

与此同是，我摸索了一下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的途径。事情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要简单。然而除技术方面的问题外，也还有道

德方面的问题。当时已不是1958年，但还远非1988年。就在十年以前，把自己手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帕斯捷尔纳克还受到猛烈抨击呢。不久前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进行了审判。父亲不赞成这次审判，但是……还想起了较为久远的事情，想起费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封揭露斯大林制度种种惨状的信。这封信若不是在法国发表，我们当时就对许多情况无从知道。还有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呢？……当初不是也经常在国外发表吗。

然而旧框框也很厉害：如果很快在西方出书，那就是一种敌对的态度。

父亲比我胆大，他认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真理，有警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那一天呢？

我们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实际上就从合法活动转入了“非法活动”。我多少有点不大自在。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逮捕还是流放？不愿去想后果了，需要赶快行动。

许多曾参与此事的人依然健在，因此我现在还不能公布详情细节，还不能指名道姓他说出我们那些自愿提供帮助的人。我只想在此衷心感谢曾经帮助保存和出版我父亲的回忆录的每一个人。

……于是，材料（磁带和打印材料）便穿越几道边界，在保险柜的铁门里找到了可靠的栖身地。

新问题又随之出现。材料放在那里倒是完好无损，但万一我们出事，到

那边去决无可能，材料就会在那边睡大觉，睡上几百年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可口授材料并非留待日后备用的，其中有关于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我们的成绩与错误的思考，材料是供当代人阅读的。这是易腐烂“货物”，不宜长期存放。如果人们现

在，在当前的形势下读到它，其中内容肯定会有所裨益。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我想错了。停滞时期把我们生活中的好几十年勾销掉了。不久前我又把父亲的回忆录读了一遍。裁减军备，减少军队人数——这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不久前在联合国讲到的问题。他的想法同父亲所写的东西是一致的。又如写军工企业转产民用品，这样的方案已经有过，可是在1964年被悄悄地埋葬了。今天农村中的租赁承包制，父亲给它起了个别的名字。至于揭露斯大林主义、住房建设、和平共处、物质利益及其他广为人知的作为赫鲁晓夫内外政策基础的原则，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把自己的担心对父亲说了。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父亲说，“可能不光是你，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接近那个保险柜，最好是跟一家可信赖的出版社事先讲好，让他们出书，但不要赶在一个具体的日期出，要在我们从这里发暗号之后出。”

父亲不作声了。我们缓缓地沿着小路散步。后来他说，我们要作好一切准备。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么悄悄偷走材料，要么没收。不会贸然逮捕。一来时代不同了，二来没那个能耐。他们倒可能想方设法把东西收走。

年底，达成了可在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出版公司出版回忆录的初步协议。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删掉可能使当局大为恼火的文字。这样的地方不多，父亲同意了。

日子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材料愈来愈多。我们工作起来安心了：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书是保住了。

这里我想起一件滑稽的事情。出版社提出怀疑：该不会给它塞了一本伪造的书吧？一切都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出版者担心有人在搞挑衅。出现了如何证实材料的真伪问题。我们不想给他们

写信，因为我们认为败露的危险太大。于是给我们帮忙的人找到了办法。决定请照相机来帮忙。

从维也纳给父亲带了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另一顶为黑色，都带有很大的帽沿。对方要求寄去父亲戴上这两顶帽子的照片，以证明确系出自父亲的手笔，并证明父亲同意出版。我把礼帽带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时，帽子那古里古怪的形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解释说，这是父亲的一位国外崇拜者送来的纪念品。妈妈很吃惊：“难道他以为父亲会戴这两顶帽子吗？”

我们出去散步，只剩下我们两人，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父亲讲了。他大笑不止。这个点子很对他的心思，他喜欢机智敏锐的人，我们散步回来后，他主动加入了游戏。父亲坐到房前的长椅上，大声地对我说：

“喂，把那两顶帽子给我拿来。我想试试。”

妈妈大惊失色：

“难道你打算戴上不成？”

“为什么不戴呢？”父亲逗她。

“太艳了。”妈妈耸耸肩膀。

我把帽子拿来了。同时也把相机带上。

父亲戴上帽子说：

“给我照个相，真想知道是个什么模样？”

他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像。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如今他们明白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不过，尽管作好了一切准备，我却很希望不要采取万不得已的办法——在西方出书。

夏天农活繁忙，实际上占用了全部时间。用于回忆录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再说父亲也不想写。干这种事需要有情绪，有愿望。可现在一想起回忆录就会冒出基里连科那副嘴脸，听到他说的话。既然同父亲的谈话毫无结果，“好心人”们便决定另辟蹊径。

从子女下手，先从阿朱别伊一家开始。

现任《苏联画报》部主任阿朱别伊被叫到某个机关，那里让他离开莫斯科到一家远郊的出版社去任职。阿朱别伊吓坏了，闹得满城风雨：他声称哪儿也不去，并且要马上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威胁意外地奏效了。再也不去纠缠他了。看来，也同他谈了其他问题。反正从那时起，他同父亲的来往更少了。曾几次主动提起回忆录，而且他的意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今他认为写回忆录是无益和无用的事情，并且断言父亲的业绩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无需任何补充说明。父亲避而不答或是用毫无意义的无关痛痒的回答搪塞过去。阿朱别伊还让我劝父亲别再写回忆录了。我没同意，回答说回忆录无论对于历史和父亲本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也未能免遭“劫难”。让我来详细说说吧。

我上面已提到我是在一个从事火箭技术的单位工作。我喜欢那里的工作，也喜欢我的上司——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院士。当时我负责几项设计中的控制系统部分。工作很忙，但我忙里偷闲地一有空就弄父亲的回忆录。总是随身带着一包需要校改的稿子。基里连科与父亲谈话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我说：

“谢尔盖·尼基季奇，这里是仪表制造部人事局。我们接到通知说，您要调到我部的电子控制机械研究所，请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把手续给您办好。”

我简直弄不明白。

“你们好象搞错了吧，我根本没打算调动。”我回答说。

“不知道，不知道。我这儿放着调您的文件，”对方接着说。“不过，这是您的事情。您记下我的电话，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他说了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情况令人感到不快。切洛梅近几年对

我态度大变：一方面尽量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希望外人在设计局里尽量少见到我。他甚至有一次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别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在设计局呆着，别去邻近的单位。”

我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茹拉夫廖夫，切洛梅主管人事的副手。我便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我还正打算找你说说我对你的叛卖行为的想法呢，”茹拉夫廖夫突然说道。“我这儿有一封关于你的商调函。我以为你背着我们把什么全办妥了。

我向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作了汇报，他吩咐我找你谈谈。”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撒谎了。后来我才得知，在上述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个机关的人为我的事情而来，他们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我受了委屈，最好是调任同保密课题无关的工作。假如切洛梅回答说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在设计局里离不开，那么这次谈话就不会引起什么后果了。至少后来知情者是这样对我讲的。

但切洛梅却没有这样做，出现了甩开我的可能性，他同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谈话时总是会冒出我的名字（他们对我和我在哪儿工作都了如指掌）并引起不快。

当时我对这一切都不了解，我对茹拉夫廖夫说，我哪儿也不打算去，甚至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立即上六楼去找切洛梅。他仔细听我把话讲完，并不加以肯定，仿佛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这都怨乌斯季诺夫。他不喜欢你，”他谈起了自己心爱的话题。他恨乌斯季诺夫，乌斯季诺夫也恨他。“这全都是他的事儿。谢尔宾已经来电话问过你什么时候走了。你都想象不到他这个人有多么卑鄙，什么下流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谁——是乌斯季诺夫还是谢尔宾。不过我很了解切洛梅习惯用这种字眼来评价许多与他有来往的人，对他

的话并不怎么在意。

我不知所措，期望得到他的帮助：

“我可怎么办呢？我根本不想调走。”

“你知道吗。”切洛梅沉思着慢声说，“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写一封信。除了他，谁也无能为力。他了解你，而且过去对你一直不错。”

这一忠告无懈可击：切洛梅可以“置身事外”了。万一勃列日涅夫恩准把我留在特种设计局，我的未来就得到了上边的批准，就可以不再替自己担心。就是不留也没话可说了。切洛梅借口部长有急事找他便走了。我沉思默想起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特别是在父亲与基里连科发生冲突之后，我很不愿意；既无济于事，又非常厌恶。我决定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或许会忘掉的。

过了两个星期，茹拉夫廖夫给我来电话说：

“怎么样啊？打算怎么办呢？刚才我接到电话……”

“其实我没采取任何行动……”

“不该这样。给你提供了作出决定的时间。现在该行动了。你得去一趟那个单位。”

我决定来个孤注一掷。

“卢基奇，我要是拒绝，哪儿也不去，你准备怎么办呢？按照法律，辞退我可是没有道理的呀。”

“你是在白浪费时间。咱们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不过我必须执行领导的命令。至于法律嘛那就多了去了。比方说，可以拿不需要做理由或者因为改组的需要裁掉你所在的设计局。那你不就无事可做了吗。我的忠告是：要么接受建议，要么采取措施。时间对你不利。”

指切洛梅。

指勃列日涅夫。

“谢谢你的忠告。你不能让我同给你发指示的人联系一下吗？”

“这个问题我自己不能回答你，我回头再去电话吧。”

半小时后，茹拉夫廖夫向我通报了电话号码和姓名。从头几个数码即可看出，这是克格勃的号码，不是我们部的号码。我同这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对方说话时间较短，他不能向我提供任何新情况。我只是问了问万一所推荐的单位对我不合适可怎么办。我能否再去别的单位。

我还天真地以为我可以调到熟悉的我这个专业的总设计师——皮留金、库兹涅佐夫、佩捷林中某一位的“公司”去呢。

我听到的是，不存在别的方案。如果推荐不合适，他们根本无法帮助。我放下听筒。只有要么服从，要么向最高层反映。

当天切洛梅把我找去了：

“你同列昂尼德·伊里奇联系过吗？”

“还没有。我想尽量不找他帮忙，自己解决，很不想给他写信。”

“没必要。除了他，谁也无能为力。谢尔宾已经给我来了两次电话。我尽量跟他周旋，不过我觉得他很快也会失去耐心的。”

无路可走，于是晚上我写了一封致总书记的短信，说明事实，并请求把我留在原工作单位，我作为专家，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我打听清楚电话号码后，给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去电话，我不大分得清他几位助手的职责范围，也不知道这位是主管国际事务的。

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接的电话，他仔细听完我讲的话后，建议在我认为方便的时候去一趟。讲好了第二天上午见面。我受到特别客气的接待。亚历山德罗夫说他将尽快向“主人”汇报，估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您过两天来个电话，”末了他给人以希望地说道。

我有些安心了。说真的，我没想到办事这么干脆利落。我想，既然勃列日涅夫过去对我们的业务管得较多，显然他对我们这个设计院和我也很了解。大概一切都会顺利地得到解决吧。

我“过分热心地”忘记了父亲与基里连科的谈话，忘记了1964年后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

两天以后，亚历山德罗夫吞吞吐吐地打电话对我说，他把我那封短信作了汇报，但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深究问题的实质，而是说：“这是乌斯季诺夫的事。让他去处理吧。”

“您给季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去电话吧，这是他助手的电话号码，”亚历山德罗夫最后说。

我没有给乌斯季诺夫去电话。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回答就是明确和轻慢的拒绝。对于我们单位，自然也有我同乌斯季诺夫之间关系不怎么好这个情况，勃列日涅夫心里一清二楚。

我把这一切都对切洛梅讲了，又听完他那如今看来并不完全真诚的同情话后，我拨了人们向我口授的我今后即将任职的单位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纳乌莫夫的电话号码。

秘书马上就把电话接通了。纳乌莫夫在听了我那番语无伦次的解释后友好地说，他全都知道了，而且他也听说了我的许多情况，然后他表示相信我

会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干的。他建议我去一趟。两个小时后我驱车来到自己未来的住地。我穿过前厅来到一个不大的院落，这里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中学式的五层楼房。看惯了我们特别设计局那宽阔的地盘和许多座多层楼房，这个单位就显得寒碜了。

走过存衣处，我来到二楼。一位体态丰满、浅色头发的女秘书亲切地微笑着说：

“是谢尔盖·尼基季奇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正等着您呢。进去吧。”

办公室里一位身躯高大、仿佛全身都在微笑的人迎接了我。他一副温厚善良的样子。

我开始讲述，想尽量说简短一些。

“等一等，”他打断我的话说，“如果可以的话，请讲详细一些。我听了关于您的活动的许多情况。”

“柳波奇卡，上茶，谁的电话也别接过来。不管是谁，”他通过传话装置向女秘书发命令。

我们喝着茶，谈了两个来小时。我讲自己，讲切洛梅，讲了一些工作情况。能讲的都讲了，纳乌莫夫聚精会神，客客气气。他提出问题，进一步弄清情况——看来，他对这一切都特别感兴趣。纳乌莫夫建议我考虑考虑：他打算让我自己挑个部门，担任处长职务。

“我接到了这样的指示，”他进一步明确道。

决定两天后见面。于是我就开始了在电子控制机械研究所的工作。由于性格和环境的关系，我逐渐重又置身于局势演变的中心。可喜的是一年之后，从特种设计局调了我的几名同事到我这个部门，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战斗的集体。至今我们仍在一起共事。

所有这些极不寻常的事件使我无法脱身去帮助父亲写回忆录了，不过1968年夏天他也不大出活。秋天到了，父亲又开始口授。工作进展缓慢，他失去了节奏，把原来想好的也忘了。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最初拟订的提纲。选好一周的题目，到下个星期天再来归纳总结。

起初父亲老生气，对我提出的问题都用他那惯常的“别缠人！”来作答。但他逐渐又陶醉其中，工作活跃起来，也不需要我那些惹人厌烦的提问了。

1969年在宁静的气氛中来临。“上面”没有想起我们。父亲对基里连科的反击奏效了，看来决定不再沾父亲的边了。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写回忆录，菜园，散步，照相，又是回忆录，电视，看书。就这样日复一日。春天，父亲也干得跟前年刚开始

写回忆录时一样地紧张。

我们多少安心一些了，但后来的情况说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父亲的回忆录仍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这一切都在下一个年度充分表现出来了。

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表面上看同本篇叙述的题目毫无关系，但由于一系列情况。它忽然牵连到回忆录的写作，并对我们今后的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我妹妹列娜从小身患重病。她年幼时从南方回来即患上系统狼疮——一种严重的、现代医学尚不了解的不治之症。

妈妈和父亲为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无论请教科学界的巨擘还是求助于民间医术都毫无结果——病情日益加剧。

60年代后期，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列娜不能工作，行走困难。不过勇气

和乐观精神使她还能在别墅里侍弄蜜蜂和花草。夏天病情再次加重后，列娜住进医院。疾病进入了一个严峻的新阶段——她双手痉挛，不能走路。情况十分严重。莫斯科所有的名医，包括塔列耶夫院士、斯莫林斯基教授、纳索诺夫教授，早就给妹妹诊治过，但未见好转。他们已无能为力。

廖瓦·波得罗夫（我外甥女的丈夫）当了几年苏联新闻社驻加拿大的记者，对西方医学确信无疑，他建议到国外去作化验：说不定那边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诊治方法呢。治疗的医生对此想法持怀疑态度，但并未提出异议。他们知道：已无治愈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会给亲人以充分的自由。问题是怎样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这时机会来了。

那时我见到自己的好友沃洛佳·巴拉波什金和列瓦兹·加姆克列利泽，谈话中我为出现的问题而抱怨。列瓦兹略一思索后提出：

“我看有办法。美国数学家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我去跟他们说说，也许他们里面会有人愿意承担到美国一家医院作化验的任务。”

尽管我根本不想同外国人发生关系，尽管我宁可让自己人接受这个使命，但已不容我选择了。几天后，加姆克列利泽在自己家中接待了美国客人。我也应邀参加。我在那里认识了斯通博士。“这个人可以帮助你。”列瓦兹说。

我们谈得很投机。原来斯通同已故肯尼迪总统关系很好，他对父亲印象不错。列瓦兹已经给他讲了我的问题，他不但愿意承担化验的麻烦，而且主动表示要找到一位医生、胶原病专家，还要试试把医生请到莫斯科来。胶原病是我妹妹所患疾病的学名。临行前，斯通博士带走了化验用样品，并答应很快来电话。

过了两个星期，他来电话说美国这方面的一位著名专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眼下正在欧洲。斯通同他讲好了一俟办妥旅游签证他就顺道来莫斯科。问题必须很快解决，不要超出一两天的时间。美国医生的欧洲之行已近尾声。他本应从维也纳回国。

老实说，在这次电话之前我并没有认真对待关于外国医生来访的谈话，这同苏联公民习以为常的认识格格不入，而且这则消息对我说来有如晴天霹雳。第一个反映是表示感谢和婉言谢绝，但我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便下了决心……

然而我处在这样的地位又怎么去张罗签证呢？而且只有两天时间。正确的主意突然出现——应当通过“上头”去办。唯一可以帮忙的人是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我并不怀疑他为人正直，不过也没有忽略掉此人极端地小心谨慎。

我们同住在一座大楼里，这也是增加见面机会的相当重要的情况。晚上我鼓起勇气，打电话到他家，请他允许我为一件要事登门拜访。

当然，我的电话使他感到诧异，而且关于见面的要求未必会使他高兴，不过表面上丝毫没有外露。他平静而好心地（仿佛这些年我们曾多次交谈过）让我现在就去。我下楼到了他们在的楼

层。葛罗米柯在他那套宽大住房的前厅里接待了我。屋里还有他的妻子，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

我简要他讲明事情的原委，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很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也知道妹妹的病情。他对我的要求持积极态度，用他那“0”音很重的低沉嗓

音说：

“可以，这是人道主义的事情。我尽量帮忙。明天给我来个电话。”

莉季娅·德米待里耶芙娜经常保护他，使他免遭可能的不快，她插了一句：

“安德留沙，这个问题你自己可决定不了。这需要取得同意。”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并不退缩，又重复说：

“明天给我来个电话。”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什么问题要取得谁的同意。

接见结束了。

第二天我往外交部给他打电话。我对葛罗米柯、对他做人的优秀品质没有看错——我去电话前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一封关于向美国教授发放签证的电报已发往维也纳。

但事情半途而废。那位医生看来是害怕到人地生疏的莫斯科来。反正他拒绝领取签证，从维也纳直接回国了。这一切都有人向葛罗米柯作了汇报，我去电话表示感谢时，他说如果今后这件事情上需要帮助的话，他很乐意帮忙。

事后人们对我说，葛罗米柯曾主动给驻美大使阿·费·多勃雷宁发去电报，请他必要时在给美国医生发放签证问题上给以协助。他所做的比我们要求的多得多。

我给身在美国的斯通去电话，讲了这段事情。他没有灰心。保证说会找到新的办法。

“我去过贵国大使馆，那里答应给予优待。这是主要的。”他最后说。

我们当时不知道葛罗米柯去过电报。几天后斯通又来电话；要找的医生找到了。此人经验和学识都很丰富。曾长期担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私人医生。而且他是世界上胶原病方面最著名的临床学家。他愿到苏联。同妻子一起来。他岳母刚去世，妻子很悲痛，他们很高兴换个环境。

“签证问题解决了。我国大使馆告诉我可以顺利地发给签证。你得支付往返路费和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费用，算是给他的酬金，你还得负责给他安排文化方面的游览。”斯通最后说。

我欣然同意。问题解决了。手续很快办妥，10月底我便在舍列梅捷沃机场接到个头不高、身材瘦小的哈维和他的夫人。莫斯科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他们下榻在民族饭店。

不料会诊出现了麻烦——塔列耶夫和斯莫林斯基躲着不同美国人见面，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们说通。哈维教授经过仔细检查和对所有的（我国的和美国的）结果进行鉴定后，得出了同苏联医生一样的结论。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明显地有了改善。

美国专家多少使我们受到一点鼓舞，他认为情况没有预料的那么严重。病情还可以控制住，而且可以活到高龄。遗憾的是这种病无法治愈，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都治不了。

列娜没有活到高龄。她四年后去世了，至于教授是弄错了，还是遵照医德有意安慰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

第一次会诊后决定再作一批化验，待化验结果出来后再行会诊。哈维要求再把妹妹的血样送往他在美国的实验室——那里可以利用最现代化的仪

器，也许会得出新的结果。不过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可望得到新的结果。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

无庸讳言，我有些感到失望和沮丧——费尽周折，作了惊人的努力，却没有出现奇迹。教授只是证实了我们原来听到的结论。

文化游览倒是很顺利。客人已去过剧院、博物馆、会议宫、兵器馆，到列宁格勒玩了一两天。通过教区办公室安排了一次游览扎戈尔斯克的活动，在那里参观了珍宝，并出席了隆重的晚宴。

国际旅行社给他们派去的女译员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是何许人也。我和列娜的丈夫维佳尽量做到不让客人单独外出。女译员尤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经常把客人带到某个地方去。我们那是去会诊，看来，这些出行让她感到可疑。

哈维夫妇在莫斯科的逗留已近尾声，父亲按照礼节邀请他们去作客。我同维佳商量后（这事我们没有问过父亲）决定不让女译员去别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只是不想把外人往家里带罢了。

当天早晨去饭店时，我们对女译员说，我们要把客人带出去玩一整天，她可以自便了。她很不高兴，但我们没有在意。按原计划先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参观了宫殿。我们在当地饭馆里吃了午饭。这时我们才告诉哈维夫妇，赫鲁晓夫的别墅离此不远，要是他们不反对的话，他想见见他们。客人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感谢。

父亲专为客人光临换上了西装。我们许久没有见他这样打扮过了，他平常都穿便服。他亲切地接待了客人。看来，哈维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很高兴在自己家里接待这位美国医生。妈妈请大家入座：为客人的光临作了准备。这点我们没有估计到，于是只好再吃一次午饭了。

席间话题不仅涉及医疗业务。父亲首先感谢哈维同意来莫斯科会诊。然后照例谈到俄罗斯的冬天。外面铺着厚厚的一层积雪。不出所料，接下来谈话就转到苏美关系。父亲回忆起自己的美国之行。他热情地赞扬这个国家及该国的人民。讲述了同艾森豪威

尔总统的会见。谈话无拘无束。值此隆重的场合父亲居然同客人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喝了一杯白兰地酒。

父亲有两个心爱的高脚酒杯；一个又高又宽，能盛 15 毫升酒。我早在基辅时就记得它，另一个大而阔气。他喜欢夸耀这第二个酒杯，就象夸耀德国产的带把手茶杯一样。酒杯里填满了玻璃，只在上面留出几毫米的地方供盛酒用。从远处看，酒杯里象是斟满了酒。这个酒杯是美国大使简·汤普森的夫人有一次来别墅作客送给他的，他说，赫鲁晓夫先生经常要出席宴会，遇到不得不频频举杯时，这个酒杯很方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段故事，并让大家观看这个酒杯。这次也不例外。

午饭后大家来到门廊上，天色向晚了，哈维想利用落日余晖拍照留念。我们就餐时也照过相。

自然，谈话中只字未提回忆录的事情。哈维根本不知有回忆录、父亲则不会想到这个话题。我们回到饭店时天色已黑。客人对在前任总理家受到的接待特别满意，让我们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

扎戈尔斯克市位于莫斯科州境内。在市内谢尔吉圣三大修道院中有艺术品保护区，并有 15—18 世纪建筑古迹。

我们万万想不到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哈维在苏联过得很开心。太太恢复了常态，心情愉快了。11月7日节日将至。从一开始我就劝他们多呆两天，看看节日庆典，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把行期从11月6日移到8日。民航没费什么周折就把机票改签了。

客人6日启程一事是尽人皆知的。行期变更则无人觉察。谁会对早一天晚一天走感兴趣呢？实际上后来才知道，这两天注定要起特殊的作用。

没有给哈维夫妇搞到进红场的票，不过我对他们进行了安慰；民族饭店的窗户就朝着高尔基大街，我们不出房门几乎什么都能看到。我准备弄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活动了。当时决非每个包房都配有电视机的。

节日那天到饭店必须早早地赶在七点以前去，晚了没有通行证就过不去。我带了好多东西：除电视机外还有两个俄式茶炊，是我们送给哈维夫妇和斯通做纪念的。赶上过节大家都在家里呆着，维佳也挺忙。一位朋友主动来给我帮忙。临走时我又拿了一本书，万一客人正睡觉我可以在大厅里看看书。

哈维夫妇已经在等着我们。大家喝过咖啡就欣赏起茶炊来了，但这时值班员来通知说，检阅时不能呆在房间里。必须离开饭店到外面去。她没有说明理由，不过我们并未特别沮丧：节日里都情绪极佳。大家来到饭店的门廊上去看阅兵式。在寒冷的空气中站了很久。个个都冻坏了。阅兵式结束后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哈维夫妇十分满意，他们兴致勃勃地相互交换观感，开着玩笑。哈维先生讲述着自己的观感，预感到把很有意思的来自俄国的照片向自己国内的朋友展示时的欢乐。为了暖暖身子，我们定了一小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几碟小菜，让服务员送到房间。电视打开了。舒适而宁静。很快哈维就要同自己的病人见最后一面并提出最后的医嘱了。晚上我们的客人打算去大剧院看戏，明天就启程回国了。

“统统留在原地别动！！！我们掌握了你们从事有损苏维埃国家的活动的情报！不许动！！！”我们听到粗暴的吆喝声。

几条汉子冲进房门大大敞开的室内。陪同他们的是一位女负责人。

为首的那位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工作证，他叫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他态度稍微平静一点地重复道：

“由于你们的反国家活动，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搜查。出示证件，留在原地别动。”

没有出示搜查证。我忘记了这个必要的手续，哈维夫妇则根本不知道我们都有些什么规矩。关于苏俄制度的最阴暗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大概此时此刻他们都后悔不该同意来此旅行吧。

教授比其他人都清醒得早一些，他很有礼貌但是态度坚决地要求让他同美国使馆取得联系。他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

让我们面壁而立，挨个搜身。从衣袋里掏出所有的私人物品，并细心察看。然后开始对饭店的那间客房和我们客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搜查。

我清醒过来后，问他们究竟找什么。拉斯卡佐夫没有作答。

他们翻寻了床铺、手提箱、搜遍了所有的橱柜，仔细察看马桶，又把我带去的书翻阅了一遍。甚至对电视机也发生了兴趣，想把它拆开。我不肯干，

他们自己又下不了手，只好透过机体上的栅栏仔细看了看里面就算完事。不速之客的决心稍稍减弱了一些，在马桶里搜寻的那位恶狠狠地说：“没有，什么也没有。来晚了一步。东西已经转移了。”

电话铃响了——这可能同大剧院的戏票有关，要不就是妈妈打来的，哈维很快就要同她见面。“不许动，不许接电话。”拉斯卡佐夫大声呵叱道。他本人也不去接。

这时我的朋友活跃起来了：“你们该不是找这玩艺儿吧？”他指指门上锁孔里翘着的一张什么纸。

拉斯卡佐夫凶神恶煞地瞪了他一眼。“我又不知道你们要找什么。我是想给你们帮帮忙。”我的朋友辩解道。

拉斯卡佐夫终于屈尊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在从事间谍活动。”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说。

最有趣的是我居然相信了！……没有完全相信，但是相信了搜查一无所获，只有哈维博士十分珍贵的照相底片可以凑数。

我们的“客人”简直感到自己很不自在了，说话的口气也大变。拉斯卡佐夫表示抱歉。说他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然后请大家坐到桌旁，他开始写什么东西。原来这是张简短的字据，其中提到我们，某某人某某人，对国家安全机关所进行的搜查没有任何意见。

我和我的朋友被刚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我们对于一切都“圆满地”结束觉得幸运，便点头应允。美国人也在我们之后不大情愿地表示同意。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游戏规则。

拉斯卡佐夫让我亲手把字据抄写一遍。我机械地照办了。每个人都签了字。“客人们”走了。拉斯卡佐夫把我拉到走廊里。

“您是明白的，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人很危险。”他重复道。

我点点头。

“底片上要是没有不准拍摄的镜头，我们明天上午就把冲好的底片送来，我过两天给您去电话，”他的口气又坚决起来。“请您千万不要把他们请到家里去。再见。”

我回到客房。我的朋友匆匆告辞了。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不知道我们当中谁最觉得扫兴。我开始安慰哈维夫妇，胡诌些什么人人都可能弄错之类的话。特工机关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不过也可能搞错。

看来，我的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再说表情也欠佳。哈维又反过来安慰我说：

“赫鲁晓夫先生，我在秘鲁工作过几年。我看那里的情况比这儿还糟。您别难受。我明白，您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向您担保，我回国后不会向新闻界透露任何消息。”

我确实不想声张出去，便表示感激地微微一笑。我们渐渐平静下来了，但哈维在房间里呆不下去。

“我一挨到这些东西就厌烦。咱们离开这儿吧。还有您母亲和妹妹……她们要到这里来，这真是太可怕了。把谈话改在您家里

进行吧。”他央求道。

我记着拉斯卡佐夫临走前所说的“千万不要……”。我无论如何不敢违反，因此便支支吾吾地说：

“我家里没有收拾好，妈妈也准备到这儿来。还是照原定计划吧。”

他全明白了，只是眼睛露出忧伤的笑意。

妈妈抵达前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同妈妈和列娜的最后一次谈话草草地结束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脑子里老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提到“客人”。我过后也没有讲过此事，我不想让亲人感到不安，不愉快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父亲、母亲、妹妹都已先后谢世，他们至死也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情。

临别前哈维提醒说，最好在他的实验室里再化验一次血样，并让我托便人把血样捎去。

次日早晨我同维佳去送客人。底片照拉斯卡佐夫的允诺早上就归还哈维了，全都冲洗好了，只坏了一张。会精打细算又刻板的维佳仔仔细细地把茶炊捆好，使之经得起长途旅行的颠簸。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到了海关，哈维的手提箱翻了个底儿朝天。开始在大厅里整治他们，后来又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要搜查吧。在舍列梅季耶沃老机场，透过把大厅隔开的栅栏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检查程序。茶炊退给我们了，说是没有文化部的证明书不能放行。必须具有茶炊并非艺术珍品的结论。

备受折腾、疲惫不堪的哈维夫妇终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同我们挥手告别就去上机了。对他们说来“俄罗斯奇遇记”结束了。如今他们在家里可以添油加醋地向友人描述这一切，把南美的警察作风同俄国的警察作风相提并论。而我们还有未了的事情。必须找到给哈维带血样去化验的办法。

起初一切都显得简单。11月初尤利·沃龙佐夫要飞华盛顿，他过去是谢尔戈·米高扬的同学，如今则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副手。我同他有些认识。沃龙佐夫欣然同意满足我的请求。况且他曾参与安排哈维的莫斯科之行。

不料又出现了麻烦。沃龙佐夫的夫人法因娜在启程前一天惊惶而吃惊地对我说：

“真是破天荒了！专门把我们集中到外交部，提出警告：谁也不许往美国带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准为第三者带东西的规定久已有之，但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法因娜不同，问题出在哪儿，我马上就明白了：是拉斯卡佐夫他们那个机关设置了新的障碍。所指的并不是第三者的东西，而具体就是我的东西，因为化验血也许只是个借口，而那里……

我终究还是说服了沃龙佐夫夫妇。他们带走了盛有血样的暖瓶，暖瓶送到了指定地点。

几天之后我同哈维通了电话。他说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化验结果他已通过邮局寄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化验结果我当然没有收到。看来，它们是保存在为我而设的专案文件中了。

12月底，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见面。他再次提醒我，斯通和哈维都是老牌间谍。我如果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应立即向他汇报，他特地留下了电话号码。

所谓狡猾的赫鲁晓夫欺骗了所有的人，利用列娜的病和身边人员的轻信来达到把回忆录送到国外去的目的这一说法，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过。当时曾传播了其余波至今犹存的如下流言：哈维曾漫天要价，

硬要父亲给他回忆录作为此次治疗的报酬，不错，西方（和东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包括了哈维返国以后那个时期的口授材料，但这一情况却原来是可以不加考

虑的。

11月发生的事情不仅给我们，而且也给帮助邀请哈维的人以及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都带来了许多不快。加姆克列利泽院士不让出国了，斯通也不准来苏联。这些禁令直到前不久才取消，我怀着欣慰的心情在报纸上看到，应邀出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招待会的美国学者中，也有斯通博士。时代不同了，他不再被当成“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

我还得知，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那些曾帮助办理哈维的入境签证的完全无辜的人们也曾身受其害。我想，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也受到了连累。邀请医生可是他一手批准的啊。我始终没有机会向他说明情况。这使我十分难过。

我那些当时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熟人都被辞退，尽管他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斯通和哈维这两个人。诚然，他们到其他机关去都安排了不错的工作。

我想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向所有这些人深表歉意。

茶炊始终未能交到收件人手里。维佳久久无法搞到证明，他处处受到刁难，人们象踢皮球似地让他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在一次同拉斯卡佐夫谈话时我稍微提了一下往美国寄送茶炊和维佳的漂泊历险故事。他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他脸一沉，恶狠狠地说：“你们者惦记着这些茶炊。你们那么起劲给美国佬寄这玩艺儿干吗？”

可见，他们仍然认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茶炊。茶炊是到不了美国了。我们的这些庇护人究竟怕什么，我猜不透。也许他们怀疑里面放着缩微胶卷吧……。

……1969年，回忆录已是摸得到见得着的东西了。这已经不是零零碎碎的纸页或者章节。我们手里有经我加工近1000页手稿，时间跨度为从30年代初到斯大林去世和逮捕贝利亚。并附有对父亲生平中某些片段的描述，如加勒比海危机，苏共二十七次，

日内瓦会谈，关于总参谋部，战争回忆录，同中国关系的思考，等等。这一切都装在几个文件袋里。

1969年夏天父亲读了这些材料，说了他的意见。他远非处处满意，尤其是文学方面不大满意。

我决定找个能承担文学加工任务的专业作家。工作量很大，决不是每个作家都愿意承担此事。再说父亲也不是那样的人物：跟他一起工作，当时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同著名的电影编剧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特鲁宁要好，有一天我向他讲起面临的困难。他提出承担文学加工的任务，他说，尽管这是一项大工程，而且此类工作报酬很高，但他分文不取。办法找到了。我把我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给了瓦季姆。他看完后，向我要原稿。我给了。瓦季姆把我的编辑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他说，全得推倒重来。

我有些感到委屈，我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啊，不过我明白，难以同专业作家竞争。特鲁宁开始工作了。我也没有丢下自己的那份活，继续修改洛拉送来的稿子。

我把同特鲁宁协商的结果对父亲讲了，他有点担心：

“你敢肯定他不是间谍？可别叫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

我保证说，我早就认识瓦季姆，他是个正直可靠的人，我的好朋友，对父亲有好感。父亲放心了，他相信我。

顺便说说，当时我没有对我们的工作保密，我认为既然当局从窃听中知道父亲在口授，那就无需保守秘密了。我同当时经常交换稿子的洛拉定期通话，讨论工作上的所有问题。

在新的 1970 年，父亲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看来他已经被遗忘了。除其他习以为常的事情外，他继续口授。诚然，他的健康状况有些恶化：他明显地衰弱了。定期为父亲检查身体的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警告我们说，父亲的血

管严重硬化。

“这样还能活许多年，”他说了一句标准的安慰话，接下来通常是严厉的警告，“也可能随时死亡。医学在这里无能为力。”

父亲对疾病不大注意，他尽量不去理睬它。春天一到，他就开始了春季的忙碌：计划从别墅往下边的草地铺水管，以解决菜园的灌溉问题。他同干其他事情一样，专心致志地开始了这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整天搬水管，往水管上绑麻丝、涂漆，把水管拧紧。工作给他带来了乐趣。他象往常一样地开玩笑说：“我的钳工手艺用上了。你们就不会。你们都学了些什么啊？”

天气转暖后，回忆录的写作几乎完全撂下了。

5月29日天气象7月一样酷热。干活很艰苦，但是到了除草和翻地的时候。父亲扛着锄头前往菜园，在那儿忙乎到中午。他回到家，没吃午饭，抱怨说身体不舒服，心区疼痛。他在屋里走了走，希望疼痛会止住。却没有止住。把医生叫来了。别祖比克确诊为极其严重的心肌梗塞。父亲被立即送往位于格拉诺夫斯科耶大街的医院。开始了心神不定的等待的提心吊胆的日子。

别祖比克解释说，父亲必须长期住院，得住几个月，但头十天最危险，什么都可能发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我们正竭尽全力，”最后他以这句套话作结。尽管他说的是老一套，他的话却对我起了安慰作用。他利用自己的医院主任医师的权力给我开了个出入证，我每天任何时候都可自由出入。只不过他警告我说，不能让父亲激动。激动会对病情产生不良影响。

我每天都去看望父亲，有时白天去，有时晚上去，在他那儿呆上一两个钟头。天气炎热，但病房里凉爽宜人——开着空调器。早在30年代初为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修建的旧楼不久前搞了一次大装修。

父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不准他看书，他便沉思默想。我试图让他开心，给他讲家里的各种新闻，讲回忆录工作进展情况，讲

我做什么，特鲁宁又做什么。

床边放着一台仪器，导线通到病人身上，荧光屏上不断描绘出曲折的心电图绿线。病房里老有一名护士值班，病人情况严重，只有我来探望时，她才出去一小会儿。

父亲不喜欢他所说的白白打发光阴。他把我的探望也算在此列。他开始假装生气：

“你往这儿跑什么？你是没事可干了吗？白浪费时间，还影响我。我在这儿老是挺忙：一会儿输液，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医生查房，一会儿量体温。

就没有时间感到无聊了。”

不过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我的探视让他高兴。当然，妈妈和姐姐妹妹都来看过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病人开始康复。不再提死亡的事了。我牢记着别祖比克关于千万别让父亲激动的话，因此我同他的谈话充满了乐观主义。

与此同时，事态又开始严峻起来。看来，开始了一个缉查回忆录的新阶段，也许这一缉查打从哈维夫妇来访后就从未中断过。

第一批警告是春天出现的，当时父亲还很健康。起初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怎么认真。一切都象是一部蹩脚的电影。至于并非平安无事，我是4月底才得知的。

我们这个处里有个叫沃洛佳·利西奇金的年轻人，他招人喜欢，老是笑嘻嘻的。他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跑进我们房间。沃洛佳显得特别慌张。他把我拉到角落里，用神秘的耳语声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吗，有人在盯你的梢！！！”

我不相信。尽管前面发生的事情本该使我学会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吃惊的，这样的事情却还是想不到。对间谍、刑事犯盯梢，那是因为他们逃避法律的惩罚。可干吗盯我的梢呢？

回忆录？肯定是的！

沃洛佳接着说：

“你一小时以前在列宁大街上走车，就是在大街尽头的地方，是吧？”

“对啊。”

“你瞧。我坐出租车匆匆忙忙往编辑部赶，要拿走打字的手稿。司机正好很健谈。他说：‘你想看看对汽车是怎么盯梢的吗？这两辆‘伏尔加’正盯着那辆汽车呢。’我一看就惊呆了：那是你的车号。我们在后面跟着，我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一辆车在超你的车，一辆车落在后面。后来他们交换了位置。他们是在缉查回忆录吧？”他以其特有的好奇心问道。

单位上人人都知道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改父亲的稿子上面了。利西奇金的问题中没有任何造反的成分。我没有回答，只是感谢他的提醒。

若不是利西奇金，我就根本不会想到去注意大街上我周围那些挤来挤去的汽车。一切都会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诚然，我知道了此事后情况毫无变化，没必要躲躲藏藏，谁也不打算逃跑。我决定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必向我的跟踪者说明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这是谁呢，肯定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所为。

我决定拿盯梢来寻开心。我让好奇心控制住了。老实说，我对所通报的事情有一种小孩的心理。我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对于如何搞盯梢觉得挺有意思。我能马上发现吗？怎么从车流中分辨出跟踪者呢？

脑子里全是侦探片里的那些情节。眼前浮现出特别卖座的影片《死亡季节》中那个勇敢无畏、有点滑稽，从不张皇失措的巴尼奥尼斯及其跟踪者。我就是这样去“追捕”的。

我驱车在列宁大街上行驶，开得很慢，再慢一点，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有了！一辆伸出两根天线的灰色“伏尔加”跟

在我后面，我的车速跟乌龟爬行差不多，所有的汽车都超过去了，它却象粘住了似地在后面慢慢行驶。它终于按捺不住，也超过去了。我记下它的车号。我把车停在路边，后面一辆伸出两根天线的蓝色“伏尔加”不慌不忙

地拐进胡同。一分钟后我启动了。我几乎不朝前看，只是通过后视镜看后面，果然不错。那辆熟悉的“伏尔加”从胡同里爬了出来。

我仍然把这一切都当成儿戏，我开始开慢车，老在找“它”何时出现。我多半都能认出跟踪者，不过也往往有同时怀疑几辆车的时候。

还有换装的花招。5月份有一天我去莫斯科军事工学院上课（我至今已在该校授课25年了）。后面有一辆可疑的“伏尔加”。我仔细一看：一个男人驾车，旁边是个身着短衫、头发梳得又光又平的姑娘。是他们吗？我甩开这辆车，往左一拐，沿着医院桥穿越亚乌泽河，停在一所学校旁边的汽车停车场上。我下车等着。一个人没有。突然那辆熟悉的车疾驶而过。驾车的仍是那个姑娘，只不过身着高领绒线衫，长发披肩。小伙子坐在旁边。我认出了姑娘——就是他们！我在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就去上课了。

我决定暂且什么也不对父亲讲，不想让他激动。他无法对事件施加影响，而中断回忆录写作又并非明智之举。况且那样一来就说明我们害怕了。

事情层出不穷。看来在单位上已进行过搜查。我发现写字台抽屉里一卷在别墅拍好的柯达彩色胶卷不翼而飞。我国当时没有人冲洗这种胶卷，它已经在抽屉里放了将近一年。我决定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我沉着地关上抽屉，没有声张，也许我的邻座就有知情者。这是完全可能的。

忽然管理处下了指示——马上检查并汇报打字员上班时是否在打外稿。看来，是决定在研究所内假他人之手进行检查，以免泄密，却没有估计到这项工作在我们处要通过处长，也就是通

过我来进行。

我问心无愧地报告说：

“没有打外稿。我进行过必要的教育工作。”

我们的打字员确实没打任何外稿。一位我很熟悉的专职打字员讲了她周围开始出现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前两天她忘了什么东西中途回家，见楼门口有一些陌生人在忙活。这些人发现她后就匆匆爬到上面一层去。开始按上面那家的门铃。我安慰她说：不必害怕，这是你自己神经过敏。

我自己是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在检查，想查明家里有没有回忆录。回忆录不在那里……

心情一天比一天糟糕。暂且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可他们很会找。查我们这件事甚至不需要特殊的职业技能。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洛拉那里去。他们如此不厌其烦地要寻找的东西，恰好就在她那里放着。洛拉当时生病住进了医院。她在医院里当然不打字了。七月底我打算去看望她，顺便把所发生的事情给她打个招呼。

当天陪伴我的是一辆浅蓝色“伏尔加”。我发现它停在医院的围墙旁边。车上的人没有下来。我同洛拉在这幢古色古香的建筑周围的公园里散步。我向她介绍了所发生的事情，尽量不吓着她。未了我把停在墙外的汽车也指给她看了。

“这辆车我认识，”洛拉突然打断我的话说。“我已经在这儿看见过它。两天前我们正在打乒乓球。周围全是自己人。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一名又高又瘦的男人，他身穿灰色胶布雨衣，头戴宽边大礼帽。他有点古里古怪，简直就是电影里的侦探。他在这儿转悠了一阵，不知为什么老看着我们，后来就很快溜掉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这号人。当时我丢下球拍跑到围墙旁边，我一看，这个戴礼帽、穿雨衣的人物就坐在一辆浅蓝色‘伏尔加’里。他马

上开车走了。不错，就是这辆车。”洛拉吓得不得了。

我决定安慰她：

“没什么可怕的，来个一次两次就不会再来了。我们又没有干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他们要是想弄清谁在打回忆录就由他们去吧。这方面没有什么秘密。他们要是不搞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侦探片，直截了当地问我，那我就如实回答。有什么要隐瞒的呢？”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自己也并不象表面上尽量装出的那样沉得住气。看来是在酝酿着什么行动。可究竟想干什么呢？有一点很清楚：他们已经知道洛拉的事情了。

就在我看望洛拉的几天之后，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再次给我来电话。他很客气地要求见面，说是有些细节要弄清楚，我一点不反对，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我们这里并不方便，”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指的是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大楼。“要是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在莫斯科饭店恭候。”

他说了楼层和房号。以这种方式见面我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好奇，还有点害怕。我登上那层楼，服务员给我指明应进哪道门。这间客房与我在这个饭店里看到的其他房间并无二致：一间卧室带一间客厅。

除拉斯卡佐夫而外还有一个人。他自我介绍说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说话中他仔细注意着我的每个动作。问题原来都是日常性质的。看来，他俩对答案兴趣不大。我没有全都记住，不过我觉得有些话值得注意。

“您那儿有斯通和哈维的新消息吗？您同哈维还在保持联系吧？”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开始问道。

我一点也不打算隐瞒。

“斯通那边没有消息。我想，他除了我就已经够忙的了。至于哈维嘛，我同他在莫斯科约好了寄妹妹的血样去化验。我曾经设法跟他通话，可几乎什么也听不见，只听清了要把化验结果邮寄过来。可是我什么回音也没有得到。我们很为这件事情着急。它

关系到列娜的健康。”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表示了一番同情，却没有要提供帮助的意思。

“谢尔盖·尼基季奇，”他的同僚突然问道，“请问您认识一个叫阿尔米塔日的人吗？他没有同您见过面？”

“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倒是碰见过，当然我不能说这就是您所感兴趣的那个人。11年前我陪父亲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的代表阿尔米塔日陪我一起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那里有个蝴蝶收藏家，我很想见见。蝴蝶是我的嗜好，”我解释说。“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感到吃惊。现在提这个干吗？应当说，关于阿尔米塔日的问题后来也有人向我提过。我真不知道，他们因为我的关系怎么会对阿尔米塔日这样感兴趣。即使他是特工机关的人，这里也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他同我的交往仅仅限于外交礼仪的范围以内。诚然，过去只要有这层“关系”就绰绰有余了。不管怎么说，我自1959年以后再没有遇见过阿尔米塔日。

“他眼下在莫斯科，在大使馆里工作，”我的谈话对方接着说。“跟斯通一样的老牌特工。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里挺卖力的间谍。万一他找到你，就马上向我们报告。”

我同意了。

“那些记者对您感兴趣吗？”拉斯卡佐夫问道。

“不感兴趣。”

“他们要是对您感兴趣，就向我们报告。”

“好吧。”

实际上这就是全部谈话内容。

直到分手时才把主要问题提了出来，仿佛是捎带着顺便提出的。

“对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叶

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问道，他的同伴紧紧盯着我。

“谢谢，没什么。现在他生病住院，所以谈不上写作。”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将近两个星期过去了。1970年7月11日，星期六，我同妻子正打算去作客，已是傍晚时分，电话铃响了起来。

“谢尔盖·尼基季奇，您好。我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我们需要马上同您谈谈。您能够同我们见面吗？”

今天找我谈话很不是时候。而且我们刚刚谈过话没几天，其实也没有谈什么。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今天是休息日，您搞得我措手不及，我正要去做客。咱们下星期再说吧。”

“不行，”他赶紧说道，“事情特别重要。出了一些事，电话上我没法说。我求您了。”

“好吧，”我妥协了，“我马上过去。”

“谢谢，”拉斯卡佐夫很高兴，“直接到门口来，有人在门口接您。”

在所有苏联人都知道的卢比扬卡那座大楼的铸有独出心裁的花纹的大金属门门口，不久前曾在莫斯科饭店与我谈话的那个人确确实实在等我。他领着我通过一道道岗哨，来到要去的楼层。我们走进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在哈维夫妇的那档子事后我已经到这儿来过。

拉斯卡佐夫从桌旁站起来。一副殷勤好客的模样。我们寒暄之后一一落座。我的向导坐在我对面。所有这些接待都已十分熟悉。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又是老调重弹。几天前我们已经详细地谈过一切。又是斯通，阿尔米塔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身体如何？还问了部回忆录的事情。

我大惑不解，这些有什么紧急可言呢？出什么事了？是他们无事可做了吗？当然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声儿，我著无其事地回答

他们的问题，看看下文是什么吧。

“谢尔盖·尼基季奇，我们首长想跟您谈谈，您不反对吧？”

“哪能呢。他是谁啊？”

“副局长。”

我们从办公室里出来，顺着楼梯往上爬了几层。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敲敲紧闭的门，把我让到前面。这间办公室稍大一些，但也不算大。靠右边窗户是一张写字台，左边靠墙是一张开会用的桃木大长桌，桌子中间绷着绿呢子——典型的斯大林风格。

一位约莫45岁到50岁之间的面目清瘦的人从桌旁站起来，看上去象是个有知识的人。

“您好，我叫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请坐。”

我们在长桌旁坐下来，这回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成了第三者。又开始了关于生活和工作的“世俗”谈话。这时我插了一句，说两年前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把我从特种设计局调到研究所来了。

“您在新单位工作得如何？”办公室主人问道。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就连我的调动看来也不无他的参与。

当时我在研究所里已经搞熟了。我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喜欢这里的人。因此我回答说，我没有意见，而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对工作单位变动感到满意。我没有进一步说明。我的回答使他感到满意：跟一个心怀不满、愤愤不平的人更难达到相互理解。

他终于讲到正题：

“谢尔盖·尼基季奇，请问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眼下放在什么地方？”

我警觉起来——开始了。在此之前在考虑行动方案时我就决定不谈假话。要是前后不一，那就更糟。再说一个天真的不大聪明的老实人角色更适合我这张面孔。而主要是我没什么必要隐瞒。

“一部分回忆录放在我这儿，一部分放在别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保险柜里。”

“您知道吗？”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压低声音，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我们得到情报：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想偷走您那儿的回忆录。您是怎么保管的呢？”

一切都清楚了。他们的论证手法竟如此粗浅，使我颇感吃惊。

“我放在密封的书柜里，不过这当然不是主要的。我们那个楼里住着政治局委员。有克格勃严加把守。门口有岗哨，还有流动哨。外国间谍想钻进大楼偷走我的材料，就好比钻进你们这座大楼一样地困难。”我居然开起玩笑来了。

“啊，您知道吗，对行家来说警卫和门锁都不在话下。我的保险柜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保险……”

接下来他又继续打官腔，说鉴于这些回忆录具有重大的国家意义，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康复后派秘书和打字员各一名去帮助他继续写作。

然后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我保管的那部分材料交给他们，理由是：国家安全机关是中央委员会的左右手，这点父亲也不止一次他说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中央批准、受中央委托才做的。材料放在克格勃更加安全，而且可以肯定不致落入外国谍报机关的手中。

“我完全是以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同您正式谈话。所有材料都会完好无损、一五一十地还给您父亲以便继续写作。”我的谈话对方最后说。

我拼命开动脑筋想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对策，然后我犹豫地回答说，他搞得我左右为难，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住院。我没法跟他商量，医生严禁使他激动。回忆录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不能不经他许可就交出来。

不过看来他们的全部用意就是我不去找病中的父亲，至于对付我他们是不成问题的。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果断他说他理解

我的难处，可没有人说要上交呀。说的是在父亲康复前换个地方临时保存嘛。

我又重复说，我无权处理材料。不过既然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对此事如此重视，那么我至少要求见一见尤里·弗拉基米罗奇·安德罗波夫。我想听到他的亲口保证。再说我同他也很熟悉。我补充说，我始终十分敬重安德罗波夫，认为他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因此我相信他是不会自食其言的。

谁知这个要求并没有使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猝不及防。

“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根本不可能。他外出了。是去同选民见面，”他耸耸肩膀。

我默默地点头。他们两人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我想，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的话当然不足信，却又无法拒绝他们。假定说我表示拒绝，他们就此罢休的可能性极小。他们这伙人我是知道的，材料随时都可能被所谓的“外国谍报机关”偷走。那样一来我就更找不到线索了。而且我还要为这事吃官司另一方面，关于中央愿意帮助也表示也很诱人……我同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种方案……他对基里连科也提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没有得到父亲的许可仍然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承担起这样大的责任！……父亲可是拒绝了基里连科的要求啊……不过，当时可说的是不准写回忆录，而现在……可谁来担保呢？……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您干吗不说话？”他阴沉着脸问道。

“我正在考虑我该怎么办……”

“您没有别的出路！”他脱口而出。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以责备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助手。我微微一笑。

“嗯……我暂时倒还另有一条出路。”我指指房门。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不安起来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主意由您自己拿。我们不过是提醒您现在的形势和可能引起的后果罢了。”

两人的表情都很不安……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换了个话题，他谈起了美国，他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不久前才回国，他谈起自己的观感。归结起来是，在美国过日子不如在苏联。食品的味道也欠佳：全是冰冻过的。我机械地点点头，脑子里想着别的事呢。

我设想着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现在不交出材料，他们就不会罢休，就要查找，只有上帝知道会怎么收场。不会让你写下去。洛拉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了。另外找个打字员未必能办到，他们会不遗余力。要是交出材料，那他们多半是不会再查找了。那就可以等上一段时间再继续写作。而且大概到了发信号让那边出版的时候……跟父亲谈谈多好……不，需要下个决心。我要是交出材料，他们就会感到满意——觉得自己打了胜仗，而且立即向上面报告。父亲那边我设法把情况讲清楚。总之，经过这番思考之后我决定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于是我忽然觉得轻松了。

“好吧，”我说。“我考虑过了。既然外国谍报机关确实实在猎取材料，那就把材料暂时放在你们这里吧。你们不是说这样更保险吗。”

这时我想起要马上回家去取文件袋和磁带，可妻子正在家等着我去作客呢。还得解释一番，这是我最不愿意干的。

我天真地要求把移交材料挪到明天，自然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敌人那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他们只等着今天夜里最终实现肮脏的意图。无法可想。

我同意了，不过又提到这种情况下无法预料的事情：部分材料在打字员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那里。

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部分材料已在我这几位好客的主人手中——他们已用很短时间到她家里让她交出来了。

“这是欺骗行为，”我脱口而出，“你们没有权利。你们只能通过我采取行动。”

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尽量消除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他说，他理解我的气愤心情，但时间不等人。每分钟都很宝贵。现在掌握了权威性的情报，外国谍报机关眼看就能把这些材料偷到手。

最后这条理由把我彻底“说服”了，我开始进行“合作”，我说还有一部分材料正在我的朋友、电影剧作家瓦季姆·特鲁宁那里进行文学加工。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特鲁宁！诚然，近几个月我同他很少见面。

我的对方着急起来。

“他住哪儿？”问题紧跟而来。

特鲁宁常换地方，租房住，不久前地址又变了。他住在华沙公路上的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电话号码。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记下号码，走出房门。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特鲁宁不在莫斯科，下星期才回来。然后问我，材料交给他有多久了？

“1969年秋天。”

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点点头并考虑一下，他建议在特鲁宁同志的住所外设岗。只要他一回来，我就得把材料要过来，再交给我的谈话对方保存。

我同意了。

还有最后一道手续——交出我的材料，让他们打个收条。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跟您去。”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作出决定。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我所住的大楼。我登上六层，尽量不弄出声响，悄悄走进房间：我不想费口舌向妻子作解释。我打开柜子，感到一阵痛楚：我往这些材料里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实在

不想把它交出去。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装了两大包材料和录音带。

我们回到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的办公室，他们桌上已经放着从洛拉那里没收来的材料。这时，我在录有父亲回忆录的若干大盘录音带中还发现了一盘稍小一些的。我完全把它忘掉了……

大约一年以前我根据自己的草稿把关于我偶然成了见证人的1964年十月事变的讲述录了下来：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桌上正好放的是这盘带子。我焦急不安起来：我怎么会忘了呢！我相信父亲回忆录的内容不会引起当局的反感。因为他讲的全是“陈年往事”，现今的领导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至于我的那盘录音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讲的是不久以前，1964年10月发生的事情。现任高级领导人都在其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而且，最后援引了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结论：所发生的一切同党的原则性政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而已。

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父亲录的磁带即使不在中央，至少也要在克格勃机关启封，并且会受到仔细的研究。那样一来，我的这盘磁带逃不过他人的耳目的。我拼命地动脑筋：怎么办呢？只有希望出现奇迹了……

不错，我曾绝望地试图拿走自己的那盘磁带，声称这一小盘磁带是放错

了地方。这里录的是我的笔记，我请求把磁带还给我，甚至已经伸出手去要拿那盒磁带了。

然而，没有人打算归还我什么东西。不仅如此，我的疏忽还在无意中使人们注意到这盘磁带。由于我自己干的蠢事，全部材料中只有我的磁带受到了研究。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弄清的……

我们三个人对材料进行分类，一类是经过加工的材料，另一类是草稿和由我按年代顺序编上号码的录音带。又计算了总页数和磁带总数。

“开个收据，我们把名签上就散了吧，”我疲惫不堪地请求道。

“不行不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反对。“您自己亲笔写吧。”

我同意了，并且提出了大致如下的写法：“为了保证完好无损并防止被外国谍报机关攫取，国家安全机关要求我向他们交出我父亲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

然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的措辞不行，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最后的文本是这样的：

“1970年7月11日赫鲁晓夫，谢尔盖·尼基季奇应国家安全机关代表的请求，为了保证完好无损和万无一失，将包含有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忆材料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交来保存。材料交给波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和拉斯卡佐夫，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直径13厘米的录音带18个，直径18厘米的录音带10个，打印材料16卷宗，总计2810页。此外，曾应我的要求为回忆录打字的费诺格诺娃，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交给国家安全机关6大盘录音材料和929页打印材料。我于1969年秋天将一部分打印好的材料，数量为十卷宗，约为回忆录的一份半交给作家特鲁宁，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进行文学加工，这部分材料也将在他返回莫斯科后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保存。

除上述人员外，材料未曾交给其他任何人。以上材料将在作者康复后归还作者本人。1970年7月11日。”

签字：维：波波夫、叶·拉斯卡佐夫、谢·赫鲁晓夫。

波波夫叫来秘书，吩咐把收据打出来。在等待打印的工夫，我们喝着咖啡，说些一般的话题。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无法掩饰顺利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不过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的高兴心情更是溢于言表。

谈到回忆录，一致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再次强调克格勃只按中央的指示行事，它的一切行动同中央完全协调一致。他再次提到那个论点，即就连尼

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在说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也曾强调指出它是中央的左右手。然后话题转到美国。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再次抱怨说，美国的食物不如苏联的味道好。总之，在那边工作很苦，老是有盯梢，老在紧张中度日。

“没什么，盯梢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习惯就行了，你们对我盯梢了多长时间啊，我也没出什么事。”我挑逗道。

我的两位谈话对方脸上现出了不安的神情。

“哪能呢？我们从来没有盯过您的梢。那不过是您的感觉罢了。咱们别使问题尖锐化了。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争辩。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收据还在打字中。这时我触及了一个“痛处”。

在我们这次谈话前不久克格勃上尉诺先科向美国当局寻求政治避难，此人是原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闹得满城风雨。我出于好奇问道，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他眼下在于什么。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皱起眉头说，诺先科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为一己私利违反了法律，以为他身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就可以逍遥法外。最后堕落成了叛徒。

我赞成他的意见，同意不能为叛卖行为辩护。但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违反法律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不知道会在哪儿刹车。

这时我的东道主们不知为什么不礼尚往来了：我的意见竟得不到反应。谈话提不起劲来。幸而打好的收据送来了。我们再次签字。然后他们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就分手了……

我驱车把妻子接上，并一起去作客。我们当然是晚到了很久，因为在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那里耽误了几个小时。我作客时也没有心思玩儿。脑子里一再浮现出刚才那个场面。看来，现在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了……

可是洛拉·费诺格诺娃的情况如何呢？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可

谁知道她都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呢？我很不安。此外，一个主要的问题在折磨着我：“下一步怎么办？”唉，这方面谁也无法给我出主意。父亲在住院，同他谈话是不可能的。只得自己拿主意了。

问题是：要不要表示同意准备出版此书，还是暂缓一下呢？很清楚，此书的出版定会引起不少议论。诚然，两年前我就同父亲讨论过一切细节。但现在是否已到了危急关头呢？另一方面，此书的出版将向全世界表明，有这样一部回忆录，而且意味着它将会存在下去。

这肯定会在我的新“朋友”中间引起骚动。他们这些可怜虫满以为已大获全胜，却没想到竟弄得如此尴尬……

总之，我在作客时绞尽了脑汁，后来在家里又冥思苦想到下半夜，最终认定所发生的事情就应该看成是到了危急关头，因此不必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要当机立断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很清楚，不能再等待了。情况不会好转。当然，我的处境微妙；必须替作者拿主意，但父亲要到夏末甚至秋天方可出院。时间将会永远地失去。谁可知道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还会想出什么花招来呢。

简而言之，说到做到：向西方出版社发去了约定的信号。

我很快得到消息：第一卷将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书。至于第二卷，他们说工作量大得多，因此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出版。其实，当时我对第二卷并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开始出。

决定10月公布出书消息，拟于11月开始在杂志上刊登。时间安排得很好：我反正有充裕的时间预先通知父亲。

我毫不怀疑父亲对出书决定的态度：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现在我是严格按照我们事先定好的方案行事的。至于他对我交出材料的反应，老实说，始终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从逻辑的角度看我做得对。但我仍然觉得我的行为从道德上说来并不太漂亮。父亲当初就没有把回忆录给基里连科嘛……

这些想法始终纠缠着我。而且应当承认，直到事过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想法仍在折磨着我……

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父亲历经革命、内战和卫国战争，经过了我国发展的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他的错误如今已没有意义：他把自己长期积极的生活都献给了共同的事业。如今他退休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重现历史，思考过去，提醒他的继任者防止可能出现的失误。这一切都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不了解过去，就无法清晰地看清未来。

真是咄咄怪事。不仅如此，原来至今谁也不需要经验，不需要历史，一把回忆录当成破坏性读物一样地追查，几乎把我们降低到罪犯的地位，而把回忆录本身列入国外出版的非法出版物。

父亲的回忆录是地地道道的党的文献，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哪儿呢？当时我始终找不到对这个简单问题的明白易懂的答案……

同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谈话的第二天，我找到了洛拉。原来，对她的态度远远不象对我那么客气。

早就在对她盯梢了。最近几个星期有一些可疑的家伙老在她家的周围转悠，向邻居打听情况。我去医院看她只是让追捕者更加确信了。据邻居讲，神秘的客人最感兴趣的是：她有个什么样的录音机？哪儿来的？她打印的是什么？他们也试图跟列奥诺拉本人套近乎，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她因公出差，有人想潜入她家。但不速之客未能得逞：洛拉的母亲有病，一步也不出门。看来，当时就决定采取屡试不爽的办法。把洛拉叫到人事处去（当时她已调到我们这个研究所），让她填写一张长长的调查表，并且暗示想交给她一件有趣但严格保密的工作。这样至少让她在外面整整呆了几个小时没回家。病中的母亲则临时请到医院去作检查了。

据洛拉断言，她家有“生人”光顾过。而且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仔细的搜查，诚然，不必搜查一看便知：橱柜里放着打好的回忆录，这里还有录有父亲声音的录音带。

看来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把我们这些“阴谋分子”都揭露出来了。

据洛拉说，当天只丢了两张用过的复写纸。可想而知，“客人”是尽量不留痕迹。然而观察力敏锐的洛拉却发现了屋里有人光顾过，因为她对这类不速之客早有防备，一叠复写纸少了两张7月11日早上洛拉回家。早已有人在门外等候。走过来三个人，亮出证件。没有特别讲客气，就让她上了离此不远的“伏尔加”。两个人分坐两边，另有一人坐在司机旁边。把她拉到卢比扬卡，就马上进行审问。这是第一次仓促的审问，从种种迹象看来是为了熟悉情况。洛拉毫不隐瞒：“是，我打过赫鲁晓夫回忆录。难道不准干吗？这犯了什么法？”

然后那些人同她一起回家。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不过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请见证人。结果把录音带和打印材料全拿走了。没有人写搜查记录。当即一起返回克格勃，这回是到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那里。

对洛拉的审问是由拉斯卡佐夫进行的。这里他认为没有必要克制，一上来就说什么她显然不明白自己参加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勾当，她休想滑过去。对她说，她本该立即前来报告有人让她打反苏材料的！可她没有这样做，反而卷入了反苏活动……

瞧这位可怜的女人横遭怎样的指控。苏共二十大过去15年了，居然还指控她参与反苏活动，仅仅因为她打印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真是天下奇闻……

由于这次“见面”洛拉得了神经性休克，久久没有平复下来

几天后最后一名角色——瓦季姆·特鲁宁回到莫斯科。他回来的消息我是从……克格勃得到的。早上我给他去电话，他还没起床。我没有讲已发生的事情，只是说好了我去。他住在华沙公路那一带，住的是他朋友、电影剧作家安德列·斯米尔诺夫空出的房子。

我一去就给他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后说我要取走材料，因为我答应过要交给克格勃保管。我只得把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的解释又重复一遍：这是临时性措施，父亲康复后即可全部送回，到那时我们再继续进行中断了的工作。我对自己说的话不大相信，瓦季姆则只是表示怀疑地冷笑道：你就等着他们还给你吧。

“其实，材料是你的，想拿就拿走吧。”他既不争辩，也不劝阻。

我把卷宗整理好就给拉斯长佐夫送去了。我没有得到单另的收据：他借口这些材料在原先收据中已经提到。不错，那里没有说明页数。我没有坚持，因为这都是副本。我想尽快结束这场恶梦。

不过还有一个我的磁带问题。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道歉说，他工作太忙，录音还没有听过。他让我等等，并答应尽快还给我。

“你们怎么这样拖拉？”我生气了。“转录一盘，爱怎么听就怎么听去。转录也不难。”

这个话题显然使拉斯卡佐夫感兴趣，他问我转录容易到什么程度。

我明白，他之对我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不是无缘无故的，便回答说，这事很简单。只需有两个录音机、有时间就行。当然，录音要多少时间，转录也要多少时间。换句话说，为了转录父亲的录音，我得用将近200个小时。在有压力的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悄悄地完成这项工作。我十分希望拉斯卡佐夫正好也得出

这个结论。

于是他好奇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会转录。

“根本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最后，拉斯佐夫询问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不会转录。

“不知道，”我耸耸肩膀。“这是他的事情。我从来不向他提出这类问题。”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第二天，瓦季姆对我说，我刚出门，一位自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陌生人闯了进来，亮出证件就……把他带到克格勃机关去了。跟他纠缠了很长时间。问他：有谁看过和读过回忆录？回忆录放在哪里了？一连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得，你让我上了贼船，”特鲁宁并无恶意地嘟囔道。“他们什么也不会还给你的，记住我的话。”

为回忆录一事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传讯了许多人。看来审问持续了不止一个星期。审问了安德列·斯米尔诺夫，主要是对特鲁宁感兴趣，向居孀的彼得罗娃、我的外甥女尤莉娅打听廖瓦、我和父亲的情况。向我的好友巴拉波什金调查我和录音机的情况。还有其他“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其中有我知道的，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

拉达和阿朱别伊没有受到触动。他们的忠心耿耿显然不会引起怀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略微提到了同父亲回忆录的写作和出

版有关的问题。他指出，他本人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他不知道回忆录是怎样出版的，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对这个问题作答……

父亲仍住在医院里，对于外面的风云变幻一无所知。我照样定期去看他，尽量造成一切如常的印象；只是不再详细介绍回忆录的进展情况了。我不想说假话，反正很快就得向他汇报一切。父

亲自己没有问起手稿的事情。与此同时，他的病情也日见好转。

我为自己的录音带定期给拉斯卡佐夫打电话。终于在8月中旬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让我去：他们准备归还磁带。此外，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表示希望同我谈谈。

这些天父亲准备出院。已经定好出院时间：再过一两个星期。他拒绝去赫尔岑疗养院疗养。他说住在别墅里自我感觉要好得多。关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对他说。我决定等他回到彼得罗沃达利涅那时再讲。我内心里想竭力把不愉快和费力的谈话往后拖。

于是，我又来到我已十分熟悉的大楼。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上楼去找波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殷勤地寒暄问好，从保险柜里取出我那盘装在灰色塑料盒里的磁带，但是不给我，说他们听了我的录音，觉得生动有趣。显然，那是当初趁着事情刚过赶快录下来的吧？

我点点头。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则认为，我当时的感情就决定了要作出很激烈的、并不完全正确的评价。如今事过境迁，大概您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当年的事件吧？

我一言未发，只是耸耸肩膀。

“我们把磁带还给您，”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笑着说，“不过录音嘛就当着您的面在办公室里洗掉。”

反对当然毫无意义。再说，我可以逐字逐句地把录音复原。

波波夫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接着说：

“您当然可以把这个录音复原，但我们希望您能理智。”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走进办公室。他抱着一部笨重的灰色机子，一望而知是自制品。把线接到插座上，机子就发出低沉的声音。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把机子举在录音带上方鼓捣了一下，就把录音带递给我。手术结束了。显然，根据“外科医生”的意图，记忆被消灭了，就是说，这些事情并未发生……

有点类似于“录音机脑白质切断术”。录音洗掉了毕竟很可惜。仿佛我自身的一小部分消失了。当然我要使之复原，不过新的录音肯定在某些细节上与原先的录音不一样。

“好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又笑着说，“把自己的录音带拿去吧。您看，我们可是一贯说话算数的。”

他显然对这个有趣的场面感到满意。但我并不急于离开这间“好客的”办公室。

“谢谢把录音带还给我，”我开始说，“不过您忘了您还答应过一件事情。”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困惑不解地抬眼看我。

“您答应过我，收据上也写得一清二楚，只要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一出院，您从我这里拿走的全部材料都要物归原主。他这几天就要出院，回到别墅。我希望他回来那天磁带和打印材料全部归还原处。至于您答应的秘书和打字员，也应该跟父亲讲。”我最后说。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面带安然的笑容看了我一眼，说……他什么材料也没有！……

我当然料到他会拒绝，也作好了争辩的准备，却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转折。

“怎么能这样？”我慌了神，“您本人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不是一直对我说材料放在您的办公室，放在您私人的保险柜里吗，还说您谁也不给，因为就连放在这里您也对材料的完好无损不放心，”我说着往屋角的保险柜努努嘴。“可东西在哪里呢？”

我得到的回答是：材料已交到中央。

我耸耸肩膀，抱怨说当初正好也是以中央的名义保证归还我的。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痛痛快快地承认他确实这样许诺过，却

又马上借口上面下令把材料送交中央，他们必须照办，他显然在拿我的仓皇失措取乐。

于是我再次要求安排同安德罗波夫同志见面。回答是办不到，因为安德罗波夫已经出差，然后直接到南方度假。回莫斯科还早着呢。

再说有什么可谈的。我走了……

我的处境很不怎么样。父亲要出院，材料却不见了。材料真的放在中央，还是干脆销毁了？到中央又找谁要呢？

这时我想到，发信号出书绝对有充足理由：那样总算可以留下一点东西。可见，父亲当初所谓这些工作全是白干的说法并没有错。全都得没收。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这一点。我一心要进行斗争，脑子里盘算着去中央委员会内部我回忆录的种种方案。可是不用我去找。他们自己找到我头上来了。

同波波夫说话的第二天，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问起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不过我已不记得了。他让我明天去党的监察委员会，并说了房间号。

“预先给您办好出入证，党证别忘了带。”他口气严厉地提醒道。

没有说明请我去的原因，我也没有问。不用问也什么都很清楚。我在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的“时软时硬”表明，我还“嫩了点”，不妨再给我加点压力。

我来到监委，接待我的是前一天打电话的工作人员——一个相当客气的人。他说知道回忆录的前后经过，请我把所发生的事情统统详细地写在纸上。我写了很长时间，尽量做到无一遗漏。

他仔细看了我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页，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孤零零地一个人留了下来。不过没有等多长时间。

几分钟后，请我去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一位身材高大、颧骨突出、面孔粗陋的人

坐在标准的写字台旁边。他在未到监委工作前，担任苏共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梅利尼科夫开始问我，回忆录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看来，撇开别的不说，他不过是觉得好奇：想知道外人无从了解的父亲

生活详情。

我把波波夫已经知道的一切向他再讲一遍，作为补充，又详细叙述了对我盯梢的经过。我特别强调了一点，即波波夫是代表中央把材料拿去保存的，并以中央的名义保证归还，现在却说材料不在他那里，而且他也不知道现在何处。

我讲这些时，天真地以为所有这些滥用权力行为会激起对方的愤慨，以为会决定进行调查，问题也可得到公正的解决。

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所听到的却是：中央委员会没有人对我作过任何许诺。材料确实在中央，但也不在梅利尼科夫手里。现在根本说不上归还。中央会作出有关的决定，决定作出后会及时通知我们的。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8月底，父亲出院，回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家中。他身体虚弱，面色苍白。很少散步，多半是坐在凉台上，或是坐在房间内自己那张安乐椅里打瞌睡。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精力逐渐恢复了。他已经开始往下边走，到自己那片心爱的林子边缘去，看看菜园，欣赏一下河上风光。

我们暂时没有谈回忆录的事。父亲沉默的时候多，他在想自己的心事。可能他也猜到出事了，如今我老是一个劲儿地避开这个话题。我在谈话中尽量讲些无足轻重的莫斯科新闻，分散他的注意力。

拒绝归还回忆录尽管并非十分意外，却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我觉得自己这事做得不对，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交出去。向父亲隐瞒这段不愉快经历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他可以绕开我去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回忆录进展得如何啊？”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仍很虚弱。如果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父亲就会激动，可心脏还无力承受。不过早晚都得讲……

父亲渐渐恢复常态了，有一天我们不慌不忙地往村子边缘踱步，我决计向他和盘托出：我讲了克格勃，讲了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到不久即可出书。他赞成向国外发信号出书。既然对他如此放肆，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作出决定了。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暂时没有在我国出版吧……在国外出版固然不好，但也别无他法。早晚也会在我们这边出的……”他痛苦地抱怨说。

然而，就为我把材料给了波波夫，他可把我痛骂了一通。父亲至死也饶恕不了我的这个过失。他说，不管怎么说我都没有权利把材料交出去。问题不在东西没有了。而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违反宪法。我却胆大包天地对于无权处理的事情作了处理。他要我立即同波波夫联系，以他的名义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全部归还。没必要去中央，那儿什么也不会给的。他们不是说什么也没有答应过吗。应该找开收据的人要。如果不成，他就要大闹一场。

父亲异常激动。他取出异戊酰薄荷脑，往嘴里塞了一片。如今他已离不开这种药了。我担心他的心脏出问题，不过这次倒没事儿。

“当然，好在一切都可以重新恢复，工作没有白干，”他稍微平静下来之后说，“但是这种态度无法容忍。象这等事情不能饶过他们，”父亲又开始激动起来。

“咱们别谈这个了。”他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们又继续散步，谈了谈别的事情，却再没有提回忆录的问题。

我为履行父亲的要求，开始找波波夫。他当然知道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谈话，也明白我为什么找他。不言而喻，波波夫再也找不到了。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出去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会亲自给您去电话……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出差了……”我去电话时常可听到这样的回答。

看来这样下去没有个完了。但我特别执拗，一天就打好几次电话，因为我很了解情况。最后，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怪事！）亲自接了电话，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他显然明白我不会罢休的，还不如亲自来见我，以免遭到可能的不测。

我一见波波夫就来了一段正式声明，把父亲吩咐转达的话全讲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果然不出我最坏的估计，他说他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归中央管。根据中央的要求材料已交到中央。克格勃既不掌握也不支配。他对未能履行自己的保证深表遗憾，并以个人的名义致歉，但眼下该机关与此事无关，因此波波夫让我去找中央。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对父亲讲了。他一气之下甚至啐了一口。

“去他们的吧！现在拿他们没有办法！找他们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再别去了。”他嘟哝道。

由于生活的安排，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和他那“一大帮人”的交往持续了多年。对我的兴趣忽而似乎完全消失了，忽而又更加浓厚起来。10月初，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又见面了。西方发布了关于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即将出版书名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父亲回忆录的消息。据说该公司拥有打印材料及由父亲亲自口授的录音带。经专家鉴定，录音带确系真品。

书名是事先与我们商定的：质朴平和，没有不必要的矫揉造作。

这回拉斯卡佐夫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也不难理解。7月份还“战绩辉煌”呢，10月份却出其不意地落得这个下场……

我们在莫斯科饭店那间熟悉的客房里见面。谈话很简短。不

难猜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回忆录怎么弄到美国去的？

我的回答很简单：

“材料放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版。今天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不该来问我。”

严格他说来，我并没有讲假话。

最后我又要求物归原主，再说当前这个情况下没收材料已毫无意义：很快就要见书了。

拉斯卡佐夫恶狠狠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我根本不要提这个问题。

但是对我们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原来，父亲还得再次同他过去的战友们谈话。书尚未出版，谁也不曾亲眼见过，更谈不上“读过”了，然而病体尚未康复的父亲却被粗暴地叫到中央去。

至于书的内容，书中讲些什么，没有人感兴趣。据我所知，对于从我这里没收去的材料内容，甚至根本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却11月11日，十月革命节刚过，佩尔谢即从书记处给父亲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十分得势，羽翼日渐丰满，愈来愈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当然还没有到70年代末期，但也已经不是自由化的60年代了。60年代谁也不敢这么放肆。

父亲回答说，马上去不了——没有交通工具。他没有汽车。

“已经派车接您去了。”对方回答说。

在那里等着父亲的有佩尔谢，梅利尼科夫，还有我从父亲的叙述中意会到的两月前搞过我的那位工作人员。谈话刚开始没几分钟，事先拟好的谈话脚本就完全破产了。

父亲本来就因对他的恶劣态度、没收回忆录、明日张胆的欺骗、波波夫蛮不讲理的回答等而怒火中烧。他一直强压住怒火，佩尔谢的电话则有如火上浇油。父亲的健康状况本不宜进行激烈的

谈话，但并不是他主动发起的。这里，医生别祖比克关于不要激动、保持冷静、别往心里去的忠告统统不起作用了。父亲投入了战斗，象往常一样地义无反顾。

总之，邀请者显然指望进行的“教育性”谈话没有成功。这些“教育者”的处境实在不值得羡慕……

他们向父亲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声明中说赫鲁晓夫从未写过回忆录，也从未交给任何人，所出版的书系伪造品。父亲当即断然否定了这个文本，并表示这样的声明他不会签字。这是假话，而说假话是罪过，在他这样的年纪更是罪过。应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了。而且也不应该影响到他人……他写过回忆录。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这些回忆录是为党为人民而写的。照父亲的意见，回忆录对于了解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是有所裨益的。他的回忆录就是历史。这时他让自己的反对者确信，他今后还要写下去。然后他说，如果声明的大意是回忆录尚未完稿，因此尚不具备出版的条件，那么他可以签字。

至于谈到书在国外出版的问题，父亲同意写上他本人并未把材料交到国外出版的字句。这一妥协使佩尔谢感到满意。草稿很快拟出并打印出来，父亲签了字。声明当即见报。现在我手边没有声明，无法在此逐字逐句地引用。再说我也不认为这有多么重要。然而，谁知主要的话题才刚刚开始呢。

佩尔谢已经认为无话可谈了，这时父亲却向他提出没收回忆录一事。

佩尔谢没有准备，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梅利尼科夫却没有来帮助自己的上司解围。这时父亲又提起一个新的话题，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

父亲说，他们甩开他已经干了六年。当初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他们说：只要甩开赫鲁晓夫就会事事如意了。父亲可是曾经提醒过自己原先的战友们，要改变工作方式，用新的办法来搞经

济，否则将一事无成。但是他们恢复了部的建制，而且破坏了好的东西，当初的革新步子尽管不大，毕竟已经迈出去了。

农业陷于崩溃。父亲在位时提高了黄油、肉类价格，意在刺激食品生产，但目的没有达到，商店里空空如也。1963年，也是他在位期间，购买了美国的粮食，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而他离任后这倒成了通例。可耻！！！堂堂苏联购买粮食！！

父亲接着说，可见问题并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有缺陷的经营管理体制上。他们已经心安理得，什么也不想干了。他们安于一潭死水的现状，而应当行动，探索。

国际关系又如何呢？过去说，赫鲁晓夫使我们同中国闹翻了。六年过去，关系只是更加恶化了。如今人人都可看出：这里起作用的是较为复杂的规律。再过上一段时间，关系就会正常化，不过为此双方都得有新人上台，新上台的领导人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问题，抛掉多年积存的糟粕。

据父亲事后讲，佩尔谢刚要打起精神提出反驳，父亲却不让他插嘴，继续把自己原来的那些战友批得体无完肤。

他说，在埃及问题上处处坐失良机（他用了较为难听的字眼）。为这个国家投入了多少财力，倾注了多少心血啊，他们却让我们的这个盟国吃了败仗，尽管已作好了充分准备，拥有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父亲还谈到其他一些同国内外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一番怒气冲冲的长篇大论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控告词”，一声不响了。

佩尔谢试图辩解，但父亲不听他讲。然后说，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字也签了。现在想回家去……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同党的领导人、同他的继任者见面。他向他们倾吐了近年来郁积在心中、他孤身独处时苦苦思索的一切。

我原先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妈妈当天给我打电话时说，父亲被叫到党的监察委员会去，向他询问关于回忆录的事情。

我放下听筒便马上驱车前往别墅。父亲在林边上坐着。我坐到他身旁。我们沉默良久，后来他开始讲述，愈说愈激动。讲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又仿佛自言自语地突然补充道：

“现在我完全确信出书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肯定要把没收去的东西销毁掉。他们害怕真理。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又沉默不语了，各自想着同一个问题。

晚上我走了，因为那天是工作日。我到家后趁着记忆犹新把父亲的叙述记了下来。

父亲这次去中央委员会不会不留下后果。佩尔谢达到了目的：父亲再次住进医院。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别祖比克宣称父亲是轻度心肌梗塞。

“这跟夏天那次根本不同，”他尽量安慰我们说，“设法相比。相当于小猫用爪子挠破了皮。”

比喻倒挺恰当，不过我认为根据太不充分……

父亲有先见之明。许多问题他事先就预见到了。我们刚开始搞回忆录他就吩咐过，一旦他生病住院，我得把同口授有关的一切拿走，存放在可靠的地方。以防万一。

我又每天去看望父亲。他象往常一样埋怨我不该去。荧光屏上则照例是一条永无穷尽的绿线……

父亲苍老多了，而且不光是外表。最近他遭受的纷至沓来的打击不会不留下后果。关于大闹监委的事情他是逢人便说，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前来探视的客人。其实他并不期待对方作出反应。他需要的是一吐为快。

1971年新年即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个新年到来之前，他出院了。他是在别墅里过的新年。表面上生活又步入习以为常的轨道：同先前一样的散步，与恢复参观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休养者的见面，众所周知的问题和众所周知的回答。

但最近也出现了新特点：许多人问起回忆录的事情。因为许

多人听到的是各种不同的“声音”。父亲回答说，回忆录怎么到国外去的与我无关。他口授过自己的回忆录而且认为，没必要把回忆录隐藏起来。其中没有秘密，没有不能公开发表的东西。

父亲心力交瘁，元气大伤。这次恢复得很慢。他极易劳累，已经到了中

途不休息就走不到草地的地步，他沿途不时在照常随身携带的小折叠椅上坐坐。阿尔巴特狗已经不在。它死的时候年岁很不小了，于是就没有衔椅子的帮手。父亲新养了一只看院子的狗。起名叫松鼠，因为它长了一身红棕色毛，性格也活泼。父亲去哪儿它都跟着跑，忠心耿耿地望着他的眼睛，舔他的手，却显然缺少阿尔巴特的分寸感和教养。我们建议他弄一只纯种狗。

“看家狗又聪明，又忠心，又好养。我要那名门望族的蠢货干吗？”父亲拒绝了。

尽管在中央的谈话不会不引起后果，父亲却没有屈服。早在二月份他就对我说：“我们要继续干。你去安排一下。”

如今口授起来比较吃力。他强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如今他已不再把全副精神寄托在工作上了，而是在履行自己给自己加上的职责。他在以自己的工作向自己和欺负他的人证明，他没有屈服，也不想投降。

他就这样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口授了两盘未录满的磁带，其中讲到同文化界的几次谈话。他试图理解和解释自己的行为，弄清行动的动机。

不过，父亲对这部分回忆录并不满意。他对我说，要全部重新录。却没有来得及。所以对这部分回忆录应当较为慎重地对待。

一月份我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回忆录：一本黑色的书，书名用了黄红色字母，护封上有一帧父亲尚带笑容的照片。我当即赶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把书给父亲看。他翻了翻，看看照片就还给我了。他看不懂英文书。这本书对他说来毕竟不象自己的东西。那要是我国出的就好了……

“就放在你那儿吧。”他说。

一月份我再次被叫到克格勃去。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转告说，让我看看父亲回忆录的英译文并就其与原文是否相符作出结论。

我感到吃惊：

“我手头又没有回忆录，全都在你们那儿。最简单的办法是对照原文和译文，马上就可以看出有什么不同。”

他提醒说，已经向我多次解释过，回忆录不在克格勃，已交到中央。因此无法对照。所以他们才来请教我这个对原文十分熟悉的人。

当然，说他们弄不到材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我始终猜不透他们让我作结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不过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看英文书倒没问题，不过内行的翻译可以更准确地对译文与原文相符的程度作出评价。他们给我找了个房间，又让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照看一下，我就埋头搞起逐字翻译来了。

埃德华·克伦克肖给每章前面的简短导言当即引起我内心的反感。我许久没有再看过这本书了，但当时我所产生的不接受感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他方面倒没问题，译文从意思上看与口授材料没有区别，同我们曾多次听到的父亲的讲述也大同小异。

我在结论中说，材料被大大压缩，其中有关战争的部分几乎悉被删去。只留下了个别片段。有些属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事实也没有。我把结论交给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他向我表示感谢，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再没有人为回忆录事情来找父亲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书一出版就消除了紧张气氛。

就在那年，1971年，进步出版社出版了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俄文译本，供范围有限的读者阅读，书上贴有“内部使用”的标签。这样一来，尽管是从

英文转译的，毕竟第二版为俄文版。

如今赫鲁晓夫回忆录又以我们这个星球上的 15 种文字出版。实际上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读者，唯独那个回忆录最初的主要对象、父亲还为之经受了降临到他头上的考验的国家例外。

当然，父亲也可以不写回忆录。他也有过其他的爱好：种菜，散步，摄影。若不是回忆录，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完全符合当局的口味，而且大概会使父亲多活几年。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坚信他所口授的内容是人民所需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迟早总有一天会传到他的主要读者的耳朵里。他的回忆录出版后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书架上放着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甚至还有土耳其文版。暂时只缺俄文版，但愿它会早日问世。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及其“一大帮人”看来是把我忘掉了，只是偶尔遇上重要国事访问、如联合国秘书长访问莫斯科时，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辆熟悉的“伏尔加”。我间或听到关于准备出第二卷的传闻。诚然，再也用不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取决于我了。

1974 年，即父亲逝世三年之后，回忆录第二卷终于以《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为题问世了。白色的护封上以黑红色表示哀悼的标题刊出一帧父亲冬天坐在林边他心爱的长椅上的照片。

这时他们又想起我来了。我又在莫斯科饭店那间熟悉的客房里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见面。他由始终不渝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陪同。又是旧话重提：回忆录是怎么到了利特尔·布劳恩公司的。

他们给我看了事先拟好的、仿佛是以我的名义致著名美国主编卡津斯先生的信。信相当长。遗憾的是现在我在自己的文件中已经找不到这封信，不知是丢失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给我。我还记得信的主要内容：我在信中把第二卷的出版看成针对我国和

针对我家的挑衅行为，并宣布该书系伪造品，其实就是这么点内容。

据我所知，当时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国务活动家撰写的许多回忆录。附带说说，其中一部分确系伪造。

按照他们的意图，我的信将要引起轩然大波并且损害回忆录的声誉。计划很简单，然而有效。卡津斯是利特尔·布劳恩出版公司所归属的时代公司的竞争者，他将高兴地利用这一天赐良机使竞争对手陷入窘境。

建议是别出心裁的。我说，我得跟妈妈商量商量，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一个人处理。我们讲好了几天之后见面。当天我就全都对妈妈讲了。她问我看过书没有。

“没有，”我回答说，“连见都没见过。”

“那怎么能说这是伪造品呢，你连译文都没有读过，”她合乎逻辑地反驳道。“对一本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书，你不能这样表态。可以照父亲那样写：我们不知道这些材料是怎么弄到西方去的。”

我就这样去参加下一次谈话了。我明白谈话并不轻松，便准备了无可辩驳的论据：妈妈不准。这是真话，而他们是不会去找尼娜·彼得罗芙娜的。此外，我从我的谈话对方的表现看得出来，如今问题不象四年前那么尖锐了。

我把他们事先拟好的稿子又读了一遍，并要求按照妈妈的观点重写。彼此争执起来。我坚持己见。

“把书给我吧。妈妈和我都能看英文书。当然看得不那么快，所以研究

译文大约得用两个星期。如果书的译文与回忆录不符，我就会到处宣布这是伪造品，给谁写信都行，否则就免了吧。我不能写。”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脱口而出：

“我们怎么给您书？我们眼下手头一本也没有。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见过。”

我抓住这句话不放：

“那我怎么能对这本书下断言呢？原来不光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

拉斯卡佐夫明白，他一失言后我们就谈不拢了。只好在声明的行文上久久纠缠，为每句话争来争去。最后总算一致同意搞一篇口气类似父亲四年前那篇声明的东西。照例又让我亲手把信抄写一遍，并亲自写上地址。最后一切都结束了，信即按下列地址寄给卡津斯先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和他的忠实朋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的信交到了卡津斯先生手里，并引起他的兴趣。出现了“帮助”同行陷入窘境的现实可能性。他派手下人到莫斯科来跟我见面，如果我愿意的话，还要发表一组揭露性的文章。

当时我正忙于同父亲墓碑有关的问题，墓碑是由杰出的俄罗斯雕塑家兼画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创作的。涅伊兹韦斯内周围老是有许多外国记者。卡津斯先生的使者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请他向我转达见面的要求。涅伊兹韦斯内不了解这一切来龙去脉，以为这是新来乍到者希望对我进行采访。他提醒对方说，我不会接受采访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方请他相信，不是要我接受采访，而是为一件我很清楚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找我。

涅伊兹韦斯内向我转达了谈话详情，并提出在他的工作室里见面。

我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令人愉快，不过我甚至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感到高兴。寄出的信使我感到不安，如今我有可能恢复对局势的控制了。我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是涅伊兹韦斯内工作室的常客，我的来访早已引不起“大楼”里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那些同事的职业兴趣了。

这一次涅伊兹韦斯内提醒我说：工作室旁边停了一辆带专用天线的汽车。显然，他们要对我们搞窃听。

“只要有他们感兴趣的外国人来，这辆车必到。”涅伊兹韦斯内漠不关心地向我通报说。

我以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旁听我们的谈话不大合适。

我们刚在小房间里安顿下来，就有人敲门——记者到了。他挺认真。我们亲切接待了他。请他随使用点东西。小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些普通的小吃。我们的客人俄语讲得不错，这样交流起来当然方便多了。

每人喝了一杯酒，吃了点小吃。询问了美国的情况。然后谈了谈艺术、宗教。又喝了一杯酒。议论了近来的国际时事。谈了谈持不同政见者。再喝一杯。话题转到涅伊兹韦斯内的创作风格上来。开了第二瓶酒。参观了工作室里的雕塑。

我们的客人什么也不明白。他本想转入此次苏联之行要弄清的问题，我却老是把话岔开。最后他看来是对这一切乱弹琴感到厌烦了。脸上露出明显的困惑表情：他毅然站起来，感谢热情接待。我们相互道别。他更加困惑不

解了。我出去送他上车。

我不知道室外是否在对我们搞窃听。带天线的汽车停在离记者乘坐的“伏尔加”车十米开外的地方。我不想使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扫兴，因此认为最好是不让他听到我们的短暂谈话。然而不能再拖下去了。

客人打开车门，我一把握住他的手：

“请原谅我。屋里有人在窃听我们的谈话。”

他十分高兴地微微一笑，情况终于开始明朗化了。

“请代我向卡津斯先生深表歉意。我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使他产生误解。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回忆录是真的。我都看过，所以就没什么可揭露的了。”

然后我们亲切话别。

这是我国主管机关最后一次企图干预父亲回忆录西方版的生活。此后回忆录即过着一位大国退休政府首脑的回忆录所应有的可敬的生活。不断有人援引回忆录。它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诚然，我国仍然有人继续散布所谓这本回忆录纯系伪造的消息。至今有的人在说起父亲回忆录时，免不了要说：

“要是能有真正的回忆录而不是假回忆录，那该多好。”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接到同楼邻居简·坦皮斯特的电话。她父亲是个曾在苏联工作多年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她生在我国，简直成了地地道道的莫斯科人。我们经常全家相聚。眼下她在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任教。

“我的一位新朋友想同你见面。他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颇有研究，”她说。

我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家里来。于是我头一次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见面，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他把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贡献给了我父亲的回忆录，并因此在新闻界小有名气。他对我国生活的细微之处了如指掌。对他说来，赫鲁晓夫成了十分亲近和能够理解的人。他向我介绍了回忆录的编译情况，介绍了他都删掉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删掉。被删的部分是关于战争、住宅建设的章节，尤其“不走运”的是关于农业的部分。

“他讲了许多关于玉米的问题，想让读者相信玉米的优越性。这对我们说来是不可理解的，没有必要向美国的农场主讲这个道理。”斯特罗布介绍说。

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实际上对于谁编译的回忆录和怎样编译等情况一无所知。对我说来，该出版社工作人员对于父亲回忆录的厚爱甚至可说尊敬，是一件意外的幸事。

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涉及同如何收到回忆录有关的问题。当时正是停滞的后期，谈论这个是不安全的。

我原以为我们此后不会再见面了。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1988年，《时代》杂志莫斯科分社给拉达·尼基季奇娜来电话要求见面，以便就一项重要建议进行磋商。6月中旬，我们在我侄女尤莉娅·列奥尼多芙娜家中同该杂志代表见面了。尤莉娅当初也曾卷入（尽管是间接卷入）同回忆录有关的长篇故事中去。

《时代》杂志那边来的人有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还有莫斯科分社工作人员恩·布莱克曼和费利克斯·罗森塔尔。我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究竟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塔尔波特回顾了我们的上一次见面，也回顾了其他许多情况，然后他说，只要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一天没有出，没有成为其主要对象——苏联人民的财富，他们就不能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补充说，他们准备为此竭尽全力，并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塔尔波特说，时代公司特别感到自豪的是，它有幸成为这位伟人的回忆录的首家出版者。

斯特罗布解释说，他看到我答南斯拉夫《信使报》读者问后，就给他的上司去电话说，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应当去莫斯科，他的主张得到批准。他们就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1988年春天克罗地亚《信使报》记者米龙·雅凯什希望采访我，我就同他见面了。就他提出的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的问题，我解释说，回忆录存放在苏共中央，不过我认为在改革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苏联出版。

这篇答记者问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几家主要通讯社纷纷转发。

我代表我家感谢时代公司这番好心的话语和打算，并说能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根据录音打印的俄文回忆录。塔尔博特回答说，时代公司所有的录音带都已交给哈里曼诺夫研究所。那里保存着一批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讲话录音。

“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查阅这些录音资料。我们也可以不费力气地取出来供你们使用，”他让我放心。

我们约好了下次再见面。过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在7月初接待了时代公司的负责人亨利·马列尔和约翰·斯塔克斯，还有我们的熟人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恩·布莱克曼和费利克斯·罗森塔尔。

马列尔和斯塔克斯没有参加回忆录的出版工作，他们是后来才到这个公司的。他们把一些英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送给我们。我本来就有，拉达和尤莉娅则是第一次得到。

他们再次请我们相信，时代公司认为把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工作胜利进行到底是自己的光荣事业，并且说，根据录音整理的打印材料最近即可送到我们手里。

此后不久，笑容满面的罗森塔尔即来到我家，身后是他的司机，捧着一个大硬纸盒。

“我拿不动，”费利克斯·罗森塔尔解释说。“按照我们原先谈好的全都在这儿了。我的上司从纽约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他祝您成功。”

罗森塔尔走了。经过长途跋涉和多年的分别，回忆录重又归来。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我打开第一包。不错，这肯定是那部稿子，上面有父亲那十分亲切的话语，还有我那尽管不大在行、却很努力的文字改动：

“我的同志们早就一直找我，他们问我，而且不仅问我。他们建议我写回忆录，因为我和我那一代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于是，我重新得到了这一弥足珍贵、但愿不仅是我觉得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不过早在发生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前，我的生活中就曾有过一些变动

和接触，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对赫鲁晓夫的名字

采取了特殊的态度，这些变动和接触使人希望父亲及其回忆录的身后命运将会有所变化。

70年代末期，我接到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的电话，他说，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正在撰写父亲的传记。斯涅戈夫向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况，现在正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要求请我同他见面。

我曾听到许多关于罗伊·梅德韦杰夫的情况。我读过他那本关于斯大林的书《让历史审判》。在当时看来这是异常大胆之举，因而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也对他印象不错，正打算介绍我们认识，却还没有来得及。

我也读过梅德韦杰夫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父亲的书。说实话，我不喜欢。我觉得书中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分析，许多事件讲得肤浅，有些事实被歪曲了，至于说到评价，不管我怎样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并克制父子之情，我都无法苟同：这些评价同当时千篇一律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唯一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说法实在太相近了。

不应忘记不久前那个时期的情况。只是今天报刊上才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我父亲的文章。但当初甚至只要稍微提提他的名字，就可能给作者带来麻烦。

我同梅德韦杰夫约好见面。于是一位两鬓斑白、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坐在我的面前。我们谈了谈他的意图，谈了谈必须客观地阐明历史。看来我们完全做到了相互理解，我们又谈了几次。我向他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作者在写作该书的许多章节时利用了这些材料。

最后梅德韦杰夫带来了改定稿。他说，书已在伦敦付排。这事正好赶上勃列日涅夫去世……

我不喜欢这本书。其中个别篇章充满了不愿接受赫鲁晓夫改革的情绪。只有诸如二十大、裁军之类无可争辩的措施，没有受到抨击。就我记忆所及，父亲在农业方面导致农业机械——拖拉

机和联合收割机产量减少的“不正确”行动受到特别猛烈的抨击。然而今天我国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产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情况，经过清醒分析证明是谁也不需要的。20年前父亲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

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对学校改革进行评论，这个问题并不在父亲优先考虑的问题之列，却是梅德韦杰夫本人最贴近的题目。

总之，无论我怎么努力抛开可以理解的亲属固有的主观主义和清醒地面对历史事实，却都无济于事。在我们12月份见面时，我把这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向梅德韦杰夫讲了。

我们冷冷淡淡地分手了。梅德韦杰夫说，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对过去事件的看法，再说书已送到出版社了。这点没有必要争辩。这里我也说出自己对当年事件的个人看法。

几天后我接到斯涅戈夫的电话。他在评价上比我态度还坚决。

不久，我又在听筒里听到梅德韦杰夫那熟悉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大家都不提上次的谈话。

梅德韦杰夫把他的《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一书俄文版送给我。如今人们经常摘引这本书。它同上次那部稿子相似之处很少，尽管在我看来也有一系列不确切的说法。

我们又恢复了交往。梅德韦杰夫说，他正在写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书，请

我帮忙。我当然应允了。

不管怎么说，梅德维杰夫毕竟是在那个不幸时代唯一研究赫鲁晓夫的历史学家，我为此很感激他。

由于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所开始的变化，可以认真地考虑在我国整理出版父亲的回忆录、恢复他的名誉的可能性。我开始构思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信，但未及写信，安德罗波夫即离开人世。我国上空又开始愁云密布。去找契尔年科提要求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风险。

幸而这段插曲十分短暂。经过久久的思索和动摇后，我决定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写信。

他的讲话、言语和行动都令人感到乐观，使人相信情况会有好转。他的活动的整个风格、精明机智、善于交际、对新事物的追求都使我想起父亲。

我为这封信的措词苦思良久。这封信的作用可是非同小可。最后我下了决心。

我轻而易举地打通了戈尔巴乔夫助手阿纳托里·谢尔盖耶维奇·契尔尼亚耶夫的电话。第二天他接见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旧广场那座熟悉大楼的一号门。我对这里真是久违了。契尔尼亚耶夫详细询问了全部情况，答应近日就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我的问题，这使我惊诧莫名。我原想至少几周之后才会有回音，甚至可能拖上几个月。

看来，新的时代当真开始了。

确实，三四天后我再给契尔尼亚耶夫打电话时，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过了，他们认为根据当前的历史科学方针整理出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忆录的工作颇有现实意义。契尔尼亚耶夫补充说要给我提供一切条件，决定的具体实施由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负责。他马上给了我雅科夫列夫助手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的电话号码，建议我遇到难处时往那儿打电话。

我真是如登天堂！原来还有这事儿！我还老想着我们这里通常的拖拉作风呢。这就叫做新思维！

然而后来才知道，高兴得太早了。不禁令人想起父亲活动后期那坚不可摧的机关委婉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对它们不中意的决定

搞消极怠工。今天新领导又遇到了同样的工作方法。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助手让我去找宣传部副部长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克利亚罗夫。此人马上就同我通了电话。谈话极其客气。他向我保证最近几天就要研究。他没有经办过此事。到时他会亲自给我来电话的一切都开始得很好。那是党的二十七大会后的第一个春天。阳光和煦，心中则可说是小鸟在婉转啼鸣。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我又去电话。原来，这些年不但没有人管回忆录，而且甚至无人问津。只得到档案馆去查找。斯克利亚罗夫又向我保证说，一有消息就亲自给我来电话。

我们就这样互相打电话打了两年。

1987年8月，我们决意再去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的情况是我身在外地，拉达·尼基季奇娜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

又来了一道肯定上次指示的新指示。我开始干劲倍增地给斯克利亚罗夫

去电话。起初是档案馆正在修理。后来呢，又是档案馆正迁往新址。

1988年8月总算找到东西了。我赶快到中央去。拉达·尼基季奇娜已经在斯克利亚罗夫那里坐着了。桌旁还有一位——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莫尔古诺夫，是上级领导派他来协助我们整理回忆录的。

斯克利亚罗夫打开一个结实的硬纸夹，确切他说是硬纸盒，他说，他收到400页，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为什么才400页？其余的到哪儿去了？录音带呢？”我深感不安。

我仔细看了送来的稿子——不是我加工的，但也不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看来，是有人撇开我们动过这部稿子。

拿我面前的材料进行工作不行，要有全部原文来进行编辑，另外还要有录音带来作校对用。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材料没有遗漏和

原文没有受到歪曲。

我在准备去中央时，把波波夫那张取走材料的收据又看了一遍，并且用手抄了一份。我把收据副本给他们看。借助收据可较易找到全部材料。斯克利亚罗夫毫不掩饰他的惊奇心情。这里谁也不知道这张收据。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到9月份再电话联系。

第五章 送别

1971年新年并无不好的兆头。

当然，父亲已十分衰老了，而且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问题甚至并不在于整个没收过程中那种赤裸裸的放肆态度。在最后一次同佩尔谢的谈话中父亲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这也是实情。而今天他根本就不存在。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甚至在正式出版的国家之间的通信集中，致我国政府的信件都署有对方姓名，而我国的信件则含含糊糊地署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报刊上偶尔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必定要加上千篇一律关于唯意志论的提法。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往往宁可提名，只留下“唯意志论”的字眼。

父亲的心中，因原先朋友的叛卖而引起的委屈与痛苦同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状况不妙的消息夹杂在一起。父亲在位时的革新措施悉被取消，又恢复旧的一套，情况却愈来愈糟，商店的货架眼看着愈来愈空。过去的一切努力均已付诸东流，并未达到目的。

“主要的是让人们吃饱穿暖。”父亲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对于内战时期的饥荒和经济崩溃、乌克兰战后的饥荒、弃置路旁的冻

死骨、人吃人现象，他始终记忆犹新。为了使这一切不再重演，为了使我国有资格在世界上那些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中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他曾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全部旺盛的精力。

过去他在位时，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许多想法遭到挫折、失败；而现在呢，父亲看到，在当局的纵容甚至协助下，残存的不多一点东西也给搞掉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似乎整整一生全部虚度了，曾花费多年顽强劳动搞起来的一切都在污水中腐烂了。从风起云涌的6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的体力也已是灯尽油干，离80岁不远了。

1971年初的冬天父亲已大不如前。可以明显看出，机体衰弱了。显然，已经到了那个所有器官一下子全都开始出毛病的生理时刻。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所支配，他伤心地抱怨说：

“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只是白白地活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

我们当然尽量精神振作地反驳他，对这种情绪表示反对，但我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父亲眼看着愈来愈忧郁。显然，这并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他心中某种深刻过程的表现。

尽管如此，表面上生活并无变化。作息时间仍然照旧。我上面已经提到，父亲又悄悄地开始口授回忆录了。

春天到了。如往常一样，4月17日，那些敢于来波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人又聚在一起给父亲祝寿。他仍然不鼓励亲友们这种通常的聚会，嘴里嘟嘟囔囔，但大家的厚意当然使他感到高兴。按照惯例大家都来到草地上，在“游蛇出没的小山丘”上站了一会儿。土壤开始变暖，出现了第一批花朵。大家在菜地里走了一圈。父亲生病期间，田园荒芜——缺少主人关心备至的照料。

父亲在菜畦之间走了走，用拐杖戳戳地面，叹了口气向我们宣布说：

“医生不准干活，所以今年菜地就不种了。”他说这番话心里是很难过

的。大家异口同声地一齐表示反对，连最懒惰的人也不例外。

我们还是齐心协力把菜园搞起来了，诚然，比往常小一些。土壤融化后，来了一些朋友，大家一起翻地，整地，播种。父亲非常满意，他在一旁看着，务使一切都干得合乎科学的要求，还责骂我们“笨手笨脚”，他给大家示范应当怎样平整土地和怎样给菜畦选择好土。

春日里暖融融的阳光、万物复苏的景色使他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父亲仿佛又恢复了常态：精力充沛，老是笑容可掬，干劲十足。只是已经不能自己拿起锄头或铁锹干了。挥舞那么两三下后，他就脸色发灰，呼吸也困难起来，他回去坐在那把形影不离的小折叠椅上。喘过气来后，忧伤地开玩笑说：“如今我成懒汉了。只能发号施令。”

他自己一直不能干活，便满怀希望地盼着周末。“人手”未到之前在脑子里盘算好行动计划。活儿很多。得在两天之内干完过去他自己一周的活。子女们总算盼来了。通常除我以外，有列娜的丈夫——维佳，孙辈尤莉娅和尤拉来得较少。拉达和阿朱别伊更多地是在自己的别墅度周末。

父亲把我们这个他所谓的“生产队”带到地里，分配工作，自己则监督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渐渐使他入迷，他开始发布指示，为我们的差错发火。他终于按捺不住，跑过来开始示范：怎样握锄头或者怎样拔除蒲公英。我们千方百计地把菜园维持下来，执行他在农艺方面的指示。菜畦看来还不错。

夏天来到，7月临近了。我决定在别墅庆贺自己的生日。一帮吵吵闹闹的人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相聚。人人都认识并尊敬父亲，他既高兴看到熟悉的面孔，也高兴同“新人”打交道。我们这些

亲人很有点让他觉得厌烦了。

父亲照例把大家带到菜园里。在听到当之无愧的夸奖后，他必定要对助手们的低劣技能抱怨一通。然后大家一起进屋，他邀请我们接受音乐“款待”。客人们挤满了父亲的卧室，他的电唱机放在这里。

父亲预感到听音乐的愉悦，他开始摆弄象小山一样堆放在安乐椅旁小桌上和窗台上的唱片。我们都知道有哪些节目，但谁也没有去破坏这个程序。

父亲在唱片中翻寻了一阵，笑着说：

“先听乌克兰歌曲吧，我最喜爱的歌。”

大家一致赞成。

于是响起了《我弹起了班杜拉》……最后是科兹洛夫斯基演唱的最令人喜爱的几首歌曲。

父亲坐在安乐椅上，眼睛半睁半闭，嘴唇在翕动，他在轻声地跟着唱。

接下来是俄罗斯民歌、歌剧的咏叹调，最后以鲁斯拉诺娃的歌声作结束。充满激情的歌声使父亲想起了他的青春岁月。

音乐会终于结束，大家在林中徘徊。主要的款待——烤羊肉串需点起篝火。客人们纷纷拾柴禾去了。

父亲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上了他的哈谢尔勃拉特相机，轮到了摄影仪式。

起先是大家在篝火周围合影留念。然后客人们要求与父亲合影。

这是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最后一次聚会……

7月底我打算去休假，想同往常一样开车带帐篷去旅行。后来我犹豫了。我征求父亲的意见。

“你在这儿无事可干。只会碍我的事儿。走吧。”他撵我走。

父亲最受不了的是他身不由己地需要特别照料，因而使亲人不得不放弃自己计划的念头。他最怕成为我们的累赘。

没有特别值得担心的理由，我就出发了。我一路上经常打电话回来，一切正常。一个月后我回来了，打算余下的假期在家里过。父亲看上去同原来一样。

妈妈对我说，我不在时他又谈起自己活着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几次提到自杀。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认为这类谈话不可等闲视之，他同父亲谈了许久，并建议妈妈不要让他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阵发性忧郁症过去，父亲又有说有笑，继续散步了。

8月底，孙女尤莉娅把早就要求见见父亲的叶夫恨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带来作客。父亲见客人来了十分高兴。他们一起呆了几个小时，父亲讲述了斯大林去世、逮捕贝利亚的经过。

父亲退休后，我经常给他拍照、拍电影。过去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干，记录他的每一句话、照下他的每个动作的人实在太多了。家里积攒了成堆成堆的相册。现在没有人来同我竞争了。其实也没有人订购我的作品。但我坚信，早晚有一天我的材料也是历史所需要的。

当时我坚信这必将在我有生之年得以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不足了。我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些材料交给谁？看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完全被遗忘了，有的好心人则卓有成效地用笑料塑造出一个斯大林的侍从丑角、没念过多少书的专门鼓吹种玉米的怪人形象。

那年我搞到一部与录音机同步的电影摄影机。最近几周我起劲地拿父亲同疗养院休养者的会见作试验。

如今该拍叶夫图申科了。我只听到谈话的片言只语，全神贯注地进行拍摄。我记得他们谈起了双方都难以忘怀的60年代，当时父亲曾讲过许多措词尖锐、并不公正的话，使得他同真诚支持

他的事业并产生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家、画家、电影艺术家分离开来。父亲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些会见。如今他反复思考当初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发生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讲话。他对叶夫图申科说，他为自己当初对艺术界年轻人所说的那些尖刻话而深感内疚。

大家一起回到屋里。父亲觉得冷，吩咐上茶。这时该叶夫图申科唱主角了。他讲起了不久前周游全国各地的情况。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的规模全然不知。他说，不久前去了贝加尔湖，会见工人、知识分子，并谈起了斯大林的镇压。对于当时大约有多少人遇难的问题，回答是：两千来人。有人出来纠正说：不止这么些，是两万来人。可见，他们连当时的大致情况都不了解！

叶夫图申科不久即起身告辞。父亲到门廊上送客。叶夫图申科感谢父亲的盛情接待，还邀请父亲到他家作客……

秋天到了。

我的假期结束了，我只是每到周末才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9月5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妈妈到拉达家的别墅去作客。路程不近，约有60公里，这样的出行简直成了旅行。这样父亲的生活更加多样化一些：他同新人见面，获得新的印象。

遗憾的是，这次旅行并不顺利。父亲很不舒服，觉得心里发紧。妈妈让他服了药，他勉强在那把随身携带的小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便提前回家了。

父亲又服了药，尽管并未奏效，不过似乎情况没有恶化。大家决定星期天别去打扰医生。

入夜并未好转，黑暗压迫着胸部，呼吸困难起来。父亲唤妈妈去：为防万一，通往她房间的门是不关的。

“陪我呆一会儿吧，我不知为什么挺难受的。看来我是活不过今年秋天了。”父亲象孩子般惊吓地对她说。

早上别祖比克到了。他看了看，听了听，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不过他建议住院治疗。父亲不想住院，医生也没有坚持。但白天又发作了一次，别祖比克态度就十分坚决了。诚然，父亲也听从了劝告，只是要求让他乘“伏尔加”去。他很不喜欢急救车，他说坐在里面觉得自己跟死人差不多。别祖比克同意了。大家开始等车。

妈妈往我单位上打电话。她说，父亲要住院了。我丢开手头的东西，飞快赶赴别墅。但晚到了一步。父亲已经送走。家里只有妈妈一人，她心神不安，有些叫人觉得可怜。她仿佛试图自我安慰，对我解释说，父亲不是心肌梗塞，这就好，不过自我感觉很糟糕。“或许会熬过去吧。”她信心不足地最后说。

我习惯性地录有父亲最近一次口授材料的磁带取下来，装进自己的公文包。又往录音机上安了一盘新带。我在父亲的安乐椅上坐了一会儿，心乱如麻。

别祖比克终于来电话说，他们已平安到达，父亲情况尚好。暂时不能同他讲话：他已被送到病房，然后要照心电图。晚上可以去看他。

有一次父亲病倒了，我问过医生别祖比克这赫赫有名的“情况尚好”是什么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看天花板，小声对我解释说，父亲年事已高，随时可能出事。如果很难预料，我们说“不好”。此外无论何种情况都用“尚好”……

父亲又进了医院，又是老一套情况尚好。

晚上我去看他。他气色不错，精神满好：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来心脏没事儿了。他不让我久坐，半开玩笑地撵我走：

“不必在这里浪费光阴。怎么，你没有事情可干？回去，问你家里的人都好，别影响我，瞧我工作多忙：到时服药，量体温。这儿不让我们感到寂寞。明天带几本书来看看。”

语调也好，话语也好，都已十分习惯，我不禁受了影响：一切正常，很快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我第二天带去的书已经用不着了——夜间突然发生最严重的心肌梗塞。医生甚至避免让父亲去复苏病房，担心他经不起颠簸。

我悄悄走进病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床边挂着的输液瓶。父亲看上去很不好：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并时断时续。他已经离不开氧气，不过还有呼吸。氧气靠两根透明管接到鼻孔旁。透明管用胶布贴在脸上。父亲还有精力开玩笑，他对在床前值班的护士说：

“我的胡子弄乱了，请您给整理一下吧。”

他周身挂满了传感器，荧光屏上又是那条绿线在闪现。

别祖比克没有安慰我，他说父亲的情况特别严重，随时都可能死亡。唯一的希望是父亲的机体在他那个年龄算是相当健壮的。

我当然愿意相信任何乐观的估计了，可是……一天过去了，而情况并未

好转。

这些天来我们大家——妈妈、姐妹和我在父亲床头轮流守候。星期四早上，我打算下班后去医院，便给值班护士去了个电话：

“还有呼吸。”她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便把电话挂了。

我奔向医院，医生解释说，昨天夜里情况极其糟糕。父亲出现了钱恩—斯托克斯式呼吸，不过抢救过来了，病情稍稍稳定下来了。

我从1953年3月发布关于斯大林的病情公报那时起就记得钱恩—斯托克斯呼吸这个赫赫有名的术语。这个词散发着坟墓的冷气，它意味着必死无疑。

我小心翼翼地把门稍稍推开，往病房里瞥了一眼。父亲躺在一张高高的床上。他见了我想笑，却笑不出来。我坐了一会儿，试图讲点什么事情，却老讲不下去。父亲闭眼躺着，——不知是睡着了，还是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不，他睁开了眼睛。

“走吧，”他含糊不清地开起了习惯性的玩笑，“没见我正忙着吗。别浪费时间……”

我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妈妈、拉达和列娜来替我的班。星期五，父亲稍有好转。举行了一次会诊，大家确认病情与病历所载的昨日病情相比，不是极其严重，而是十分严重。不过，就连这个说法也使人产生了一线希望。

第二天，9月11日，父亲又略微好了一些。我去电话时妈妈正在医院里，谈到父亲的病情她是这么回答的：

“这儿人很多，我和拉达都在，所以你现在别来，要不他会发火，会撵我们走的。我们再坐一会儿就走，你晚点来。”我下楼到院子里备车。过不一会儿我得回屋取个东西，就上楼了。还没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声。我跑过去拿起听筒。这些天每次来电话都让人担惊受怕。

这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父亲情况很不好。赶快来。”

5分钟后我就到了，却不让我进病房。

妈妈坐在走廊里的木制长沙发上：

“我出去了一会儿，我一回来……就见医生们在给他做什么……是复苏医务人员……他们让我出去。我只听见他们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吸气！’”

我坐在妈妈身边，护士和医生们从旁边跑来跑去。谁也没有理睬我们。我看到最近在父亲身边值班的那位熟悉的护士。便急忙过去。

“很，很不妙。”她边走边摇头道。

“没希望了吗？”

“是。看来是……”

我走到妈妈身边，说情况很不妙。她表情呆滞。

名叫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值班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了。我们认识她已有许多年，因为她很早以前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她默默地坐到妈妈身边。

“他很疼吗？”妈妈有些慌乱地问道。

“不……现在已经不大疼了，”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压低嗓门回答说。

这样的回答看来使妈妈产生了某种希望。她又开始问起什么来。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沉默不语，半天不回答，后来才下定决心，搂住妈妈，

小声他说：

“他死了。”

妈妈哭了起来，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也在她身边哭。

我打电话回去，半小时后家里的其他人全都来了。人们把我们带到旁边的一间空病房里，让我们先等一等。妈妈哭着。过了一会儿，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叫我过去，准许我走进父亲的病房。

在病房门外的楼梯口，三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贪婪地抽烟，他们是复苏医务人员。他们以同情的眼光目送着我。

我独自走进病房。父亲已面目全非。他完全是另外一张陌生的面孔：鼻子变尖了，出现了鹰钩鼻。下颌部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他的下巴。墙上溅满殷红的鲜血，好大一片。这是复苏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后留下的痕迹。

我的嗓子眼儿一阵抽搐，但我明白，不能让感情自由宣泄，不能失去自制，还需要精力。我站了几分钟，手触到父亲的脸上，脸愈来愈凉。我在前额上亲吻一下就出来了。我两腿发沉，脑子里一片混沌。

我走进我们全家人所在的那间病房。不禁想到妈妈看见父亲时会有多么难受，于是我有口无心地问道：

“要不你这会儿就别去了？”

“瞧你说的！”她很吃惊。“一定得去。”

大家都来到父亲的身边。坐成一圈儿。我站在后边紧挨窗户的地方。静默不语地坐了一段时间。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一直仔细看着妈妈，她附在我耳朵边上说：

“该离开了。给尼娜·彼得罗芙娜说一声。”

我们走了出来。太平间的带担架两轮车已在门外等候。他们把父亲推走。我们护送着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了。大家往出口走去。

路上，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用旁人听小见的声音问道：

“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有金牙套吗？”

“有啊，”我不解其意。

“有几个？”

我耸耸肩膀。她没有向我解释，到了太平间前总理的金牙套照样给拔掉，那里可是人人平等。而我对生活的这个侧面根本不了解。

我们来到下面。父亲的专车在门口等着妈妈。

妈妈和姐妹们上了车。

一切都结束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稍等，一会儿，”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犹豫了一下。“死亡证明书、葬礼的事情怎么办？”

这时我终于明白过来，往后还有一大堆麻烦事。过去我没有接触过葬礼的事情。

这些年来，同父亲有关的一切问题、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是通过卫队长进行的。要求和希望都是向他提出。他点点头，并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星期之后带来不具名的答复：什么事可以，什么事不行。

我跑到医院去找最近管卫队的孔德拉绍夫或是洛德金，但他们均已不见踪影。他们的被监护人一死，他们的职能就算完结了。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夫娜知道我指望不上，

便亲自出马。我们来到医院的值班室。

一张大桌子上放了一排电话机。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列宁图书馆的灰色大楼。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坐到桌旁，信心十足地拿起手边的一个听筒。然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的挫折。我看不见也不认识的谈话对方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他们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应当由另一个单位的人来拍板。他们绝对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便匆匆结束了这次他们觉得“危险”的谈话。

最后，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把电话打到她的一位上司那儿，但此人也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可否把死亡证明书给我？

葬礼如何举行——按国家要人规格还是按照个人规格？

一切都发生在星期六，我们当然想尽快把有些事情问清楚。她说，死亡证明书可在尸检后给我，眼下则什么也不要干。

不难理解，同父亲的去世和葬礼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将在最高一级解决，现在谁也不会出面张罗。

我尽管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脑子不大听使唤，却仍然很清楚往后的事情都落在我身上，所以渴望采取行动。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安慰说：

“过一两个小时一切都定下来了自会通知您。”

我终于明白了我无论怎么想干点什么都无济于事，便驱车回家了。家里空无一人，全都去了彼得罗沃达列涅耶。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徘徊。想起了一些片断，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父亲的样子，当时我觉得这很重要。喉头再次便住，我哭了。过后我好受点儿了——我再次控制住自己。

意识到下面这点十分痛苦：就连父亲死后的命运也要由异己的、敌视他的人来操纵，这些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使赫鲁晓夫的名字淹没在官方的报道中，甚至根本不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不幸。

我对此无法容忍，便决定自己采取行动。去世的不仅仅是我

的父亲，而是一生做了许多好事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尽管如今对他缄口不提，甚至讲他的坏话，但我知道，也还是会有人同情我们，并同我们一起在他的灵前默哀的。

我拿起听筒，拨了我所熟悉的一名英国记者的电话。通过他全世界都可知道这条消息。他马上拿起听筒，仿佛在等我的电话。他向我表示了哀悼，但从声音可以听出这是发自肺腑的。他尽量安慰我，并劝我不要自己主动采取什么行动。

“别瞎忙。快去帮助母亲。你自己什么也办不成。要等待。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你只需服从就是。晚上再通电话吧。”他清醒地判断道。

这个主意有道理，我决定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临走前给别墅去了个电话。是列娜接的电话。

“这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回来就发现房子上了锁！门口站着卫兵。只要上司不发话，他就不想放我们进去。妈妈当时就打算往回走，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

诚然，两名卫队长很快到了——看来，他们是在向上级报告后就回来了。所以把房门打开了，但父亲那间房不让进——贴上了封条，门口站着哨兵。

列娜是我们家公认为最不妥协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她更是义愤填膺：她快要气炸了。

我家的生活总是以父亲为中心，这已成为惯例。每迈一步都不禁要拿父

亲对某种行为会怎么看来检验一番：看他是夸奖呢还是保持沉默。

因此，他的去世对我们说来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可亲可爱的人；似乎事物之间的联系瓦解了，我们生活的进程受到破坏。这扇贴上封条的门仿佛就成了这一坍塌的象征。

我前往别墅。

列娜所讲的事情经过，我并不感到意外。谢尔戈·米高扬已

给我讲起过类似的情形。近几年这种做法已成惯例：千万别让什么文件丢失了。我想，这类行动的依据与其说是害怕泄露国家机密，倒不如说是担心发现有关迄今健在的领导人的评价、笔记。专门抽调人来干这项工作。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失掉亲人的家属会是什么心情，倒是没有人去操心。同样，诸如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这类小事，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安的。

半小时后我来到别墅。这段时间内尚未出现新的情况。站在父亲卧室门口的哨兵左右脚替换站着，从他那慌乱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不自在，为大家感到羞愧：既为自己在这一悲痛的时刻讨厌地呆在人家家感到羞愧，也为那些派他来的人感到羞愧。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只是尽量不去理会他罢了。

我去找孔德拉绍夫，弄清下一步的安排和我们怎么办。他说，中央要来人检查父亲的私人物品并作出处理决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准备接受搜查了……

夜幕降临。但情况并无变化——我们没有得到从外面来的任何消息。我终于忍不住了，又来到卫队值班室。原来消息是有的，但孔德拉绍夫竟然认为关于成立了一个以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波戈柳波夫为首的清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档案工作组的消息不必通知我们。该工作组成员阿韦季相和库夫申诺夫已在来别墅的途中。库夫申诺夫我认识，他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曾为日常生活问题同他打过交道。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阿韦季相我则是头一次听说。

我打算预先通知妈妈，以免对这两位到来太感突然，但我还未及结束同孔德拉绍夫的谈话，汽车就开到了门前。下来两位身着深色衣服、头戴深色礼帽的人。他们在门口踏步，没敢往里走。库夫申诺夫我倒认出来了，另外那位中等身材、戴一副金色细镜框眼镜的人，想必就是阿韦季相了。

我同孔德拉绍夫一起出去迎接他们。库夫申诺夫表示鼓励地跟我握手。我请他们进屋。孔德拉绍夫跟在我们后面。他们向妈妈表示慰唁，并为闯入私宅深为抱歉，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的程序，而且并非他们制定的。他们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他们把哨兵支开，撕掉封条，把门打开，手里就有门上的钥匙。又问我们要了房内保险柜的钥匙。

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文件和录音磁带。我还记得没收回忆录材料的经历，便保持沉默，干预也无济于事。

清理完保险柜，又往下进行了。录音磁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收走。对我们的解释不予理睬：音乐磁带，早操录音，空白磁带，见什么装什么。妈妈不知怎的很不愿意交出早操的磁带。喊操人开始的话是：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早上好！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我们软弱无力的抗议并不奏效，客人们丝毫不为所动。诚然，答应在听完把没有历史价值和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所有材料如数归还。的确，早操磁带几个月之后在多次提醒下还回来了。其余的磁带，包括原打算用于回忆录

的空白磁带，都留在那里了。

清查父亲的文件并没费什么周折。他实际上没有档案。他的全部公文都放在中央，回忆录去年收走了，而来往信件又引不起我们“客人”的兴趣。

他们有条有理地对房间进行了检查。所有的抽屉、盒子、衣柜都一一看过，又把堆放在安乐椅旁边桌上和窗台上的书翻了个遍。凡是感兴趣的纸片他们都要仔细察看，再给妈妈过目，阿韦季相随即装进他那个其大无比的公文包。不知为什么唱机竟引起了特殊的注意。

列娜和我张皇失措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一言不发，如前如述，我知道任何干预都毫无意义。我已经有过体验了。列娜却怒火满腔，老说些挖苦话。当阿韦季相在窗台上的书中找到一

首打印的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斯大林的诗，看完后往公文包里塞时，列娜按捺不住了。

有一次列夫·安德列耶维奇·阿尔齐莫维奇偕妻子涅拉前来向父亲祝贺生日。这首诗是他们送的礼物。列夫·安德列耶维奇在角上写下了致父亲的意味深长的献词。原文我记不清了，不过其中讲到镇压，讲到二十大的清风。总之，毫无反叛的东西。就是这篇献词引起了阿韦季相的特别注意。他问诗是谁写的，听说作者为曼德尔施塔姆，他哼了一声，又问加写上去的话出自谁的手笔。

这时列娜控制不住，愤怒地对阿韦季相说，他没有权利没收院士给父亲的礼物，这是我们全家的纪念物。

他们默默地听完了列娜的驳斥。等她一口气把话说完，阿韦季相以平淡而安详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解释说，附有阿尔齐莫维奇致赫鲁晓夫献词的曼德尔施塔姆诗篇是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因此应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怒气冲冲的列娜跑出去了。

还没收了什么呢？我记得有中央主席团庆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信原件，信上有全体主席团委员的亲笔签名，我已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了贺信的全文。这里提醒一下，信中说他们全都为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和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幸福，祝他健康长寿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封贺信当时曾在各报上刊载。没收这封贺信是理所当然的。今天贺信中的措词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

可为什么要把由加里宁签署的勋章证书收走呢，我们始终弄不明白。此外再没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阿韦季相同志要我们一旦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就向中央报告。他强调说，同赫鲁晓夫一生有关的一切文献都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

我已经懂得这种话值几文钱，妈妈却诚心诚意地提出：

“我保存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录有他声音的唱片、历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

阿韦季相说，这些材料可以留在家里……

外面天色全黑了。我看看手表：8点刚过。

但是我们的客人一直没有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报

奥·谟·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苏联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

列·安·阿尔齐莫维奇（1909—1973）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在他领导下首次获得物理热核反应。

道和在什么时候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及如何举行葬礼。

我一直等着他们提到这个问题，可奇怪的是竟然没等上。工作组大功告成，打算离去。直到这时我才问有没有关于葬礼程序的决定。原来有这个决定。是他们自己没有想起来，因为一直操心别的事情。

一切都安排好了：葬礼将是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在新圣母公墓举行。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在星期一公布，同日上午 10 时在孔策沃医院遗体告别，12 时举行葬礼。安葬费用由苏共中央承担。

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毫不拖延。库夫申诺夫留下了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要是举行葬礼方面有什么问题，请直接找我。”

妈妈说，她已给基辅去电话。明天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和丈夫、其他亲戚就到了。

这时我才明白，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人们最早在举行葬礼时才能听到，甚至还要晚。当然啦，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并非偶然。我决定凡是能通知到的都打电话通知，以便让尽可能多

的人知道葬礼的消息。我气愤到了极点，我一度强烈地希望粉碎这一卑琐的可憎的挑衅行为。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认定他们的这类行为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我们的任务是体面地安葬父亲。

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给我的朋友英国记者去电话。他对我说，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播发了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而且播发了长篇评论、分析文章，这些报道总的调子是肯定的，没有攻击。对父亲在贯彻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也指出了他所做的其他好事。“打开收音机听吧，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你的父亲。”他最后说。

心里好受点儿了。在一连好多个小时的紧张之后，十分需要听听善意的话。

我把这次谈话内容对家人讲了，又坐到电话机旁。我给朋友、熟人去电话，通知葬礼的时间，他们免不了慰唁一番，我则让他们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人。

当然，我马上就想到米高扬。我很想邀请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参加，他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 1964 年 10 月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唯一支持父亲的人。同时我也知道，米高扬处境困难，他同父亲一样，不受当权者欢迎。他若在葬礼上露面可能被当成一种挑战。我踌躇再三，拨了谢尔戈家的电话号码。他在家，却还一无所知。

他向我说了一些表示同情的安慰话，保证一定去告别，并说今天晚上去别墅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

我在给朋友和熟人打电话时，突然想到既然定在 10 点告别，那么大家天刚亮就得起床：要到郊区的孔策沃医院去啊。当时这比现在要复杂得多。那可是地地道道的郊区。

我同家人商量后，决定给库夫申诺夫去电话，要求把开始告别的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时间已是晚上了，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他特别客气，却寸步不让，因为他显然接到了死命令，于是库夫申

诺夫表示，决定已经作出，再找不到另外的告别室，告别时间也不能动，还有其他死者呢。那里也排着队。那些人也很难过。再说葬礼的时间也根本不能动。

看来，他很不乐意老讲这话，便换了个话题，说明天要在墓地上造坟。他建议我去看看地方，如果不中意，可另选一处。他答应给公墓去电话，作一些必在的吩咐。

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一美意特别重要：我们找到了一个显眼的、便于瞻仰的地方来造坟。

老实说，我们都盼着政治局委员中会有人打电话来。因为父亲同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的人岂止是共事了几十年：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父亲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家很有交情，过从甚密，他们对妈妈和我们全家都了解。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政治上的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诚然，为了懂得这一点，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素质。

他们当中一直没有人来电话……

夜深人静时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想避开窃听，便来到门廊上。我们就在寒冷漆黑的夜晚坐在一张长椅上，收听突破自然干扰和干扰台的噪声传来的各种各样的“之音”。除莫斯科电台外，它们都在讲父亲去世的消息，都在宣读有关的报道、评论、回忆。

广播中也传来了致苏联政府的第一封正式唁电。发唁电的是当时不大知名的马达加斯加政治活动家、后来成为该国总统的拉齐拉卡。看来，马达加斯加那边的人对我国内部相互关系的微妙之处不大了解，却挺懂国际礼节。

吊唁的函电给部长会议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谁也不知道拿这些函电怎么办。然而毫无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很快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我们从邮电局一再道歉的邮递员手里收到一封又一封肮脏的、漫不经心地撕碎的公文，那都是政府首脑、总统、共产党领导人、社会活动家的信函，还有

来自怀念和尊敬父亲的人的最可宝贵的唁电和唁函，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新年前才告结束。邮件数量很多……

唁函唁电积了不少——整整一手提箱。我翻弄着一束束唁电、唁函，随便挑出几份来。这里有铁托和卡达尔、范范尼和吉科宁、杰克琳·肯尼迪和汤普森大使一家、农场主哈斯特一家和雷里赫一家（父亲对哈斯特一家和雷里赫一家怀有特殊的亲切的友情）……这里当然不可能一一列举。

信件有的寄到家里，有的寄往我姐姐拉达所在的《科学与生活》杂志，也有干脆寄往莫斯科赫鲁晓夫遗孀名下的。许多唁电唁函一直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其中包括马达加斯加的那封，这些函电我们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的。

这年年末和第二年年初，妈妈一直在写回信，感谢人们的慰唁。诚然，我想她写的信也并非每封都送到了收信人手里。

其中的一封回信有着特殊的经历。

院士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就父亲去世写来了十分亲切的话语。他已经很不受欢迎，而他同当局的龃龉早在父亲执政时即已开始。50年代末，在我这位年轻的工程师眼中，他——最年轻的院士、“氢弹之父”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我同他甚至连点头之交都谈不上，但父亲经常讲起他的经历，对他甚至可以说（我找不到别的词儿）有点崇敬之情。

就连他俩在我国于暂停核试验之后恢复核试验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关于在新地爆炸一枚数百吨级特大装置决定的道义方面的争论也对此并无妨碍。他们互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赫鲁晓夫胜利了，因为他握有实力。主意由他来拿。那一系列试验以震惊世界的爆炸而告终。

这次顺利完成的工作照例又是以颁奖作结。这次颁奖面特别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通常是不仔细过问这些事情的，由各主管部门拟好名单，中央主席团只需草签嘉奖令。人们向父亲汇

报说名单已经拟好，只需获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发颁奖令即可，当时我偶然在场。事情发生在别墅。

父亲问助手，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名单上有没有萨哈罗夫院士。在此之前萨哈罗夫已两次获得英雄称号。

结果没有萨哈罗夫的名字：据说他没有积极参加，而且反对进行试验。

父亲感到气愤。他高声说道，这太不象话！萨哈罗夫对我国国防贡献很大。即使大家观点不同，但每个人都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干的是国家领导人工作，而他干的是学者的工作。他们进行争论，发表或讨论各种观点、作法。这是好事。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我们不同意萨哈罗夫的意见，没有听从他，这样对他的嘉奖就更能说明政府对他的观点是何等地尊重。要同萨哈罗夫这样的人谈话，劝说他们，他们许多事情都不懂，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远离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许多波折，殊不知这方面的肮脏东西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且萨哈罗夫的见解无论多么天真幼稚，却很有意思。这些见解都发自内心，出于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愿望。应当听取这些意见。

这样，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就第三次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他们各自踏上了艰难的途程。父亲退休后目睹萨哈罗夫院士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继续彼此疏远的过程，感到痛心，他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交谈，而不应训斥。要听取他的意见，同他展开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才能取得共识。他们却把他当成自己的敌人。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沿着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小径散步时，父亲不止一次他说到萨哈罗夫的遭遇，说来难于置信，但他俩——赫鲁晓夫和萨哈罗夫却都同样处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位。诚然，就不同意当时政策这点而言各人的角度不同，但主要之点没有变，即他们关于

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正的想法根本没有人需要，若是根本没有赫鲁晓夫、萨哈罗夫和其他许多到头来在祖国找不到安身之处的人，那就太平多了。

眼下妈妈就萨哈罗夫的唁函写好了回信，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寄到萨哈罗夫手里。尽管知道地址，但通过邮局是肯定交不到的。我决定亲自送去。不必隐瞒，我很想认识萨哈罗夫。

需得驾车走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区去。当时又在开始对我盯梢了，因此我在驶近索科尔的沃洛科拉姆公路岔道口时发现两辆熟悉的“伏尔加”并不感到奇怪。

我在休金的街道上转来转去，却老是找不到要去的街道。我在询问了稀稀落落的几个行人后，才终于找到了那座楼。车开不过去，前面没有路，只好顺着楼房周围的小道往前走了。我的“护送队”落在了后面，也许他们的同事在前面等着我呢。我急躁不安地找到了单元门。门口空无一人。待我爬上楼梯后，才听到下面有谁的脚步声，我按铃后很快有人应声，门开了。我报了姓名。唉，等待着我是失望。萨哈罗夫不在家。我们未能见面认识。只好让人转交回信，然后离开，单元的大门口有两个身材高大、穿风雨衣的

人在交谈。我们互不“理睬”，各忙各的事情，他们同偶然过路的人有何相干呢，归途中，我再也不想从后视镜中去细看我的陪伴者或是从其他汽车中把他们找出来了。不用看就知道他们在尾随跟踪。我驱车回家，想着命运的奇怪之处：我穿过一个个昏暗的小胡同，为的是向杰出的科学家转达谢意，感谢他对我国前政府首脑的吊唁！……

往后还有一大堆忧愁的麻烦事呢。

星期天我们去新圣母公墓。原先我曾来过一两次。现在我必须把这个新地方的许多问题搞清楚。因为我就要成为这里的常客公墓管理处主任在等着我们，他姓阿拉克切耶夫。这个姓让

我大吃一惊，因为那几天所有的巧合我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后来我们处得很融洽。原来这是个特别正直和坚持原则的人。可惜当公墓关闭起来不准自由进入时，上司认为他不算特别好使的部下——他建议组织集体参观、印发人名录。在一次争论激烈的党内会议后，新来的主任走马上任了……

人们把我们往远处的墙边领。在快到右墙角的地方挖好了一个墓坑，由此开始了新的一排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已经想到过墓碑了，可这里无法靠近，转不开身。坟墓与小道之间隔着一个无法通过的浓密树丛。

我问可否把坟墓迁至那条横贯公墓的宽阔林荫道上，那里空地很多。现在那里葬有扬格尔院士、原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勃列日涅夫助手楚卡诺夫之子和其他人。我的随行者商量了一下便拒绝了：绝对不行。我明白，那地方太招眼，太显赫。

“那么也许可以就在同一排、只是靠小路近点儿的地方挖墓穴吧？”我央求道。

这次没有人表示反对。

挖了新的墓穴，我站在一旁，直到掘墓工人把活干完。原先挖好的墓穴并没有空多久。12月，我国杰出诗人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即安葬于此……

我们办完公墓上的事情后，回到家里，大家都在为明天作准备：收集勋章，洗涤酬客宴所需的碗盏，摆好家具。我和维佳则寻找一张适宜这个场合的父亲相片。选了一张十年前的相片，又用塑料布裹起来，以便防雨。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城市的亲戚陆续到齐了。有些人在城里的那处住宅里过夜，有些人则来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屋里坐满

了人，晚上又听广播。世界各国都在就赫鲁晓夫去世发表评论。莫斯科却仍然保持沉默。

要给所有新来的人安排过夜的地方。床位不够，沙发全占了，又安上折叠床。只有父亲的房间空着。妈妈让我在父亲的床上过夜。我有些犹豫，有点害怕——一星期前他还在这儿睡过……不过我二话没说。躺下了。整夜都在想父亲，望着天花板，回忆起不久以前的一些往事……

出殡的那天是9月13日，星期一，大家早早地起床——要在10点前赶到孔策沃。我赶快去取报纸。《真理报》没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在第一版下方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

19世纪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时代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曾推行残暴统治制度，后来阿拉克切耶夫即成为军警残暴统治者的代名词。

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1年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

措词引人注目：类似的消息中过去都说“极其沉痛”，而这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都值得“极其沉痛”地哀悼。后来有人对我讲，起初只想在最后一版加个黑框报道，但据说总编辑坚决反对，以辞职相威胁——他可是要对全世界负责呀。

在此之前，无论在位或离任的国务活动家去世的消息总是配有讣告，讣告按级别放在第二版或者末版。这一次看来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因此就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沉默。

看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过后果，从此开了一个先例：如今出现了新的规矩，退下来的原任部长都登讣告，而退下来的原任中央主席团或政治局委员则不登讣告。这成了惯例。后来，当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在父亲之后去世时，就受到这样的对待。如此沿袭下来。布尔加宁，基里连科、别尔乌辛和其他许多人的丧事莫不如此办理……

妈妈硬要大家把早饭吃了——往后是极其紧张的一天。吃饭不香，但只好服从。终于向太平间进发了。

在去孔策沃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要立墓碑。要找到一个符合父亲人格和遭遇的不同寻常的设计方案。但怎么去做呢？从何入手？我一个雕塑家也不认识，同这个领域相距甚远。再说还有谁肯干呢？有些人胆子小，父亲在马涅日又同有些人闹翻了。他们未必肯干……

我们来到医院的告别室。不大的红色砖楼，狭窄的小告别室，只供亲人告别用的。楼前聚集了一群人——主要是外国记者。大家都很克制，也很客气。我们一到就给闪开一条道来，什么问题也没问。朋友们的熟悉面孔也一一闪过。库夫申诺夫和阿韦季相已事先通知我们，葬礼纯属家庭葬礼，国家不参与这项活动。

灵柩前只有我们这些亲友送的花圈，此外还有一个不大的花圈，上面写着：“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千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敬献。”

其实，国家毕竟还是参加了葬礼，周围站满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院墙外的小树林里则停放着装甲车，士兵们全副武装。指挥员来回踱步，用步话机在报告什么。总之，俨然是临战的气氛。

人终于到齐了。我们的人不多。当天要到告别室来可不那么简单。而且，医院远离市中心，在通往告别室的路上就开始检查证件，必须证明确系我家的人或是我家亲友，方可继续前行。其余的人则根本不予放行。

大家都来到告别室。灵柩旁是一排为家属准备的椅子，靠墙也有椅子。不过没有人坐。哀乐声起。亲人和一批老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人早年曾同父亲在顿巴斯共事）在灵柩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形。我们的朋友、我单位上的同事、邻居也来了。记者被拒之门外。

官方人士自成一体：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谢·帕夫洛夫，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来自克格勃吧。

父亲躺在棺木中，表情严厉，丝毫不象本人，一副陌生的、异己的面孔。

站在灵柩前的妈妈拉我的手。我俯身过去，她悄悄问我，是否打听到了追悼会在何处举行，都有谁发言？

我表示否定地摇摇头。

“去打听一下吧，”她央求道。

她的脸上老是十分痛苦的神情，但她没有哭。看来，追悼会的问题早就在困扰着她。她认为一个同社会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人的葬礼没有这种场合下已成惯例的仪式是无法想象的。

我明白，当局最不愿意看到任何演说，因此才作出了举行单纯家庭葬礼的决定。当时我很不想同他们发生争吵，违背他们的意见，仅仅是简直没有精力来干这个，何况我并不特别看重墓前演说。但妈妈有这个要求，当时我自然根本不能考虑拒绝她的要求——眼下任何小事对她说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向帕夫洛夫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因为葬礼是非官方性质，所以不拟举行任何追悼会。他的这番回答我无法对妈妈讲。

“要是我讲上几句话，也许哪个朋友再说上两句，您不会反对吧？”

可以感觉出来，我的谈话对方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显然并不喜欢这个使命，看来他打定主意不越雷池一步。帕夫洛夫耸耸肩膀说：“那就请便吧。”

我对于自己必须讲话这点并不怀疑。在我还不知道是否举行追悼会时，为防万一就已经考虑过讲些什么，打过腹稿，可我总不能一个人讲吧，我走到老共产党员面前，问他们准想讲话。他们窃窃私语一阵，一名妇女说：“加夫里沙·皮利片科能讲。你找找他。”

然而皮利片科拒绝了，他推说有心脏病。旁边站着一名个子矮小、头发花白的妇女——纳杰日达·季曼施泰因，也是早年在乌克兰就认识父亲的，她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我想再找一位年轻点的，这样既有人代表者同志，又有人代表年轻一代。我见特鲁宁和叶夫图申科站在一起。我想起叶夫图申科不久前来看望父亲，想起他俩的长谈，认为他是不会被吓倒的，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我当即请叶夫图申科讲话。

开始他有点慌神，过了一会儿他说，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他说道，沉默倒是更加意味深长。

我向特鲁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跟他比较好办，我们有多年的交情。他也不想讲话。我理解他，这一切可是都要录音的，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需要我可以讲，可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拿主意吧，我听你的。”他说。

但我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特鲁宁几乎不认识父亲，他今年在别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父亲见面。我走开了。

瓦季姆·特鲁宁后来责备我说：他从告别室到公墓这一路上都在作准备，可我没有叫他讲。

我遇到瓦季姆·瓦西利耶夫，他从大学起就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父亲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遇难，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不会胆怯。“是，我当然要讲。”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就在我张罗追悼会的当儿，告别时间已经结束，该往公墓走了。我走到妈妈面前，向她讲了追悼会的事情。自然绝口未提我跟他们交涉的过程。对她说来，中央的态度很重要，我这番话对她也是个安慰。

告别室里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大尤莉娅和小尤莉娅号陶大哭，拉达表情呆滞，妈妈软弱无力。

大家都已走出告别室，我同家人留了下来。这是最难受的时刻。妈妈鼓足全身的力气，难能可贵地坚持下来。拉达一直在她身边。

我们都亲吻了父亲。太可怕了：前不久这还是个神气活现、活泼好动、快活乐观的人，可眼下嘴唇接触到的却是某种异己的冷物……

我保存着一张照片，它记录了出殡的情景：有安东·格里戈里耶夫——大剧院的歌唱家，有瓦列里·萨莫伊洛夫、谢苗·阿利涅罗维奇——我在特种设计局的朋友和同事，有米沙·茹科夫斯基——教授兼医生。

我们上了大轿车，中间是灵柩。我们出发了。警车开路。我们后面是门诊部的汽车，车上载有护士以防万一，然后又是几辆小车。接下来是记者的车队。

我们刚刚从包围着告别室的小树林出发，士兵即蜂涌而来——他们在林子里聚集的人数比起初看上去要多得多。

我们上了鲁布廖夫公路，现在已行驶在库图佐夫大街上。我们畅行无阻地通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汽车开得非常快。在我看来，其速度之快与送殡的车队不大相称。前面就是博罗金斯基大桥了。这里是不能向左拐弯的，但过桥后为此特地设立了交通岗。明白无误地伸向左边的指挥棒挡住了车流，我们毫无阻碍并出乎我意料地拐向滨河路。就是说，我们不走花园环行路了。显然是不愿意让我们从行人众多的街道上通过。

我们驶近新圣母公墓了。周围是封锁线，部队，而封锁线外面是三五成群的人。我们驶进大门。当年公墓是对外开放的。因此那张“今日公墓不开放。打扫卫生”的非同寻常的通告就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开进去了，其余的汽车都停放在入口处。汽车经过总是有个木制讲台和放灵柩的底座中央广场。今天那里空无一物，东西都撤掉了，以防万一。

据当时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生活服务和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主管公墓的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库里利奇克回忆说，上级早在前一天即星期日就开始因可能在公墓搞追悼会而感到不安了。中央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家里找到他，目的是打听公墓有无讲

台。在得知讲台安在举行仪式的广场上时，便下令把它撤掉——防止举行自发的追悼会。库里利奇克满有道理地反驳说，讲台有也好，没有也好，都起不了决定作用，他建议宣布公墓当天打扫卫生。诚然，他也把讲台撤了。库里利奇克还指出粗暴违反公认的葬礼礼仪的一例：汽车不应开进公墓。

看来，当天主办者已经无暇顾及礼仪了。

我们开到尽头停了下来，再往前是一条无法行车的狭窄小道，最后几十米灵柩是由我的朋友抬过去的，他们是尤拉·杰多夫、尤拉·加夫里洛夫、沃洛佳·莫杰斯托夫、别佳·克里梅尔曼和其他许多人。

趁把灵柩安放在墓旁的金属支架上的当儿，我赶到大门口去，得把所有的人都放进来。我往大门口又跑了一两次，把自己人和所有那些得以通过无数道警戒线的人放进来。

一切都是预谋的。附近的几个地铁站不往外放人，开往公墓的公共电汽车不开车。克格勃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吹毛求疵地检查证件，必须表现出奇迹般的机敏和聪明才能通过。一名教员率领一队打着旗的少先队员来到公墓。驱散他们吧为时已晚，就把少先队员们塞上一辆军用大轿车。别佳·亚基尔干脆被押送到民警分局。也有其他一些令人难过的事例，我们是许久以后才听说的。身穿便服的特工人员毫不掩饰地把每个来到门口和进入公墓的

人都拍了下来。这些特工人员为数不少。

我坐在灵柩旁一路上都在苦苦思索我该讲些什么。我当然没有任何现成的讲稿，只有零零星星的夜间思绪。诚然，我根本不想讲父亲的具体功绩。第一，这样的观点一直颇有争议，再说今天这听起来是一种挑战，我又不想惹事。自然，我也不打算涉及当权者。世间的一切对父亲说来都已成为过去。我始终没有想出什么具体的方案，不过讲话的中心思想我已经有了，到时候话应是张口自来。

到了墓地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没有讲台谁也看不见我，听不见我说话。墓坑旁边聚起相当大的一群人。看来，帕夫洛夫对我的要求之所以没有表示异议，他指望的就是物质上不具备开追悼会的可能性。

我慌忙四下张望，我注意到了墓坑里挖出的一堆土，旁边支架上是父亲的灵柩。上首站着妈妈、列娜、拉达、尤莉娅、尤拉、我们的其他亲人，还有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人。我不假思索地爬上这个土堆。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人注意我，很少有人认识我。大家都在默默地期待着下一步的行动。人群开始在周围缩成一团。

最后我下定决心，说道：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同我们的父亲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告别……”

接下来的话就自然地一句连一句了。我提到我们不是举行正式的追悼会，没有事先安排好发言人。然而我想就我们此刻正在安葬的人说几句话。

我说，我不想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所起的作用。我的评价——儿子和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作出自己的判断，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的面目，对每个人论功作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然而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过去和现在都不会使任何人漠然置之：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这再次证明：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我是把他作为父亲，作为我的父亲、我们全家的父亲来谈论的，我们了解完全在另外一种生活中的、家里的他。他是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

他活在我们的心中。愿他活在亲人们的心中、活在他无数朋友的心中吧。没有言词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还讲到我们失去的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大写的人。可以同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太多。我以传统的告别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安息吧！……”

我在上面看见记者们朝我伸过来的一个个话筒，便尽量提高嗓门。我想让人们记住我的话，想再次让他们想起那个为他们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我也看到了另外的情况：每位记者旁边都站着衣服一样、面目相似的人，这些人高声唠叨，竭力阻挠录音。

事后有人对我说，我开始讲话时，在场的那些有特殊任务的人乱作一团：不行，不准。但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下这方面的命令。

我环顾四周，请纳杰日达·季曼施泰因讲话，自己则退到一旁。她尽管年事已高，却轻松地踏着滑溜的泥土登了上去，她居高临下，声音洪亮地讲

开了。她讲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乌克兰的工作情况，他们在那里曾并肩工作，又讲到顺利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她话锋一转，讲到斯大林的镇压和为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以及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她最后说：

“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贯是个正直而老实的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永别了，亲爱的同志！”

接下来是瓦季姆·瓦西里耶夫讲话，他讲了心中郁积已久的话。讲到他那过早身亡的父亲，讲到恢复名誉，讲到当年的其他受害者。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向您深深地鞠躬。俄罗斯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他最后说道。

讲话结束，开始了最后诀别的时刻。后排的人开始挤过来，人人都想最后道一声“永别了”。

我把我的朋友集合起来，戏们组成了一个通道。人们沿着这条隧道移动。他们献上鲜花，同父亲告别。大约15分钟后，卫队封住通道，又开始拥挤了，我只得再次出来干预，没有人同我争吵，都能听我的。终于所有人都走过去了。最后是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告别。没有苏联记者在场。我国的档案中这次丧事活动未留下文献资料。

轮到我們作最后的告别了。妈妈勉强支撑着。

到此结束。灵柩放入墓坑。我们扔上一捧又一捧土。掘墓工挥舞铁锹干了起来，新出现的小土丘为数量不多的花圈和鲜花所复盖。

妈妈挺不住了，用头巾掩住面孔。安东·格里戈里耶夫关切地扶着她。

这时我看见有人手持花圈从门口沿着小道匆匆朝坟墓走来。我不认识他。只见他气喘吁吁地以忠实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把花圈小心地放到坟上。我们见花圈上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千古，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敬献。”

原来，谢尔戈星期六那天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他到别墅时已相当晚，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快要喝完茶了。他看父亲似乎很累。闲扯了一阵，拿不定主意：此刻，天色已晚；要不要报告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父亲会十分不安，无法入睡。他决定次日早晨再告诉。因为他要回城里去，就请女秘书代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报告这一噩耗。女秘书同米高扬一起住在别墅。

她对谢尔戈将说话移至次日的决定表示热烈支持，并且保证早上一定全部转告。当然，她什么也没有对米高扬讲。指挥她行动的人根本不需要米高扬参加赫鲁晓夫的葬礼。因此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直到星期一早上看《真理报》时才知道赫鲁晓夫已经去世。

父亲安葬完毕。人群开始散去。我无意中发现一名记者，看

样子是日本人，只见他从脚下拾起一朵花并小心翼翼地放到坟上。

妈妈请亲友和熟人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参加酬谢宴。我们到达别墅时，乌云消散，太阳露面了。

大家坐在大餐桌旁。人人都有座位，尽管显得有些拥挤。大家谈了很多。有些人讲得好一些，有些人讲得差一些，但都很亲切。我尤其记得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梅尔曼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茹科夫斯基两人所讲的充满善意的话语。1964年以前他们还不认识父亲。当老“朋友”纷纷离去时，正是他们成了父亲的交谈者和同志。今天他们来同我们分担悲痛，他

们的话听起来特别感人肺腑。

我还想起这个不轻松的日子最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家，他是新闻系的学生。他无法穿越警戒线去公墓，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地址，便到别墅来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他同我通了几次电话，有时来坐坐，后来就不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餐桌上热闹起来，有一部分客人三五成群地在花园里交谈。这时发生了一个并不重要，却令人难忘的插曲。

我站在门口，米沙·茹科夫斯基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你知道吗，我在这儿散步，走到拐角处，”他指指卫队值班室，“就听到谈话的声音。我仔细一听，这是我们的声音，不知是谁在讲话。”

他与其说是吓住了，倒不如说是感到好奇。我早就不关心这类事情了，便安慰他说：

“这是很平常的窃听系统。”

不久，有人给我们讲了列夫·安德列耶维奇·阿尔齐莫维奇的事情。他当时正率领一个代表团在瑞士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参加葬礼。他在举行葬礼那天的会上请大家为赫鲁晓夫默哀。我想，要换成别人就不敢这么做了。举行葬礼的第二天，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克里斯托费尔打电话来表示慰问。原来，他因事昨天刚到

莫斯科，原指望同父亲见面，还给父亲带来了纪念品。他从报纸上得知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电话。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他下榻的民族饭店见面。

父亲是1959年访美期间与克里斯托费尔相识的。当时，苏联政府首脑兼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将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父亲对应邀访美颇为自豪，认为这是对我国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的一种承认。

访问的准备工作是在皮聪达国家别墅进行的。父亲、葛罗米柯、助手们在海边的遮阳篷下热烈地讨论行动战略，尽量设想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形，敲定讲话的最后文本。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他们关心的话题，他说，一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邀请共产党员去作客，这在20年前难道可以想象吗？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们就不能不重视我们。就算是勉强也罢，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实力。难道我们过去能够想到资本家会请他这个工人去作客吗。他对自己的听众开导说，你们看，我们这些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到美国去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但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相互摸底。在对全国各地的访问中，随着往西的推移，那种不完全是表示欢迎客人的标语牌也愈来愈多。

我记得在一个小站，有个年轻人挥舞着标语牌。一面写着“欢迎赫鲁晓夫”，另一面写着“给哈萨克以自由”。他的脸上洋溢着友好和好奇的神情，毫无疑问，他本人对哈萨克只有很模糊的概念。

在地方领导人的讲话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父亲看来是干涉我国内政的字句。起初他假装不予理睬，但心里很窝火。他把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不尊重我国的表现，而这是父亲所不打算容忍的。

洛杉矶市掀起了轩然大波。市长诺顿·波尔松在欢迎我国代表团的晚宴上讲到苏联没有充分的个人自由，还提到其他者生常

谈的问题。这回的措辞比前几次都激烈。

父亲在致答词时大发雷霆。他声明，作为一个大国的代表，他不能忍受这样的态度，美国已习惯于对自己的附庸国这样颐指气使，但我们一定要给予反击。他讲话时，言辞激烈，嗓门很大，时间也长。波尔松先生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手里转动着酒杯。全场的人都好奇地默不作声，看这场戏如何收场。最后，父亲开始息怒了。末了，他对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图波列夫说：“咱们的飞机怎么样啊？我们可以马上从这里飞回去吗？符拉迪沃斯托克又不太远嘛。”

“飞机作好了准备。几个小时就可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图波列夫答道。

“如果老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坐上飞机回国了。”父亲重复说，“这么多年没有你们都过来了，没有你们也照样过得下去。我们只同意平等相待。”他结束了自己的即席讲话，向大家举杯祝酒。

举座哗然，客人们纷纷对俄国总理言辞激烈的讲话发表评论。波尔松先生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

这个有趣的场面似乎是自发产生的——不过是一个不大能自持的人的感情冲动而已。然而一切都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和沉着冷静上面的。

宴会后代表团成员、助手和陪同人员都聚集在总理客房的宽大客厅里。大家都因发生了这起事而张皇失措，情绪低落。父亲脱下上衣，坐到垫脚板上。我们也依次在沙发和安乐椅上落座。

父亲仔细地大家的的面孔，他表情严厉，但在眼睛深处却似乎流露出一丝快活的神情。他打破了沉默说，我们堂堂大国的代表决不容忍把我们当成殖民地对待。后来他用了半个小时，措词很不客气地发表了他对于我们所受到的接待的看法。他几乎是在大声嚷嚷。似乎他已极端愤怒。但目光不知为什么有点调皮。父

亲不时抬起手，用手指指天花板，意思是说，我这番话不是冲着大家说的，而是说给窃听者听的。

独白终于结束了。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大家都张皇失措地沉默不语。父亲擦掉秃顶上的汗珠——扮演角色相当费劲，他转身对葛罗米柯说：

“葛罗米柯同志，你去，马上把我讲的话转告洛吉。”

（亨利·卡伯特·洛吉系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代表总统陪赫鲁晓夫在国内各地访问。）

葛罗米柯站起身来，咳嗽了一声。便朝门口走去。他那张本来就不苟言笑的脸上现出阴沉而坚决的神情。他已经抓住了门把手，他的妻子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却憋不住了：

“安德留沙，你对他可要客气点儿！……”她央求道。

葛罗米柯对这个悲观的插话毫无反应，他出去后房门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我瞥了父亲一眼。

他简直高兴得很，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反应说明，他的话讲对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旧金山。我们的东道主好象换了一批人：一张张友好的面孔，我们没有听到一句侮辱人的话。

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克里斯托费尔的想法是同国务院的意见相吻合的：对客人要亲切接待。总之，后来直到访问结束，对贵宾都采取了最尊敬的态度。

度。

从那次令人难忘的冲突开始，赫鲁晓夫与克里斯托费尔之间就彼此产生了好感。他们每逢节日都互致问候，并交换纪念品。父亲退休后他对父亲的态度一如既往，并未改变。

我们在民族饭店见面时，克里斯托费尔对未能参加葬礼甚表遗憾，他亲切地回忆起父亲，并向我们全家表示慰唁。关于旧金山市市长一片热忱的亲切回忆使我终生难忘。他终于未能送给父

亲的那支金笔，我把它作为这两人之间、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标志珍藏着……

父亲去世后不久，妈妈被迁到茹科夫卡——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不远的部长会议别墅区。她在那里同其他退休者一起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70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劝她写自己的回忆录。她一直不肯写，后来开始写了，写写搁下了，又开始写。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许多事情搅到了一起。她把一部分札记交给了我，有一部分在她去世后到了我姐姐拉达手里，从她那儿又到了阿朱别伊的回忆录里。我认为妈妈札记中的事实是准确的，但时间界限模糊了。因此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例如她说父亲的心肌梗塞始于他同基里连科谈话之后，尽管谈话是1968年4月的事情，而心肌梗塞发生在1970年5月29日。还有其他不确切之处。

妈妈葬在新圣母公墓父亲的旁边。到了晚年两腿完全不听使唤时，她很少去给父亲扫墓了，一年里去两三次。“就把我葬在这儿吧。”她指指我手植的白摊树下那块地方央求道。

老实说当时我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当时在新圣母公墓安葬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必须有专门的批示。我的最大奢望就是把骨灰葬入父亲的坟内。

天赐良机。她1984年8月去世的当儿，契尔年科正在休假，在莫斯科“看家”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H.E.克鲁奇纳提出的将妈妈葬在父亲旁边的请求，一个半小时后就得到了肯定答复。

我妹妹列娜死于1972年。哈维教授关于她可以活到七老八十的预言没有兑现。

赫鲁晓夫的生与死同我国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似乎已完全被遗忘的、下台的他由于许久以前和前不久的事件又突然从虚无中出现了。至今人们还在经常谈论他。

第六章 墓碑

我最初想到墓碑是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个念头在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葬礼结束后我与瓦季姆·特鲁宁同乘一车，我问他意见如何。他略作思索后说，唯一值得一提的雕塑家，就是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

我当时对涅伊兹韦斯内几乎一无所知。我的天地是导弹、卫星、顺利发射和发射事故的天地。当然，我对马涅日事件的余波也有所觉察，父亲曾在那里痛斥“抽象派”及其他当时所谓“从西方渗透进来进行思想颠覆的”现代艺术流派。但我对这种喧闹一时的舌战并不太感兴趣。我只是想弄清楚谁是谁非。习以为常的“父亲有理”的概念未能形成，尽管他的话是有通常的那种说服力，却不知为什么并未起到说服作用。

大凡个性强的人都是如此：父亲看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软弱无力，因此就变得更加生硬粗暴和毫不妥协了。有一次谈到影片《列宁的哨所》时我在场。这一分析的整个风格和咄咄逼人的架势给我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至今仍记忆如新。我渐渐地愈来愈确信，父亲正在犯悲剧性的错误并正失掉自己的威信。然而要干点什么可没那么容易。需要选择时机，小心

地对他说出自己的意见，尽量使他相信如此武断的见解是多么有害。最终他会明白他的打击对象乃是自己政治上的盟友，是支持他的事业的人。因为正是根据父亲的亲自指示才发表了叶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任者》、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在阴间》、卡扎凯维奇的《蓝色笔记本》。

我记得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口角，苏斯洛夫认为卡扎凯维奇的书中提到季诺维也夫的名字是不能容许的。父亲温和地笑着反驳说，历史真相就是如此嘛。“您是想让伊里奇在拉兹列夫对季诺维也夫不称呼名字吗？那他该怎么同他讲话呢？总不能篡改历史吧。”他向苏斯洛夫解释说。

这是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是否可以从今天的利益和观点出发来改写历史。

然而在父亲活动的后期，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都牢牢占领了阵地，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让父亲也听命于他们。如今他便同他们一道来同文学与电影中“异己的思想影响”、音乐与雕塑中的形式主义等等进行斗争了。

我几次试图同他谈这个问题，都必然地碰到通常的那番话：“别管闲事。这方面你一窍不通。谁给你灌了一耳朵，你就跟鹦鹉一样地人云亦云。”

谈话还没有开始就中断了。

自然，瓦季姆一提到涅伊兹韦斯内的名字，我就想起了马涅日的那场冲突。我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他知之甚少。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墓碑应当向真正的大师订做，以免父亲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暗淡无光。

瓦季姆的话我深深铭记在心，不过我对这个想法有无实现的可能甚表怀疑，因此便对瓦季姆说，涅伊兹韦斯内未必肯干。父亲可是在马涅日把他和他的朋友批了个体无完肤，堵了他们的路。他简直可能把我往外赶。我实际上是在请他为自己的对手树墓碑嘛。

瓦季姆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涅伊兹韦斯内是个知识分子味道很浓的人。他对赫鲁晓夫本人持客观的态度，很看重他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那些事情当然没有忘记，不过现在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且看法也多少有些改变了。我一言不发。我倒是很想同意，瓦季姆却没有把我彻底说服。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他去个电话。”瓦季姆建议道。“他如果拒绝，

你就根本别跟他联系了，要是同意呢，你就去找他。我相信你们会谈妥的……”

酬客宴上我向尤莉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是我们家公认的文化问题专家。她想了一会儿，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瓦季姆的话，她说看来唯一值得一谈的人就是涅伊兹韦斯内了。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雕塑家。

两个分别问到的人都异口同声作出同样的答复，这看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我决定去找涅伊兹韦斯内，并开始等瓦季姆的消息，瓦季姆却仿佛故意作对似的，竟然音信杳无。

这时又冒出一个人选——祖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采列捷利。他名噪一时：一名新星！我不久前与他相识，而且似乎彼此都有好感。父亲葬礼后不久，我们在共同的熟人家里相遇。餐桌上我俩是邻座。我当然便征求他的意见了。

他很热心，并当即表示亲自承担此事。采列捷利建议明天就去公墓实地考察。他准备立即着手创作。

说实话，我倒有些为难了，我吞吞吐吐他讲到自己打算找涅伊兹韦斯内。

“主意挺不错，”采列捷利十分高兴。“我很高兴同他合作。”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公墓。采列捷利绕坟墓走了一圈。一切都仔细地察看过去，用步子分别量出距离小道、距离墙根各有多长，他很满意，说我们很走运，因为周围没有坟墓。这里可以竖一块真正的墓碑。大致需要五米长、六米宽的一块地盘。当天他就回家去了，答应一到第比利斯就画出草图。一周后采列捷利打算回来同我讨论方案。我得在这段时间内解决场地问题。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彼此都很满意，后来才知道，这竟成了永别……

因为我绝没料到会有这等事，便为这五米长、六米宽的地盘投入了正面进攻。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谁也不能够、不愿意变更标准的坟地面积。我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没有料到，正当我到处踏破门槛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物介入这件事情中来了。

瓦季姆那边始终杳无音信。我没有同涅伊兹韦斯内接上关系，而与此同时，有人对我那不坚定的步子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作出决定，并且……随即有了行动。

我同采列捷利前往公墓之后没过两天，就由一位关系很熟的女同志向我转达了警告：

“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提醒你，”她说。“那边对你很不满意。自从你父亲的回忆录在美国发表以后，他们对你的看法就不大好。他们认为你骗了他们。说你装得挺老实，甚至有点傻，其实是个滑头。”

“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看我。他们无论提什么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的。”我反驳说。

“那好，”她撇开这个话题。“可现在呢？你决定给父亲立墓碑，这是很自然的。可这是赫鲁晓夫啊！你呢，一方面想邀请涅伊兹韦斯内——你父亲骂过的画家，另一方面又找格鲁吉亚人采列捷利。这种搭配显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感到吃惊，这样的解释我压根儿没想到。

“你也不必跟涅伊兹韦斯内说了，”那位女同胞当然是在转达别人的建议。“最好是到美术家协会去，那里会给你推荐一名头脑清楚的雕塑家的。谁知道涅伊兹韦斯内是不是胜任得了这样复杂的工作，可政治上反应不好。

他很喜欢制造丑闻，你要丑闻干吗？干吗跟当局弄得不愉快？再说，关于请涅伊兹韦斯内的事你也可以跟协会商量，说不定他们正好要推荐他呢，”女同胞建议道。

这番忠告没有提起我多少热情。然而对这样的警告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说实话，经历回忆录那件事后，我不想去激怒如此强大的机关。

我决定找谢尔戈商量。原来他就认识涅伊兹韦斯内，并且愿意马上去电话。至于“友好的”警告，谢尔戈态度很坚决：“别理他们，他们不知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你们的目的正好相反：你是想给父亲竖一块好墓碑，而他们认为主要的是不能允许在一片平淡的背景上有出类拔革的作品出现。比方说，你到了艺术家协会，给你推荐一名你不满意的雕塑家。你就得跟他们争吵，发生冲突。你的处境就很不利。可现在你是以订货人、赫鲁晓夫儿子的身分去找涅伊兹韦斯内，你在协会提出找他肯定遭到拒绝，情况就完全两样。要是你还一味坚持的话，就只好不听协会的推荐，那就会发生矛盾。”

对他的意见不能不同意。我决定马上同涅伊兹韦斯内联系。谢尔戈拨通电话，正要开始讲我的问题，但涅伊兹韦斯内打断了他：“不必多讲了。瓦吉姆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我对他说很高兴同谢尔盖·尼基季奇见面。我愿意接受他的建议。”

第二天我同谢尔戈去工作室。它位于离现在奥林匹克大街体育中心不远的一层小楼内。如今小楼没有了——已被拆除。我们在院子里徘徊一阵，找到了所要找的门。敲门进入一个小小的过厅。地上放着一件雕塑。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喜欢它。后来知道它名叫《以自己心脏的琴弦演奏的俄耳甫斯》，我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出来的人，我当时主要的艺术性标准就是相象。可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还是撕裂的胸膛。我当时想，没有这样画的。

要同涅伊兹韦斯内打上数月和数年的交道，才能使我走出愚昧的密林。不过当时我决定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主人从一间小屋中走出来，这是一位身体结实、个子不高、五十来岁的人。凭初步印象就记住了他那敦实身材、犀利目光和上嘴唇那细细的一络小胡子，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们。

面积不大，工作室本身约有35—40平方米，还有两个8—10平方米的辅助房间。主人把我们带到其中的一间，这里有一张铺着士兵呢的长沙发，两个书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了。墙上挂着一幅又一幅画。在另外一间象是过道的房间里有一个工作台，放着用于浇铸、焊接等用的各种器具。

我是第一次到雕塑家的工作室来。自然兴趣甚浓。

相互认识后，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请我们参观他的作品。作品很多，多到不可能一下子全都看懂和领会。房间中央摆着一个我认为不可思议的建筑物模型：中心是一个人头和从头上伸出的翅膀，翅膀上是象征性的浮雕，若干人的面部。

“这是思想大厦——西伯利亚科学城中央大楼的草图，”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解释道。“您父亲在位时长期不让我工作，后来总算准许了。设计方案是1964年批准的，可现在又遥遥无期了。”

天花板下四面墙上都挂着画——那是连成一体的彩色构图，东一处西一处闪现出刺眼的鲜艳的斑点。

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番之后，回到房间里开始了主要的谈话。

“我想把话说清楚，”涅伊兹韦斯内开始说。“由于我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争论，我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不过如今这已成为过去。我很敬重他，而且说来叫人感到奇怪：我想起他时有一种亲切感。这个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的意图不能不引起同情，尤其是在许多事情都看得更加清楚的现在。我同您谈的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国务活动家的墓碑。我可以承担这项工作。”

我从内心深处对他的开场白感到高兴。

涅伊兹韦斯内马上在一张纸上描绘图画：一块竖起的石头，一半白色，另一半画上阴影线——为黑色，下方是一大块平板。

我一点也没看懂。

“为什么黑白相间？这表示什么意思？”我问。

涅伊兹韦斯内说，这张画上暂时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他只是解释说，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这二者之间不断斗争中进行的。我们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之间，也就是与理智那扼杀它自己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例证。原子弹便是如此。这种看法在神话里的化身是半人半马。在我们的墓碑中黑与白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世态度。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象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石块应当是不规则的，相互咬合，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整体。这一切打算安装在铜板上。

“我看构图不错，”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

我事先就决定不介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纠正画家的看法很难有好结果。要么信任画家，要声指靠画匠。二者必取其一。

“我完全指靠您了。还要肖像吗？”

“我认为什么肖像也不应该有。我们搞个象征性的东西。只有在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希望保留他的外貌、以免从记忆中消失的情况下才需要肖像，”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耸耸肩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面孔人人都很熟悉，肖像就没有必要了。”

他未能把我说服。不过我暂时把自己的疑虑藏在心底。来日方长，况且说实话，我在名人面前有点羞于开口。我有些担心他讲了同采列捷利的谈话和他参加这项工作的意愿。

“只要您愿意，我可以跟他合作。”涅伊兹韦斯内随口答道。

还有一件小事。因为来自卢比扬卡的警告使我有所戒备，我决定设法来个万全之计，使我们的关系合法化，我提出签个正式合同。

“这个好办，”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答道，“我认识一位律师，他会把一切手续都办好的。”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我对于可能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担心决非没有根据。后来了解到，采列捷利也好，涅伊兹韦斯内也好，都有人找他们谈过话，诚然，结果都适得其反。

竖起墓碑后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往昔，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了

半人半马：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善骑嗜杀的人。

自己的那部分故事。我和谢尔戈去过之后不久，他就曾到卢比扬卡那幢著名的大楼里谈过话。那里执拗地劝他别接这个活儿。一开始讲了我们家和我许多坏话，但这个原始的办法没有奏效。于是便动用了更有分量的论据。当时涅伊兹韦斯内正在创作浮雕，这些浮雕拟用来装饰泽廖诺格勒一所学院重新装修的大楼。定货颇有来头，作品从各方面说来都有希望获得国家奖金。这些谋士们好不难过：可别让赫鲁晓夫的墓碑影响了涅伊兹韦斯内的获奖提名，可别破坏了他的升迁。

然而“好心人”并未摸透自己对象的心思，他们选择了极其错误的途径。

“恰恰是在他们的威胁之后，我作出了最终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说原先还可能有疑虑，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那么现在我决定坚持到底。”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最后说：这就是两个人、两个雕塑家作出的不同反应。谁对？谁赢了？我不知道。我只晓得涅伊兹韦斯内没有获得国家奖金，却得到全世界的承认，采列捷利则除列宁奖金外，又获得了国家奖金。

我们见面之后工作便按部就班地开始了。第二天，我们到公证处签了合同，去了一趟墓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答应几天后看第一张草图。

我定期去墓地。我设法保持墓地的整洁。时间和秋天起了作用。花圈枯萎了，照片湿透了。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水还是渗到照片下面。朋友们再次帮了我的忙。在我的老单位作了一个结实的临时性支架，牢牢地把一张新照片焊到有机玻璃里。

我觉得在坟地上放父亲的标准像不大合适。想放一张更象常人的照片，好让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前任总理。于是墓上出现了父亲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他没系领带，一副居家装束，疲倦地微笑着面对镜头。

妈妈不喜欢这张照片，要求换掉。我坚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她并不孤立，其他亲友也不喜欢这张照片。最后我投降了。放了一张70寿辰时拍的照片，父亲面带微笑，心满意足，胸口上挂满了所有的勋章。涅伊兹韦斯内所言极是：赫鲁晓夫是一种象征，他不应敞开领口出现在人们面前。

与此同时，仍在继续张罗扩大修建墓碑的场地。涅伊兹韦斯内也认为，场地应再大一些，不过他把采列捷利的建议定义为“纯格鲁吉亚气派”。需要采取坚决措施。于是我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

但帕夫洛夫并没有打算亲自解决问题：

“我跟普罗梅斯洛夫同志谈谈，他会帮忙的，您明天给他去个电话。”

我同弗·费·普罗梅斯洛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见面老打招呼，总之相互很熟悉——他可是早在父亲离任前就当上莫斯科市市长了。我满有把握地以为他会立即作出肯定的答复。后来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这位殷勤的邻居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不愿亲自同我谈话。在秘书处，人们打发我去找副市长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贝科夫。

贝科夫对我很客气，却一点不了解情况。他马上跑去找普罗梅斯洛夫，但回来时十分沮丧：

“他说没有接到过电话。他给了我一句：给他加30厘米吧。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看来，普罗梅斯洛夫决定要耍耍威风了。

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倒是很想帮忙，他愿意竭尽全力，我们说妥了由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拨出一块2.5×2.5平方米的场地。贝科夫当即签署了所需

的文件。

事情有了进展。我当时以为再有一年，顶多一年半，墓碑即可完成。我怎么想象不到竟拖了四年之久。

我把走访涅伊兹韦斯内的情况对妈妈讲了，她没有表现出异常高兴，不过并未表示异议。她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她认为黑白相间的构思应由雕塑家去负责，至于墓碑上没有肖像这点，她绝对不能同意。

“墓碑是完全私人性质的，是对亲人的纪念。尼娜·彼得罗芙娜的意见很关键。我能找到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安上去的办法。”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表示同意。

工作在进行着。我每周抽一个晚上甚至两个晚上去工作室。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上午和下午工作。我们在他的小房间里坐到深夜，无话不谈，谈墓碑，谈政治，谈他的和我的工作，谈上帝，谈同父亲的会见，谈生活。

涅伊兹韦斯内上前线时还是个17岁的小孩。他在库什卡读完了军校。当过空降兵。曾立功受奖，而且不止一次。受过重伤——脊椎打断了，成为一级残废。“日常生活需要护理。”他让我看医疗结论上的话。这个他无法接受，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不能当残废。他战胜了伤病，受完高等美术教育和高等哲学教育。他一边把沉重的雕塑品搬来搬去时，一边微笑着宣判说：“日常生活需要护理。”

他交游甚广，朋友遍布各行各业，彼此的交往也很有意思。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晚间聚会往往成了喧闹的辩论会。赶上心情特别好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便讲故事让我们开心：关于印度的严肃故事，关于乔巴山元帅半身像的滑稽可笑的故事，关于他在莫斯科的各种遭遇的忧伤的故事。

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这个门外汉对他的创作的理解也日益加深。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的许多作品从前曾引起我的困惑甚至反对，现在我却开始喜欢了。

我上面提到了厅里那个锌制的俄耳甫斯。我注视的时间愈长，就愈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开始领悟到这一作品的深刻哲理，在我的心中它开始与我父亲的精神实质相互呼应——父亲也是这样把自己彻底贡献给了人们。我久久地站在雕塑前凝视。好在我成了工作室里的自己人，我的出现早已不使任何人感到不安了。

有一次我甚至向涅伊兹韦斯内提出就用这尊雕塑作墓碑。他感到吃惊地说，虽然竖立自己的作品总是很惬意的事情，但这件作品不合适。我们要的是更加严肃的纪念碑似的东西。俄尔甫斯则太轻桃了，它适于给诗人作墓碑，却不适于国务活动家，已经构思出来的方案对赫鲁晓夫之墓说来要好得多，也更合适。

我在同涅伊兹韦斯内的交往中，尽量去弄懂他的艺术见解、他的哲学。我渐渐地学到了一点东西。

可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心中并不平静。当然，涅伊兹韦斯内是个大画家，但他是个“抽象派画家”——这个词儿对我说来即使不算骂人话，那也不很光彩。他的创作风格会怎样体现在父亲的墓碑中呢？我主要担心的是肖像像不像。我害怕看见拼图方块、三角形、扭曲的线条。

有一天，我把这一切都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和盘托出。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干我们这一行，一切都既简单又复杂。比方说，我就不把自己归到艺

术中的某个流派：既不算你父亲所责备的抽象派，也不算现实主义者。这两种流派都束缚了画家，使他变得贫乏。要一切都各得其所才好。拿我们的墓碑来说吧。尼娜·彼得罗芙娜希望有一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这必须是他的肖像，而不是我通过肖像来表达的对他的哲学观点的看法。这里一切都应当最大限度地相似，应当是那种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对的。我就是这样去塑造。我这可是在创作墓碑。你们这些亲人来到墓地是希望看见自己的父亲，并不希望看我对于他的认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墓碑的构思，它的思路，”涅伊兹韦斯内接着说。“其中包含了永恒的矛盾，光明的进步的因素同反动的因素之间的斗争。用现实的、照像式的描绘可怎么表达呢？那样会使我们的思路偏离方向，流于俗套。这里很需要一种抽象的主题思想，以反映画家奔放的见解。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在彼此斗争中相互咬合的白与黑。”

我所受到的教育就这样继续下来。从前我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国思想家的通行见解，即：“抽象画人人能画，现实主义绘画可不是好玩的，这里得出出汗。”现在我明白了，抽象派绘画对才干的要求不知比现实主义绘画要高出多少倍。

这里就自然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即父亲当初反对的是不该反对的事物和不该反对的人。可惜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涅伊兹韦斯内并没有马上给我讲马涅日所发生的惹出麻烦的冲突。

“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都对赫鲁晓夫没有恶感呢？他很矛盾，但实行了诚实的进步的政策，在马涅日他不过是受人挑动来批我们。这次画展是故意举行的，展品都是事到临头才拉来的。起初我们都想不通，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他们必须把我们搞掉，自己才好生存下去。”

“在艺术界，各种流派的斗争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他们说来第一位的是钱，我当时已经搜集了关于我们莫斯科的艺术界头目贪污受贿的大量材料。他们让我也参加黑势力。我一拒绝，他们就决定发动攻势，把我干掉。”

“此事由来已久，我当时还在学院里学习。当时宣布进行名额有限的征求纪念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 300 周年的纪念碑的方案活动。拟竖立在基辅车站广场，基石已经打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客观的竞争。所有的作品都用了代号，谁也不知道作者的真名实姓。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一举中标。架上那个模型——《班杜拉琴演奏者》便是。你父亲看见过模型的照片，他喜欢，至少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其他人全都夸奖我，报上说：中标者是原前线战士、大学生。尽管如此，这个纪念碑没有落成，而且永远也不会落成。借口都是最客观的：要么拨款没下来，要么缺水泥，要么缺石料，要么吊车坏了。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时想加入美协莫斯科分会。全都“赞成”，我入会了。当即有人客客气气地把我领到旁边，讲开了生活准则：‘雕塑家稿费很高，可以过得不错。我们有一个轮流制，当然是非正式的了。今天您中标，明天便是别人。我们全都遵照这个规矩，劝您也这样做。’我当时年轻气盛。给他们来了一句：‘应当公平竞争，我要靠才气把你们统统击败！’我的谈话对手们听了

请看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根·伊·沃罗诺夫的回忆，“我不打算完全断定，但可以说说我的猜测，即这次画展也好，赫鲁晓夫参观画展也好，都是特地安排的，因为画展举办者对他的艺术鉴赏水平和美学观点可说是了如指掌。既然如此，这次参观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知道了……”——作者

付之一笑：走着瞧吧。但也提出警告：‘离开我们你通向大艺术的道路就堵死了。’

“遗憾的是他们说到做到，我在莫斯科没有一件作品：基辅车站的《班杜拉琴演奏者》也好，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前面广场上的《翼》也好，《克里姆林宫建设者》也好，统统没有落成。可都曾有过政府的决定，来自上面的强有力支持啊。《克里姆林宫建设者》是谢皮洛夫亲自抓的。但又是一会儿缺水泥，一会儿缺石料，一会儿缺人手。时间一拖长，就可以注销了。大家都忘掉了原先的决定。

“我一气之下，整理了有关我们的师长和部领导受贿情况的专案文件。我们那儿有一位总局局长，大家都去给他‘搓背’。他们不知为什么用这个词来表示送钱的意思。我决定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不成体统的行为。我打算去找赫鲁晓夫。我已经给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去过电话，他也定好了见面的日期和时间。由于年轻，我说漏了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民族饭店吃饭：几个陌生人坐到我的身边来。你一言我一语，便打了起来。你是知道我的，可不那么好对付。我这个空降兵在部队受的训练岂止是打人，而是杀人。可这里看来挑选的不是生手，而是职业打手。他们十分内行地把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我本该去中央委员会，可那边已经接到关于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酒后肇事的密报。我总不能自己眼睛下面带着肿块去擦亮列别节夫的眼睛吧。我打电话去表示抱歉，胡诌自己有病。他表示同情地哼了几声，把见面改期了。后来就始终没有见过面。

“他们决定在马涅日把我彻底打垮，同时也教训教训其他人。当时我们都站在自己的作品旁边，等着。你父亲过来了：他没有看见过我们，不认识，作品也没看，当然，在此之前已经向他作过解释，做过工作，把他拉来仅仅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抽象主义’。

“这时便发生了我们之间的激烈对话。我没有屈服而是顶撞了你父亲，就象他顶我一样，我觉得他对这点倒挺喜欢。他一贯敬

重强者。他最后说我对本专业一窍不通，所有随从听了都高高兴兴地直点头，这时我回答说：

“‘那您检查一下，派个工作组吧。’

“他打住话头，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用完全另外一种口气、平心静气地说：

“‘那就派吧。’

“当即吩咐下面的人：

“‘派个权威的工作组，让他表现一下自己究竟都会些什么。’

“说完就向前走去了。

“诚然，有人什么全明白了。列别节夫在一切结束后悄悄对我说：

“‘处境很不好的时候就给我来电话。我们找个机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

马涅日事件后开始了怎样的过程啊！他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便要来把我撕着吃了。起初指控我偷战略原料——铜。又向赫鲁晓夫密报了。派人来调查：一清二白。我让他们看了，我自己浇铸用的是拾来的废旧物资：龙头、研钵、废金属，他们没有得逞。

“于是又搬出了业务上不行的指控：说我不会搞现实主义的雕塑，所以

我的雕塑都是抽象派的。说这话的人居然都是一些行家、院士！我提醒他们说：赫鲁晓夫吩咐成立工作组。工作组搞起来了。我当着他们的面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切准则用几天时间搞出了雕塑。有两米五高！那是个正在浇钢的炼钢工。就是这张照片。后来在全苏大量发行。我因此得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大笔稿酬。但这不是艺术，只不过是仿制品。谈不到有什么思想。他们又落空了。

“于是就决定开会。指责我们缺乏爱国主义。我们这些受指责的人都打过仗，受过伤，得过奖，指责者当时却可靠地‘被保

护’起来，在后方保卫祖国。于是我们就决定‘开个玩笑’：穿上军服到会，每个人胸前都挂着军功章、受伤的荣誉章。而他们却在台上大谈其爱国主义。

“我一直没有见着赫鲁晓夫。我给列别节夫去电话，他却老是往后推：一会儿是忙，一会儿又干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后来他帮了我的忙：看来也向赫鲁晓夫汇报过。1964年突然让我设计科学城中的思想宫。但是只要一不走运就老不走运。我刚刚放手开始干，就把你父亲搞掉了，又是一切全都落空。

“今天他们是胜利者。有人警告我说：‘别折腾。无论是谁，也无论哪一级作的决定，莫斯科决不会有你的一件雕塑。’事实果真如此。

“最后一个例子。几年前我所设计的竖立在波克隆纳亚山上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碑方案一举中标。曾有过几轮角逐。赞成我的有社会各界，有将军，甚至还有莫斯科市苏维埃。反对者则只有我的绘画界同仁。结果如何呢？纪念碑根本就没有开工。

“我的构思却让另一位雕塑家剽窃了去，他在伏尔加格勒修了纪念碑。这不吗（他让我看《星火》杂志的插图），我的是一名妇女举着旗帜，他的也是一名妇女，只不过手持利剑。我的旗帜在后，与前倾的身体保持平衡。重心对头，雕塑很稳固。他则往手里塞了一把利剑，现在靠绷在躯干内的整整一束钢绳支撑着以免倒塌。墙上的浮雕也大同小异。

“但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你听了可别介意，你父亲的墓碑对我说来也不是主要的。这是件大作品，它是为伟人而塑的，但对我说来主要的不在于此。我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是塑造一个纪念碑，它应该能体现人的理智的发展，能概括精神发展史、生活和文明的发展史、理智同亲手造出的杀害人和扼杀人的精神的东西之间的斗争。

“这将是七个彼此镶嵌在一起的‘麦比乌斯圈’。最大的一个

圈直径为150米。“麦比乌斯圈”上将布满浮雕，浮雕描绘的是我们的理智的发展史，生与死、善与恶的斗争史。纪念碑的模型和浮雕草图都有了。所有这些画册都是为我主要的制作准备的。

“将有四条路从东南西北四方通向纪念碑。人逐渐走近，就会感觉到纪念碑的庄严雄伟，自己理智的庄严雄伟。可以通过七条过道登上这些圈，这七条过道体现了七条罪孽。方案搞出来了，问题是谁来订制。

“我去找中央委员会。那里有我的朋友，他们都支持我。但他们都是波罗马廖夫那个国际部的思想家。我需要的却是拥有资金和物资的订货人。如此规模的建筑决不是简单的工程任务。按我的估算，需要1000—1500万卢布。如我们这里搞不了，就向联合国推荐这一方案。纪念碑的构思符合这一组织的目标，现在它成立40周年的日子临近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我的厄运同你父亲关系极小。他本人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的受害者，而且最终比我受害更大，那些人在马涅日是一箭双雕，既清算了我们，又使他失去了同盟者。我想搞一个反映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矛盾和悲剧的墓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说。

可惜“麦比乌斯圈”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至今纪念碑既未在我国也未在国外竖立起来。我手头有一幅摄影拼接画——壮丽地翱翔在某个城市上空的“麦比乌斯”模型。

我当然并非专家，却产主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正在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善战胜恶的纪念碑设计方案绞尽脑汁。为什么不能由其全部真谛就在于颂扬理智与善良的纪念碑来体现我们的胜利呢？而且，它也可以充当斯大林制度受害者的纪念碑！牺牲和斗争的根源不都是善与恶的冲突吗？为什么一定要搞成五花八门的纪念碑呢？

该设计方案如可得到这样的重用，那也将是“麦比乌斯”所包含的伟大思想当之无愧的，也是我们对方案的作者、历尽坎坷的战争英雄的应有评价。

涅伊兹韦斯内继续进行墓碑的创作。添上肖像颇非易事。一个又一个方案都先后被否定了。起初把胸像放在石碑前的石柱上。构图出现了不协调。拿掉石柱，胸像又仿佛失去支撑地悬在空中。所有这些方案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都在石膏模型上进行过验证。

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呈旧金子色的青铜头像立在白色大理石的龕内，背景是黑色的花岗石。

我们在头像的颜色上颇有争议。我劝涅伊兹韦斯内再把颜色上黑一些，他不同意。最后决定搞成旧金子色，再说青铜随着岁月流逝必然要变黑。

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半年多。1972年夏天到了。墓碑的构思最后定型，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制作。我们决定让家人来批准方案。妈妈和拉达来到工作室。当时列娜已生命垂危。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详细他讲了自己的构思。大房间中的活动托架上放着上了色的墓碑模型。大家一起谈了谈，有问有答，一致同意画家的方案。

在开始实施方案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要详细搞出墓碑本身的设计，而主要的是要得到俄罗斯联邦艺术基金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建筑规划总管理局的艺术委员会的批准。图纸上没有这两个单位的印鉴，工厂就不会承制，也不准竖立在新圣母公墓。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坦率地表示害怕艺委会。他这方面具有丰富的、十分令人伤感的经验。然而，奇怪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艺术基金会艺委会经过半个小时的讨论后，全体委员都祝贺涅伊兹韦斯内在创作上的这一巨大成功。我们真是高兴极了。

艺委会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在准备发言时，我十分活跃，又是把模型搬来搬去，又是回答问题，又是问秘书处要记录草稿。

一切都结束后，艺委会秘书问涅伊兹韦斯内：

“您这位合作者叫什么名字？”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起初没有听懂，他猛地一哆嗦，恼怒他说：

“就我一个人！”不过他马上笑道：“这位不是合作者，他是订货人。认识一下吧——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

我们开怀大笑。

开始了纯生产性的忙碌。为了修墓碑，就要解决一个材料来源问题。青铜属战略材料，因此需要有苏联部长会议的特批方可弄到。这方面我们得到了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米·谢·斯米尔秋科夫的帮助。他毫不拖拉地对我的要求作了答复，真正是第二天就作出了拨给青铜的决定。同时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非矿产材料管理局在石料上予以帮助。管理局的人很想帮助我们，局长本人早在50年代初父亲执政时就开始了升迁，并保留着关于父亲的最亲切的回忆。但尽管十分愿意帮忙，他们却没有所需规格（几乎长2.5米）的石料，而且不可能有。规格中没有这样的尺寸。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坚持专门订做。我们的意见没有受到反驳，但有人提出警告：不规则的石料是用爆破法开采的。爆炸会引起成为隐患的微裂缝，这些微裂缝一直要到最后一刻、在成品完全抛光之后才会暴露出来。标准规格900×600平方厘米的石料是用专门的机器锯出的。没有裂缝。这很诱人。如果不用标准尺寸石料，谁来赔偿废品所造成的损失，工作又要拖上多少个月甚至拖上多少年呢？要由作者来最后拍板。必须在不破坏构思的前提下重新设计。

我们议论了几天。最后涅伊兹韦斯内下了决心。新的方案中白的一半和黑的一半都分别由三块标准规格的石料组成。

“这样效果甚至更好些，”他说，“雕塑的动作感更强了。”

现在可以进行下面一步——寻找制作者了。管理局建议我们去找位于沃德尼基的那家工厂。我们带上部长会议办公厅的信就去了。然而等待着我们的却是失望。时值1972年，赫鲁晓夫的名字只是与“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塔配在一起时才提到，再不就是同1964年十月全会的“历史性”决议联在一起。

我们去工厂时正值夏季。厂长休假去了。接待我们的是总工程师，一个高傲而自满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漫不经心地努努嘴：

“坐吧。有何贵干？”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简直要自我膨胀了。

涅伊兹韦斯内开始说明来意。我递上办公厅的信，这些没有起任何作用。办公室主人仍是冷若冰霜。

“这活儿我们接不了。”他傲慢地声称，“我们厂忙最重要的活儿都忙不过来。工厂按照克格勃第九局（他说到这几个词时显得特别有滋有味儿）的委托正在修理列宁墓。我们总不能因为你们去冒耽误工期的风险吧。”

说完这番话，他更加摆开架子：

“我想，你们根本用不着石料。赫鲁晓夫一直很热衷于混凝土，连我们这个厂都想关掉呢。你们就拿混凝土给他修墓碑吧。就是那种弧形的小玩艺儿。我前不久去国外，那儿搞了不少这种东西。”他忍不住又自吹自擂起来。

显然，我们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涅伊兹韦斯内面孔绷紧，满脸通红。由于这种粗野举动，他的小胡子伸成细细的一条线，两眼紧紧盯住口出狂言的家伙。看来，他马上就要用空降兵的方式教训那个家伙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无论受到谁的欺负都决不放过的。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了。我们走了，决不会再回来。

艺术基金会在梅季希有自己的工厂，但我们起先没有去，知道那里总是门庭若市。如今我们别无他法了。厂长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沃谢洛夫对我们客客气气，但他的回答却有些令人沮丧。因为需要得到建筑规划总管理

局的批准才能开始制做。涅伊兹韦斯内对这个机关比对艺术基金会艺委会还害怕。他本想要个花招——带上完成的墓碑去见他们。在这一阵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已到了秋天，我们则始终没有来得及去找建筑规划总局。

当时关于墓碑的传闻和议论已不胫而走。许多人都对设计方案抱有浓厚的兴趣。我的朋友和父亲的同情者都在问，墓前将竖起一块怎样的东西？工作进展情况如何？墓碑何时揭幕？问题甚多，不一而足。我决定向至亲好友介绍一下方案。妈妈和涅伊兹韦斯内都没有表示异议。

9月的一天，我的朋友同我一起来到工作室，我的外甥女尤莉娅已在那里等候。我们走进工作室后，尤莉娅同涅伊兹韦斯内热烈地讨论问题。旁边站着她那位满脸胡须的朋友——著名电影编剧伊戈尔·伊茨科夫。她事先并没有说过此人要来，他的出现使人隐隐约约感到担心。我们全都很清楚他在哪儿工作。我有过疑虑，但什么也没说——总不能把他撵走吧。

最近几个月的事情、部长会议办公厅很殷勤的帮助使我们心肠变软了，警惕性降低了。有些淡忘了同我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的“预防性”谈话，忘了采列捷利的消失不见，把警告和暗示都置诸脑后。

涅伊兹韦斯内展示了模型，讲了先后被否定的方案，讲了精彩之处和所作出的决定。大家都表示喜欢。伊茨科夫问到墓碑的中心思想。

“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础是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涅伊兹韦斯内习以为常地郑重说道，“光明——进步、动态的原则与黑暗——反动、静态的原则之间的对抗。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

要往后拉。这一生活发展的基本思想很适合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形象。他开始让我国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曙光，它预示着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光明开始驱散黑暗。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墓碑的基本构思。主要成分为白色大理石，它那动作感强的形式向黑色花岗岩发起进攻。黑暗在反抗，斗争，不退出自己的阵地，这里也包括人自身内部的斗争。头像放在白色托架上并非没有原因，但后面保留着黑色的背景。白色大理石的上方角落处为太阳的象征性形象。往下发射一束光线。它们驱散着黑暗。白色大理石上的旧金子色头像不仅好看，而且是个象征——罗马人就是这样使自己的英雄流芳百世的。一切都放在铜板的牢固基础上。铜板无法搬动。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能逆转。

“在铜板左边，如果从石柱这边看过去的话，是一个心形的小孔。那里要栽上体现燃烧、自我牺牲的红花。这里镌刻着墓志铭：‘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反面为生卒年月日。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说明。一切都应简洁而庄严。还记得苏沃洛夫墓上的墓志铭吧：‘这里长眠着苏沃洛夫。’仅此而已。什么统帅、元帅、勋章统统未提。”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如此详细地向局外人说明了自己的意图。通常他都只限于关于善恶生死的一般议论。后来处境困难时，他辩解说：“你把你的朋友都领来了。我当时还以为什么都可以讲呢。”

这次展示之后不久，我们的活动一度停了下来。涅伊兹韦斯内早就打算去波兰，系应邀进行私人访问，却一再往后拖。他当时办手续之难，今天已无法想象。终于获得批准，年底即可成行。邀请他的波兰朋友搞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他打算要到明年冬末春初时再回来。

这次被迫中断并未引起特别的担忧——创作实际已经结束。这样甚至更好：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会安排就序，到那时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设计

方案。只要得到最后批准即可去工厂了。

我怀着轻松的心情给自己的这位朋友送行，他情绪高昂，虽说路程不远，毕竟是出国访问。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想在波兰搞一次小型个人画展。当时休想得到官方的批准。他决定只带版画去。既不大引人注目，占地也少。尽管如此，画幅也很大，出现了如何完好无损地运到的问题。

我在自己别墅阁楼上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个大手提箱。里面曾经放过父亲的军服，那是妈妈在战争结束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去的。现在箱子空着。我把这只箱子给了涅伊兹韦斯内。版画都妥妥贴贴地放在箱底，一点不皱，他很喜欢这个包上帆布、带有皮带的坚硬的旧箱子。再说，带上赫鲁晓夫的手提箱上路也是一大乐事。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终于成行，工作停止了，我只是偶尔用工作室的电话问问波兰的消息。最后，1月底2月初，涅伊兹韦斯内归来了。他观感甚多。在那里他受到了亲切的接待。版画画展获得成功。他把展品赠送给了主办单位。

边境上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手提箱那与众不同的外形和大小引起了海关职员的注意。

涅伊兹韦斯内并未带任何违禁的物品，却为版画提心吊胆。他算不上当局承认的画家，便没有去领取携带作品出国的特许证明。我们担心（也并非没有根据）又要开始拖拉、研究，最后则遭到拒绝。眼下版画可能被扣。

一名海关职员不十分起劲地翻检了箱内的物品，翻到版画时脸上明显地露出困惑的表情。看来他从未曾见到过这种艺术风格。看了一张、两张、三张、十张。更加困惑不解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什么？这是谁的画？”最后他问道。

“啊，这是我的画，”涅伊兹韦斯内漫不经心地答道，“我自己画的。”

“明白了，”海关职员如释重负地砰地把箱子关上，“您可以走了。”

涅伊兹韦斯内出国期间，许多事情起了变化。是谁对他的构恩发表了怎样的评论，我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上头的态度变成坚决否定了。这点已为所有参与建造赫鲁晓夫墓碑的人所知晓。只有我们暂时蒙在鼓里，还指望可在新的1973年大功告成呢。

到了领取建筑规划总局的许可证的时候了。起初我们找“基层单位”，到通常往设计方案上盖“准”字印的那个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对这个单位了如指掌。那位他熟悉的太太把我们的申请报告拿在手里翻来翻去，连声叹息表示同情，她说，作品一定要经过艺术委员会开会研究。她给我们排上号了。

艺委会开会的日期到了。比艺术基金会可排场多了：大厅，大会议桌，人数众多。我们提前到了。想熟悉一下环境，把模型摆好一些。模型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毫无疑问，与会者中许多人是特地冲着“涅伊兹韦斯内与赫鲁晓夫”来的。艺委会委员一进来，都要对展出的作品看上一眼。目光蓦地遇到了熟悉的形象。大家活跃起来，脸上露出鬼鬼祟祟的神情，有人四处张望，莫斯科市的总建筑师M·B·波索欣没来，我想这并非偶然。由他的副手·布尔金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了。先讨论那些悬挂在房屋上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大家打着呵欠，东张西望，这是此类会上通常可见的场面。逐渐轮到我们的了。

布尔金对设计方案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由涅伊兹韦斯内发言。一切都

进行得平平常常，认认真真。我们当然估计到已经对

艺委会委员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汇报后，又回答了许多问题。然后开始讨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因此十分紧张。

大家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设计方案很有意思，但黑白两色搭配在一起的象征意义不清楚。

“这样的对比，”雕塑家齐加尔说，“破坏了构图，说明作者审美力还有欠缺。原有形式不变，但是把材料换成灰色花岗石不是更好吗？另外……是不是把尖锐的棱角抹平。”

涅伊兹韦斯内一声不响，看着地面，鼻子发出呼哧声。他与齐加尔是同学，但后来的创作道路却使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这滔滔不绝的发言弄得我完全慌乱了，我直想插话，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压低声音说：

“别出声，还有更厉害的呢。”

下一位发言者说，他觉得这个墓碑太高了点儿。给人以压抑的感觉。此人建议把高度从2.30米降至2.10米。

我一点不懂，但我清晰地联想到住宅楼中房门的高度。

这场戏还在继续往下演。台上站着艺委会的一名新委员。他也为黑白相间的颜色感到不安。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用红色斑岩，象征革命，象征赫鲁晓夫革命的一生。与会者都喜欢这个主意。其他发言者也对此表示支持，不过有所补充：要能把比例放大50倍就好了。这样一来墓碑（确切他说不是墓碑，而是巨型建筑）在市内的大广场上就显得十分气派了。提建议的人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在哪个广场。

众说纷坛中，有人建议仿照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的做法，把胸像放在石柱上。是谁提出这条建议的，我记不清了。我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不久就弄清了，这不是偶然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各个不同的办公室被玩味了很久，并以其缺乏个性、缺乏思想、千篇一律而讨得官僚们的欢心。

经过一番“详细而全面的讨论”，方案没有批准。我的发言，我以尼娜·彼得罗芙娜和家属的意见为理由力争，均未奏效。决议说：“归还作者继续加工，应吸收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待加工后再行审议。”

我们把模型放进提包，垂头丧气地回到工作室。朋友们在那儿等待着，却没有可以让他们高兴的消息。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巧妙而幽默地把会上发言复述了一遍，并加以评论，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他不知道。有人提出给勃列日涅夫写信。我想起了1968年那次同他打交道受挫的经历，便把这一提议搁置一旁了。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力图找出对方案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原因。几个月以前大门不是敞开的吗。有人想起西方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墓碑的短文。其中说到黑白相间的组合反映了我国社会中的矛盾和赫鲁晓夫本人在苏联民主化进程中自相矛盾的作用。还有其他类似的说法。至于消息的来龙去脉就很难说了。已有许多人看见过设计方案，对它兴趣甚浓。总之，到我们分手时什么主意也没有想出来。

我从第二天开始就给各高级机关去电话，但那里的态度也变了。原先打通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的电话也不容易，但完全可以办到。眼下却怎么也抓不住斯米尔秋科夫了。一会儿说到柯西金那儿去了，一会儿谈正在讨论五年计划，一会儿又谈去什么地方了。建筑规划总局也是这个情况：一会儿说波索欣出去了，一会说他还没到。布尔金则只是没精打采地让我相信方案必须

重新设计，我不同意，我凭经验知道，只要一让步，墓碑就会成为泡影。

我的谈话对手们最感到不安的是黑白相间的搭配，他们挖空心思地揣摩其中的含意。看来，每个人都暗地想出了自己的解释，一个比一个可怕。

我有一次在气头上对布尔金说：

“您以为黑色影射勃列日涅夫吧？真是太荒唐了！墓碑是永久性建筑物。如果接受您的解释，那么勃列日涅夫死后我该拿墓碑怎么办呢？”

布尔金一言不发。他无能为力，最后拍板的并不是他这个机关。

涅伊兹韦斯内灰心了，不过进度虽然缓慢，工作仍在继续。到我们在艺委会上那次不成功的辩论时。石料和铜板均已进行仔细的加工。头像他暂时没有着手搞，不愿浪费精力。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他开始了肖像的制作。困难很快出现了。父亲刚刚去世时我在慌乱中一时没有想到做个遗容面膜。如今只能按照相片来制作了。

起初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似乎找到了出路。他想起艺术研究院院长尼·瓦·托姆斯基好象有个按写生制做的赫鲁晓夫胸像。

“虽然我简直无法接受托姆斯基的创作，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个优秀的肖像画家。既然他是根据写生来雕塑的，那么胸像就可顶原型用。”涅伊兹韦斯内说。

我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根据写生塑造过父亲的胸像。但我还是给托姆斯基去了电话，他并未同我通话。只是故意冷淡地回答说：

“不错，我们是有一幅肖像，可这是文化部的财产。不经他们批准谁也不能给。”

涅伊兹韦斯内听完这段叙述后，”嘟哝着说：

“咱们可以不靠他们，就凭照片来创作吧。”

整个 1973 年就在同各个机关毫无结果的斗争中过去，1974 年到了。妈妈焦急不安，我安慰她说：“还有最后一个台阶，还剩最后一个电话了……”但电话并非最后一个，台阶之后还有台阶……情绪日益低落：布尔金、莫斯科市苏维埃、部长会议都意见

一致——在石柱上竖胸像。这个方案除了我家而外大家都满意。墓碑就成了没有个性、没有任何内涵的东西了，这也正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我提出新的反论据：既然不是国家出资，而是自费，那么最后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我们决不会同意在石柱上竖胸像的方案。

出现了下棋中那种无子可走的形势。每一方都在为自己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有传闻说莫斯科市苏维埃想承担所需费用，而这就等于说他们将得到决定性的发言权。我执着地坚持艺委会重新审议。布尔金无可奈何，便答应批准方案。我们又坐在那个会议室，仍然是那个模型。

布尔金并未食言，讨论的气氛变了。发言者一致承认，设计方案经过加工后可以在提出改进意见的情况下予以批准。在开会前并没有提到什么意见。意见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的，于是决定成了一张废纸。

最后的决定文本称：“鉴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家属的一再要求，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建筑规划局艺术委员会批准作者恩·约·涅伊兹韦斯内所提交的尼·谢·赫鲁晓夫墓碑设计方案。然而艺术委员会建议

审查建造高度略低的灰色花岗石墙的方案。此外，艺术委员会认为以石墙上竖胸像代替现有的墓碑设计更为适宜。”

我认为我们打了胜仗：有了“批准”的字样。涅伊兹韦斯内持怀疑态度，后来证明他是对的。谁也不承认这个决定。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争论时，艺术基金会艺术委员会撤销了自己正面的决定。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

我试图抓住波索欣——他老在躲。最后我到他家。这个他觉得受不了。

“我喜欢不喜欢设计方案都无关紧要。只要上面不发话，我什么也不批。我一份文件也不签！”他斩钉截铁他说。

无路可走……

不幸降临了，开开门一看：主管公墓的总局局长位置上上来了一位新人——一退职上校，原北方某劳改营负责人。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大笔一挥，就取消了原先关于墓碑占地的决定。我在他的接待室里整整坐了半天，才荣幸地受到接见，他很粗暴地拒绝了 my 要求。

我打电话到莫斯科市苏维埃找贝科夫。他对这种刚愎自用感到吃惊，当即召见那位局长。我也去了。仅仅用五分钟就恢复了公正，减少用地的问题不复存在。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贝科夫是唯一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唯一说话算数的人。

最后弄清楚了，在这一级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只得设法往“最上头”找了。

我建议从格里申入手。他是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同父亲并肩工作多年，曾是我们家的常客。

涅伊兹韦斯内打听到电话号码，我很快就打通了格里申助手伊久莫夫的电话，他答应向首长汇报。一周后有了答复。

“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件事既归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建筑规划总局管，又归部长会议办公厅管。我们一点帮不上忙。去找他们吧。”

涅伊兹韦斯内听到一则看来是特地让我们知道的传闻。说的是格里申在同助手谈话中抱怨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我要是换一个地位，我当然就给解决了。眼下的情况是我什么也干不了。”格里申自我辩解道。

他的拒绝使我们彻底地丧失信心。除了去电话找勃列日涅夫而外，再没有其他可找了。

我极不情愿地干起了这事。但是看不到有其他的门路。

原来从我 1968 年最后一次同总书记秘书处联系后，电话全换

了。寻找电话号码就占去了将近一月的时间。我们接通了秘书处的电话，讲明了自己的问题。他们建议我去找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助手——楚卡诺夫，还给了他的电话号码。又是多次毫无结果的尝试。记不清那是第几次，我总算走运了，听到一个高傲的声音：

“有什么事请讲……”

“楚卡诺夫同志，您好，”我紧张起来。“我是赫鲁晓夫·谢尔盖·尼基季奇，我有个给父亲修墓碑的问题要麻烦您。事情完全停顿了。我们已经奋斗了一年，却什么也解决不了。只有指望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帮助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这事儿归部长会议办公厅管。你给那儿去电话吧。”声音显得极为不满。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想请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无所获。所以

我才决定找您的。”我赶快说道，我知道我的事情告吹了。

“您以为我们没有更重要的问题吗？这事儿我们不管，也不打算管。”

“可谁能帮助我呢？……”

听筒里传来电话挂断的嘟嘟声……

如今是彻底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再往上找吗？再往上就只有上帝了……

当时是1974年3月底。

我很不愿意让妈妈卷到这种麻烦事里来。她年事已高，听不得粗暴的答复。可是已没有别的出路。我简要地把情况向她讲了。她十分冷静地听完了我的讲述。

“我早对你说过该让我介入了。好吧，我给柯西金去电话。”

我不大相信会有积极的结果，在这条路上经受的失望实在太多了。找柯西金没费多少时间。秘书问明来电话的是谁，便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正忙着，问了电话号码，答应一有机会就

让本人回话。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

“是尼娜·彼得罗芙娜吗？我是柯西金的秘书。请您跟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讲话……”

柯西金同十年前一样地殷勤周到。他询问了健康状况，抱怨年岁不饶人。

“尼娜·彼得罗芙娜，请讲讲有什么事吗？”他转到正题上来。

妈妈简要地讲了我们所遇到的倒霉事儿。柯西金没有打断她，一直听着。

“您本人喜欢这个方案吗？”这是他唯一的问题。

“喜欢啊，要不就不给您去电话了。”

“好吧。我让他们过问一下。我们这儿有您的电话。到时候给您去电话。”

他客客气气地说了再见。

妈妈给我往单位上打电话，讲了刚才的谈话内容。我欢欣鼓舞地决定马上出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涅伊兹韦斯内。可是刚刚放下听筒，又来电话了。是部长会议总务局副局长找我，让我马上把墓碑草图送去好呈送柯西金。机器转起来了。

一天之后，彩色草图就放在总务局长列昂季耶夫的桌上了。他仔细看了很久，摆弄来摆弄去，最后说：

“波索欣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墓碑方案，是放在石柱上的胸像，同克里姆林宫墙下那些墓碑差不多。”

他让我看了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小张纸，上面用墨汁草草画了带胸像的石柱草图。我便动用自己的全部论据表示反对，却并未奏效。

“行，回头再说吧。我们把两个方案都报上去，最后把结果通知您，”列昂季耶夫最后说。

开始了难耐的等待。一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讯。我憋不住给总务局打了电话。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还什么都没看呢。我们一报上去就通知您。”他们回答说。

又是等待。又过了一星期。

我永远记得那阳光和煦的4月的一天。我在单位上接到一个电话。这是

总局经管我的事情的一名处长打来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把两个方案都看了。我们想请您来一趟。”

“他都说什么了？”我禁不住问道。

“在电话上我什么也不能讲。您来吧。”

当天要去拉辛街很困难。不知又在欢迎什么人，为了迎候礼宾车队，列宁大街已经开始封闭交通。只得在胡同里穿行了。我总算到了，简直是跑步进了那间熟悉的办公室。

“祝贺您！”办公室主人迎上来对我说。“咱们到列昂季耶夫那儿去吧。他等着呢。”

列昂季耶夫讲了在柯西金处汇报的细节：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审阅了方案，下令修建墓碑。他认为：既然家属赞同这个方案，办公厅或者其他人就不必干预了。我们已经给波索欣去了电话。您同他通话吧，他会发布一切必要的命令的。要是出了故障或者需要帮忙的话，别客气，给我们来电话。我们会帮忙的。”

“需要给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去信要求拨给青铜。”我想起来了。

“我们马上就办。只要讲讲信的格式就行了。”

“还要给工厂发指示。”我十分兴奋地一一回忆起我们的问题。

“今天就发。”

看来，列昂季耶夫很高兴事情有这样的结局。我们之间的不快的根源是在其他地方。

我回到单位后，头一件事就是给波索欣去电话。最近这几个月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我甩脱的女秘书，这次听到我的声音却象见到亲人一样地喜出望外：

“太好了，谢尔盖·尼基季奇，您来电话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正在到处找您呢，每过五分钟就问一次。我们怎么也打不通您的电话！我马上让他同您通话。请让我记下您的电话，以防万一。”

波索欣充满了善意：

“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我什么都知道了。祝贺您！部长会议给我来电话了。我们马上就批准您的方案！”

“艺委会什么时候开会？”

“您怎么了？什么委员会也不需要了。今天就盖戳。您什么时候能过来？”

“现在就去。图纸在我这儿。”

“就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手上的那张草图上盖戳不行吗？”波索欣犹豫起来。

我忍不住笑了。

“不行，”我严肃他说，“需要几份：您一份，艺术基金会一份，工厂一份，我一份。所以绝对不行。再说草图上又没有标尺寸，图纸上标了。到时候又会产生疑问，究竟高度是多少，是两米三还是两米一。”

波索欣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来吧，我等着……”

波索欣的接待室里门庭若市。在场的人都跑来向我表示祝贺。许多人原先就站在我这一边，他们喜欢墓碑。如今更是个个夸奖。我正要朝波索欣办公室的门口走去，女秘书却客气而坚决地把我拦住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您应当去找处长，”她说了处长的名字，

“他什么都能签。”

“难道……不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吗？”我打心眼儿里感到惊奇。
“我刚刚同他通过话……”

“不不。他全都吩咐过了。”她边说边把我从门口挤开。

看来，就在我开车来的当儿，波索欣变了主意，决定自己不在上面签字。以防万一。

于是我拿上了盖有建筑规划总局“准”字戳印章并附有签名的图纸。我给涅伊兹韦斯内去了电话。他满心欢喜。

“马上来吧。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讲。”他提出要求。

我讲完后，心里有一种过节般的感觉。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满意地微笑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趁热打铁，”他猛地一振。“要快马加鞭，快马加鞭！我们要赶快把墓碑竖起来，以免节外生枝。”

生活使他得了不少痛苦的教训。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深有体会。

当天我们就来到我家，挑出了父亲的相片。又过了两天，铸像选型工做出了头像的毛坯。我到工作室去看工作进行情况时，起初大吃一惊：我面前竟是一尊列宁的头像。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大笑起来。

“开始阶段什么样的形象都能行：需要的是耳朵、鼻子、眼睛、嘴等等。接下来我一参与，就要做赫鲁晓夫的头像了。造型工们做列宁的胸像已相当熟练，简直是易如反掌。”

工作顺利地进行。头像愈来愈象父亲了，但涅伊兹韦斯内并不满意。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要搞得维妙维肖。我在其他人的墓碑上还可以搞一些模拟，这里则应当是纯现实主义的，我甚至要说是自然主义的。”他重复着我已听到过的这番话。

眼眶的形状、脸的下半部老弄不好。泥型的头像终于完成了。只剩下最后吹毛求疵的检查。我们两人已经看惯了肖像，完全搞

熟了，需要有全新的眼光。

我们召集了自己的家庭“验收委员会”。妈妈、拉达、尤莉娅都来了。塑像旁边放着父亲的巨幅照片。我们反复进行比较。大家都一致赞同，没有意见。

头像大功告成，该是交到工厂去的时候了。

我们到梅季希去。厂长很客气，但是毫不让步：“艺术基金会艺委会的决定呢？”我试图拿原先的决定充数，但这一招不灵。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只得给艺术基金会去电话了。主任去外地了，副主任接的电话。

“您是谈建造赫鲁晓夫墓碑的问题吗？您手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决定？”他表示担心。

“有建筑规划总局的批文。”我自豪地回答说。

“既然如此，那就在艺委会例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吧。”我的谈话对方放心了。

这次的委员会会议没有先前那样友善了。并没有特别的挑剔，但大家都有些提心吊胆。突然议论起成本来了：照此方案，国家拨给的3000卢布不够用。可以感觉到艺委会委员们的隐忧：既然拨给3000卢布，就说明上头心中有数，而这里超出了这个数。该不会是设的圈套吧？可别批准了一个不合适

的方案。主任随即感到怀疑：他想实地看看头像——这个涅伊兹韦斯内脑袋里可是什么鬼主意都有。

决定：有条件地批准，在实地到工作室看过头像后再作最后决定。

两星期后艺委会委员们来到工作室。按照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塑造的头像受到他们的欢迎。“瞧，只要他想干就能干出来。”——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这句潜台词。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接受了他们的祝贺。

于是，凡是可以意料到的各种委员会都已一一开过，应当开始制做了。部长会议给工厂去了电话。工厂优先收下这个活。

在生产中出现了困难。“2.5×2.5平方米的铜板没法铸造，”工艺师们说。“要分成四个部分，再焊接起来。”

他们经过考虑后，决定不做整块，而是一分为四，并留下缝隙，否则就会看见焊接的痕迹，再说铜板遇热膨胀，整料可能翘起。

1975年7月2日，我40岁生日那天，墓地上为墓碑奠基。干得一丝不苟：挖出一个几乎够到灵柩的土坑，全都浇上水泥，用钢筋加固。原班人马又开始安装墓碑。部长会议总务局提供了必要的设备。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发生了，我们渐渐地忘掉自己不久前的劳碌奔波。

……阳光明媚、但已凉爽宜人的1975年8月的一天。我们即将开始我们四年辛苦的收尾工程——安装墓碑了。

我和涅伊兹韦斯内一大早就到梅季希那个工厂去接汽车。讲好了10点。10点了——汽车未到，11点——还是未到。我们感到焦急了，心里清楚这纯属技术原因的延误，然而已忘却的恐惧感仍悄然而至：难道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吗？

汽车终于出现了。原来是路上坏了一个轮胎，得换上新的。

于是把石料装上了。下一趟再拉铜板。头像小心翼翼地放到我的日古利车上。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新圣母公墓。吊车已在那里等候。一位来自部长会议的同志在旁边踱步，他负责卸车。头一天决定不开始安装。石头和青铜放在基础旁边到明天再说。头像则拉到工作室保存。

安装的日子到了。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吊车小心翼翼地吊起第一块铜板。

外国记者在我们的周围忙做一团，他们把每道工序都摄入镜头。这次同葬礼上一样，没有苏联记者。涅伊兹韦斯内请求记者们在完工前一个字也别报道。我们是想避免发生任何不测事件。

当时公墓对外开放，墓旁已聚起相当数量的一群人。我们找来绳索，把施工现场拦起来。不时要把那些过分好奇的人请出去。终于到了最后一道工序——安装头像了。夕阳的霞光映照在墓碑上。

涅伊兹韦斯内捧起头像，走近墓碑。石龛同他的个子比起来嫌高了点。找来一个木箱。他登上木箱，于是最庄严的时刻到来了——头像安好。大功告成！……

涅伊兹韦斯内站在木箱上的照片便上了世界的各大报纸。

还有最后一根线条：墓碑周围洒满了黄沙。整整洒了一车沙。不过一周后就踪影全无：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的鞋底把黄沙全带走了。

我们对部长会议代表的帮助表示热烈感谢。可以看出，他也十分满意。而且说真的，他下了不少工夫。

“我可以对他们说您没有意见吗？”分手时他问道。

“也请转达：我们十分感谢！”我满有理由地这样说。

此刻墓地四周已挤满了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涅伊兹韦斯内的朋友、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大家都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也向我表示祝贺。总之，一片喜气洋洋！

没有官方人士在场。只来了一名艺委会委员——齐加尔。他在墓碑周围走了一圈，向涅伊兹韦斯内表示祝贺，却又按捺不住地说：

“你还是没有吸收我们关于降低高度的意见。”

石料是按设计方案的尺寸制做的，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并不示弱：

“我们甚至做的比模型还略高一些呢。”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该结帐了，”我高高兴兴地对涅伊兹韦斯内说。“合同上讲好了稿酬，而且应当完工后支付。”

我们刚刚见面认识并开始谈判时，涅伊兹韦斯内不肯收钱。但略加思忖后又同意要了，因为免费服务可能会被当成一种示威。我们商定了稿酬的数额。

“好吧，工程不小，我挣得也问心无愧，”他顺着我的口气答道，一面把装钱的信封藏起来。“现在我请客，以示庆祝。”

我们驱车去民族饭店。临时安排的宴会算是这幸福日子的压轴戏。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到墓地上去。墓碑周围站着一群人。底座上堆满了秋天的花朵。人们纷纷议论，争辩，拍照……

……至今墓碑旁仍争论颇多：有人喜欢，这种人占多数；另有一些人起劲地反对。但重要的是没有人对此漠然处之。我们达到了目的：在非凡者的墓上竖起了同样非凡的纪念碑。许多人到侧面去寻觅作者的签名。远非人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有时产生困惑：

“作者是无名氏，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名字保密呢？”

其他人解释说：

“涅伊兹韦斯内是姓氏。他可是世界闻名。”

黑白相间的搭配引出的问题最多。有人问到我时，我通常都不去复述作者的意图。

“每件真正艺术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生命，你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它反映了你们的思想，”我俨然以名副其实的艺术评论家的身分说道。“大家可以思考和品评。”

众说纷坛：善与恶，生与死，赫鲁晓夫命运中的成功与挫折（这种解释比较少）。一位妇女则解释说：

“白色表示好事，黑色表示坏事。”

是啊，每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

肖像引起许多议论。作者的意图未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头颅仿佛是砍下来的，”许多人这样说。

旧金子的颜色也没有得到首批观众的认可。不过这已成过去了。时间对颜色作了摆布。如今头像几近黑色，而底座则成了浅灰色。

我觉得，涅伊兹韦斯内、我和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给父亲竖起了一块他的名字和他的非凡一生所当之无愧的墓碑。

“涅伊兹韦斯内”的俄文为

，意为“无名氏”。

尽管我们竭力赶在父亲忌日之前竖起墓碑，我们的计划中却并未安排正式揭幕仪式。我们不想激怒当局：任何演说都必然引起反响，必然引起对墓碑的不必要的注意。我们吃够了苦头，不想去预言这会起什么后果。下令拆除墓碑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猜测并不算十分荒唐。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帮过我们会因此惹上麻烦，我想，连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也不例外。

我不禁想起叶夫图申科的话“沉默中有着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我便决定听从他的忠告。然而生活却作了另外的安排。父亲忌日那天，妈妈打算晚点去，等参观者全都散去、公墓关门之后再去看，这样可以在墓旁安静地呆上一会儿。1975年9月11日那天天气阴冷，雨时下时停。我们驶近公墓大门时，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除了每年都在这天前来凭吊父亲的人而外，这次又加上了他的陌生的崇拜者和外国记者。

热尼亚·叶夫图申科朝汽车跑了过来。他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挽起妈妈的胳膊，帮助她走下车来。给她撑起了一把大伞。他始终同她在一起，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他悄悄问我：“谁来讲？”

看来，四年前谢绝讲话一事使他不得安宁，现在他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我们既不想搞集会，又不想发表演说。然而他在墓

碑旁仍然讲了几句亲切的话语。

闪光灯的灯光闪烁，外国记者为我们拍照，但是未提问题——今天不宜接受采访。半个小时后我们散去了。堆满鲜花的墓碑留在了身后的黑暗中。

几天后我同涅伊兹韦斯内见面时，他讲到曾接待了一个原斯大林劳改营囚犯组成的代表团。这些人想把他们募捐的钱亲手交给他，以感谢他塑造了这个墓碑。“我们在墓碑旁边轮流值班，每天换上鲜花。”他们对涅伊兹韦斯内说。

一位亚美尼亚雕塑家把他亲手做的父亲的大理石像安放在墓碑的脚下，并献上自己十分感人的字条。

墓碑前每天都聚起一大群人。人们时聚时散。东一处西一处爆发出热烈的争论。没有人无动于衷。

这当然不会不引起那些论职责应当是无所不知的人的注意。下面这种“阴郁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即：墓碑激发了对赫鲁晓夫的兴趣，使之表面化了。早已烟消云散的关于风起云涌的50年代的回忆又复活了。如今他俩联成了一体——赫鲁晓夫与涅伊兹韦斯内，而且一个人的荣耀维护并衬托着另一个人的荣耀。

对这种情况不能长期听之任之。新圣母公墓“因内部修理”停止对外开放。这种状况持续了十余年。直到现在，到了改革时期，公墓上才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瞻仰者……

墓碑竖起来了，我们欣喜若狂，但这种喜庆中又伴随着忧伤：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打算出国。“同行们”千方百计要把他撵走。他们的这一肮脏勾当渐渐得逞。眼看俄罗斯就要减少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早已开始的对抗又有新的进展。事情的进程突然加速。

我已经提到莫斯科官方画家同涅伊兹韦斯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即形成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战争。但双方显然力量悬殊。涅伊兹韦斯内注定要失败。才华横溢的人怎敌得过受到悉心保养和调理的官僚机器呢。他的处境每况愈下，眼下出现了危机。

表面上一切都平安无事。泽廖诺格勒的工作结束了。尽管没有得奖，却也受到赏识。涅伊兹韦斯内正在创作莫斯科加加林纪念碑的草图，还有来自塔什干、阿什哈巴特和其他城市的重大订货。在制作父亲的墓碑的同时，又在制作朗道院士的墓碑。只是在本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涅伊兹韦斯内的声望和威信与日俱增，全世界都在谈论他。不知不觉地生日到了：满50周岁。这样的生日我国通常是要纪念一下的——勋章啦，画展啦，称号啦，集会啦……没有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授勋，尽管他虚荣心并不算重，却也深受刺激。

“我有的是勋章，这些勋章都比不上，那都是军功章啊，”他不止一次地说道，但可以看出故意怠慢刺伤了他。

他认为让他在建筑师之家举行纪念画展是一种侮辱，因为那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只有少先队员和退休老人才在那里办展览。”他回绝道。

个人画展被完全取消了。

所有这些刺激都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扎得疼，叫你不好受，破坏情绪，影响工作。决定性的打击是十分内行、鬼鬼祟祟地进行的。莫斯科开始筹办奥运会，到处修建新的体育设施，铺设着宽阔的大道。推土机震耳欲聋，一座座楼房被推倒了。地处修建中的体育设施附近的涅伊兹韦斯内的工作室很快也要葬身在推土机下。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准备搬家，该张罗新的工作室了。他手里有一封信，上面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关于优先给他提供房屋的批示。然而美术家协会却作了另外的决定。

“先排上队吧，”他们嘲弄地对涅伊兹韦斯内说。

“排队要等上好几年。每个新入会的人都自动排上队了。可我已年满五十，没时间再等。”他反驳道，

“我们这里人人平等。”这样的回答是冲着他那出名的自尊心和脆弱来的。

涅伊兹韦斯内这回出乎人们意料，他没有一点就着，却拿出了主要的武器——马祖罗夫批示。但无济于事。

“那您去找马祖罗夫同志好了，他不是答应您了吗，”他们建议道。

怒不可遏的涅伊兹韦斯内冲出办公室。过道里等待着他的是一次打击。遇到了一名老同学，此公眼下是莫斯科某单位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张开双臂。

“真是幸会。你还在这儿？我们都以为你早出去了。何时动身啊？”

“朋友”笑道。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回答说，哪儿也不打算去，他是来张罗新工作室的。

“不，你老是这么天真，”“朋友”抑扬婉转地说，“你在这儿什么也得不到。相信我的话吧。”

涅伊兹韦斯内回到工作室时，神情忧郁，十分沮丧，当天第一次谈起出国的事情。起初是开玩笑，后来就认真了。我劝他道：

列夫·达尼多维奇·朗道（1908—1968）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学派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曾多次获苏联国家奖与列宁奖，并获诺贝尔奖（1962）。

“国内人人都知道您。您是个享有盛誉的画家。到那边得从零开始。年过五十这很不易。这里有亲朋好友，那边呢是一个新的还不习惯的世界。”

不过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否正确也没有把握。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太了解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然而……

“他们不会让我工作的。‘麦比乌斯’我是搞不成了。就算在那边默默无闻吧，毕竟还有机会。”他与其说是在说服我，倒不如说是在说服他自己。

有关打算出国的传闻不胫而走。也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文化部长彼·尼·杰米契夫找他谈话。

“谈话谈得不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述说，“但是毫无结果。我又同当局、同党没有什么冲突。我想工作，可美协不让我工作。我就请杰米契夫给我工作，让我免受美协的暗算。此外我别无所求。‘我可不会为了您跟所有的画家闹翻，’部长回答说。我反驳说，跟我作对、妨碍我的不是所有的画家，而是贪污腐化的上层人物，黑势力。他却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可不会为您一个人同所有的画家闹翻。’在他看来这些上层人物就是‘所有的画家’。”

他俩已无话可谈，便分手了。后来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谈话的还有杰·米·格维希阿尼和别的什么人，但谁也不肯去解决他同艺术界官僚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涅伊兹韦斯内在当年的莫斯科尽碍事儿，他是个多余的人。“健全的”腐败官僚主义机体排斥他，把他当成异物。

当时涅伊兹韦斯内的一件重要订货是位于阿什哈巴德的政治教育大厦的外观装饰。

我已经讲过，尽管在莫斯科一切门路都堵住了，但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还是有人乐意找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订货，

这件订货被认为是很有威望的。大厦将赶在共和国的纪念日前落成，届时有贵宾出席。画家的仇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万一他的作品受到人们喜爱可怎么办。后果将无法预料，因此便竭尽所能地设法阻挠。

我曾是某些事件的见证人。有一次应当领取两袋大青颜料以供阿什哈巴德大厦装饰用。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道，在类似情况下雕塑家都是在美协仓库里凭自己的保管收据领取必需的材料。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次却什么都不一样了。

工期迫近——再过一个月就要揭幕，一个小时也不能推迟。基里连科将亲自以中央代表的身分出席。涅伊兹韦斯内要求批给大青，得到的却是不动声色的回答：

“珍贵材料只能发给负责材料的人。”

一架飞机从阿什哈巴德专程来取这两袋东西，在莫斯科等着。土库曼共和国常设代表介入此事，表示可以效劳。

“您不是负责材料的人，”共和国驻中央政府常任代表得到这样的回答。

最后，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给莫斯科市委打电话，这才把那两袋大青给了。飞机起飞了……

就是这样——因每一件小事。

阿什哈巴德的工程勉强完成了。那位贵宾并未对此作出反应，作者的命运毫无变化。

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使涅伊兹韦斯内更加下定决心出走。他并不打算永远离开祖国，他要求保留他的苏联护照，这样便于在异国他乡熟悉环境，但随

时可以回来。然而这是他的同行们万万无法同意的，因为他也可以同不久前一样载誉归来呀。

一直有传闻说问题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为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保留苏联护照而说情。但苏斯洛夫反对，并且占了上风——涅伊兹韦斯内只得侨居他国了。没有退路。诚然，出国也暂且尚未批准。涅伊兹韦斯内在四处奔走。离开祖国是很难受的，但环境在逼迫他走。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顽强地工作到最后一刻。直到临动身前他还同建筑师斯塔莫（会议宫的作者之一）一起参加加加林纪念碑设计方案的角逐。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尽管业已采用的方案无论在表现力和施工上都大为逊色。

“让他走吧。要不一有工作，他就留下不走了……”显然，艺委会委员们这样认为。

眼下在祖国的最后一件作品——朗道院士的墓碑已告结束。

思想家的头像将在作者临行前安放在院士墓前的钛制圆柱上。早从未能实现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思想宫开始，思想家的主题就不止一次地在涅伊兹韦斯内不同的设计中重复过。

出国单纯从技术上说也颇不容易。不久前对涅伊兹韦斯内大张挞伐，不许他的作品展出，如今又宣布他的作品不得运到国外。全部作品都放在工作室里，因为博物馆不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闹事，表示抗议。于是“迎合”了他：作品允许随身携带，但需交纳一大笔税款。他没有这笔钱，也无法筹措。

爆发了一场新的争执。涅伊兹韦斯内陷入绝境，他的神经饱受折磨，他决定铤而走险：

“要是不停止嘲弄，我就当众毁掉全部作品！”

这可不是虚张声势……

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特列季科夫画廊收购部分作品，所得款项用来交纳税金。诚然，收购的作品都是早期那些最缺乏表现力的东西。不过作者如今已经不为此感到不安了。只要让走就行。

看来，一切都解决了。雕塑作品已在整理和打包，但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放行。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拖得叫人难受。

3月初我到杜尚别去，打算呆上十天。行前一切都毫无变化。似乎往后日子还长着呢。

我回来后，我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去电话。

“再过两天我就乘飞机走了。票已买好。”他一通话把我给说懵了。

我丢下手里的工作就往工作室赶。那里人声鼎沸。在往外搬东西，到处都是木箱。准备工作达到高潮。

“你前脚刚走，就把我叫到外国人签证登记处去，给我发了证件，还提醒说，三周内离境有效。所以你有可能回来见不着我了。”

临行前的日子不分昼夜：收拾，忙活，奔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把大部分作品都随身带走了。是用火车运走的。一部分作品卖了——上路需要钱，一部分送人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舍列梅季耶沃2号机场尚未建成。我们都聚在老机场内。香槟，亲吻，话别。到了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之间是一道边界，这暂且

只是一道透明的隔墙，但已经不可逾越了。可能是永远分离了。飞往维也纳的班机把当废物扔掉的国家的民族财富、它的宝藏和荣耀的一部分带到异国他乡去了.....

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是，要是在以前，这些人会把他藏进劳改营，如今“只不过”是把他撵走了，世界文化中总算没有失去这位杰出的人才。

聊以自慰吧.....

常常有人问我：

“据说赫鲁晓夫晚年同涅伊兹韦斯内很要好，还嘱咐他给自己立个墓碑，有这么回事吗？”

“有这么回事，”我回答说：“论性格他们都算得上是人物，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至于没有发生嘛，那只是偶然现象.....”

